



YANHUANGCHUNQIU

炎黄春秋

1993/4(总第13期)

周恩来亲自策划指挥的 **开国第一重大行动**

**彭德怀落难与
林彪得势真相**

胡耀邦：
中国人民的儿子

解放后郭沫若
锐气何不及当年

1938：蒋介石身边的日本间谍





英杰谱

江总书记探“亲”小记

卢弘

23

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会晤,已多有披露,但毛泽东出访的保卫工作是如何筹划的?江青在毛泽东临行前为何到戒备森严的车站吵闹?一路上发生了哪些重大事件?却鲜为人知。

周恩来亲自策划指挥的 开国第一重大行动

杜卫东 2



彭德怀庐山获罪,是因为写了“万言书”吗?毛泽东当时就说:万言书讲的是真话……

彭德怀落难与 林彪得势真相

权延赤

25

春秋笔

抗战初期,蒋介石曾有意抗日,但南京国民政府最高军事当局的绝密情报屡屡被日军获悉。原因何在?

36 徐刚

1938:

蒋介石身旁的 日本间谍



古镜台

20

扑朔迷离的南山集案

刘跃进

法制苑

90

总参谋部派来的“大校”

田浩

神州景

76

价值千金的唐墓壁画

王兆麟

人海浪



——纪登奎下野之后 下页书 63

下期要目

- 我参与“丁陈反党集团”案处理始末
- 毛泽东指挥包击金门
- 中国海军泣血远东
- 宣不宣传雷锋曾有过争论
- 一本英雄书 一场生死劫
- 叶利钦、海部、贝克……和香格里拉的公关小姐

动乱中的乱动

柳 萌 [71]

向苗地兄索画记趣

姜德明 [94]

遭人嫉恨的林芳兵

张维国 [22]



古今谈

借东风 华人·华文与新加坡 黄孟文 [35] 林斤澜 [57]

求是篇

郭沫若解放后锐气为何不及当年
郭老晚年二、三事 王朝柱 郭汉英 [52]

高岗曾建议将东北划归苏联吗?

师 哲 [84]

赤子心

周奇勋和他的“阶梯行动” 于 源 [86]

神州景

价值千金的唐墓壁画 王兆麟 [76]

顾问：
伍修权 楚图南 费孝通
谢冰心 杨静仁 冯文彬
王朝闻 赵朴初 胡景青
特约编委：
王俊义 冯其庸 张 柬
张国琦 李学勤 李 普
刘颖南 苏双春 常 征
温济泽 廖盖隆 戴 逸
韩劲草 魏久明 魏 巍

社长(法人代表):杜导正
副社长:方 实
丁洪章
宋文茂
总编辑:洪 炉
总经理:徐 孔
副总编辑:刘家驹 杜卫东
美术编辑:刘少波 李科平
社 址:北京市文津街7号
邮 码:100802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1003-1170
出版日期:每月11日
广告许可证号:京西工商广字
235号
印刷: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
发行:《炎黄春秋》发行处

炎黄春秋

开国

第一重大行动

英杰谱



□周恩来一扬剑眉，问：“那个国民党的潜伏电台侦破了没有？”

□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回答：“正在全力侦破，目前，还没有突破性进展。”

● 杜卫东

1949年11月的一天。

当秋夜抖动黑色的翅膀为古都北京罩上了一件藏青色的睡袍时，中南海西华厅的灯亮了。刚刚参加完一个重要国务会议的周恩来套上蓝布套袖，又坐在了那张宽大的写字台前。那时候，他正值壮年，精力充沛，生命如同一支燃得正旺的火炬。

“报告！”秘书走进来，对正伏案审阅文件的共和国总理说：“罗部长和杨副部长他们来了。”

周恩来闻声放下手中的毛笔，抬起头说：“噢，快请他们进来。”

新中国刚刚庆祝了她的诞生纪念日。建国伊始，百废待兴，作为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其工作之繁重是可想而知的。而这几天，他几乎正在倾其全力策划开国以后的第一重大行动——毛泽东出访苏联。

几个月以前，当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转折关头，毛泽东为取得斯大林的理解与支持，曾有意出访苏联，只是因为斯大林考虑到两军决战的关键时刻主帅不可轻动以及毛泽东的安全和健康等因素，没有同意，而是派了苏共有威望的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来华听取意见。

这一次，毛泽东准备亲率代表团赴苏联参加斯大林70寿辰的纪念活动，同时，与强大的苏联缔结一个条约，以为新中国的建设提供强有力的外部依托。

这是毛泽东平生第一次出国远行，这位从韶山冲的小路上走来的乡村教师，以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无法比拟的胆识与气概，挽长纆，缚苍龙，“气吞万里如虎”，终于亲手把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在天安门广场的上空。在此之

前，这位缔造了一段辉煌历史的时代伟人，在黑暗中摸索，在血雨中苦斗，从未离开过生他养他的这片故土。因此，他的第一次出行就更为举世所瞩目。

当时的治安形势颇为严峻。

毛泽东乘车所经地区大多为新区，土改尚未进行，铁路虽然全部接收过来，但内部人员有待清理，我党对专列保卫工作还缺乏经验，铁路公安保卫工作也尚在建设之中。而且，沿途有着众多潜伏下来的国民党武装特务出没活动。

更使周恩来感到焦虑的是：我有关部门破译了一个密码电报，是国民党北平保密局的潜伏电台发出的，向台湾当局通报了毛泽东出访这一重大战略情报，台湾当局也声称要对专列进行颠覆。

毛泽东出访苏联，必须要向全国人民打“保票”，保证万无一失，否则，对于刚刚诞生的共和国来说，其灾难性的后果简直无法想象。他今晚紧急召见公安部的部长和副部长，就是要对主席的安全问题再做一次筹划。

罗瑞卿和杨奇清推门进来，并排向共和国总理举手敬礼——这是一对老搭档了，很早就有所配合，为我党的保卫工作立下过汗马功劳。罗瑞卿身材高大，眉宇间时时流露出一股军人的豪气；杨奇清身材矮小，举止中透着长期担负保卫工作所特有的那种机警与干练。

“请坐，坐下谈。”周恩来一指沙发。

警卫员走进屋，将两杯刚刚沏好的香茗放在公安部长和副部长的面前。

罗瑞卿揭开杯盖，一股清香袅袅而出，他啜饮一口，连连赞道：“好茶，好茶！”

杨奇清没动茶杯，却从上衣口袋里抽出一支香烟。这几天，为部署和安排主席专列的保卫方案，他几乎夜不成眠，紧张工作时尚无感觉，一旦坐下，顿时感到阵阵困倦袭来，他想抽一支烟提提精神。

“奇清啊，怎么，熬不住啦？”公安部长和自己的搭档开着玩笑。

杨奇清笑着摇摇头，又把香烟放回衣兜。主席嗜烟，遇有客人前往总会递上一支香烟；总理豪饮，待客却每每是清茶一杯。因为主席也抽烟，杨奇清在主席面前吸烟不觉太拘束，在总理的办公室吸烟反倒有些拘谨，因为不抽烟的人一般也讨厌烟味儿。

周恩来微微一笑：“奇清同志，你请自便，我不抽烟，可是并不禁止别人抽烟嘛！”

杨奇清重又将香烟抽出，打火点燃，深深吸了一口。

周恩来的面色渐渐严峻，他望了一眼罗瑞卿和杨奇清，说：“怎么样，我们把情况再凑凑？”

罗瑞卿放下茶杯，从公文包里掏出一张地图铺在茶几上，上身前倾，语气庄重地汇报：“东三省解放得早，像黑龙江，我们1947年就搞了土改，但是那里日本人统治的时间长，还有不少武装土匪在铁路沿线出没，相对而言，倒是河北境内要安全得多，老根据地嘛！”

周恩来点点头，用粗杆的红蓝铅笔在地图上东三省

境内重重划了两道，问：“那么，采取了哪些防范措施呢？”

“根据总理的指示，我们一个省一个省抓了落实，首先，组织部队对沿途匪患进行清剿，特别是东三省境内，清剿工作已经搞了几个回合；同时，由总参谋部调动部队护路。北京——天津——山海关一直到满洲里，每隔一段儿就有一个步兵游动哨！并派出巡逻部队沿线加强巡视，不准任何路外人员接近线路，不准在铁路两旁逗留，对可疑人员，允许哨兵严加盘问，必要时扣留送上级审查。”

周恩来把粗杆红蓝铅笔在地图上重重一划，说了一声：“好！”少顷，又语重心长地道：“对主席的安全保卫我们一定要做到一丝不苟，不能有丝毫的大意；同时，又要相信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发动人民群众，不能一说要提高警惕了，眼里便处处都是敌人、坏人，我们的专列刚刚开过去，人家老百姓就在后面骂娘，这是个政策性很强的问题，你们一定要掌握好！”

罗、杨点点头。

周恩来又一扬剑眉，问杨奇清：“那个国民党的潜伏电台侦破了没有？”

杨奇清回答：“正在全力组织侦破，目前，还没有突破性进展。”

周恩来站起身，双臂交叉抱在胸前，在房间里来回踱了两步，说：“这个案子，我已经向主席做了汇报，主席指示，在他回国以前，一定镇压这些反革命！”

杨奇清摁灭烟头，起身立正：“请总理放心，我们保证在主席回国前清理掉这个隐患！”

罗瑞卿也站起身，问：“主席起程的日子定了吗？”

周恩来摇摇头：“还没有最后定下来，一旦定下来，我会立即通知你们的。不过，这是这次重大行动的最高机密，对非直接关系人员要一律严格封锁消息。”

“是！”罗瑞卿和杨奇清立正应答。

周恩来望住公安部正副部长，双眸中闪烁出信任的光，沉思片刻又关切地叮嘱说：“没有特殊情况，你们这两位‘保卫大臣’是要送主席到满洲里的。注意，路上有什么情况要及时向我报告，正常情况下，也要每隔4个小时向家里通报一次情况。”……

□电话铃响了。周恩来拿起听筒，是中央军委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的电话。

□放下听筒，共和国总理以手示意铁道部长：“代远同志，请接着谈。”

公安部长罗瑞卿和副部长杨奇清的轿车驶出中南海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委员、铁道部部长滕代远的轿车又“嘎吱”一声停在了西华厅的门前。应召而至的铁道部长推开车门，快步登上西华厅的台阶。

周恩来已经在门口迎候：“代远同志，快到屋里坐。”

铁道部长脱下夹大衣挂在门口的衣帽架上，回首望

着总理，语气中饱含关切：“总理，您要注意身体啊！”

周恩来揉一揉罩上一圈黑晕的眼睛，又开话题道：“罗瑞卿和杨奇清昨天从我这里走，沿途的保卫工作他们已经会同总参谋部做了妥善的安排，铁路上的保卫工作可要由你唱主角喽！”

滕代远点点头，从衣兜里掏出笔记本摊在面前的茶几上，说：“我们研究制定了一些具体部署，不知道是否妥当？”

周恩来神情专注，剑一样的浓眉下是一双睿智的目光：“好，你谈谈看。”

“首先，要纯洁内部，对沿线铁路职工进行严格的审查、调整和清理，参加专列工作的所有人员，必须是政治上绝对可靠的党、团员，不允许留一个可疑分子；沿线各站的值班人员，必须经过党委的逐个审查，确保政治上的可靠，同时要求各级党委的负责干部深入基层，坚守岗位，及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

周恩来点点头，“这一点很重要。我再送你几句话：党委挂帅，全党动员，绝对保密，精心部署，分段负责，及时检查，严密保卫，内外结合！”

滕代远埋头记录。少顷，又抬起头来说：“其次是整顿设备。我们已经对全路一切设备，尤其是直接与列车运输有密切关联的车、机、工、电等动员全体职工进行了大检查、大维修、大保养，并指定专人负责，严格交接班制度，使设备始终处于良好状态，消灭一切可能发生的技术事故，从物质上、技术上为主席出访做好充分准备。第三……”

“嘀铃铃铃……”办公桌的电话铃突然急促地响了起来，周恩来抓起红色的电话机听筒：“喂，我是周恩来……噢，聂老总……准备调动三个军的部队参加护路……好，我知道了。”他抬起手腕看了一下手表，“这样吧，过两个小时，你到我的办公室来一下，我们再当面谈一谈。”放下听筒，周恩来以手示意铁道部长，“代远同志，请接着谈。”

铁道部长继续汇报道：“专列的全面检修，由铁路局负责，逐辆彻底检查，并请部队派工兵用雷达扫描探测有无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然后实行封闭，派部队24小时警卫，凡上车人员，必须持有‘特许证’，验证后才可上车，最后由铁道部派人验收合格后方准使用。”

周恩来插话道：“这一两天，你抽个时间陪我到机车厂看一看专列。主席要在车上呆几天几夜，一定要安全舒适才成。”

铁道部长颇为自信地一笑：“您放心吧，专列我已经查看过了，这是我们接收的国民党高级列车，又加以全面改造，专门为主席外出准备的。”他略一停顿，见共和国总理仍以关切的目光注视着自己，便进一步介绍道：“专列上有一节瞭望车，挂在列车尾部，有一节会议室式的车厢，还配备了几节一般的软席卧车和高级餐车。车内温度可以自由调整。”

周恩来满意地点点头，象想起了什么似地又问：“床是软的还是硬的？”

铁道部长回答：“软床。”

周恩来一摆手：“你们不了解主席的生活习惯，他是一生睡不惯软床哟！”

“这我们倒是忽视了。”铁道部长挠挠头，有些不好意思。

周恩来指示说：“把软床换成一张藤床，要有弹性而又平直，这件事你要亲自落实一下。”

“是。”铁道部长点头应允，他把笔记本翻过一页接着汇报，“根据总理的指示精神，我们在列车编组方面采取了一些特殊措施：为了迷惑敌人，防止敌特发现后中途破坏，拟同时派出三组列车通过。三组列车的顺序可随时调整，前列为警卫专车，派部队武装押运，并专门安装有无线电军用电话与专列上的指挥台随时联络，中间一列为专车，后面一列做备用为后卫车。行进中，三组专列同时通过，使敌人无法弄清专列的准确位置。”

周恩来赞扬说：“兵不厌诈嘛，这条措施很必要。”

“在运输调度上，为预防一切事故，在专列未通过前，停开一切客货列车，如在沿线运行可就近进站待避，待专列通过以后再重新编组发放。”铁道部长合上笔记本，抬头望住共和国总理，“您看，这些措施可行吗？”

周恩来沉吟片刻，眉锋一扬：“好，就这样办！”见铁道部长起身欲走，周恩来又一举手示意，留住铁道部长，然



后起身踱到办公桌前，轻轻撕下一页台历，转身道：“我再给你补充两点——”

铁道部长忙掏出笔记本，摊在手掌，注视着共和国总理。

“第一，要严格保密。铁道部和公安部要分别为专列规定代号，以便于在电话电报上使用，沟通上下的联络。”

“我们也考虑了这个问题。罗部长他们规定专列代号为‘李德生’，铁道部为专列规定的代号为9002。”

周恩来的脸上绽出一缕满意的微笑，那笑容象一圈涟漪，很快便消逝了，随即代之以肃穆的神色：“为做到高度保密，各地党政负责干部，一般不进站迎送，除非主席特别召见的，首都出发时，中央领导同志也不进站送行。”周恩来把撕下的那页台历放在桌子上，加重语气说：“代远同志，保卫工作由公安部统一领导，统一指挥，铁路内部一律由铁道部公安局全权负责并随时向公安部请示报告。另外，对铁路职工的审查和清理，你亲自挂帅，统一领导，既要不留一丝一毫的危险隐患，又不许动辄捕人，要严格执行审批规定！”

“请总理放心，我回去以后马上进行布置。”

周恩来望了一眼桌面上那张撕下的台历，语气若有所思：“各项准备工作要赶快就绪，专列尽快进入待命状态，保证命令一下，10分钟内即可开进车站，到达始发线。能做到吗？”

“没问题！”铁道部长把笔记本装进了公文包。

□公安部副部长说：“军中无戏言，你说的话可算数？”

□侦察科长一拍胸脯：“敢立军令状，完不成任务提头来见！”

北京。公安部会议室。

副部长杨奇清一口一口吸着烟，乳白色的烟雾从牙缝间“吱吱”地冒出来，汇成一片淡淡的云雾，在他的眼前聚集、飘散……

气氛显得有些沉闷，仿佛每升空气都储满了铅块，压抑着使人透不过气来。

杨奇清狠狠在烟灰缸里拧灭烟蒂，用犀利的目光扫视了一眼与会者，语气颇为严厉：“都说话呀？怎么，哑吧了一个个儿的？”

人们仍然沉默。

国民党潜伏电台至今没有起获，可是，它仍在频繁活动，据最新破译的台湾当局来电，敌潜伏电台台长因通报毛泽东出访苏联的情报有功，已被国民党保密局由少尉提升为少校。而我公安部门除了掌握破译的署名0409的敌电译文以外，其他任何线索都没有，侦察工作毫无进展，毛泽东、周恩来对破案工作甚为关心，不断向杨奇清询问情况，难怪主管侦破工作的公安部副部长着急。可是，着急又有什么法子？这个该死的敌潜伏电台，到底隐

藏在什么地方呢？

见没有人说话，杨奇清有些生气，语调也提高了8度：“主席已经规定了破案期限，他回国以前必须把这些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镇压，你们说怎么落实主席的这个指示呢！”他扫视了一下会场，忽然问：“哎，曹纯之怎么没有来参加会？”

有人回答：“他病了！感冒。”

公安部副部长一挥手：“去，把他给我叫来！”

曹纯之是公安部的侦察科长，曾破过多起大案、要案，为人精明干练，经验丰富，是一个十分难得的侦察干部。

警卫员跑到曹纯之的宿舍，一推门，见侦察科长正躺在床上发汗，便一把撩起蒙在他头上的棉被，说：“嘿，还睡呢？”

曹纯之睁开眼，见是副部长的警卫员，便问，“怎么，出什么事啦？”

“敌电台还在发报，找不到敌人，杨副部长火了，叫你呢！”

曹纯之挣扎着爬起来，随警卫员来到会议室，喊过“报告”，一只脚还在门外，杨奇清就大声责问：“你曹纯之是公安部的侦察科长，紧要关头你到那里去啦，嗯？”

治安处副处长苏宇涵赶忙为曹纯之开脱：“老曹这两天发烧，这个案子没有告诉他。”

杨奇清掏出一支烟，扔给侦察科长，语气中信任多于责备：“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你早不病，晚不病，偏在这么个关键的时刻病了，你曹纯之讲理不讲理？啊！”

曹纯之擦燃火柴，先为副部长点燃香烟，接着又为自己点燃，然后找了把椅子坐下，不慌不忙地说：“不就是侦破一起潜伏电台的案子吗？我负责侦破就是了！”

杨奇清注视着侦察科长，“你说得倒轻巧，有期限的！”

“保证按期破案！”曹纯之胸有成竹。

“军中无戏言，你说的话可算数？”杨奇清了解自己的这个老部下，知道他言出行随，不打诳语，但这个案子事关重大，容不得半点懈怠，便又叮问了一句。

曹纯之一拍胸脯：“敢立军令状，完不成任务提头来见！”

杨奇清眉锋一扬，目光中闪烁出喜悦：“事到如今，我也只好有劳你这个病号披挂上阵了！”说着，他用目光扫视了一眼与会者，高声宣布道：“就这样定了：部里的侦察力量，市局的侦察力量，统一由曹纯之指挥，你曹纯之要天天晚上到我家汇报侦察工作的进展情况和相应措施，今天在坐的，有一个算一个，统统给我当参谋，都天天晚上到我家听取曹纯之的汇报，我要亲自领导此案的侦察工作。”说罢，杨奇清站起身，一边把笔记本合起来放进衣兜，一边对秘书说：“告诉后勤部门，曹纯之要什么，不要我批，保证供应。散会！”……

杨奇清的家就在公安部的大院里，一所老式的平房。从那天以后，这所平房就成了破案的总指挥部。

第二天晚上，曹纯之匆匆来到杨奇清家里，拿来了“郭国顾巩”四姓近200名嫌疑分子的材料，这是连夜调动公安部的电讯侦察手段从多少万份的档案材料中筛选出来的。因为经过猜译，敌电文署名0409可能是郭国顾巩四字之一。

曹纯之向杨奇清汇报了自己的分析和工作进展。杨奇清听罢，用手翻了翻材料，又漫不经心地推开说：“我看这堆东西没有什么用。你开动开动脑筋，想一想那些特殊作用的侦察手段！”……

回到宿舍，曹纯之躺在床上翻来翻去睡不着觉。自己苦心想出的侦破切口一下子就被部长否定了，那么，什么样的手段有特殊作用呢？想不出来，他就扭亮床头的台灯拿起了一本书。这是他长期从事侦察工作养成的一个习惯：思路不开的时候就看书，分散一下注意力，冷却一下头脑，再重新进行思考。

他顺手拿起的这本书是《政治经济学》。进城了，党要求干部提高思想政策水平，他的床头便摆满了马列著作和有关理论书籍，他翻到的这一章正好讲的是价值法则，读着读着，他的脑子里仿佛突然闪进了一道亮光：价值法则调节作用如此之大，难道反革命就可以不受它的调节吗？对，查汇！

仿佛是迷路的人发现了一个路标，曹纯之一个鲤鱼打挺翻身下床，趿拉着鞋敲响了隔壁的房门：“老成，成润之！”

侦察员成润之披衣开门，问“什么事？火上房似的。”

“有办法了！”曹纯之一脚踏进房间，从成润之放在桌上的烟盒里抽出一支烟边划火柴边兴奋地说：“向同志们布置，北京所有托办汇兑的银行邮局统统进行检查，凡是国外汇给北京的款子收款人的名字都要记录在案。”

成润之望着曹纯之，目光里有些茫然：“你这是想起那一出了，《空城计》还是《三岔口》？”

曹纯之吸了一口烟，悠然吐出，冲成润之鬼诡地眨眨眼：“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有哪个傻瓜肯不要钱，豁着脑袋掉了干反革命勾当的！”

成润之恍然大悟，一拍大腿道：“对对对，我这就去布置！”

曹纯之一伸手拉住成润之：“且慢，让同志们再睡一会儿，天亮了再去查不迟。”稍停，他又说：“汇款保密可是受政府保护的。咱们先研究一下怎么个查法。”

成润之说：“这不难。我们的同志拿着介绍信，找他们的领导机关，说明情况，人家肯定会密切配合。”

曹纯之点点头，略一沉思：“还有两条也必须提醒同志们注意：最快的速度和确保秘密！”

成润之点点头。看着曹纯之的眼睛布满血丝，想到他发烧未退，便有些心疼地说：“你赶快抓紧时间睡一会儿吧！”

曹纯之向门口走去，刚要出门又回身叮嘱说：“天亮以后，除了查汇的同志外，其他同志一律在家待命，回来

一份材料，就立即派出人员调查落实有无疑点。”

“对！再加上政治动员，提高责任感，行了吧？”成润之心疼地望着侦察科长，语气中充满了关切，“时间不早了，你赶快抓紧时间睡一会儿吧！”……

第三天晚上，曹纯之来到设在杨奇清家的总指挥部，向副部长汇报了工作进展，杨奇清使劲地拍了拍侦察科长的肩膀，高兴地说：“思路一开，就看见胜利的曙光了！”……

可是，一连两天过去了，在北京的收汇名单中没有查出可疑线索，当曹纯之心情沉重地把这一情况报告了杨奇清以后，公安部副部长胸有成竹地一摆手：“北京没有，就到天津去查嘛！”

曹纯之闻听心头一亮，大有“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他一拍脑门，惊喜地说：“对呀！明天我就到天津去查！”

在天津，查汇工作有了突破性进展。

北京新侨贸易总公司计采楠颇为可疑，新近从香港汇给她的一笔款项比过去每次汇的多出好几倍！而且，计采楠为什么要舍近求远，每次都让香港把钱汇到天津呢？

晚上，曹纯之向杨奇清作了汇报，杨奇清一听非常高兴，他拍着曹纯之的肩膀说：“有事干了！老曹你调动最精干的侦察力量，抓住计采楠不放，破案工作很可能由此打开缺口！”

经查，新侨贸易总公司是集社会游资和海外侨胞投资而组建的一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复姓司徒，名美堂。计采楠是公司股东之一，年方20多岁的一位小姐。她在新侨公司没有职务，也不到新侨公司上班，而公司里有一个叫孟山的职员却是这位计小姐的姘夫，时常到她那里幽会。

根据杨奇清指示，计小姐被严密地监视起来。

每天晚上曹纯之都向杨奇清汇报工作进展，杨奇清则随时否定掉许多当日跟踪对象，确保外线工作不走弯路。

一天，曹纯之汇报了一个“重要线索”：一名侦察员发现，和孟山有来往的一个乡下老头，上了三轮车后面向后坐着，此人行踪诡秘必有问题，应重点跟踪。

杨奇清听曹纯之讲完情况，微微一笑说：“明天你上街看看，侦察员有没有自己隐蔽不好，反被人注意的问题。”

第二天，曹纯之在金鱼胡同果然发现，这个侦察员骑自行车跟踪时，他的手枪红缨却露在衣服外面一点儿，曹纯之立即骑车赶上小声叫他回机关。晚上，杨奇清听了汇报，哈哈大笑道：“隐蔽工作暴露了，就等于作战伤亡了。幸好才开始，现在跟踪的对象还不一定是我们要找的敌人，如果跟上了敌人，这样粗心大意的侦察员怎么能打胜仗？”

曹纯之有些迷惑，副部长怎么就基本断定了侦察员跟踪的那个乡下老头不是潜伏下来的国民党特务呢？

杨奇清象是看出了曹纯之的疑惑，他点燃一支香烟，

深深地吸了一口，不紧不慢地说：“老曹，你想想，一个乡下人进城，发现一个小伙子老是跟着他不放，人家能不害怕吗？回头看看，跟着自己的小伙子时隐时现，干脆转过身来盯着看。隐蔽的敌人不会那么傻，那样一来，他岂不是彻底暴露了吗？”

听了副部长的分析，在场的人不住点头称是。

“老曹，把握住两条，一是紧跟孟山，估计这家伙会有所动作，二是严密监视住那个计小姐，从她身上才可能发现线索，扩大战果！”杨奇清说着，轻轻在烟灰缸里磕去烟灰，抬眼望住侦察科长，目光充满了期待与鼓励，“胆大心细，成功的曙光已经看得见喽！”

按照杨奇清的指示，侦破工作果然又有了重大进展……

□毛泽东见到江青，脸上不由露出惊讶的神色：“哎，你怎么来啦？”

□江青有些嗔怪地嘟囔了一句：“说走就走，你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啊！”

1949年12月6日傍晚。

从新华门到北京前门火车站沿途，隔一段路就有一名荷枪实弹的解放军士兵。道路两旁，卖糖葫芦的，擦皮鞋的各种小贩也比往日多了许多……

一辆军用吉普车驶出新华门缓缓向前门西站开来。司机是一位年青的解放军战士，他双手紧握方向盘，瞪大眼睛注视着路面的情况，副司机的位置则坐着一位干练的警卫员，他右手握着胯下的驳壳枪枪柄，一双机警的眼睛中闪烁着警惕的目光，并不时回过头来看看坐在身后的首长。

中央军委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端坐在后坐上，面色严峻，目光如炬。隔着车窗，他注视着沿途部队警卫的情况。时值隆冬，西北风打着尖利的哨声在街市上呼啸，担负警卫的战士却一个个军容整齐，精神抖擞。代总长的眉宇间流露出一缕满意的神色……

20时许，几辆黑色轿车从新华门驶出。门口的警卫持枪敬礼，他仿佛觉得，中间那辆轿车里坐着的那个戴皮帽穿大衣的人，体态很像毛泽东，块头身材都象，他想把自己的这一发现告诉带班的班长，但是他没有说，警卫工作的纪律要求他学会沉默。

坐在轿车里的正是毛泽东。

前门火车站戒备森严，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城墙上，凡是枪够得到的地方，都布置上了岗哨。北京刚刚和平解放，兵不血刃，国民党几十万大军接受了整编，肯定有暗藏下来负有特殊使命的特务，加上台湾当局也得知了毛泽东出访苏联的战略情报，扬言要有所动作，所以警卫工作严之又严，用时任铁道部保卫处处长任远的话说：“就是一只鸟想飞过去，也甭想。”



毛泽东乘坐的专列将于当日 21 时从北京出发。随行人员有陈伯达、师哲、叶子龙、汪东兴等人。

这是周恩来在听取了各方面的汇报，认为主席的安全已有确实保证后，经请示主席同意后做出的决定。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副部长杨奇清和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已分别登上专列进行了视察。

20 点 30 分，毛泽东的轿车驶入火车站，停在第一股道上停放的专列车厢前。

警卫员拉开车门，头戴皮帽、身穿大衣的毛泽东弓身钻出汽车，与已等候多时的周恩来颌首致意，然后在铁道部部长滕代远的引导下登上列车。

车门两侧分别由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副部长杨奇清、铁道部公安局副局长冯纪和保卫处处长任远守卫，目的是使别人无法看见主席登上哪节车厢。

毛泽东登上火车，周恩来介绍说：“代远、瑞卿和奇清同志随您到满洲里，这几位是老熟人，用不着介绍了。还有两位同志，一位是铁道部公安局的副局长冯纪，一位是保卫处处长任远，也要一路护送主席到满洲里，要不要叫过来认识一下？”

毛泽东含笑作答：“是不是刚才在车门见到的那两位？已经认识了嘛！”

周恩来笑一笑，又用目光扫视了一下车厢的陈设，然后转过头来对毛泽东说：“主席，还有什么指示吗？”

毛泽东脱去大衣，摘下皮帽，用右手指拢了拢头发，道：“看来，是万事具备，只欠东风喽！”他抽出一支香烟点燃，深深吸了一口，再将烟雾从牙缝间徐徐吐出，望住周恩来深情地说：“恩来，家里的事情你要多辛苦了！”

周恩来点点头，伸出手：“主席，请一路保重。家里的事情，我们会及时发电报向您请示。”

毛泽东也伸出手：“那好，我们在莫斯科见！”

“莫斯科见！”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毛泽东此行的目的是为斯大林祝寿。同时，他还想借此机会搞一个“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与苏联缔结一项友好互助条约。不过，这是两国政府间的事，自然应该由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出面了。

周恩来走下专列车厢，一招手，又把罗瑞卿、滕代远和杨奇清叫到一起，语气严肃地说：“主席可交给你们了，一路上要小心，小心，再小心，不能有丝毫的马虎和松懈啊！”言毕，他弯腰钻进汽车，摇下车窗，又向三人摆摆手说：“我在北京等着你们的胜利消息。”

目送着总理的车开走了，三人重新登上车厢。

此时，站内异常肃静，站台上无一闲人。

忽然，车站门口传来一阵吵闹声，是一个女人的声音：“为什么不让我进，啊？为什么！”

正在站内巡视的保卫处处长任远闻听一愣，不知是什么人竟在这里吵闹。他急忙向车站门口跑去。

警卫战士横枪立目，刺刀一横，在寒夜里闪闪发光：“你有通行证吗？没有通行证就是不让进！”

“什么通行证？”那女人 30 来岁的样子，中等身材，不胖不瘦，穿一件灰色的棉旗袍，裹一条浅紫色的长围巾，鼻梁上架着一副白边眼镜。

任远觉得此人有些眼熟，一时又想不起在哪里见过。

“放我进去！”女人仍要往站里闯。

警卫战士眼睛一瞪：“再在这儿吵吵，我就不客气啦！”

“你敢，你敢？”女人叫起来，语气中充满了委屈和轻蔑。

任远已走到近前，借着路灯一端详，才猛然想起，这不是江青吗？毛泽东的夫人！

任远是延安抗大的四期学员，毕业时，鲁艺演出京剧《打渔杀家》，江青曾在戏中客串女主角。她念唱做打都有些韵味，在延安曾风光一时。

“这不是江青同志吗？”任远掏出特别通行证让哨兵查看了一下，然后说：“让她进去吧，有什么问题我负责！”哨兵这才把枪一收，闪开了一条路。

江青随任远向毛泽东乘坐的车厢走去。一边走，任远一边批评江青：“你有特别通行证吗？没有，怎么能非进不可呢？”

江青瞪了任远一眼说：“我开会刚回家，一看主席没有了，上了火车站。这不，我饭也没吃就赶来了，可是他居

然不让我进！”

“哨兵也不认识你，怎么能放你进来呢？”那时的任远30多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而江青也不过是中宣部的一名普通干部，并没有像后来一样权倾朝野、颐指气使，所以任远也不管她愿意不愿意听，继续沿着自己的思路批评她，“不让你进来，你就吵闹，像什么样子？如果人家知道你是主席的夫人，影响多不好！”

江青不再吭声。

来到毛泽东的车厢门口，江青爬了上去。主席正坐沙发上看文件，任远敲门，他抬起头来说一声，“进来。”门开处，毛泽东见到了站在任远身后的江青，脸上不由露出愕然的神色：“哎，你怎么来啦？”

江青有些嗔怪地嘟囔了一句：“说走就走，你怎么也

□毛泽东的专列抵达天津，在铁轨上突然发现了一枚手榴弹。

□罗瑞卿部长生气了，两道目光似一对闪着寒光的宝剑：“简直是乱弹琴！”

专列以70公里的时速行驶在北宁线上。

毛泽东的专车位居中间。前卫列车由七、八节车厢组成，中央警卫团的一个连押运，接受随行的公安部领导指挥和调动。后卫列车是空的，作为备用，由北京铁路局派人看守。三列火车相距一二十华里的距离，每一列专车上都装有电话，可随时通话沟通情况。

为了防止泄密，列车乘务人员在事先将毛泽东的车厢整理就绪后，不听召唤，一律不得进入。直到这时，所有的乘务人员，包括亲自为毛泽东开车的北京铁路局机务处处长，一概不知他们的这趟专列是护送那位中央首长出国。

照料主席的起居饮食，由毛泽东带来的厨师直接负责。毛泽东吃不惯西餐，所以这次中央办公厅专门为他出访配备了一位湘菜名厨。

罗瑞卿、杨奇清、汪东兴、冯纪和任远等毛泽东的贴身保卫人员；可以直接进入毛泽东的车厢，随时照料毛泽东的生活。

22时许，列车驶入天津郊区。

冯纪、任远来到毛泽东车厢的门外，举手敲门：“笃，笃笃！”

毛泽东正在看报，听见敲门声放下手中的报纸：“进来！”

冯纪、任远推门而入，举手敬礼：

“报告主席，我们是……”

毛泽东一摆手，微笑着说：“我们已经见过面了嘛，你们哪位是冯纪？哪位是任远啊？”

毛泽东博闻强记。刚上车时，彼此已经打过照面，周恩来介绍随乘人员时又说了他们的名字，毛泽东便记下了，所以象老朋友一样和他们打着招呼。

“我是冯纪，他叫任远。”

毛泽东注视着任远：“任远，任远，任重而道远。好好！刚才，还是你给江青同志解的围吧？”

任远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主席，天已经不早了，请您休息吧！洗漱用具都是现成的。”

毛泽东笑着一摆手：“这些东西我自己有，用不着公家另行准备！”说着，从身后拿出一只小布袋，在冯纪和任远的眼前晃了晃：“你们看，我这里不是带来了嘛？毛巾、香皂、牙刷和牙膏，一样不缺！这些东西你们收起来。”

冯纪忙上前将准备好的洗漱用具收拾起来，关切地对毛泽东说：“主席，请您早点休息吧！”



不跟我说一声啊！”

毛泽东脸上露出一丝歉然的神色，诙谐地说：“哟，没有向夫人请假，多有冒犯，恕罪，恕罪！”

江青从衣兜里掏出一瓶辣椒酱，递给毛泽东：“喏，早就给你准备了，差点没有带走。”……

毛泽东接过瓶子，举到眼前端详了一下，随手放在沙发上……

不过，当江青10分钟以后从毛泽东的专列上下来时，已经喜笑颜开了，她挺胸昂头地走过进站口时，并没有忘记狠狠地瞪了那位阻拦她进站的年青哨兵一眼。

21点正，毛泽东乘坐的专列在北京铁路局机务处处长亲自驾驶的“毛泽东号”机车牵引下徐徐启动，开出北京站。

一声清脆的汽笛长鸣，把这个历史的瞬间永远地定格在了共和国的编年史上。

毛泽东看了看厢壁上的挂表，习惯于夜间办公的他无可奈何地摇摇头，“才10点多钟嘛，要是在家里，才是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呢！……唉，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哟，有理，有理！”说着，他冲冯纪和任远点点头：“那我就入乡随俗喽！”

冯纪和任远退出毛泽东的车厢，来到警卫车，把情况向罗瑞卿和杨奇清作了汇报，罗瑞卿听罢点点头，道：“主席睡觉很轻，没有特殊情况，就不要进去打搅他了。”略一沉思，他又补充说，“进入夜间行车后，警卫工作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松懈，我们即便打个盹儿，也要睁大一只眼睛啊！”

进入天津站以后，专列停了下来。

天津站警卫部门报告：铁路员工偶然在专列要经过的铁轨中间发现了一颗手榴弹。

罗瑞卿闻听大吃一惊。他问天津站的警卫人员：“怎么才发现？不是早就进行过清理了吗？”

警卫人员低着头没有吭声。

“简直是乱弹琴！”公安部部长生气了，双眉一挑，两道目光似一对闪着寒光的宝剑，“你们的保卫工作是怎么搞的，一旦出了问题，我们怎么向党中央，向全国人民交待！”

这时，有人把那枚手榴弹拿来请公安部长查看，原来是一颗旧手榴弹，已经锈成了一个铁疙瘩，根本就不可能再爆炸。公安部长的语气略有缓和，但仍不肯轻易放过这一偶然事件，他对杨奇清说：“专列不能耽搁太久，我在天津站下车，这颗手榴弹到底是怎么回事儿，问题要搞清楚。”

杨奇清点燃一支香烟，说：“这一事件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现在还不能下结论。主席出访的消息，只控制在极小的范围，敌人不可能准确地得到这个情报，知道主席的专列什么时候通过那条路轨。不过，也好嘛，毕竟是又给我们敲了一次警钟！”

罗瑞卿点点头，对杨奇清的分析表示赞同，“我下车以后再进一步了解一下情况。老杨，车上的警卫工作你要多费一些心啦，有什么情况，我们随时通过电话联系。”

“好，你放心吧！”杨奇清伸出手，“我一定不辱使命！”

罗瑞卿本来是准备护送毛泽东到满洲里的，因为这一偶然事件，他提前在天津站下了车。经认真侦察，没有发现其他可疑的动向，估计是铁路员工无意间丢弃在铁轨间的。

□专列晨抵山海关，引出一段对话。

□滕代远说，吴三桂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毛泽东说，一切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

专列抵近山海关，时值第二天清晨。

太阳与月亮正在举行庄严的交接仪式。只见东方的

夜空先闪出一抹亮光，这亮光上边发绿色，下边呈粉红色，渐渐扩展成一片金色的光晕，并轻轻脱去了夜的睡袍，月亮在夜脱去睡袍的同时悄悄远遁，让位给了以亮光为先导的一轮红日……

毛泽东早已起床。他打开车窗，见窗外红日东升，朝霞满天，兴致颇好。

任远走进主席的车厢，报告说：专列因为要在这里上煤上水、换车头，估计停半个小时左右。

毛泽东一听，高兴地点点头，随口吟出两句古诗：“两京锁钥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他凭窗远眺，“山海关北依燕山，南临渤海，因关在山海之间而得名，是通接东北与华北之间的咽喉要冲，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啊！”……

列车稳稳停在山海关的站台。冯纪和任远最先跳下专列，在列车附近巡视。

站内检修人员正紧张地准备换乘，候车室内挤满了顾客，隔着大玻璃窗向站内张望。

车头一侧，任远向公安段长了解治安情况。交谈间，公安段长的眼睛忽然直了，愣愣地向着任远身后张望，目光中先是惊异，继而是抑制不住的喜悦神色：“毛主席，毛主席！”

任远回头一看，脑袋不由轰地一声：戴着皮帽，披着皮外氅的毛泽东已经走下列车来到站台上，他环顾了一下四周，悠然踱步，神态轻松而愉快。

任远他们根本没有想到毛泽东会在这个车站下车散步，因而没有安排任何警卫部署，心里不由非常紧张，急忙对公安段长说了一句：“注意车站警卫！”便转身来到毛泽东身旁，警惕地注视着四周的动向。

滕代远部长和杨奇清副部长见主席临时下车散步，也有些措手不及，他们急步上前，问：“主席，您冷不冷？”

毛泽东没有正面回答他们的问话，而是兴致勃勃地提议：“‘天下第一关’在什么地方啊？走，上天桥上去看看。”没容他们答话，毛泽东已迈开大步，向天桥走去。

滕代远一行急忙跟上。

毛泽东逸兴遄飞，谈锋甚健，边走边说：“到了‘天下第一关’，不瞻仰一番岂不可惜。听说，‘天下第一关’那几个字还是康熙老倌写的呢！”

毛泽东登上天桥。

他手搭凉棚，极目远眺，眉宇间闪现出一缕深情与眷恋的神色。少倾，问身旁的杨奇清，“这里距山海关有多少里呢？”

杨奇清答：“几十里吧！”

毛泽东喜形于色，恳切地望着杨奇清：“不远嘛！‘保卫大臣’，可否找辆车子到山海关一游？”

这时，候车室里的游客已经发现了毛泽东，人们止不住激动的心情，高兴地叫着：“毛主席，那是毛主席啊！”

专列乘务人员和警卫部队开始并不知道他们护送的哪位首长，在天桥上见到了毛泽东的身影，一个个兴高采烈、奔走相告：“毛主席坐火车出国了！”“我们是护送毛主

席出国啊！”

滕代远部长和杨奇清副部长有些犹豫，同意主席去山海关吧，因为事先没有任何警卫部署，稍有差池，他们无法向党和人民交待；可是主席兴致正高，不同意他去，又不肯劝阻。

毛泽东望住两位部长：“怎么样啊？可不可以发个‘通行证’？”

杨奇清扭头看了一眼站在身后的任远，问：“任远啊，有没有车子？”

任远已经从两位部长的眼神中看出了他们的难言之隐，便回答说：“一时很难找到车子。”其实，铁路工厂就有轿车，刚才，他向公安段长询问情况时已经了解了，只是他也担心主席的安全，便撒了一个善意的谎。

毛泽东闻言，有些失望地摇摇头：“那就算了！”

两位部长如释重负。

毛泽东手扶栏杆，兴犹未尽地对众人说：“这山海关还是明洪武十四年，由明朝的大将徐达在这里修筑的。本想凭据天险，抵御外侮，不想，吴三桂由此引狼入室，把个大好河山拱手让给了那个多尔衮。”

铁道部长滕代远道：“吴三桂拥兵自重，最后忧忿而死，被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毛泽东朗声一笑：“一切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这是一条定律，历史的定律！”说着，他走下了天桥，在人们敬仰的目光中登上专列。

众人尾随毛泽东陆续上车。

杨奇清叫住任远，轻声对他说：“一出山海关，情况就更复杂了。东北境内匪患成灾，虽然经过清剿，也还有小股的武装土匪出没活动，你到警卫车上去，有了情况也好随机处置！”

任远答应一声，调来一台压道车赶上去。

毛泽东乘坐的专列重新启动，平稳地驶出站台。走了好长一段路，人们才感到列车在行进。原来，调换车头以后，由天津铁路局局长亲自驾车。因为他已经知道车上坐的是毛泽东，所以小心翼翼，把列车开得异常平稳……

毛泽东回到车厢坐定，忽然问身旁的俄语翻译师哲：“怎么不见罗瑞卿了呢？”

罗瑞卿在天津站下车，杨奇清已经把有关情况通报了师哲。于是，师哲回答说：“罗部长已经在天津下车了。”

毛泽东“哦”了一声，抬眼望住俄语翻译，目光中有些不解。听师哲做了解释，他颌首笑道：“这个罗瑞卿还是很负责的嘛！”

师哲回答：“保卫您安全抵达苏联，他们是向党和人民打了保票的，哪里敢有一丝一毫的松懈哟！”

毛泽东换一个话题，有些神秘地望住俄语翻译：“我发现了一个情况……”

师哲一愣：“什么情况？”

毛泽东微微一笑，“我见到了一个人……”见师哲一脸的疑惑，毛泽东的目光中闪过一缕柔情，“怎么岸英也

在车上呢？谁带来的？”

师哲想了想，回答：“可能是李克农部长带他来的。”

毛泽东的语气变得严峻：“无论是谁带他来的，总之，不许让他过界！”

从内心说，师哲是希望毛岸英能随毛泽东出访的。因为岸英在苏联呆了很长时间，俄语说得相当流利，他在毛泽东身边，可以减轻自己的许多压力。但是师哲知道，毛泽东不会同意毛岸英到苏联，他是率领中共高级代表团赴苏进行访问的，带上自己的儿子，岂不是假公济私了吗？所以回答说：“我想不会吧，他也没有办理出国手续。”

毛泽东摇摇头：“欧洲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出访，常常带家属。岸英在国外呆得久了，晓得那一套，他很可能想跟我过去呢！”说到这里，毛泽东抽出一支香烟，划根火柴点燃，深深吸了一口，“至于说没办手续，那又能怎么样呢？人家一看是我的儿子，还能不让他过？”

师哲有些无可奈何：“那怎么办？”

毛泽东一摆手，“总之，不许他过界。这个事情，交给你负责！”

师哲啧啧嘴，又摇摇头。他想了想，找到随行的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问：“岸英是你带来的吧？”

“是啊！”持重而老成的社会部长点点头。

“主席不许他过界。”师哲和李克农是老相识了，彼此关系融洽，所以说说话用不着拐弯抹角，“主席让我负责，我管不了也不管。岸英是你带来的，你还要负责带回去。”

社会部长摸着唇上的一抹小黑胡子笑了：“你放心，我不会因为岸英让你在主席那里挨克。其实，岸英本来就没有打算过去，我带他来，也是因为工作需要。”话说到这里，社会部长把手一摊，“苏联驻华使馆的大使、武官、参赞都跟车来了，有岸英在我身旁，工作起来不是也方便吗？”

师哲这才放了心：“那好，反正这个任务交给你了，出了问题我可不再承担责任哟！”

□清晨，周恩来拿起了红色电话机的听筒：“喂，少奇同志吗？我是周恩来……”

□挂断电话，周恩来又拨通了朱德的电话，轻声问：“喂，朱老总起床了吗？”

夜色，像是一块展开的巨幅天鹅绒，掩盖了已经沉睡的都市；天空中，几颗碎银一样的星星点缀其间，眨着好奇的眼睛。

初冬的夜晚宁静而宜人。

中南海西华厅的灯光还亮着，宛如一颗跌落在窗里的星星。

周恩来送毛泽东从车站回来后，正神情专注地批阅文件。这是代总参谋长兼北京市军管会主任聂荣臻送来的一份布告。布告规定：某些外国，过去利用不平等条约中所谓“驻兵权”，在北京市内占据地面，建筑兵营。现在

此项地产权，因不平等条约之取消，自应收回；此项地产上所建筑之兵营和其它建筑，因地产权收回所发生之房产问题，我政府另定办法解决之；目前此项兵营及其它建筑，因军事之需要，先予征用……

电话铃忽然响了，周恩来拿起听筒：“喂，我是周恩来……聂老总吗？布告我看过了，个别文字做了一些改动，对，对，对，这是中国人民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特权的重要措施之一，布告一经发布，就要不折不扣地执行。……还有，明天早晨，噢，不，应该说是今天早晨，我们谈一谈关于护送主席出访的警卫部队的情况，看一看还有什么工作需要布置，好，就这样。”

周恩来刚刚放下听筒，秘书推门进来，把一份文件放在总理的案头，说：“这是中缅建交的联合公报草稿，外交部送来请您审阅。”

周恩来点点头：“好，放在这里吧！”

秘书没有出去，停了停又说：“刚才，公安部打来电话，报告说，主席已安全通过天津，没有发生什么问题，只是在主席专列要通过的路轨间发现了一枚锈手榴弹……”

周恩来一愣：“怎么回事？”

“手榴弹锈成一个铁疙瘩，已经废弃了。”秘书补充说：“罗部长已经下车调查和处理这事去了。”

周恩来站起身，双臂交叉抱在胸前，在办公室里来回走了几步，回过身来说：“通知沿途各站，加强警戒，再对铁轨、路基做一次清理，通知滕代远和杨奇清、汪东兴他们，警卫工作要认真、仔细，绝不能有一丝一毫的马虎！”

“是！”秘书答应一声，转身欲走。

周恩来一挥手叫住了他：“再有，罗瑞卿同志如果回到北京，请他马上来见我。”他又把案头的那份北京市军管会布告拿起来，“天亮以后，把这份布告也发给主席，请主席最后再过一下目。”

秘书转身出去了。

周恩来重新坐在案头，开始审阅文件。

他认真批改过中缅建交的联合公报；又拿出了一份党外民主人士人事安排的名单，逐一地审视着那一个个熟悉的名字，在血雨腥风的战争年代，这些人和共产党肝胆相照，休戚与共；几乎每一个名字，都可以引出一段美好的遐思，几乎每一个名字，都可以生发一个动人的故事。而且这些人博学多才，正为新中国建设所需要。周恩来颇为用心地在每一个名字的后面，写上了自己对于他们任职的意见。这个名单还要经主席最后审定，他尽量把他们的专长及拟请他们担负的工作考虑得周到一些，以便于毛泽东最后决策……

天快亮时，周恩来处理完了手头的事情。

警卫员推门进来，为总理送来了早餐：一碗稀粥，两个馒头，一盘咸菜。

周恩来示意警卫员把早餐放在茶几上，看看腕上的手表，拿起了红色电话机的听筒：“喂，少奇同志吗？我是周恩来。主席已经安全通过天津。……出了一点小问题，

罗瑞卿同志在天津下车处理了，有什么情况我会及时向你通报。”

挂断电话，周恩来又拨通了朱德的电话。接电话的是朱老总的卫士长，周恩来轻声问：“老总起床了吗？”

周恩来所以选择这样一个时间向刘少奇和朱老总通报情况，是精心考虑的。少奇同志有夜间工作的习惯，这时候正是就寝之前；朱老总年岁大了，熬不了夜，现在则应该刚刚起床。果然，朱老总的卫士长告诉总理：“老总正在洗漱，一会儿就要出去散步。”

周恩来放下电话，匆匆吃过早点，穿上大衣走出西华厅。他想和老总一起散散步，一来驱赶一下一夜的疲惫，二来趁这个机会向老总通报一下主席沿途的情况。回来后，聂荣臻同志就到了，研究完有关警卫工作，他上午还有两个重要的会议要参加……

□毛泽东逸兴遄飞，谈锋甚健，时而妙语连珠，时而借题发挥……

□听毛泽东谈话，使你觉得，你并不是面对一个人，而是面对一片智慧的大海！

毛泽东的专列在塞外大地奔驰。

一路上，毛泽东有目的的选调沿途党政负责同志上车，亲自作深入的调查研究，有时一谈就是半天。

绥中县委书记从主席的车厢里出来时，额头上渗出一层汗珠，他一面用手绢擦着汗水，一面连声感叹：“毛主席问得真细呀！我在绥中工作好几年所了解的情况，都叫主席拿走啦！”

锦州市市长和毛泽东谈话完后，则连连说：“主席出的题目太多啦！”……

除了和沿途党政负责同志谈话，剩下的时间，主席就是读书、批阅文件，和随行的同志聊天。因为师哲是毛泽东的俄文翻译，平常总在一起，所以交谈的机会很多。

这一天，师哲又来到毛泽东的车厢，毛泽东放下手中的文件，招呼师哲道：“来，来来，我们聊一聊。”

师哲说：“主席，您也不看看车外的景致？”

毛泽东摆摆手：“尽是树林子，没什么好看的，还是摆摆‘龙门阵’吧！”

师哲在毛泽东的对面坐下。

“师哲啊，你在苏联呆了那么长时间，给我讲讲苏联的见闻和观感，如何？”毛泽东递给师哲一支烟，自己也擦燃火柴点着一支，望着俄文翻译。

1925年，已是共青团员的师哲由国民二军派往苏联学习军事，直到1940年随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回国，共15年。先后在苏联的基辅、莫斯科军事工程兵学校、西伯利亚格贝乌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学习和工作。

初到苏联上乌金斯克时，一位自称中国领事馆副领事的外交官曾主动到旅馆看望师哲他们这批中国留学生，并表示歉意，说因为没有接到政府通知，所以来晚了。

师哲问他：“你是属于哪个政府？”那位外交官闻听一愣，因为话不投机，悄悄地溜了。他代表的是北洋政府，而这批热血青年到苏联来是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反对的正是北洋政府。

毛泽东听了师哲的这段经历，莞尔一笑：“道不同，不相为谋，诚如斯言哉！”

师哲又讲到了抗日将领马占山兵败退入苏联境内的经历，讲到了亲身经历30年代苏联肃反时的一些见闻；讲到了苏联的社会结构以及风土人情……

毛泽东听得很认真，时而若有所思，时而朗声一笑，时而借题发挥，论述几句有别于常人的精辟见解；时而妙语连珠，抒发一番对人生的感悟。后来，他又换一个话题，问师哲：“你是什么地方人？”

“韩城。”

毛泽东双眸一亮，“陕西的那个韩城？”

师哲点点头。

“噢，那你是司马迁的同乡喽！”毛泽东谈兴甚浓，他用手中的烟头续燃了一支香烟，深吸一口，悠然吐出，再问师哲：“你住的地方离司马迁公有多远？”

“大约40里。”师哲告诉毛泽东，司马迁得罪汉武帝被施以宫刑后，人们害怕受到株连，有一段时间，竟没人敢姓司马了，分成了冯周二姓，冯姓住县南，周姓住在县北。

毛泽东听后不无感慨地说：“打小报告的人，看来什么时候都有啊！”

对于司马迁，毛泽东寄予了无限的同情。谈到司马迁所受的宫刑，毛泽东颇有些伤感，他半天无语，许久，才扼腕叹息道：“汉武帝七岁立为皇太子，16岁即位，在位54年，把汉朝推向全盛时期。可是就这么一个还算有作为的皇帝，一旦臣子拂逆他的意愿，竟下如此毒手。”说到这里，毛泽东连连摇头，“和皇帝佬信有什么理好讲？汉武帝没有杀掉司马迁，已算是手下留情，不过，施以宫刑，也实在是够残忍的了！”

师哲接言：“司马迁也确实称得上是一代人杰，身心蒙受了那么大的屈辱，居然能潜心著书，写出了‘无韵之离骚，千古之绝唱’的《史记》！”

经典古籍烂熟于胸的毛泽东连连点头，随口背诵出了司马迁《报任安书》中的一段话：“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脚膑，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在这里，与其说司马迁是在感叹厄运对人精神世界的砥砺，不如说是在抒发自己的一种情怀，一腔报负！”说着，毛泽东站起身，在车厢里来回踱了两步，又回身望住俄语翻译，“司马迁‘身残处秽，动而见尤’却‘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所不辞’，是因为他内心的积郁还没有得及宣泄，苦衷还没有昭之于世人，满腹文采还没有来得及表露，他希望自己正在写的著作能‘藏之名山，传之后人，通邑大都’，诚如是，则虽九死而心不悔，这愿望确实是达到了。可以

说，真正的信史自司马迁始，‘史学之父’，他是当之无愧的！”

“唐诗、晋字、汉文章，汉代的文章，因了司马迁的《史记》，确实被推向了极致。”师哲附和。

毛泽东点点头，重新坐回沙发上，轻轻在烟灰缸上蹭掉烟灰，道：“有人说中国没有宏篇巨制的史诗，怎么没有？司马迁的《史记》难道不是一部有着广博学识、深刻目光、丰富体验和雄伟气魄的史诗！评论司马迁，可以有不同的侧面，单以文章论，他也不朽了。”

听毛泽东谈话，师哲往往有一种啜饮知识的畅快，他是那么宏大，那么博学，他的旁征博引和精辟立论，每每使你觉得，你并不是面对一个人，而是面对一片智慧的大海，一座学识的高山。

……

专列经沈阳、过长春，一直向北挺进。

窗外，山舞银蛇，原驰腊象，一片北国风光。

窗内，毛泽东逸兴遄飞、远奥高古，时而在历史的长河中与一个个不朽的灵魂对话；时而在现实的框架中把一幅幅新美的蓝图勾勒……

日月交替了6次。

12月24日，毛泽东乘坐的专列安全抵达我国与苏联接壤的最后一个车站——满洲里。

满洲里市人口不多，但政治情况复杂，汉、蒙、满等民族聚居在一起，还有不少散居的“白俄”。满洲里火车站是我国陆地与苏联相通的唯一出口处，车站南面是中国的中长路，车站北面是苏联铁路，因为中苏铁路轨距不同，所以列车不能互通，必须在这里转乘苏联的列车。

苏联方面准备的专列已经在站台待命。这列专车有前卫车，没有后卫车。主车编排以3个车厢为一组，互不相通。

毛泽东乘坐的专列缓缓进入满洲里车站。

铁道部长滕代远和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来到毛泽东的车厢报告说：满洲里马上就要到了，因为外面太冷，请主席就在车上休息，一俟和苏联专列负责人接洽、办理好交接手续后再请主席下车。

毛泽东回答：“一切听你们安排。”

专列刚一停稳，滕代远、杨奇清和冯纪、任远就跳下车来。

苏联铁路总局负责人和苏联保卫局负责人通过自己带来的翻译，分别向滕、杨两位部长介绍了有关情况，然后带着他们登上苏方列车检查了一遍车上的设备与布置，前后不到半个小时，一切均已交接完毕。

滕代远登车向毛泽东报告：一切准备工作就绪，请主席下车换乘苏联专列。

毛泽东站起来，双手上举，伸了一下腰身，自言自语道：“啊，终于到了！”他穿上大衣，戴上皮帽，健步走向专列的车门。

在门口，毛泽东扫视了一眼与车门正好相对的苏联专列，眉宇间闪过一丝欣慰——那是一位胜利者的欣慰。



众所周知，斯大林由于对中国共产党的力量缺乏足够的认识，因而在中国革命的历程中出过一些不正确的意见，双方对不愉快的往事都心里有数。中国革命的胜利，使莫斯科在惊喜之余也感到震惊，他们实在没有预料到，这位韶山冲里走出来的乡村教师，居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令整个世界为之目眩地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从而使整个世界的政治格局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毛泽东一生中第一次出国远行，来到共产党权力的源头，不是来朝觐，而是以一个胜利者的姿态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家庭里来展示中国共产党人的风采！如果有机会，毛泽东当然也愿意向斯大林一吐心中的块垒——这块垒已然积郁于胸多少年了。

毛泽东迈步走下专列，他的身后跟着政治秘书陈伯达、警卫处长汪东兴和俄文翻译师哲等人。

滕代远、杨奇清、冯纪和任远一字排开，向毛泽东举手敬礼，毛泽东微笑着逐一和他们握手，说：“一路上，你们辛苦了，谢谢同志们！”

毛泽东登上了苏联专列。

他并不急于走进车厢，而是站在关了车门的玻璃后面，向护送的人们挥手致意，直到汽笛一声长鸣，列车缓缓启动……

□李克农命令敌潜伏特务发报，称：“凡贵局派遣特务，我们将悉数收留。”

□毛人凤接报，颓然无语，半晌说不出话；蒋介石闻讯，连骂三句：“娘希匹！”

杨奇清护送毛泽东赴苏以后，侦破工作仍有条不紊

地进行。

法网已经张开……

这一天，“沉”入新侨公司的侦察员小冯报告，计采捕的奸夫孟山要赴津！

接到情报后，曹纯之当即组织了一个外线侦察小组负责对孟山的跟踪，同时调公安部侦察摄影组随自己先行赴津，通过市公安局的协助，在孟山要取款的黑龙江路一家银行选好了摄影的位置。

这一天，孟山强作镇静地走进银行，他30多岁，留一个分头，戴一副白边眼镜，穿一件蓝哔叽布中山装，样子很斯文，只是镜片后的那双眼睛，不时流露出一股诡谲的光，他来到柜台前，递上取款凭证。

银行工作人员看了看，不经意地问了一句，“哟，这么一大笔款子？”

孟山皮笑肉不笑地搭讪：“啊，最近有一笔生意要成交，这些款子恐怕还不够呢！”

银行工作人员将款子提出，交给孟山：“请点一点。”

“不用了，咱们还信不过人民银行吗？”孟山说着，推了推鼻梁上眼镜，把钱一叠一叠地装进了随身带来的皮包里。——这一切在侦察员的镜头前永远地被定格了！

从天津回来，负责监听计采捕电话的侦察员又向曹纯之报告了一个情况，计采捕与一个叫李超山的人关系暧昧。

曹纯之立即命令小冯设法与这个叫李超山的搭上关系，经小冯牵线，曹纯之亲自出马，以公司董事名义到李超山家里作客，以谈生意为名摸摸李超山的底细。

交谈中，电话铃响了，李超山起身去接电话。他拿过听筒，“我是超山，采捕吗……”

曹纯之闻听后立即来了精神，两只耳朵像张开的雷达一样竖了起来，捕捉着李超山嘴里吐出来的每一个字。可是，李超山说了几个“是、是、是，好、好、好”以后就挂断了电话。

曹纯之有些失望，没想到，李超山挂断电话后冲曹纯之点了点头，抱歉地说：“对不起，有几个电话要打，请您稍坐用茶”，便又拨起了号盘。李超山家是一部老式电话，在南墙悬挂着，他拨号时，曹纯之装作抽烟一侧身便可看见，李超山是约人×月×日到漪澜堂聚餐，他拨的几个电话号码，全被曹纯之一一记在心里。

李超山打完电话，转过身冲曹纯之一拱手，“失礼，失礼！”

曹纯之摆摆手，“不客气。敝人还有一件事要办，就不打扰了，有时间再来请教。”说罢，曹纯之起身走出李宅，来到背人处，赶紧掏出笔来记下了那几个电话号码，长期的侦察实践，虽然使他练出超乎常人的记忆力，但时间一长，他也唯恐把这五六个电话号码搞混了，那样将给侦破工作带来麻烦。

这一下侦察员们又有事可干了。上漪澜堂吃饭的，逛公园的，在外守候跟踪的，进行电话监听的……

参加聚会的人中有一个叫计兆祥。此人是计采捕的

◎ 建国初，外国驻华使节向毛泽东主席递交国书



弟弟，根据侦察，他是伪北平特警学校最后一批毕业生。

这时，我方电台早就监听到的一道可疑电波从宣武门移到前门外后又移到了南池子上空，计兆祥的住所正在南池子九道湾×号，而宣武门、前门他都曾居住过。

初步确定，计兆祥很可能就是潜伏下来的敌台发报员。

为了稳妥狠地打击敌人，公安部李广祥处长和苏宇涵副处长亲自布置，在计兆祥家的院内安排了个“内线”。

夜闾人静，人们都已进入了梦乡，可是透过窗帘的缝隙，“内线”看到室内的灯光频频闪动，经查实，与我方电台监视下的敌台发报时间完全一致。

敌台就在计兆祥家里，可以确定无疑了。

这时，中途返回北京的中央社会部长李克农坐镇继续指挥破案。首先，他主持了案情分析会，根据侦察得到的情况，将与计兆祥有关系的人一一作了分析，认定他们与计兆祥只是一般关系而无特务联系，便分别予以解脱。

最后，社会部部长望着侦察员们，说：“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和对敌情的判断，敌人的这架潜伏台只有一个人，那就是计兆祥，台长、特务、译电、情报均为一。其他人不了解计兆祥的底细，只是贪图小利帮了他一些忙，比如为他取钱，帮他联系住房等等。破案只捕计兆祥，不是小胜，而是大胜、全胜！毛主席从苏联回来，发表中苏友好公报，是对蒋介石的第一个打击，紧接着发布我公安机关破获国民党保密局吹嘘的万能潜伏台，是对蒋介石的第二

个打击！”李克农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水，继续说：“破案时间嘛，由李广祥同志定，破案时我要去侦察科看看同志们！”

第二天，李克农部长来到了侦察科办公的云南会馆，见部长来了，侦察员们分外高兴，又是端茶，又是递烟，又是送水果。李部长点燃一支烟，吸了一口，一指房间里的侦察员说：“曹纯之同志，你这个队伍的同志都姓张吗？”

曹纯之不明白部长是什么意思，以为部长是责怪自己没有一一介绍，忙起身说：“我来给部长介绍一下。这位是行动组组长小杨，这位是……”

社会部长把手一挥，风趣地说：“不用介绍了，我都认识嘛！都是姓张名飞字翼德，是勇猛而又细心的好同志！”

大家一听哈哈笑了起来，纷纷说：“不敢当，不敢当，部长夸奖得过份了！”李克农部长在烟灰缸里捻灭烟蒂，站起身来到侦察员面前，拍拍这个的肩膀，整整那个的衣领，十分深情地说：“干得好就是干得好嘛！”

“都是部长亲自领导，天天给我们做具体指示。”侦察员们这样说绝非虚言客套，而是发自肺腑的由衷之言。

“哪里，哪里！”李克农部长连连摆手，“就像你们曹科长天天向我们汇报一样，我和你们杨部长也是天天向毛主席、党中央汇报啊！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天天在关怀着同志们的工作哟！”

侦察员们互相交换了一下惊喜的眼色，为自己所担负的工作感到光荣和骄傲。

李广祥处长神情庄重地站起身，向李克农请示道：“李部长，开始行动吧？”

李克农点点头。

李广祥拿起毛笔，在侦破国民党保密局北京潜伏台的命令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随后把命令交给行动小组的侦察员，道：“立即逮捕计兆祥，起获敌电台！”

“是！”侦察员们举手敬礼，走出会馆登车出发。……

计兆祥正在房间里看报纸，因为向台湾当局报告了毛泽东访苏的重大战略情报，他由少尉台长一跃而升为少校，并领取了一笔巨额奖金，洋洋得意之余，正费尽心思想探听出毛泽东回国的准确时间，好向上级再邀功请赏。忽然听见有人敲门，他便问一声：“谁呀？”

“我，快开门。”

“你是谁呀？”计兆祥觉得事情有些蹊跷，正想进一步查问，不想，门已经被撞开了，他还没明白过来，几只黑洞洞的枪口已经对准了自己。

“你们这是干什么？”

侦察员们望住强作镇静的潜伏特务，把逮捕令一亮：“少费话，你已经被捕了！”

“你们为什么随便捕人？”计兆祥虚张声势地喊叫起来。

两个侦察员上前两步，不由分说，用手铐铐住了他。

计兆祥被捕了！可是，屋里屋外翻了半天，却不见电台。告急的电话打到了指挥部。正守候在电话机旁听候报捷的曹纯之闻听一愣，急忙驱车赶到了破案现场。

他在房间里来回踱了两圈儿，敲敲墙，跺跺脚，没有发现夹壁地道，便坐在沙发上点燃了一支烟，心中琢磨，真是见鬼了，敌人的电台藏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没有证据，就难以结案，敌人也不会服法，想到这儿，曹纯之的鼻梁上不由渗出一层汗珠。他的目光无意扫到了天花板上贴着的一张牡丹图，双眸倏然一亮，用手一指，对侦察员说：“上去，把电台取下来！”

原来，这张牡丹图遮住了一个洞口，一推就开，天花板上，电台、电器仪表、密码本一应俱全。

曹纯之把烟头扔到地上，用脚一碾，然后走到电台前，仔细端详了一番，抄起电话听筒，向李克农部长报告说：“敌潜伏电台已经起获，请李部长指示。”

不一会儿，李克农部长的汽车嘎然停在计兆祥家门口，他下车查看了破案现场，脸上现出满意的笑容。上车时，社会部长转过身对跟在身后的侦察科长说：“曹纯之啊，敌人用电子通讯，你们侦破了；如果敌人用质子通讯，你想过怎么解决吗？”

曹纯之摇摇头：“还没来得及想。”

李克农拍拍曹纯之的肩膀：“要考虑这个大题目。敌人的破坏手段会越来越狡猾，我们的侦察工作也要实现现代化呀！”言毕，他握住曹纯之的手，语气真诚地补充说：“为侦破这个案子，同志们辛苦了，请代我向同志们表示感谢。”……

第二天，李克农部长又来到侦察科，对曹纯之说：“你去把计兆祥捉来！”

计兆祥被两名公安干警押解来了，李克农部长把一份电文递给他，说：“你马上把这份电报发给台湾的国民党保密局。”

计兆祥恭恭敬敬地答应一声，接过电文，戴上耳机，坐在电台前准确无误地发出了这份由李克农部长亲自拟定的电文：

毛人凤先生：

被你们反复吹嘘的万能潜伏台已被起获，少校台长计兆祥束手就擒。今后，凡贵局派遣的特务，我们将悉数收留，只是想不面谢……

后来，据捕获的台湾派潜特务供认，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接到这份电文之后，颓然无语，半晌说不出话来，蒋介石闻讯后，连骂了毛人凤三句：“娘希匹！”

□斯大林建议毛泽东回国时参观一下
长春的市容，毛泽东接受了这个建议。

□毛泽东参观时，沿途布满了岗哨，开路卡车车顶上还架上了一挺机关枪……

1950年2月14日，奉毛泽东之命赶赴苏联的共和国总理兼外长周恩来与苏联外长维辛斯基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上签字。

一时，世界为之瞩目！

北京。公安部正紧急召开保卫毛泽东、周恩来访问苏联胜利回国的重要会议。

杨奇清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两道犀利的目光将会会议室扫视了一圈，清了清喉咙道：“主席和总理回国，苏联肯定将举行公开盛大的欢送仪式并向全世界发布新闻，这会为我们的保卫工作增加很大难度，因为事先公诸于世，敌人可以从容部署，特别是东北各地沿线治安较关内更为复杂，稍有疏忽，就可能造成意外，确有防不胜防之感啊！”

冯纪和任远互相交换了一下目光，深感肩负的责任重大。

杨奇清在烟灰缸里轻轻磕去烟灰，继续说：“不过，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我们也应该看到对我们有利的条件。那就是，我们在国内仍坚持高度保密的原则，不公开举行任何欢迎仪式。这样，就使敌人狗咬刺猬，难以下嘴。你想想，毛主席、周总理乘坐的是专列，可快可慢；沿途又经常要参观、访问，可停可走，敌人很难准确掌握专列的具体行车时间和所处区段。同时，沿线内外情况我们也比先前更熟悉了，哪些是要害部位，哪些是薄弱环节，已经胸中有数，事先可以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

冯纪接过话茬：“必要时可以实行局部地区临时戒严，实行军管！”

公安部副部长点点头：“沿途的保卫工作由军委直接布置，不会出现大的纰漏。关键是进一步清理铁路内部，纯洁要害部门，不能因为有了护送毛主席和周恩来出国的经验，就掉以轻心了，要时刻提高警惕，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发现新问题，采取新措施！”

任远问：“专列怎样开法？”

杨奇清眉锋一扬，语气果断地说：“为了绝对保证安全，仍开‘三列车’同时出发！”

1950年2月26日，毛泽东、周恩来乘坐的苏联专列抵达中国边界的满洲里车站时，专程前来迎接的中央一位负责同志已经带领滕代远、杨奇清、冯纪、任远等一行人排成一队迎接在站台上。隔着车窗的玻璃，毛泽东和周恩来看见了，非常高兴，连连挥手问候。专列刚一停稳，他们就健步走下车厢，和迎接的同志热烈握手，亲热得犹如久别重逢的亲人。

任远见那位负责同志和毛泽东、周恩来在车站站台上谈兴正浓，仿佛忘了严寒，担心首长受寒，便说：“车下太冷了，请到车上谈吧？”

那位负责同志仿佛才从欢快的气氛中醒悟，一拍额头说：“看我，光顾高兴了，要是把主席和总理冻病了，我可担待不起啊！快，上车，上车！”

于是，在滕部长的引导下，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顺序而行，登上了我们自己的专列。

随毛主席、周总理归来的人员中，增加了几位陌生人。还是周恩来细心，见任远他们脸上露出狐疑的神色，便笑着一一介绍说：“这位是肖华同志，这位是孙维世同志，他们原来都在苏联学习，这次搭我们的车回国。”

在苏联休养的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胡志明取道中国回国，也搭乘了这趟专列，只因是秘密回国，一路上他极少露面。

毛泽东走进自己的车厢，脱去大衣挂在衣帽架上，然后招呼汪东兴和叶子龙说：“你们代表我去向人家表示一下谢意，苏联的保卫人员、列车工作人员一路上很辛苦。别忘了，把咱们专列带来的水果送一些给人家！”

叶子龙和汪东兴答应一声转身离去。

毛泽东又对一直陪同自己参观访问的我驻苏大使王稼祥说：“稼祥啊，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你看，到了家门口，又要‘赶’你回去喽！”

王稼祥大使伸出手，谦和地笑一笑：“哪里，我的岗位本来就在莫斯科嘛！好，祝主席总理一路平安！”……

这里有一个小插曲：为了表示对中国人民的情谊，斯大林在毛泽东和周恩来归国时，分别送给他们一人一辆苏联最新制造的高级防弹轿车，到北京卸车时汪东兴发现，轿车少了好几个零件。杨奇清、冯纪、任远到满洲里一查，原来是“白俄”搬运工在搬运过程中偷的，想日后拿去卖钱。

2月26日深夜，毛泽东、周恩来乘坐的专列从满洲里出发。为了有意迷惑敌人，第一列是空车，压道试行；第二列车是警卫连乘坐的前卫车，主席、总理的专车放在最后，所有随行人员均在第三列车上。

这之前，曾发生了一起破坏事件。一天深夜，长春郊外铁路干线突然被敌人扒开数里之长，企图颠覆专列。我当地公安机关立即发现了敌人的这一罪恶企图，很快就组织人将线路修复如初。这一情况在全线通报后，给每一个参加护路的军民又一次敲响了警钟，大家严阵以待，百倍提高警惕，从此敌人的破坏活动就从未再得逞过。

专列抵达海拉尔车站时，正是上午10点多钟，因专列要在这里换车头，加煤加水，毛泽东听完报告，就说：“那好，我们下车走一走，换换空气。”

正值隆冬，温度在零下40度左右，但天空晴朗，阳光普照，毛泽东的兴致颇好。他把手插在大衣兜里，走到一个道岔前，伸出右手用食指指着道岔问：“这是什么东西？干什么用？”

一旁的滕代远回答：“这是道岔，专门用它来扳开铁轨，使列车不会撞头。”说着，铁道部长弯腰用手试了一下，“扳道岔的叫扳道员，干这活儿要把子力气，劲儿小的还扳不动呢！”

毛泽东听罢一笑：“啊！这个玩艺还不简单哩！”

铁道部长点点头：“可不是，铁路上的名堂不少呢！”

毛泽东若有所思，他抬起头目光穿过天边的几抹白云，似乎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时空寻觅着什么，少顷，才扭过脸来对铁道部长说：“建设一个新中国，我们还有多少新东西要学习，要掌握啊！”……

2月28日晚，专列抵达有“东方莫斯科”之誉的哈尔滨车站。在当地党政负责同志的邀请下，毛泽东和周恩来决定稍事停留，以解除一下长途旅行带来的疲惫。

29日上午，毛泽东和周恩来与省市负责同志谈了话，毛泽东还亲笔为黑龙江省和哈尔滨市题词——“不要沾染上官僚主义作风”。

下午，毛泽东在滕代远的陪同下参观了铁路工厂。在车间，有的工人满手油污，不敢伸手，毛泽东毫不介意，主动握住那一双双沾满油污的手，连声说：“同志们辛苦了！”“同志们好！”……

翌日起床后，毛泽东即对汪东兴说：“通知滕代远和杨奇清，马上准备专列，一个小时以后上车出发！”

当天到达长春。

在苏联期间，斯大林有一次和毛泽东闲谈，曾建议说：“长春是伪满洲国的首都，据说城市建设不错，我没有机会去参观了，你回国时不妨顺路去看一看，或许对你们重建城市能有所裨益。”

毛泽东接受了斯大林的建议，决定参观长春市容。

长春市的建筑确实别具一格，街道整齐宽敞，房屋华丽雄伟，可是，毛泽东乘坐的轿车经过市区主要街道时，路上却很少见到行人。

参观完市容，毛泽东明知故问：“长春市的老百姓很

少,人都到哪里去了?”

陪同参观的市委负责人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只好支吾道:“警卫岗哨多了一些!”

毛泽东有些不快,眉头微微一皱,批评说:“不要怕老百姓嘛!我们一来,就把人家老百姓关在房间里不让出来,这样搞下去是要脱离群众的!”

原来,毛泽东决定参观长春市容后,长春市警卫部队便立即开始了部署,并在局部地区实行临时戒严。毛泽东的专车上路前,任远和东北铁路公安局局长严佑民曾先乘一辆吉普作前卫向导,他们发现,不但沿途布满了岗哨,而且前面有一辆开路的卡车,车顶上还架着一挺机关枪。当时他们就觉得此种做法不妥,但木已成舟,幸亏毛泽东的专车在后面,没有看到如临大敌的一幕,否则一定会提出严厉批评……

专列抵达沈阳,专程赴沈的朱老总和东北局、辽宁省、沈阳市的负责同志在站台迎接。

第二天中午,为欢迎毛泽东和周恩来安全归国,东北局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宴会,为保密起见,出席人员严格控制。宴会上,毛泽东、周恩来、朱老总和东北局负责人为首席,居于大厅中央,毛泽东、周恩来的随行人员及东北局的几位部长次之,桌子紧挨着主桌。宴会上,毛泽东谈笑风生,议论纵横,妙语迭出,气氛颇为融洽。

毛泽东爱开玩笑,尤其是在饭桌上,在苏联时,他就常常在吃饭时开一些玩笑,使气氛颇为活跃。但他不和陈伯达开玩笑,而是让前来作客的孙维世同陈伯达开玩笑。孙维世伶牙俐齿,陈伯达不善言词,常常是陈伯达一语刚出,孙维世已有10句等在那里,窘得理论家面若桃花。每逢这时,毛泽东便在一旁开怀大笑,孙维世便像得胜回朝的将军。

晚上,在东北局的机关礼堂里又举行了小型舞会。

毛泽东跳舞如在音乐中散步,没有什么花样儿,也不

大注意舞点,朱老总则犹如晨练出操,挺胸抬头,一副军人气质;唯周恩来舞姿翩翩,风度潇洒,他和孙维世结伴,更是如鱼得水,配合默契,一曲下来,已赢得一片喝采。

说起来,孙维世和周恩来还有一层特殊关系。

孙维世的父亲孙炳文是朱德的好友,周恩来的至交。是他陪同朱德来到马克思的故乡,并与他一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介绍人就是当时在法勤工俭学的周恩来。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发动了血腥的“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其间,孙炳文接受周恩来派遣,去执行一项特殊使命。行前,孙炳文托孤给周恩来:“如果我没有回来,望恩来能够收养遗孤,以女儿相待。”周恩来热泪盈眶,握住战友的手:“炳文,从今以后,您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说罢,当着邓颖超和孙夫人任锐的面儿,抱起六岁的孙维世,说:“叫我爸爸。”

孙炳文含笑而去,不想真的一去不归,惨死在蒋介石的屠刀之下。

后来,由于时局动荡,行踪不定,周恩来与任锐母女失去联络,但是情深义重的周恩来时时把战友的托咐挂在心间。长征到达陕北后,他多次派人到南方去查询任锐母女的下落,几经周折,终于把他们接到延安,先送孙维世入抗大学习,后又把她送到苏联戏剧学院深造。

3月3日深夜,毛泽东、周恩来一行经过半个多月的旅途生活,安全抵达北京。

为了保密,车站上没有欢迎的人群和鲜花。

站台上,依次排开一溜专车。

专列平稳地停靠在第一股道的指定位置。

毛泽东、周恩来走下专列,随即坐上专车离站。胡志明主席一走出车厢,立即有专人引导他登上早已准备好的专车离去。随后,是朱老总、滕代远部长、杨奇清副部长的专车。

正是夜阑人静的时分。弯月如弓,星儿闪闪……

炎黄春秋杂志广告价目表

封底彩色版	全版 10000 元	半版 5000 元
封二彩色版	全版 7000 元	半版 3500 元
封三彩色版	全版 6000 元	半版 3000 元
内页黑白版	全版 3000 元	半版 1500 元
代制广告设计费每版 200 元		

客户刊登广告时请直接与炎黄春秋杂志社杜卫东、刘家驹联系 电话:4672568 6016633-227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新春茶话会暨 《中华文化通志》百志著者大会上的讲话

编写《通志》很有意义(节选)

(一九九三年一月六日)

李瑞环

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一定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应该是什么样的,全部内容是什么?正需进一步研究,但肯定包括中华民族传统优秀的文化。中华传统文化,在历史上起过很好的作用,引起了世界各国广泛的重视,现在有些国家学孙子兵法、三国演义用以管理企业。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着手编撰《中华文化通志》,对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会起很好作用,我赞成,祝你们成功。

抓住爱国团结这面旗帜(节选)

(一九九三年一月六日)

薄一波

《中华文化通志》写些什么?怎么写?我想,爱国主义这一条,结合着今天,包括中国各民族,五千多年了,始终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核心内容。要抓住爱国团结这面旗帜,一个朝代,两个朝代,一代一代的将中华民族的爱国团结讲出来。使“爱我中华”能叫小孩子也会唱。中华传统文化,当然也有糟粕,糟粕我们不要。勤劳、勇敢、智慧是中华民族的主流。要努力把中国各族人民的勤劳、勇敢、智慧充分地写出来。对中华民族这些优秀的东西,我们建国四十三年来有所总结,但不够。

秦始皇统一中国,但秦二世便灭亡了,很短啊!汉朝、唐朝年代较长,但也都是由兴盛到衰败到灭亡。对中国这些历史的实践,我们的祖先总结了一些,我们也总结了一些,但是很不够。小平同志提出的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实行改革开放这条道路,已十来年了,再过三个十年,再搞一百年,我们中国经济、文化便能达到世界先进国家水平。这样,我们就能避开中国历代兴盛到衰败到灭亡的路。

写《中华文化通志》时,建议多写事实,少发议论。

盼祖国早统一

——遥寄同窗蒋纬国先生

吕 鸿

隔陕遥望情依依,

燕语相对泪凄凄。

本是炎黄同根生,

缘何骨肉两分离。

千秋功过任评议,

恩仇一抛更亲切。

主义犹可存异同,

「一国两制」俱相宜。

港澳回归已在望,

台陆同胞盼统一。

振兴中华话题新,

国共合作今胜昔。

扑朔迷离的《南山集》

案

古镜台

● 刘跃进

清圣祖康熙五十二年(1713)二月,惊骇文坛的“《南山集》案”终于有了最终的裁决,曾以撰著《南山集》而扬名一时的戴名世,以书中“语多狂悖”获罪而被处以极刑。自然,他的著作也被禁毁。此案牵涉到三百多人,大多受到处罚,虽侥幸逃生,但人人如惊弓之鸟,噤若寒蝉,从此缄口不谈戴名世。

此案到底缘何而起呢?

忧庵,是戴名世48岁时给自己取的号,其缘由见《忧庵记》:“五行之乖诊入吾之膏肓,阴阳之颠倒盪吾之志虑,元气之败坏毒吾之肺肠。”他为此“纠纷郁结、彷徨辗转”,以至病痛愁苦,“疾且益殆”。很明显,他不仅仅是为个人的落拓不遇而忧伤愁苦,更主要的是为封建末世的衰败倾危而郁抑悲愤。这部遗稿前有小序,作于康熙四十七年,那年戴名世56岁,其取书名为《忧庵集》可以说比较贴切地反映出了作者晚年的心境。

读这部《忧庵集》,可以寻出一些脉络。

戴名世生活在清初顺、康时代。他出生时,清室定鼎中原已经十年。他并没有经历过国破家亡的惨痛。因此,从思想感情上说,他不象明末遗老那样对清初满族统治者抱有不共戴天的仇恨。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已心安理得地接受满族统治这个事实。终其一生,我们发现,他始终对清初统治者抱有一种若即若离的矛盾态度。这里是否夹杂着复杂的民族情绪,从其《忧庵集》可以略窥其端倪。如108条记载滇黔楚粤之间嗜杀报仇的风俗,作者感叹道:“呜呼!报仇者天下之大义也,惜士司之争者,血气之私,斗狠之习耳。彼夫中国之人,于君父之仇不报,且畔而助外人以叛其君父,自士司视之已禽兽之不若矣。”这里所说的“君父之仇”具体意指什么,作者似不便明说,但从33条王铎早已暗通清兵,反杀南明臣民的记载来看,所

谓“外人”是指清兵,是与“君父”相对立者。因此,所谓“君父之仇”也就是亡国之恨。这里,锋芒指向,不言而喻。清代为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先以血腥屠杀开辟道路,继而入主中原。《南山集》中有《吴江两节妇传》记载清兵于1645年大举南下,烧杀无度,“尸积城下者累累,皆糜烂不可辨识。”客观的叙述却掩抑不住对清兵残酷无道的义愤之情。再参照这部钞本第10条:“客有论魏晋以后刘聪、石勒之兴及冉闵之事曰:彼等之有天下,夫以杀人而得天下,其已也,亦必为人所杀,无噍类焉。曷若逐水草居处,衣皮食肉,子孙世世相保之为乐乎?韩子曰:人道乱而夷狄禽兽不得其情。彼虽横行一世,富极贵溢,是亦为不得其情也。”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议论确乎有点以历史影射现实的味道,涉及到当朝最敏感问题,表现了强烈的批判精神。此外,作者还花费很多笔墨,大胆地揭露了清王朝赖以存在的官僚阶层的丑恶。如152条:“近日吏治不修,一官来人皆恨之,一官去人皆思之,非思之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热,犹觉前之为宽耳。”令人发指的是,这些搜括民资的赃官竟然如此不知羞耻:“每一官必有一德政碑、去思之碑,竖立于路旁,纷纷为自己树碑立传,可鄙到了极点。”

由于整个社会被这样一些贪官污吏所把持,有清一代,社会风气急遽败坏。为此,戴名世很早就把忧郁的目光转向历史,特别是使他“有深痛”的明史,试图追溯社会腐败的渊源。当然,这并不能解决现实问题。这就使得戴名世常常陷入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他没有陶渊明那种“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的旷达和超脱,而是终生徘徊在“仕”与“隐”的关口,无从解脱。早在29岁,戴名世迫于生计,授徒家乡。“劳苦困饿,拂乱空乏”,生活相当困顿。但尤其使他感到郁郁不平的

还不是这种“处穷极之遭”，而是“当败坏之世”。这时他就想“绝意世事，欲携《周易》一卷，隐居深山之中。”30岁时又说：“余怀遁世之思久矣。”可是他并没有付诸行动。34岁时还是告别了家乡，赴京城应试。尔后十余年间，寄人幕下，转徙于北京、山东、江苏、福建、浙江等地，广泛地接触了社会生活，深刻地认识到在所谓升平气象掩盖下的种种龌龊与罪恶，于是“遁世之志愈决”。49岁那年，他畅游了浙江山水，写下很多著名的山水游记，寄寓他归隐山林的志尚。大约与此同时，又在桐城南山下买下别宅。翌年自江宁归居南山，结束了奔波南北、寄人幕下的动荡生活。如果戴名世从此真正隐居不出，也许还不至于落得个身首异处的可悲下场。但是，他实在耐不住寂寞，强烈的从政愿望使他在南山等地过了不到两年的隐士生活，便又出山应试去了。在其生活的最后十年，仕途曾一度春风得意；53岁应顺天乡试，得中五十九名举人，四年后会试，成为大学士李光地主考的己丑榜第二名进士，并获殿试一甲二名，授翰林院编修。尽管地位有了很大的改变，而那个丑恶险峻的社会现实却并没有在他眼中增添多少光彩，恰恰相反，由于身在其中，他对封建官僚机制内部的腐败现象似乎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以至不止一次为之“痛哭流涕”，不止一次为之“惊骇嗟叹”，甚至不止一次“决意归故里”。从《忧庵集》可以看出，其激愤怨愤之情丝毫不减当年。然而，他始终没有真正迈出这关键的一步，也始终没有真正关上心灵的门窗。既然看透了官场的险恶与污秽，却又对之迷恋不舍，这确乎是一种矛盾的现象。在戴名世这种矛盾思想的背后，实际隐藏着强烈的入世愿望。他对于现实中种种不合理的现象的怨愤与抨击，恰恰反映了他的“不忘于世”的执著态度；而对于山林隐逸的向往，则又是其“扬清激浊”的理想得不到实现后的一种变态反映。

这样的思想性格，这样的处世态度，当然很难见容于文网禁锢、扼杀个性的明清王朝。这一切，已经决定了戴名世只能是一个悲剧性的历史人物。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多以为戴名世获罪是由于他在《与余生书》中称引过南明年号。但那封书信作于康熙二十年，为什么当时不治罪，而要拖至三十余年后的康熙五十年才由“左都御史赵申乔追论其事、坐拟凌迟”？如果说这封信在当时还未公诸于世，有理可寻，那么，康熙四十年铸版印行《南山集》，一次在江苏就刻印三千册，这个印数不能算少了，这封书信业已收录其中，为什么还是要拖至十年后才问罪呢？看来，这些不像是戴名世获罪的直接缘由，可能是案发后为加重其罪名而追补进来的。我们看赵申乔给康熙帝奏本正文，只说戴名世“妄窃文名，恃才放荡”，并未提到《南山集》，九卿议决亦然。至刑部呈辞开始扯进十年前编刻的《南山集》，又找出三十余年前写的《与余生书》。到后来罪名越来越大，牵涉的人也越来越多，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其实，《南山集》中大部分篇章都较温和，还不至于让衮衮诸公那么愤怒。编者尤云鄂说，《南山集》所收仅为当

时已成文稿的五分之一，绝大部分都坚匿不出。戴名世给的理由是：“今吾所为文随笔直写，未经锻炼，篋中所存皆草稿而已”。七年后编《忧庵集》，他仍自称是“草稿数行，颇无伦次，亦不求工雅，聊以度日而已”，还是不想公诸世人。戴名世死后，他的好朋友方苞曾说过：“世所见潜虚文多率尔应酬之作。其称意者每挟而藏之，曰：‘吾岂求知于并世之人哉？度所云果不可弃，终无沉没也’。”由此推想，类似这样“随笔直写”、“不求工雅”的作品数量一定不少。从表面上看，他不愿公布这些作品是出于谦虚，但他为什么又对友人说，这些坚匿不出的作品多是“称意”之作，甚至还想“求知于并世之人”，而渴望知音于来世呢？很显然，这些谦词的背后恰恰隐藏着作者对这些“触事而有感”的作品的钟爱。这些作品，秉笔直书，把世风民情的颓败、官场的昏暗、作者的爱情感情等无所保留地实录下来。这在谀词、时文盛行之际，当然显得“不雅”，甚至还有可能招致政治麻烦。康熙中叶，文网虽然渐宽，但也只是相对而言。这部钞本136条就曾写道：“文字之忌讳，至今日为已然，亦亘古所未有也。自场屋之文与士大夫往还回答之书，及一切酬应之文，皆以吉祥之辞相媚悦，而古人所造之字，其可删去不用者不可胜数矣。”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文化界的禁锢情形。我们知道，任何一个统治阶级是决不会轻易放松手中的权柄的，更不能容忍各种不满情绪弥漫开来。心胸偏狭局促的清朝统治者，对这个问题显得格外敏感、格外警觉，凡属异端思想、过激言论无不防范甚严，打击极烈，推行的是以高压为主要内容的方针政策。在这种政治背景下，这类“触事而有感”而又“随笔直写”的称意之作，戴名世怎么可能把它刊行于世呢？

尽管如此，戴名世的许多未刊文稿仍不胫而走，在世间广为流传。其文章之嬉笑怒骂、冷嘲热讽，早已使得“诸公贵人畏其口，尤忌嫉之”（《清史稿》本传），“遂争骂仆以为快。”甚至连“乡之在京者”，也“多相诫勿道戴生名”（《与何纪瞻书》）。可见戴名世与那些王公贵人存在着何等尖锐的对立！矛盾冲突必定要爆发，只是时间先后而已。细读这部钞本，我颇怀疑戴名世所以在仕途正走红之际突然招致灭顶之灾，这部《忧庵集》恐怕起到了导火索的作用。前边说过，这部钞本结集于康熙四十七年，而从“嗣后随笔有记，亦附入焉”这句话推断，这是一部未定稿，随作随续，很可能一直持续了二三年。我相信其中一些篇章必然会有所流传。其愤世疾俗，特别是讥刺皇权的文字，终于给政敌授以把柄，使他们找到了报复的机会。康熙五十年，也就是《忧庵集》开始结集后的第三年，以赵申乔为首的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将戴名世贬入绝境。而这时的康熙皇帝已经历了几十年的统治，疆域逐渐平稳，经济日益恢复，剩下的工作似乎该是对思想领域内“异端”倾向进行整饬了。他曾说过：“朕临御多年，每以汉人为难治。”恰好在这时，戴名世已成众矢之的，于是康熙皇帝很自然地选择了戴名世作为整饬异端思想的开始，制造了这起影响极为久远的文字狱，开启了“监谤防口之

风,跟着就是雍正间几次大狱”(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术文化从此发生了逆转。许多作家惶惶不可终日,生怕触犯文网,只好远离政治,纷纷躲进艺术的象牙塔中,追求神韵,讲究章法,日益脱离了现实生活。很多学者也如履薄冰,战战兢兢,避谈世事,皓首穷经,把自

己深埋在故纸堆中,从此确定了以考订古籍为主要内容的乾嘉学派的必然方向。总而言之,清代中叶的思想文化界整个笼罩在“《南山集》案”的巨大阴影中,呈现出一派抑郁沉闷的衰煞气象。

〔责编:穆图〕

遭人嫉恨的林芳兵

●张维国

人生是一条坎坷崎岖的路。一个人要想获得成功,要战

胜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有的时候,容颜娇美,也会化做一个人成功路上的风风雨雨。

初进长影的林芳兵,就曾有人扬言要给她“破相”。

一天晚上,芳兵刚钻进被窝,一块砖头从窗外飞进来,砸在床帮上,吓得她“妈呀”一声用被子蒙住头,惊魂不定,一宿没敢睡。

第二天中午,芳兵打着太阳伞走在路上,突然,一只花盆从楼上扔下来,在她脚前摔得粉碎。芳兵踉跄着倒退两步,一屁股跌在地上,面色惨白,浑身颤抖。保卫处的同志闻讯赶来,仔细查看了现场,发现花盆的落点正对着楼上的厕所,因此断定:如果是从男厕所里扔下来的,就是要流氓;如果是从女厕所里扔下来的,就是嫉妒。保卫处决定“立案侦破”,但最终也没能捉拿住“凶手”,成了一桩悬案。

“谋害”事件发生没几天,又有传言说:林芳兵拍了裸体照。张三传李四,李四传王五,不到半天功夫,整个长影厂已传得沸沸扬扬。芳兵到食堂吃饭,各种各样的目光都集中在她脸上,有人还故意把话说给她听——

“不会吧?这女孩平常挺正经的。”

“那难说,为了钱,什么事干不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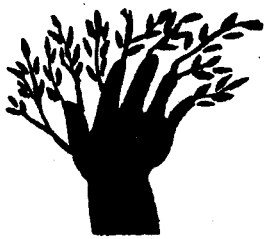
“就是,装大瓣儿蒜谁不会呀。这下好了,看她还美不美!”

“为啥不美?这叫‘为艺术献身’。”

“哟哟哟,再献就献到床上去了。”

“哈哈哈……”一阵哄堂大笑。

幸灾乐祸,冷嘲热讽,象刀子一样剐着芳兵的心。她跌跌撞撞地跑回宿舍,一头扑到床上,放声痛哭。一个女孩



家,最不能承受的就是这类下流的谣言。

一会儿,保卫处把芳兵传了去。保卫干事板着脸对她说:“你要坦白交待,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谁给你拍的,一五一十地讲,不许隐瞒任何细节。”

“我没拍!”芳兵颇为镇定从容。

“不要不承认嘛。”保卫干事将一张底片在“受审者”眼前晃了晃,“我们有证据,你还是争取主动的好。”

“那不是我!不是我!”芳兵相信假的就是假的。

保卫处长走过来,拍了拍芳兵的肩:“你太激动了。这样吧,先回去好好想想,我们明天再谈。”说完,他把芳兵送出来,随后去向厂领导汇报。

庞学勤副厂长对此事十分重视,他指示保卫处长:“这件事必须调查清楚,是她,要严肃处理,不是的话,一定要还人家一个清白。记住:这关系到人的名誉,特别是女孩子,所以,千万不能盲目下结论。”

“好的。”保卫处长说,“我们马上把照片洗出来,和林芳兵的照片放到一起仔细对照。”

两张照片放到一起,怎么看怎么是一个人。还是保卫处长有经验,从人中上发现了破绽:林芳兵是短人中,而裸体女人却是长人中。原来,照片是从一本外国挂历上翻拍下来的。显然,这是个“阴谋”。尽管没有得逞,但毕竟造成了“影响”。一年以后,北京电影学院在决定录取林芳兵之前,还专程派人来长影调查呢!

所幸,林芳兵走过了这些“磨难”。如果当初林芳兵不是以恬静从容的心态对待这种嫉恨,如果长影厂的领导不是实事求是地为一个女孩子洗去了身上的谣言,我们今天的影坛上也许会少了一颗光芒四射的明星呢!



○老一代革命家和新一代领导人谈得多开心

江总书记探 “亲” 小记

每逢佳节倍思亲。1993年春节期间，中共中央总书记、军委主席江泽民同志，先后探望了在京的一批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其中之一是我国军事和外交战线著名活动家、本刊顾问伍修权同志。江总书记听说伍老正住院养病，就直接去医院探视看望，去后才知道伍老刚刚出院回家，又专程赶到伍老家中来拜望。伍老得知后，忙让秘书打电话去“劝驾”，说自己已经退下来了，总书记那么忙，不能因为来看他影响了工作，他感谢总书记

的关心。但是江泽民同志还是来了。

江总书记一进门，就热情地同伍老握手问候。伍老欣喜地说：

“不敢当，实在不敢当！”

总书记爽朗地笑着说：“应该的，这是应该的！”

只见他们一个连忙礼让，一个要亲自搀扶，相互紧紧地挽着手，进了客厅里。伍老家里的人和身边的同志，一齐兴奋地欢迎

总书记按住要为他
送行的伍老说：“您
还坐着，就别起身
了。”



总书记的来到，江泽民同志也亲切地向大家问好拜年。当主人请他人座后，他马上关切地问开了伍老的健康状况，伍老表示组织上对自己照顾很周到，请总书记只管放心，并且希望他更要保重身体，注意休息，好挑更多更重的担子。伍老于20年代曾去苏联学习和工作，还做过俄语翻译；江泽民同志在50年代也去苏联学习过。他们俩说着说着就用俄语对起话来，俩人都称赞对方的俄语说得流畅熟练。总书记得知伍老的夫人徐和同志老家在江南湖州南浔镇，并在上海上学和生活多年，马上用上海话同徐和拉起了家常，他自己也曾在上海读书，后来又长期在上海工作，对上海和江南很熟悉并且怀有深情。伍老有个在香港工作的女儿刚回来过节，总书记忙让她坐到近处，先用广东话，又用英语同她说起了香港的情况。他的英语和广东话竟也说得那么地道，伍老的女儿连说自愧不如。

江泽民同志对伍老说，他曾仔细阅读过伍老的回忆录，并就书中一些历史往事和具体情节，说起了自己的感受。他说伍老回忆长征中过雪山一段，自己印象特别深刻。他复述着书中若干细节说，上雪山时开始还比较顺利，越向上爬就越困难，体力和精力都不够了，后来每前进一步都得下一次决心，快到山顶时只能动一步喘几口气再挪一步，就这样一步一步地边数数边鼓励自己，一点一点地用自己的全部力量爬上山顶，这才越过了长征途中的这道险关。但是有不少战友却因为伤病饿冻，体力不支，不幸地倒下再也爬不起来。他算了算，伍老当时正是20多岁，正是年轻力壮之时，过雪山时竟那么艰难，可见长征之苦，更可见长征红军的顽强斗志与不屈精神，这说明革命征程中的每次胜利，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都要有坚持到底的决心。

总书记又谈起伍老回忆录中的另一部分，也是他爱读并印象深刻的部分。那是1950年伍老去联合国的事。他说自己当时还是个青年，在报上看到伍修权同志率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赴联合国代表团，代表刚刚翻身的新中国人民，在联合国安理会讲坛上，当面揭露美帝国主义者对我国台湾及友邦朝鲜的侵略罪行，为长期受外国列强欺压剥削的中国人民，痛快地出了一口恶气。总书记说也就是从那时起知道了伍老的名字，以后就一直关注和敬佩伍老。他希望伍老作为我国现代历史若干重大事件的亲历者和见证人，继续和经常给后人讲讲历史，对大家进

行爱国主义、革命理想和国情教育。伍老说，现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正按照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在江泽民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步伐，自己作为长征老战士，虽已年高体衰，也要和全国人民一起，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在现代化建设的新长征路上，当不了打先锋的突击手，也要做个起劲的“拉拉队”，支持大家夺取伟大胜利。

交谈中总书记还对伍老另一个学过西医又学中医的女儿说，他的祖父就是个老中医，在老家扬州一带还相当有些名气。他认为我国的中医很值得学习、继承和研究、提高，西医也应学点中医，搞中西医结合，是发展我国医学的正确道路。伍老家里人和身边同志，有的拿来签名册，请总书记留下墨宝，他马上接过本子，欣然为其题字。就在这时，他的随行人员进来提醒道，下一项活动的时间快到了，可是新的签名册又递到了总书记面前，他还是耐心地一一题写起来。他的随行人员边看着表边为他收笔和拿起皮包，他也起身准备告辞了，却见伍老身边的小战士手上还拿着两个空白的纪念信封，忙向那小战士道：“这是‘十四大’的纪念封吧？这么办，我只给你写个名字，行吗？”当小战士激动地直说谢谢时，他已又坐下连签了几个名。周围的人们见总书记再次起身要去了，一齐围上来希望与他合影留念，他又乐呵呵地与伍老家的人和身边工作同志合了影。

总书记与伍老告别时说，今天时间太短，没能与伍老更多地谈谈心，下次将专门安排时间，再与伍老畅谈，好好学习请教，并请伍老多多保重，祝健康长寿，并祝他一家和周围的同志幸福愉快。当伍老要送总书记出门时，总书记坚持伍老留步，又同周围的同志一一告别，上了车还向人们不断招手。直到汽车启动，他还向人们说：

“祝大家万事如意！”

伍老在门内也向他招呼道：“祝你身体健康，心想事成！”

（曹治、臧峰摄影）

春秋笔

彭德怀 落难

与林彪得势

● 权延赤

真相



风乍起，吹皱鄱阳湖；雾弥漫，笼锁庐山峰。

有道是：望春不见春，想汉宫图画，风飘灰烬。棋枰客散，黑白胜负难分；南朝古寺王谢墓，江上残山花柳阵。人不见，烟已昏，击筑弹铗与谁论。黄尘变，红日滚，一篇诗话易沉沦……

我在北京西郊的18所写这篇文章。

这院子不能随意散步。那一幢幢站了岗的灰色小楼惹我生出许多感怀。37年前，中共第8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这里曾经住过许多世界著名的共产党领袖人物。

率苏共代表团前来参加大会的是米高扬。他说，留给他印象最深的是兼有“牛一样结实的身躯和令人敬畏的面孔”的彭德怀元帅。

“米高扬同志，”彭德怀象尊铁塔，近在咫尺地墩实在这位苏共代表团团长面前，以传统的中国农民的纯朴性，不拐弯不打结地当面诘问：“为什么斯大林生前你们都喊他天才、英明、万岁，可他死后你们又骂得他漆黑一团？”

米高扬脸红了。这一问关系到政治人物的政治品质。

“他的错误既然那么严重，为什么不在他生前提意见，人死了才算旧帐？”彭德怀皱起眉头，“他还能听到能改正吗？”

米高扬赧颜地耸起肩膀，双手一摊：“当时谁敢提呀……”

“这是对党对人民对领袖负责的态度吗？”

米高扬避开彭德怀的目光，那目光太纯洁太正直……太天真。没有水晶一样透明的心是难以承受的。

他用诉苦的口气说：“谁提了谁就要掉脑袋！”

彭德怀眯细了眼，足足打量米高扬5秒钟，嘴角开始抽搐，流出一股嘲意。他的身体缓缓扭转，就在背过身去走开的一刹，右臂忽然抡起：“怕死还当什么共产党员！”

三年后，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发言，对“三面红旗”提出批评意见，并且呈上“意见书”。

他没有被杀头，但他还是折了。失去国防部长职务，并且成为“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代表人物……

“张飞”

1959年“八一”建军节前夕。

暮色沉沉，有位“秀才”求见毛泽东。

他走进“美庐”时，卫士田云玉见到他在哭。庐山上发生的这场风波，工作人员若明若暗都知道了一些。

卫士引他登上二楼。一进门，看见毛泽东的刹那，他“放声大哭”，“哭得很厉害”。卫士劝不住，毛主席也劝不住。他说：“主席，我年轻，没经验，上当受骗了……”

也许应了“秀才闹事，十年不成？”有的秀才确实看问题敏锐深刻，风头上真能慷慨激昂，可是风向一转，便跌落下来。

不过，那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氛围，何况又是面对功高如山、

扭转乾坤的巨人毛泽东，秀才被迫讲了违心话或真以为错了而反戈一击，都是可以理解的。

他一边流泪，一边检查，一边揭发。

毛泽东对那位秀才没有生气反而劝解地说：“唉，莫哭，莫哭了。你还年轻，要振奋精神，继续搞好工作……”

送走痛哭流涕的“秀才”，毛泽东没完没了地吸烟，没完没了地踱步。

值班卫士轻手轻脚走到办公桌旁，换上一杯新茶。他准备退出，却又顿一下步。因为毛泽东迎面踱过来了。

前几天，毛泽东也曾这么踱过来。那次，“促进派”的几位同志汇报了将近7个小时；那次，毛泽东听完汇报便没完没了地吸烟踱步；那次，毛泽东突然用一根食指按在卫士胸前第二颗纽扣上问：“你知道彭德怀过去叫什么名字？他叫彭得华，要得中华。”

卫士田云玉就是由此才知道彭德怀出事了。

这次毛泽东没有用食指按卫士的纽扣。他经过卫士身边时，就象经过一片旷野，就象根本不存在这个人。毛泽东在思考问题时常会如此“目中无人”。卫士松口气，悄悄退出门外。

彭德怀

毛泽东喝一口龙井茶，目光从堆积桌案的简报、资料汇编以及“动态”“情况”上一掠而过，旋即踱向窗前。

山下暑气蒸人，山上清凉世界。微风穿窗，清爽宜人，还带来植物的馨香。他胸脯起伏几下，忽然嘣出一句：“赫鲁晓夫之后是，彭德怀……”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讲出这句话，以后会上会下又讲过几次，言简意赅，反映出他的全部思考和看法。

思考的起因是彭德怀的“意见书”，但思考的“落脚点”却根本不在那份“意见书”。

彭德怀写“意见书”的原因很简单，可以简单到三年前他朝米高扬抡胳膊：“怕死还当什么共产党员！”可以简单到一首民谣：

谷撒地，
薯叶枯。
青壮炼铁去，
收禾童与姑。
来年日子怎么过？
请为人民鼓咙胡！^①

彭德怀抡着胳膊跳出来。他这一“鼓咙胡”，便成了流芳千古的人民英雄。

毛泽东所处位置，思考决不能象彭德怀那么简单；他所肩负的责任，也不允许他象彭德怀那么简单。

论述这个问题，须专门一本书，而非现在这本书所要完成的任务。本书只是将毛泽东思考的几个阶段几个要点列出来。

登庐山每上一公里路要转十七道弯。当毛泽东“跃上葱茏四百旋”时，正是“三面红旗”遇挫，面对了一片“反华大合唱”。他恰似“一山飞峙大江边”，对于包围中国的骂声，他是“冷眼向洋看世界”。①

毛泽东“冷眼向洋”看美国，看台湾，看苏联的赫鲁晓夫，决非象某些书里所写“冷眼看着他过去的战友们上山，准备一一收拾他们”……形势座谈会开始不久，几位“促进派”向毛泽东汇报“彭德怀发言有问题。”毛泽东不介意，当着卫士们的面说：“此人是张飞，不就是提意见呗。”

又一位负责同志陪毛泽东散步时汇报，彭总建议解散中南海文工队，说是特殊化。主席建议从不同专区选一名战士到一中队，搞五湖四海，便于了解各地情况，彭总也反对，也说特殊化……

毛泽东听了仍是一笑而过。

彭德怀送上“意见书”，毛泽东也未像某些书或文章的作者所想象那样“龙颜震怒”，当时在场的秘书、卫士长以及卫士都回忆过那经过：

毛泽东看过彭德怀的“意见书”，把烟蒂拧入烟灰缸，苦笑说：“彭德怀送给我看的尽是消极材料，尽给我送消极材料。”他停下来，认真将一支香烟插入烟嘴，继续说：“王任重、陶铸、柯庆施送的材料积极。”点燃香烟后，他还说过两句：“这个人敢讲真话。”“容易得罪人。”

只要不是书呆子，谁都懂这样一个基本道理：真话不见得是对话。正确与否的标准不只是简单一个真话假话，还与时机、形势有关，更与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有关。同样一句真话，10年以后讲也许是对的，10年以前讲也许就“错”了，错在不利于大局。

毛泽东在承认彭德怀是讲了真话的同时，也敏感到另外两个问题：一是赫鲁晓夫1958年在北京当面嘲讽中国的“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彭德怀在“意见书”里也用上这个观点。二是“促进派”提醒毛泽东注意信中的“抱怨情绪”蔓延开来，“乱了思想”，“泄了气”。六亿人泄了气可不得了！

毛泽东明白非常时期（或叫困难时期）气可鼓不可泄的道理。他沉住气，要看看“另一种倾向”到底有多严重？

7月17日晨，庐山上的与会者都拿到了大会印发的被冠以《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文件。第二天，周小舟发言支持彭德怀。同时，赫鲁晓夫也在波兰发表了批判和反对中国“人民公社”“大跃进”的讲话。

7月20日，张闻天发言支持彭德怀。第二天，苏联和波兰通过新闻媒介公开批判反对“人民公社”“大跃进”，开始了中苏之间意识形态的论争，台湾中央社和美国各报迅速转载并评论了苏联的文章，这期间，山下一些党员干部的批评意见也纷纷送上山来。

于是，从杜勒斯到蒋介石，从赫鲁晓夫到山上山下的党内“持不同政见者”，恶意的攻击和善意的批评便交汇混杂，在毛泽东脑子里形成一个“合唱团”，形成一种“大气候”。

于是，在毛泽东看来，“意见书”本身内容再也不是问题的焦点，对全局对事业而言，他的威信，共产党对国家结构领导权的合法性以及党的凝聚力变成了问题的焦

落难与林彪得势真相



① • 咙胡——喉咙

点,是远比彭德怀的命运更为重要的大事。实际上,就是刘少奇、周恩来这样一批出类拔萃的领袖人物,莫不持同一观点:彭德怀的问题不解决,全党无法团结一心,共渡难关。

7月23日,美国副总统尼克松访苏,标志苏美开始握手。在这种“包围圈形成”的共识下,毛泽东同一天开始反击,在庐山会议上作了尖锐激烈的发言。

7月24日,毛泽东、党中央委派聂荣臻、叶剑英找彭德怀谈话。《彭德怀自述》也证明,两位元帅都反复讲明:“不能单从信的方面来看,而要从不如何对全局有利着想”,“要抛开信的本身,从全面利益来作检讨”。

由此不难看出,把彭德怀折于庐山,只归结于向毛泽东上了一份“意见书”,实在是简单了。

当毛泽东凭窗而立,呼吸着庐山夜晚的凉气时,他思考的已经不是要不要反击彭德怀,而是反击到哪一步?

如果说“促进派”的汇报要求和“大气候”的影响,促成毛泽东数落彭德怀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那么,今夜发生的“反戈一击”,秀才的检查与揭发,便不能不促成那定性的升级。有背后议论,会下“串联”,自然就变成了“军事俱乐部”,升级为“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

八月一日,建军节。毛泽东已下定罢免彭德怀国防部长职务的决心。

上午10点,他亲自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议。

毛泽东对彭德怀说:“我同你的关系,合作与不合作,三七开;融洽三成,搞不来七成。三十一年,是否如此?”

彭德怀摇头。他违心地退一步,说:“我同主席的关系是对半开。”

“还是三七开吧。”毛泽东一步不退。

“对半开。”彭德怀明白这关系到他的问题性质。

“三七开。”毛泽东也明白这个比例关系着定性。

彭德怀痛苦绝望地看看毛泽东,嘴角一紧,垂下头。

1959年8月12日,庐山的早晨。

毛泽东走出美庐,作睡前散步。

几十座避暑石屋安卧在绿荫掩映的山坡上,静悄悄不曾醒来。这些别墅式建筑多是蒋介石30年代所营建,如今换了主人。

晨光曦微,他的身影停在日出的位置。火花一闪,青烟飘起,迅速被风驱散。他一手夹烟,一手拄腰,放开视野。

长江水悠悠荡荡,鄱阳湖苍茫茫,雾岭云谷人迹渺渺,唯有他独个儿神情冷冷。

唉,历史就象眷恋山岫的云雾,在他面前脚下纠缠不休……

山高路远坑深,
大军纵横驰骋。
谁敢横刀立马,

唯我彭大将军。

长征路上,毛泽东赠诗彭德怀,盛赞他是猛将,“象《三国》里的燕人张飞张翼德”,是开路的“先锋”。

转战陕北,国民党军长刘戡率7万之众追在屁股后边,实在恼人。彭德怀替毛泽东分愁解忧,率2万部队去打刘戡,问毛泽东:“对刘戡要死的还是要活的?”毛泽东在电话里激励说:“张飞张翼德,于百万军中取上将之首,如探囊取物。”于是,彭德怀一战而毙刘戡。若是“丈八蛇矛”的年代,便不只“击毙”,还要“斩下项上人头”哩……

抗美援朝,林彪有病,彭德怀慷慨请缨,打得美国人惊呼:“当年八国联军陷北京,现在十七国联军攻不下一个彭德怀……”台湾报纸甚至幸灾乐祸:“现在美国人不说国军不会打仗了。”翻翻世界史,好像只有毛泽东的中国敢于同世界性的联合国对立而不败,只有彭德怀成为打败世界性的联合国军的东方将领……

白云悠悠,人世悠悠。

现在,彭德怀上了“意见书”;7月23日,毛泽东说:“老彭啊,我们谈谈吧?”彭德怀抡起胳膊喊:“谈什么谈?没什么好谈的!”26日晚,彭德怀又在政治局常委会上骂粗话:“你在延安操了我40天的娘,现在我操你20天的娘不行?”

“张飞张翼德……”毛泽东深知其人地喃喃三遍。据说那天早晨他情绪一度流出哀凉。没有枪声的庐山,损折一员大将,值吗?张飞这样的人物,谈得上什么野心?你叫他当皇帝他也当不了,不肯当,毛泽东又怎能不明白?

但是,一瞬间他眼神里又闪出坚硬的不可动摇的意志。处理彭德怀,关系“三面红旗”之争,关系他那“一大二公”的理想社会,关系到主义之争。举凡经天纬地的巨人,为主义之争,莫不可以牺牲一切。毛泽东也不例外,他可以牺牲六位亲人,也可以牺牲他的那颗将星——“张飞张翼德”。

他深知,现在的形势,尤其要维护那个“凝聚力”……

“韩信”

他不再吸烟。凝神屏息,仿佛能听到旭日东升的隆隆巨响。从他的诗作中不难得知,太阳升起的时候也是他心潮澎湃,最能浮想联翩之际。

20天前,他的秘书在半山亭上,望长江,听松涛,写下一副联:

四面江山来眼底,
万家忧乐到心头。

此联一出,其他秀才都放了笔。可谓“眼前有景道不得,家英写联在前头”。

田家英心系天下忧乐,匹夫莫不如此,何况以天下为己任的

毛泽东?民主革命,巨险大难而乾坤翻转、家破人亡不足悲;开国创业,心神交瘁而天下大定、华发早生终不悔……

“我准备在历史上担骂名。”文人杜撰一个孟姜女,秦始皇就被骂了二千多年。毛泽东多次说:无非骂我是秦始皇。秦始皇算什么?秦始皇不过坑了七十二个儒,我们比秦始皇厉害一百倍!

他首先提出为秦始皇翻案,并且请郭沫若写了文章,发在《人民日报》。

每当日出之际,毛泽东常常发出深刻的生死感怀和人生慨叹:“人生易老天难老”、“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任一己之力,主万姓之浮沉,以实现自己体魄和精神之极致,以追求那大同邦、理想国。

你彭德怀讲真话,我毛泽东也是在讲真话。我讲了几十遍,“对形势看法不一致,就不能团结”。郑州会议,武昌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直到这次上庐山,“我们不晓得做多少次检查了,大做特做,他们就听不进去”。

从第一次郑州会议,我就带头纠“左”,这不是真话?

上海会议,我感觉纠“左”不力,讲了不满的话:“……我讲话不起作用。这一次我要亲自挂帅,总书记为副帅。”你彭德怀张口就挖苦:“您不是早就挂帅了吗?”

在北戴河,我四次叫卫士去请你来谈话,你就是怠慢不来。这不是真话?

上庐山前,由武汉到九江,我在船上呼吁团结,你退出舱外不回来听,上得山又写“意见书”,这不是真话?

我多次检查反省:“我固易被感情驱使……个性不好束缚”,你“张飞”难道不要反省?只要讲真话就可以任着性子来,不要那个团结那个“凝聚力”?

庐山就是一首苍凉的浪漫诗。10年后,毛泽东在此悟到宇宙的秘密,并且告诉了斯诺:人类在这个地球上的处境,变化是越来越快了。我看要不了多久,五百年或一千年,那时的人们再看我们这些人和我们所做之事——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一定会觉得很可笑吧……

这种超越历史、超越时空的感怀,尽管苍凉,却并不忧伤。

此刻,太阳已经升起。侍立坡下的两名卫士,又鲜明地感觉到了这位领袖体内那种冲力的高扬和意志的旺盛。

冲口而出的是刘邦的《大风歌》。他声调高亢,抑扬顿挫:

大风起兮云飞扬,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他再一次凝神屏息,仿佛在听群山的回应:

云飞扬……飞扬……飞扬……

守四方……四方……四方……

长征路上,毛泽东为彭德怀取名“张飞张翼德”,却从来不曾为林彪取名“韩信”,并且也从没公开把林彪叫过“韩信”。

不能叫“韩信”,毛泽东和林彪都忌讳“韩信”,“韩信”身上有

一场历史悲剧。

但是,林彪又确实有过“韩信”的称号,并且早于“张飞”,是在中央苏区时就被人叫了出来。

共和国的十大元帅中,林彪资历最浅,却排名第三,靠的自然不是战功。朱德是“红军之父”,是总司令;彭德怀是副总司令,曾经代总司令,这种历史的原因,林彪不能超越。其他的元帅,无论是黄埔军校时他的教官还是南昌起义时他的总指挥还是上井冈山时他的军长、党代表,统统列在他的名后。他成为元帅第三。

林彪是黄埔四期学生。你可以说他“相貌平平”,“身体瘦弱”,“学习平庸”,“政治上也不活跃”,上了井冈山还怀疑“红旗到底能打多久”?……

但是,有些历史事实你无法否认。在黄埔军校他不显山,不显水,你再说他平庸他也参加了共产党。四个月后又成为“铁军”叶挺团中的一名排长。

“八一”南昌起义,他再“相貌平平”“身体瘦弱”,在战斗中也是“打得异常勇敢”,“始终冲在士兵们的前面”,并且坚持上了井冈山。

井冈山的斗争中,有人说他投机也罢,动摇也罢,怀疑“红旗到底能打多久”也罢,他毕竟是身经百战,并且在一大批优秀指战员中脱颖而出。战争对军人的选择是无私而又严酷无情的,容不得半点虚假、侥幸。侥幸过了初一过不了十五。林彪在3年时间里,从连长到营长到团长到军长,是一仗又一仗打上来的。许多军史研究专家都不得不承认他“确实仗打得漂亮”。

他24岁就升任红四军军长。不是靠谁的赏识提拔,而是靠“五十天歼敌一万余人”的战功和军事指挥才能。

他25岁升任红一军团总指挥,与红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成为毛泽东反围剿的左膀右臂。第四次反围剿,林彪率红一军团干脆利落地消灭了蒋介石嫡系陈诚赖以起家的“常胜军”十一师,为粉碎国民党军的第四次“围剿”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林彪、彭德怀,被称为红军战争时期毛泽东的左膀右臂,那时人们就看到这两位将领作战风格的不同。

彭德怀骁勇、刚猛,善于吃苦,敢于打硬仗。

林彪多谋善断,善于审时度势,用计谋以少胜多,以弱胜强。

彭德怀“横刀立马”,驰骋沙场,博得“张飞张翼德”的美称。

林彪呢?避实就虚、声东击西、暗渡陈仓、围魏救赵……确实有些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帅才。于是,在一些胜仗之后,便有些人叫他韩信。

那时人们叫他韩信,决没想到“野心”上去,只是说他率兵打仗象韩信。但是,“韩信”在人们的观念中,毕竟还有悲剧的一面,所以叫起来不象“张飞张翼德”没顾忌。打了胜仗叫一声“韩信”,范围有限,平时更不会有谁把“韩信”挂口头。长征以后,“韩信”的叫法就听不到了。

解放战争时,“韩信”的叫法又出现一下,起因在于黄永胜。

“四野”8纵司令员黄永胜,骁勇善战,多有战功。但不打仗时就稀松,就花。打牌跳舞玩女人。兵团司令员程子华颇为其挠

头。东北决战在即，程子华三次找林彪，要求换将。他看好老资格的段苏权，说段将军老成持重，有廉颇之风，可代黄永胜为8纵司令员。

林彪摇头：“辽西三战三捷，永胜同志兵不过二万五，半月歼敌一万六，功劳不小。”

程子华皱眉：“他是击鼓冲锋，鸣金玩女人。说到底咱们还是共产党的军队呀，这样子怎么行？”

林彪面无表情，声调平淡地说：“汉高祖刘邦曾问韩信：你看我能带多少兵？韩信说：十万。刘邦不悦，问：那么你能带多少兵？韩信说：多多益善。刘邦嘲笑：你这么大能耐，怎么被我捉来，供我驱使了？韩信不慌不忙说：陛下不善将兵，却比韩信善于将将，所以韩信只能供陛下驱使……”

说到这里，林彪起身送客：“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就这样吧。”

在东北，冀察热辽的干部包括程子华、李运昌、段苏权这些老人，同林彪矛盾不少，议论也常有。林彪将将，讲的本是帝王术，学的是刘邦将将。但是，无论何时何地，决不会有人将其比为刘邦。有毛泽东在，那样比是犯大忌的。于是，故事在冀察热辽的老人中传开时，刘邦将将就变成了韩信将将。于是，背地里开始有人把林彪叫“韩信”。比如黄永胜进城跳舞去了，冀察热辽的老人便议论：“那是‘韩信’看中的干部。”“在井冈山他就跟着‘韩信’当团长了……”

林彪在辽沈战役中立下奇功，打出赫赫威名。大军入关时，黄永胜豪气十足：“单是我们‘四野’也能跟蒋介石一争天下了！”林彪麾下不少人拿垓下一战来比辽沈战役，说林彪这一仗打得不亚于韩信当年的十面埋伏。

于是，不光对林彪有意见的冀察热辽老人背地里把林彪叫韩信，就是“四野”中那些最信任最佩服林彪的指战员，也有不少称其为“韩信”。

建国后，林彪不出头，不露面，淡于交往，基本过着隐居的养病生活，以至于不少老人说他“打仗象韩信，处世象张良”。

“韩信”被人渐渐淡忘了……但是，毛泽东没有忘。

1956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再次被选为党的主席。与会代表们以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向他表示热烈欢迎。

但他没有获得全票。他差了一票，这一票是投给了林彪。这一票正是毛泽东自己所投。

彭德怀

林彪7月23日偕叶群一道上山，住在一幢二层的西式小洋楼里。

他仍是深居简出，一副淡泊之态。他不象其他的元帅喜欢聚会聊天，他几乎不去看望任何人，至于其他人来拜访，多数也是被叶群挡驾。

他或者在楼里踱步想事，或者在别墅前的林木中坐把藤椅读书。但他心里有数，毛泽东没有忘记他，现在的形势，更需要用他。

8月1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彭德怀曾难过地说：

“张飞这个名字还是主席给起的。我自认为对敌斗争是坚决的……我有农民无政府思想，在北京打过八九次电话，都没找到主席，面谈机会少，得不到主席的具体帮助。养成孤僻性格，常常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毛泽东的话不无失望：

“多次重要时期，从没写信给我，为什么这次要写‘意见书’？我同常委之间，同别人，从来没讲过你什么。为了让你安心工作，给林彪发了转业费……”

林彪从毛泽东的话中，体会出了含意。毛泽东在十大元帅中，只说给林彪发了转业费，分明有了请林彪重新出山挂帅的想法。

林彪也很有份量地给了彭德怀几句：

“这回是招兵买马，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他转向常委们：“在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谁也不要当英雄。”

落难与林彪得势真相

毛泽东确实准备用林彪替代彭德怀任国防部长。

元帅第二倒了，元帅第三接班也是顺理成章。一个“张飞”，一个“韩信”，打天下都是功高勋著，是左膀右臂，也都同自己有过磕碰纠缠。

据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讲，元帅中只有彭德怀和林彪、陈毅敢坚持意见，顶撞毛泽东。

有一次，彭德怀径直闯入毛泽东卧室报告军情，没有谁能拦得住。毛泽东多次为了睡觉被人打扰而发脾气，这次没有发脾气，只是苦笑说：“只有你彭德怀才会在人家睡觉的时候闯进来。”

其实不只一个彭德怀，还有一个林彪。据卫士们介绍，林彪也曾不顾警卫阻拦硬闯进去，对阻拦的卫士喝令：“叫醒主席，我有急事。”

彭德怀敢讲话，林彪也不是有话不敢说，有屁不敢放的人。他们的区别在于：彭德怀看到自己意见正确时，会不客气地当众批评毛泽东的错误林彪在事实证明自己正确时，就这样讲话。他对东北干部们讲：“战争的根本问题在于消灭敌人……把城市丢给国民党。城市一丢，我们的包袱就没了”

……到农村建立根据地，有了根据地，我们就有了家……我讲的是毛主席的军事思想。”

东北战争终于打赢了，林彪在东北局扩大会议上讲，这是“在全东北境内贯彻了毛主席 1945 年 12 月的指示”的结果。他把功劳归于毛主席。

说林彪“当面喊万岁，背后下毒手”，并不全面，那只是特定的时间和事件。他若始终如此，就当不了“接班人”。他更多的是“当面敢坚持意见，顶撞毛泽东，背后喊万岁，公开场合全力维护毛泽东”。

在毛泽东心目中，他显然比彭德怀是“忠臣”。

毛泽东已经回到美庐二层，擦澡、服安眠药，上床。

卫士小心翼翼地替他按摩着两腿两脚，不发任何声响。从毛泽东那淡漠的目光可以知道他正在沉思。

片刻，他点燃了一支烟，并且将一张白纸垫在一本书上，用铅笔写了几个字。

他写了几个“林彪”。

青烟一团团，一股股从他嘴里吐出。他在沉吟。

沉吟就是犹豫。

当七八个“林彪”已经占满半页纸时，毛泽东拧熄了烟蒂。他出神似地停上片刻，又用笔写去。这次写得很慢很慢，每一笔一画都带着滞重的沉思。

终于写出三个字：岳鹏举。

这三个字就占满了剩下的半页纸……

“岳鹏举”

毛泽东对林彪有两个犹豫。不是犹豫他政治上的忠诚，军事上的才干，或如某些书所言怀疑林彪是一代枭雄。

毛泽东对林彪的第一个犹豫是身体状况。

许多人对林彪的怪病大作文章，都谈到他怕光、怕水、怕风、怕出汗……客观讲，对林彪的病不该用取笑态度，应该是理解。那是严酷战争造成的，是重伤及战争中过度付出遗留的。为了对付伤痛，他不得不用镇痛的麻醉品，正象许多好干部在与癌瘤抗衡时也会要求多用点杜冷丁一样。不能因此说他是吸毒者。

每到关键时刻，毛泽东要用林彪时，首先问的都是身体。抗美援朝，林彪因为身体不行未能挂帅。高岗闹分裂想取代刘少奇、周恩来时，毛泽东曾愤激地说：“他推林彪当总理，其实是他自己想当总理。林彪身体不好，怎么可能当总理？”

这次林彪上庐山，毛泽东见到他第一面时，首先关心的就是：“近来身体怎么样？”

“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泽东首先关心的也是林彪的身体。谈过北京不肯转载姚文元文章后，接着便问林彪：“现在身体怎么样？如果吃得消，就要多挑担子喽……”

毛泽东对林彪出任国防部长的第二个犹豫，就是因为脑子里还有个岳飞岳鹏举……

中国的著名将帅都有生动的“别号”。比如朱德被尊称为“红军之父”，彭德怀被称为“张飞张翼德”，刘伯承是“战神”，林彪是“韩信”，罗荣桓是“政治元帅”等等。其中不乏由毛泽东叫出名的。比如用“诸葛、吕端”来比叶剑英，用“周勃”来比许世友，用“李逵”来比李达，用“徐达”来比许光达……

毛泽东在纸上所写“岳鹏举”，是指二方面军的旗帜，爱兵爱马名震天下的“兵马大元帅”贺龙。

在中国的著名将帅中，贺龙被誉为“岳飞岳鹏举”，可以说是最早的一个。早在“八一”南昌起义之前，早在中国工农红军诞生之前。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贺龙反而主动转向共产党，在武汉与叶挺将军一见如故，交上朋友。“惺惺惜惺惺，英雄爱英雄”，两位北伐名将多次在大智门贺龙的师部里晤谈，纵论天下大势。

4月18日，贺龙向全师发布命令：继续北伐。22日，率部出征。北洋军阀奉军头子张作霖为了阻止北伐，派张学良率精锐部队南下应战，同时勾结豫东北的“红枪会”，集结一万多土匪大举进攻广水、武胜关。

贺龙率军北上，一路攻伐，扫荡鄂豫边界；战九龙关、夺插旗山、拔铜鼓台。这些参加“红枪会”的土匪，自恃“神符护身，刀枪不入，人多势重”，都是些悍不畏死的亡命之徒。当年吴佩孚、孙传芳都退避三舍，拿他们没办法。但这次遇了贺龙，真是小鬼碰上了神仙，被打得尸积如山，血流成河，剩下的全如鸟兽散。

这一带农民本来就迷信，听风是雨，一夜之间传出千里。信阳、洋河镇、五里铺、青山店……成千上万的土匪，头天还张狂横行，转天便土崩瓦解，逃得踪影全无。

贺龙统帅三军，一路呐喊着“打败了吴佩孚几十万兵，不怕张作霖的替死鬼”，长驱北上，打进驻马店。

这时，张学良率领 17 个混成旅，十几万大军集结于漯河、逍遥镇、周家口一线，准备与贺龙决一死战。

“小六子要和我在这里决战。”贺龙手指地图对各团指挥官讲，一边吸烟一边微笑，讲得象儿戏一般轻松。张学良也是中国近代史上声名赫赫的一代名将，除了他爹张作霖张大师，大概只有贺龙把这位少帅象呼小娃娃一样叫成“小六子”。他好象胜利已经在握一般，将大手在地图上一穿一插再一握：“我们穿过上蔡，强渡漯河，击溃小商桥、逍遥镇一线的敌人主力，然后插临颖，攻朱仙镇，拿下开封！”

最后这一句，那握拢的拳头砸在了图上。

在群情激昂中，贺龙磕去烟斗里的烟灰，用烟斗嘴敲地图上的几个“点”，灿然一笑：“看出名堂了吗？开封就是宋朝时候的汴京，我们现在走的完全是当年岳飞岳鹏举的北伐路线。‘精忠报国’，在此一举！”

在一片“精忠报国”的欢呼和誓言声中，贺龙摆摆手，待大家平静一些，才换上深沉的声音说：“不过你们要注意哟，小商桥是杨再兴落马的地方，当心我们不要落马！逍遥镇和朱仙镇是岳飞大捷之地，我们更要大胜。岳飞饮恨而退，我们不能退，要收复汴京，直捣黄龙！”

难怪贺龙敢于戏呼张学良“小六子”，少帅虽然是名将，关内各路“诸侯”都惧他几分，冯玉祥、阎锡山、蒋介石争相拉拢取悦于他，但是遇上贺龙，情况全变了。

逍遥镇一战，贺龙率军强渡漯河，杀得昏天黑地，神惊鬼泣，将张学良的先头精锐部队尽数歼灭。贺龙虽然只统领一师人马，但生俘敌人就达四个团！缴获的物资军械堆积如山，并且缴获的24门野战炮及其他大量小炮，增建了一个炮兵团。

接着挥师小商桥，又是一场血战，敢死队人手一挺“蛇蚤龙（一种手提式机枪）”横冲直闯，如入无人之境。震天的呐喊声中，无数刺刀紧随其后突入敌阵；硝烟滚滚，刀光闪烁，钢铁碰撞，火焰冲天，经过几个小时的反复冲杀，张学良的主力部队全线崩溃。贺龙不容敌人喘息，一道命令，挥师扑向临颍，以雷霆万钧之

势向张学良发起最后猛攻。张学良带兵以来，从不曾遇上这样的“恶敌恶仗”，丢盔卸甲，一败涂地。打到后来，一听贺龙便闻风而逃。贺龙几乎是兵不血刃便连下朝阳寨、石佛寺、朱仙镇，横扫河南大部，于5月31日进入开封。祝捷会上，贺龙高举大酒碗，豪气冲天：“北上幽燕，直捣奉京！”三军欢呼，踊跃向前。

贺龙的亲人，为革命献身者近百之众，其中不少在他的部队中任过重要职务，个个骁勇善战，所以曾被人称为“贺家军”，一如历史上被传颂的岳家军。

可是，宁汉分裂，蒋介石正准备西攻武汉，武汉国民政府内部，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也正走向激化。在这种形势下，武汉政府下令贺龙停止北伐。据说，三天之间连发12次电，严令贺龙立即回师武汉。

与历史上传说的岳飞被16道金牌令召回临安何其相似！

下达回师令时，三军痛哭，问“为什么步岳飞之后，不继续北伐？”贺龙含泪，只说了一句：“我们比岳飞只多走一步……可惜！”

北伐未获全胜，但这更使人们把贺龙与岳飞相比，从此，贺龙便有了“岳飞岳鹏举”之说。

贺龙在蒋介石心目中有很高的地位，蒋介石先后派过3名代表，许以国民党中央委员，江西省政府主席，上海南京各建一幢小楼，外加300万大洋，想把贺龙拉到自己身边。他说：“我还不曾花过这么大代价。贺家军难得，贺龙更难求啊。他一个师，打败吴佩孚几十万人，俘虏吴佩孚两个师；他把张学良打出河南，

彭德怀

落难与林彪得势真相



打得溃不成军。他还不是共产党嘛，只要他肯过来，再高一些的要求也可以答应。”

蒋介石第一次派去秘书长李仲公，第二次派去的朱绍良，都被贺龙抓起来，分别押送国民革命政府总指挥部和九江军事法庭，第三次派去的熊贡卿、梁素佛被贺龙抓起来枪毙了。

不是共产党员的贺龙，把自己和他的“贺家军”——国民革命第20军全部交给共产党，成为“八一”南昌起义的主力军，他自己成为起义的总指挥。

使贺龙做出这种选择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岳飞在他心目中有崇高的地位。他参加共产党后，曾多次向政委关向应该起岳飞和岳飞精忠报国的精神。

他说：“蒋介石破坏了北伐，赵构和秦桧也是破坏岳飞的北伐。蒋介石就是赵构、秦桧式的人物。”

岳飞字鹏举。贺龙的儿子叫贺鹏飞，是岳飞的名和字里各取一字作为儿子的名字……

毛泽东没有吃第二遍安眠药，却又点燃了一支烟。

他目注白纸上的两个名字沉吟，脑子里轮番出现两张面孔：一个是每天吃一斤肉也不会长肉的瘦削的林彪；一个是方面阔肥，黑眉毛黑胡子，不怒自有三分威的贺龙。

他在延安见到贺龙，但他上井冈山时便已熟知贺龙。当他激励自己的士兵时，讲得最多的就是贺龙：“同志们，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现在领导了一个军。我们有一个营，为什么不能闹起一支大队伍？……”

沉吟间，又有第三个面孔闪入脑际：饱满的前额和太阳穴，厚实的嘴唇和下颏，戴一副深度近视镜，目光温和、深邃、睿智、敦厚。他被誉为共产党里的圣人，是毛泽东无比信任的“政治元帅”罗荣桓。

难怪毛泽东犯沉吟。尽管林彪是他的爱将，深得他倚重，尽管他在“八大”上就投了林彪一票，尽管他在去年便提名增选林彪为党中央副主席而准备重用，尽管他在7月23日召林彪上庐山时便想到让其替代彭德怀，可是，一旦征求意见，彭真却转来了罗荣桓的不同建议。罗不同意林彪任国防部长，他鼎力推荐贺龙任国防部长。

别人建议毛泽东可能摆手而过，罗荣桓的建议却不能不深思。以往，毛泽东定下决心的事，听到多少个“不”，也不会动摇。这次例外。他犹豫、沉吟着无法安睡。

听听毛泽东对罗荣桓的评价便不难理解这次例外。

下面是引自某同志1985年11月29日写给中央负责同志的一封信。

……从过去报上发表的回忆文章看来，一般都不知道罗荣桓同志在中国革命中所起的伟大作用。

这个问题，毛主席同我谈过两次。……因为我所有的笔记、整理的纪录、手稿，在18年前都被那个专案组没收了，至今无影

无踪。所以，我只能凭记忆，把毛主席当时所讲的使我终生难忘的话整理出来。下面是毛主席的原话：

一、凡是我倒霉的时候，罗荣桓都是跟我一起倒霉的。

二、罗荣桓的品格，用十句话概括：无私利，不专断，抓大事，敢用人，提得起，看得破，算得到，做得完，撇得开，放得下。

三、山东只换一个罗荣桓，山东全局的棋就下活了。山东的棋下活了，全国的棋也就活了。山东把所有的战略点线都抢占和包围了。只有山东全省是我们完整的、最重要的战略基地。北占东北，南下长江，都主要依靠山东。

四、罗荣桓在决定中国革命成败的地区，做好了决定中国革命成败的事业。

五、罗荣桓到山东的第一天，就想的是把山东全部拿过来，就想到为把全国拿下来尽义务。

…… ……

十、罗荣桓最守纪律。连高岗都说，罗荣桓是党内的圣人，不敢去找罗荣桓乱说。

现在，这位“无私利”、“看得破”、“算得到”、“最守纪律”、“最正直的人”，这位可以同毛泽东“一辈子共事的人”，这位“党内的圣人”，他不同意林彪任国防部长，他鼎力举荐贺龙任国防部长。

贺龙是称职的国防部长，这一点毛泽东同罗荣桓并无分歧。用一句毛泽东常讲的话：死了张屠夫，也不会就吃活毛猪。即便林彪、贺龙都不在了，也还是能找到称职的国防部长。

问题在于林彪、贺龙哪一个任国防部长更好些？

毛泽东重点考虑着罗荣桓的两句话。

“林彪身体不好。”这是实话，但毛泽东在下决心前已经考虑过这个问题，不再成为动摇决心的理由。

“国防部长不要只从一方面军出。”这个意见很有份量。中国革命是农村包围城市，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每一个“星星之火”都曾是独立的，是分敌独立作战，形成众多的“山头”，这是客观现实，甚至在延安躲防空洞有时都能感觉到这种“山头”的存在。作为最高决策者，毛泽东不能不考虑那个“平衡”问题。

彭德怀和林彪都是一方面军的，这个问题不能不考虑。然而，这个问题足以改变曾经思考后的决心吗？

良久；毛泽东在纸上画了一个圈……

1959年8月17日，中央任命林彪为军委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长。

这是毛泽东反复斟酌思考后在纸上圈住的那个名字。

同时，中央任命贺龙为军委第二副主席。

毛主席说：“军委的工作，林在家林主持，林不在家贺主持。”

这个第二副主席在过去没有专设，增设一个第二副主席，并且“林在家林主持，林不在家贺主持”。这无疑是重视罗荣桓举荐的一个结果，同时也照顾到林彪身体不好，常要闭门养病。

1959年8月19日，毛泽东登上吉姆车，载着时代和文化给他的胜利给他的失败下山了。

彭德怀比他早一天下山，8月18日乘飞机返京，参加军委扩大会议，继续接受批判。

他要做准备，写材料。秦魁英秘书汇报，根据上面指示，“办公室封存了”，“办公室主任王焰和秘书郑文翰也被‘冻结’了。”

彭德怀火冒三丈，胳膊又抡起来。刚举上半空，吼声还未出口，手臂忽然僵住，略一停顿，软软地垂下来。

“唉，”他沉重地叹了一口气。“给我要林彪。”

彭德怀决定给这位新国防部长挂电话。刚拿起话筒，他又按下了。沉吟片刻，他另拨了一个号。

“我要贺总……贺总，我是彭德怀。”他呼口气，尽量缓和

些口气说：“我的秘书和办公室资料暂时还需要借用一下，等我写好材料后就奉还军委。”

“哎，彭总，这是怎么回事？”贺龙不明白，“你的秘书和办公室……”

“封存冻结了，说是上面的指示。”

“胡闹么。”贺龙嚷起来，“我跟他们说！”

第二天，办公室主任王焰和秘书郑文翰便携带资料回到彭德怀身边。

这是林彪、贺龙分别出任中央军委第一、第二副主席的第二天。当人们注目的焦点还在毛泽东与彭德怀身上时，那幕戏实际已近尾声。

而林彪与贺龙的“合作共事”，才刚刚启幕……

〔责任编辑 卓人〕

赵燕侠“赔”砖 (外一篇)



●艾颖

我国著名京剧演员赵燕侠，12岁那年搬到北京，住在周家的一座破四合院里，院内是灰方砖地，平平整整。已经接近正式演出年龄的赵燕侠，此时为练出成套的武功，一年三百六十五个早和晚，天天在院子里练来练去。

盛夏，她顶着骄阳，穿上棉背心，外边穿靠，还用绳子扎紧，这叫“夏练三伏”。开始，刚穿上这“行头”，就是一身汗。可是越练汗越少，练到后来，连中伏天也能练上两小时不出汗。严冬，外边下着鹅毛大雪，她也不肯罢休，这叫“冬练三九”。天气越冷，她在外边练得越起劲。开始，她到院子里，觉得身上发抖，手脚麻木，可练上两三个小时之后，她周身温暖，面色通红。

赵燕侠15岁的时候，要正式登台演出了。这时周家房东拉着她的父亲，指了指院子里的方砖，笑着说：“你看燕侠，这几年练功练的，把我一院子方砖都磨得一个个窟窿，等燕侠成了名，可要赔我一院子方砖啊！”

齐白石画蟹

这是一个家庭宴会，酒绿灯红，宾客满门。

宴会的主人——伪浙沪警备司令、特务头子宣铁吾走到特别请来赴宴的一位白发老人面前，假充“风雅”地请他挥毫作画。

在座的一些正直之士不禁暗暗担心，因为这个满头银髯的老人就是以蔑视权贵著称的国画大师白石老人。可是出乎人们预料，只见白石老人捋捋银髯，沉思片刻，欣然点了点头。

宣铁吾顿时眉飞色舞，急忙令人磨墨铺纸。白石老人款步走到案前，大笔一挥，雪白的宣纸上即刻出现了一只斗大螃蟹。众人赞叹不已，宣铁吾也装模作样的品味沉吟，齐白石饱蘸浓墨又随手添了两行题字：“横行到几时”“铁吾将军”。众人见状，面面相觑，大惊失色。宣铁吾顿时脸红得像猴子屁股，而白石老人却轻蔑地一笑，拂袖而去。

华人·华文与新加坡

新加坡作家协会 黄孟文

近来,中国的一些领袖与学者,认为新加坡社会秩序井然,经济发展蓬勃,值得学习。一时,中国上下似乎都有同感。一些人发表言论支持,一些人还特别到新加坡去实地考察,蔚为风气。

新加坡的长处相当多。其中较为重要的是,它有一个极为有效的司法制度。法令严明;任何被颁布的法令都严格推行,真正做到“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地步。此外,它有一套继承自英国的文官制度。所有公务员都听命于执政党的政策,行政上讲究效率,而且以“为人民服务”为目的,不可以搞“官僚”,更不可以依势凌人,必须真正成为“人民公仆”。另一点是新加坡具有远近驰名的反贪污制度。反贪污局直接向总统和总理负责,任何人(包括部长)如有贪污的行为,一经查出,如果证据确凿,那么他将法网难逃。反贪污的成功要素是总统和总理必须自己清廉,而且绝对不徇私。

其他值得一提的优点是公积金制度(国民强制储蓄计划);“居者有其屋”计划;政府、雇主联合会、雇员联合会三个团体磋商以避免“工业行动”计划,人才训练计划;国民保健计划;交通管理制计划;园林培植计划……等。

这些制度或计划都值得借鉴。

新加坡最不成功之处,依我看,是它的语文与文化政策。

先说它的语文政策。新加坡百分之七十八的人口是华人,但是华文却沦为第二语文,处于附庸地位。这里提倡英文,以英文作为全国人民讲、读、写的共通语文。这儿的小学每星期只教数小时的华语语文,高中时就只剩下英文科目了(华文非必修科目)。仅有一间华文大学(南洋大学),也遭逢并入新加坡国立大学(除中、巫文系外,全部以英语为教学媒介语)的厄运。

在这种语文政策之下,如果你是一个通晓华文的单语者,那么,你的就业前途就会受到莫大的限制。而且,倘使你不懂得明哲保身,喜欢发表一些提倡母语和母族

文化的意见,你可能还会被戴上“大汉沙文主义”的大帽子呢!即使你精通华英双语,你在许多部门也还是会受到排斥的。因为他们总觉得,如果你的华文程度太深,你的英文一定不够水准,不能溶入纯讲英语者的社层,而且思想上也多数会有一些“问题”。反过来,倘若你只懂得英文,母语一窍不通,你仍然有许多获取奖学金到国外著名大学深造的机会。

英文至上的政策一实施,家长自然不愿意让他们的子女花太多时间修读华文,免得影响他们的英文科目,前途堪虞。于是乎,“国家未来主人翁”的华文水准直线下降。根据调查,现在的华族中学生,大约十之六七不能真正看懂华文报!本来,如果华人只有百分之一二,属于少数民族,那自然不需要重视华文。但是,在新加坡,华人占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三以上,而华文却受到漠视。你说,这种政策值得中国学习吗?

至于新加坡的文化政策,那也是乏善可陈。新加坡一路来都大力发展经济,文化本身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这可以从每年提出的财政预算案和其他有关的变动看得出来,比如文化领导人被委任的情况,有关部门名称的变更,等等。即使说“文化”有受到某种程度的关注,那也主要在于方便新闻的传播和管制,而不是在于提倡文化。如果在上者不重视文化,整个社会都会受到影响。现在,新一代的领袖上台了,立意要在二十一世纪来临之前,把新加坡塑造成一个优雅的社会。文化似乎有了转机。可惜的是,到目前为止,从一切迹象看来,新政策提倡的,主要是舞蹈、音乐、戏剧和绘画,因为可以吸引游客,有一定的经济价值。文学则只有忝陪莫座的份,因为它是“赔钱货”。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中华文化根基深厚。它应该学习别国先进的科技和管理制度,但它没有理由去向一个历史短浅的国家学习语言和文化。大家都不反对学习外国语文,但绝对不允许外国语文来取代中华语文。否则,我们怎么对得起自己的祖先呢?

1938:

蒋介石 身边的

引子：蒙面黑衣人

1937年初冬之夜，南京。

上海失守，南京沦陷在即，裕蒙楼成了防空司令部。沿着山墙小径，拨开丛生的荒竹荆棘，山门后面台城下，三个蒙面黑衣人在听到轻轻一击掌声之后，突然从台城的荒竹之中站了起来，随着为晋人的手势，仿佛掠过竹尖一般悄无声息地向着南京城东方向走去，宽袖夜行服鼓起了一阵风，只有三个人嘴里呵出的热气，悠悠然象乳白色的飘带。雨停了，天更冷了。

日本间谍

这一夜，松井石根指挥的日本侵略军占据了南京东郊的汤山、半边山。

西南郊板桥、大胜关一带，日军和中国守军正在激战中，时有枪炮声传来……

南京市内，唐生智就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后，各个战略要点的紧急布防正在进行中，雨花台、上新河、紫金山一带不断有口令声使冷夜中的南京打着冷颤。

但这三个黑色夜行人穿街过巷上房踏墙如入无人之境，他们所为何来所去何处？

南京殡仪馆。

院门紧闭着，停尸间里有昏黄的灯，有一扇玻璃窗已经破碎，那昏黄的灯便从这破碎的窗里透出洒在那一条碎砖铺成的小路上，西边的屋檐滴着水，“滴嗒滴嗒”之声细小而不绝。

为首的那个黑衣人一只手伸过破玻璃窗，轻轻一拨，大门便打开了，三个人鱼贯而入，在两排十二具尸体中很快认出了他们要找的那一具，那是个年轻的姑娘，脸上出奇地平静，仿佛在熟睡中，正做着什么梦，穿戴得整洁、淡雅。只见这三个黑衣人在女尸前稍一低头默哀，随即从怀里取出一个包裹，内有一个小小的绣花枕头、一条绣花的大红丝绸被单、三粒晶莹的雨花石。他们先将雨花石放进死者的上衣口袋，将枕头垫在死者的黑发下，用大红被单轻轻地死者覆盖，拉平四个角，包裹好，为首的那个将包裹好的尸体轻轻抱起，另一人用一根黄绦束扎在死者的腰间，出门，将门重新关好。

从昏黄灯光下的小路上一纵身，三个人便先后扑上了墙头，又轻轻落地，为首的现在是在中间的位置上，三个人相隔二十步，衣袂飘飘，向着雨花台疾行而去。

月亮刚刚穿过云层……

金陵奇案

奇案之一：1937年7月7日晚，北平城西南15公里的卢沟桥畔，日本侵略军的炮声冲破了华北、中国的暂时的平静。中国守军奋起反击，八年抗战就在这个夜晚开始。

日军在华北大举进犯的同时，8月13日早晨9时，日本侵略者以租界为据点，突然向上海的闸北发起攻击，占领八字桥和持志大学，并以海军火炮轰击上海市区。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

其时，国民政府首都南京进入战时状态。

国民党内部，蒋介石、汪精卫之间的内斗暂时平息。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任命蒋介石为陆海空三军大元帅，并成立最高军事委员会，蒋介石为委员长，8月5日，蒋介石、汪精卫及最高军事委员会的高级将领三人，在军事委员会保密室内举行了一次自“七七事变”以来最重要的绝

密军事会议。会议由蒋介石主持，这次会议正式确定了对日作战中，“以快制快”、“制胜机先”的军事战略。

第一实施目标为：趁日军主力集中华北，我军顽强抵抗进行地面战争之时，于8月中旬集中优势兵力率先歼灭日军在上海的海军舰艇及海军陆战队，将战事引向东南淞沪一带，以期获得战果鼓舞民心士气，并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

第二实施目标：为确保此一战役的胜利，立即由海军突击强行封锁长江下游最狭窄的江阴要塞江面。此举一则防止日本海军沿江面上攻击南京，二则使上海日本舰艇孤立无援，而中国海军还可以乘机狙击长江中上游的日本舰艇、商船。

会议结束，已是8月5日深夜。

蒋介石当即签署命令，以特级军事机密下达有关部门：加强江阴要塞岸炮火力，破坏江阴一带长江水面的航路标志，在江面通道立即布置沉船使之堵塞，布设密集水雷，相关部队进入一级战斗状态。

就在蒋介石的命令刚刚下达到江防沿线部队，江阴要塞方面的陆海驻军正在寻找、筹划沉江封堵的破旧船只时，一声晴天霹雳，从8月6日起到8月7日止，长江中上游沿线各港口包括南京、武汉、宜昌、重庆正在行驶或停泊的日本军舰、商船近30艘，好象同时接到了蒋介石的密令一样，全部升火飞速驶往长江下游，并奋力冲过江阴要塞。就连长江中上游各港口城市的日本侨民也突然停止一切工作，随日船撤离。许多日侨家中的贵重物品悉数扔下，有的家里电风扇还开着，茶饭均已摆到饭桌上，未动一筷，人去楼空。

实在迅雷不及掩耳！俟国民政府的海军请示后得到命令强行拦截时，仅扣留住了两艘日本小商船长阳号及大贞号。

封锁长江江阴要塞江面的计划，是抗战初期最重要的军事计划，未及实施便宣告失败。

这一失败的起因，也许比失败本身更使南京政府感到震惊。

蒋介石闻报后，额头上沁出一层汗珠，半天没有说一句话。

显然，日本军事当局若不是在中国方面作出这一决策后三小时内获得情报，便断然不可能组织这一次重大军事行动。也就是说即便是日本特务机关截获、破译了蒋介石于8月5日夜间发出的绝密军事电报，也难以组织如此神速的行动。那么只有一个可能，就在蒋介石密令江防沿线部队的同时或稍后半小时至一小时，日本军事当局便也发出了强行冲过江阴要塞的命令！

最可怕的设想，但愿不是现实：日本间谍已潜入能接触最高机密的南京国民政府军事核心！

日本侵略军更快！在第一回合的中日双方最高军事当局的决策较量中，他们是真的“以快制快、制胜机先”了！

奇案之二：淞沪抗战粉碎了日本侵略军“三个月夺取

中国”及“大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上海前线中国军民的牺牲精神使日本侵略者每前进一步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战况越来越激烈。

日本方面正式成立了华中派遣军，以司令松井石根领军多朝香宫、柳川平助等副之。中国方面以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兼任前敌总指挥，并在淞沪一带集中了冯玉祥、陈诚、张发奎、朱绍良等一批名将。

蒋介石准备亲临淞沪前线视察战争。

蒋介石的这次出巡，却使南京最高军事委员会的大员们伤透了脑筋。在日本侵华军的战略计划中南京是志在必得之地，打上海一是上海的经济资源，其二也是为了收缩对南京的包围。淞沪抗战爆发后，日军飞机严密封锁南京到上海之间的铁路、公路及长江航行。狂轰滥炸已是家常便饭，坐火车或汽车或轮船都很难保证蒋介石的绝对安全。

8月25日，在军委会的最高决策会议上，新任三军副总参谋长白崇禧提议，“明天，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先生坐轿车去上海，英国是中立国，许大使的轿车上有明显的“英国”标记，委员长结伴同行，如何？”

蒋介石同意。

由白崇禧通知许阁森，并提醒对方注意保密。

第二天，即8月26日，临行前蒋介石因为一件紧急军务缠身，临时决定暂缓去上海，许阁森则按预定计划上路，许阁森的轿车出南京城上沪宁公路，路面情况不好坑坑洼洼，昨天夜里刚下了一场雷阵雨，日机轰炸留下的弹坑里积满了雨水。

公路两旁闪过的是古朴而平静的乡村、田野，光着膀子皮肤黝黑的中国农人正在采摘香瓜、西瓜……

许阁森在车里祈祷上帝保佑，他的车棚上覆盖着一面巨大的英国国旗。而在中日之战中英国是中立国。

中立，并不是公正的代名词。

下午两时许，车行至嘉定地段，靠近上海的公路路面被炸得更不像样子，只好减速。这时候，干燥得冒烟而又看不见一丝云彩的天上，出现了日本飞机的影子，这影子渐渐变大，许阁森能看见驾驶员的头部，日机也应该看见了那一面大不列颠中立国的国旗，飞机拉高紧急一个俯冲，许阁森的司机见势不妙也同时加速，两架日本战斗轰炸机竟是追着许阁森的座车轮番扫射、轰炸，直到座车被炸翻烧焦冒烟，两架日本飞机才扬长而去！

许阁森被炸成重伤，险些不治。

日军不惜冒犯国际公法，开罪一个他们绝不愿意开罪的中立国，那是因为有着他们超过一切利害关乎中日之战全局的特别重大战略目标——袭击、炸死蒋介石！

消息报到南京，蒋介石、白崇禧相对无言、顿时失色。

蒋介石站起来走了几步，望一眼窗外，阳光那么强烈，南京的夏天炽热而明朗。

“有鬼！”蒋介石说。

两国交兵，生死搏斗。而今南京最高当局关系战争全

局的机密、关于蒋介石行踪的机密——那是只有几个人才得与闻的机密——却能疾速传到日本侵略军本部，这个仗怎么打？要知道这还仅仅是战争的开始！

倘若蒋介石如期坐汽车去上海，那真是生死难卜了！

蒋介石清楚地记得，参加8月5日、8月25日两次绝密会议的，除了军委会几个要员外，还有机要秘书黄浚。

“黄浚？”蒋介石自己问自己。

这是一个典型的福建人，个儿不高，沉稳、干练，文才洋溢，写得一手好毛笔字，该做的事情从不少做一件，不该说的话从不多说一句，追随蒋介石多年，工作上从未出过差错，因而深得蒋介石宠信，位居行政院机要秘书，官阶不算太高，职位的重要与显赫却非一般的部长可比。

倘是工作之余，蒋介石兴致好的时候，还会把黄浚找来闲聊一番，从四书五经到南京八代王朝的各种掌故，黄浚似乎无所不知，有时黄浚还会偶然流露他无志于仕途，“待天下清平之日，望委员长网开一面，让我回家专心整理古籍。”

蒋介石一笑，他喜欢清心寡欲的部下。

奇案之三：日军及日本间谍把矛头直接指向蒋介石，非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行动，还在一步一步地实施下去。

南京中央军校校长官邸。8月一天的清晨。

蒋介石站在窗口前，闭目、深呼吸，约半小时，然后空腹喝一杯凉开水。

操场上军校学员正在晨操。

最简单的队列口令：“立正！”“稍息！”“向右看齐！”

或者是行进中的呼喊：“一二三四！”

蒋介石喜欢这种气氛，那队列里一定有明天的虎将在，抗日、剿共、治国平天下，哪能离得开军人？

因而他在南京十有八九住在校长官邸内。

他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的，一身上长袍马褂对于一个南京国民党政府的最高行政首长、军事统帅而言应该是过时的，他却一年四季地穿着。

蒋介石满意地看着他手书的“寓里帅气”的横匾，中堂是张静江的书法、蒋介石的座右铭、《孟子》里的一段话：居天下之广厦，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少顷，正襟危坐，批复的第一件公文是有关中央军校“总理纪念周”活动的，蒋介石指示，值此抗战初起民族存亡之际，这次纪念周活动扩大至陆军大学全体师生、党政军各部部长官，蒋介石并亲自到会讲话。

中央军校座落在南京城东黄埔路。

“总理纪念周”开始的那一天，从中山东路折进黄埔路的路上、军校大门口、停车场、会场主席台、会场内，军警荷枪实弹三步一哨五步一岗，大量的便衣特工一部分形影不离蒋介石实行贴身保护；一部分严密监视进出会场的汽车，并核查通行证与车牌号，一一登记在案。

中央军校与陆军大学的师生首先来到会场，军校学生总队队长惠济担任总值日官，排队、报数之后静候会议

开始时，惠济突然大声宣布：有两名可疑人员混入校园，正在搜捕，队列中的官兵听候命令不得擅自出列行动！

三分种后又有报告：两名嫌犯发现已露痕迹，乘车绝尘而去，追赶不及，跑了！

无疑，这是两个刺客。混进校园之后倘若不被发现，那么蒋介石登台演讲时，便是最好的行刺之机。

日本间谍似乎已经无所不能了！

他们是如何进入校园的？

在严格的车辆管制之下，非党政军要员的轿车根本无法进入会场，而刺客逃走时，又是驾车而去，那是谁的车？

据守校门的宪兵说，那辆车好象是行政院的，车速太快驾车人拒绝检查没有来得及细看。

一晃而过的驾车人面目，目击者也只是说，象日本人也象中国人。

立即戒严封锁校园，核查行政院车辆的结果是，行政院出席会议的除了各部委长官外，尚有机要秘书黄浚。

这些人他们的车全部登记在册亦全部在现场，尤其是黄浚一直在蒋介石左右。

如此看来，能使这辆车开进中央军校又能使其安全逃脱的这个人，着实是个非同一般的人物，并且千真万确就是为了刺杀蒋介石这一目标，为此他们敢于直闯蒋介石的眼皮底，视千百军警如同儿戏！

惠济站在蒋介石面前，笔直，象一截电线杆，蒋介石

从沉思中抬头，看见惠济头上的汗从大盖帽下一串一串往下掉，掉在地板上，“蓬蓬”作响。

“你下去。好好带兵好好练兵！”

玄武湖畔

金陵八月的傍晚，暑气渐消。

蒋介石在校长官邸屏退左右，单独召见三个人：军统头子戴笠，中统头子徐恩曾，宪兵司令兼南京警备司令谷正伦。

门窗紧闭。

连厚厚的天蓝色丝绒窗帘也拉上了。

电风扇呼呼作响。

三个人站在蒋介石面前，戎装束带，一动也不动。

蒋介石从椅子上缓缓抬起头来，“你们活得不错，嗯？”

谁也不敢回答。

“我也还活着。”

仍然没有人回答。

蒋介石说话有些吃力，他装着一口假牙，这些天牙根又红又肿疼得食不下咽。

“我想，你们是没有话可说了。”稍顿，蒋介石接着说：“就等着日本鬼子把我炸死，把你们一个一个抓了去，做亡国奴，是不是？”



谷正伦知道再也不能不接话了，“委座，我看要紧的是立即排出嫌疑犯的名单……”

谷正伦的话还没有说完，蒋介石一挥手：“这是你们的事，一个月之内统统给我抓起来，破不了案唯你们三人是问！”

三个人匆忙退出，并约定先到谷正伦的办公室凑一下情况。

汪精卫亲日是人所共知的，日本内阁和侵略军上层一直和汪精卫有来往。但自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后，汪精卫位居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要职，和蒋介石的矛盾至少表面上已平息，如今战端初开便出卖情报作卖国贼，可能性有多大？

谷正伦认为，按照汪精卫的性格，要干他会公开地干，这个间谍网似乎与汪精卫干系不大。

还有何应钦，但何应钦并不能与闻全部最高机密。

有没有可能是汪精卫手下的亲信如陈公博、丁默邨、李士群呢？他们擅长于秘密活动，或者他们有一个全面的脚踏两只船的计划——汪精卫应付蒋介石在国民政府中站住脚，而另一些人则明明暗暗地和日本侵略军合作。

推测，仅仅是推测。汪精卫本人似不可能出此下策，汪精卫手下的这些人实际上一直在戴笠的监控之下，却没有发现任何战事开始后直接通敌的证据。

除此而外就是黄浚，他知道全部机密，他又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时须磨的同班同学。而在座的人却又都知道他的为人：谨小慎微、平淡务实、惟蒋介石之命是从。

除此而外再除此而外，那就是蒋介石自己了。

真是一团迷雾。

已经是1937年8月之尾了。

淞沪前线，8月31日的战报：日军第三兵团第六十六联队，在三十多架飞机及海军舰炮配合下，强行登陆进占吴淞，我守军第六十师一个团死战抵抗几无生还，惟吴淞炮台仍由上海保安总团固守控制中。

军情十万火急，战况变化莫测之际，如果不把这个潜伏于南京国民政府高层的日本间谍网挖出来，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这一次谷正伦决心要走到戴笠前头去。

因为警备司令部的地利之便，南京大街小巷都有谷正伦的耳目。两年前由特警二中队成立的外事组便专门盯住日本总领事馆及领事须磨。

玄武湖畔，也有谷正伦手下风雨无阻的“游客”，那是湖波泛起桃红柳绿之地，不仅谈情说爱方便，也是谍报人员出没之处。

就是8月的最后一天，夜9时，目标出现了。黄浚悠闲地在湖畔散步，一个人，一边走一边吃巧克力。谷正伦手下的便衣以前也见过，散步、吃巧克力，十天半个月来湖畔独步一番，再由司机小王接回去，并没有什么蛛丝马迹。

黄浚停步，在金银粥摊旁和蒿地和摊主聊天。

黄浚看着星空，从内湖走到外湖，把一块巴掌大的巧

克力吃到只剩下一个角。

司机小王找到了他。

“还早，坐一会儿再走。”黄浚说。

他们并排坐在一块溜滑的石头上。

湖上不时有燕子穿过。

他们的旁边还有一对情侣，姑娘在“吃吃”地笑。

黄浚问小王：“你知道玄武湖的来历吗？”

“不知道，我只读过几天私塾，家里太穷。”

“玄武湖古名桑泊，本来是直接通长江的大湖，东吴时称为后湖，而在钟山的南麓还另有前湖。后湖是东吴建业城中小运河的主要水源，东连清溪南接秦淮河。到东晋南朝时，玄武湖还是训练水军和检阅水军的中心并改称北湖，又修筑了一条长堤号称十里长堤，晚唐诗人韦庄有诗道：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

黄浚读诗的时候，脑袋左右摇晃声调拉得很长。

他们起身，黄浚的车就停在不远处的路边。

司机小王快走几步在一处树林里小便，谷正伦的便衣看得很清楚，小王还有另外两个游客三个人在那几棵年代很久远的老槐下小便，能听见尿声啾啾。

黄浚上车时好象无意间一回首，那一对年青的恋人正假依着漫步而去。

谷正伦的办公室。

谷正伦问：“黄浚在玄武湖一共呆了多长时间？”

“一小时零四十三分钟。”

“司机呢？”

“一小时以后到的。”

“他们坐在一起聊天时有没有什么动作？”

“天太黑没有路灯看不出来。”

“和小王一起小便的那俩人是什么样的？”

“只看见背影，年岁稍大些。”

“那几棵古槐树有什么特征？”

“三棵中靠左边的离根部大约一米左右，有一个树洞半尺大小。”

“小王小便的时候是不是在这棵有洞的槐树下？”

“是的。”

“树洞里有什么东西没有？比如巧克力纸之类？”

“我们去找的时候已经没有东西了。”

“周围呢？”

“一片尿骚味儿，还有两堆新鲜的大便。”

“你们什么时候检查树洞的？”

“黄浚上车，车一开走，我们就过去了，我装作小便李荣芳打开手电寻找时发现树洞的。”

“小王他们仨人小便以后，你们去寻找之前，还有没有别人去过那地方？”

“没有！除了树林里的鸟和蚊子以外，没有人去过。”

“别处也没有发现黄浚吃过的巧克力包装纸？”

“没有。”

特警二队丁队长向谷正伦作了一番他的推理：

一切均以一个假设为前提——

假设黄浚是日本间谍，
他是江阴要塞封锁计划的泄密者，
他当然也是两次谋杀蒋介石的情报提供者，
他知道蒋介石已经震怒，南京政府不可能熟视无睹，
他至今没有暴露，但他不能保证他不会怀疑，
如果他是一个冷静的间谍，他恰恰就是这样一种间谍，
他应该明白他已列入嫌疑犯名单，

他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证实他自己究竟有没有被怀疑，
任何冷血间谍也无一例外地生活在侥幸心态中，
因而他就得露一下面，悠闲地看月亮吃巧克力，
他的本能会感觉到玄武湖畔的异象、异动，
另一种可能是他急着要告诉他的上司他正在危急中，

关键在于小王——他是同伙——他趁小便的时候把黄浚给他的情报悄悄地丢进了树洞。

那两个和小王一起小便的人至少有一个是日本特务机关取情报的特务，他可以装作提裤子、系鞋带一弯腰便能取走情报。

如果说这些可能都是真实的，那就有了另外一个结论：今晚上和黄浚的暗中较量，黄浚又赢了一步棋！

谷正伦最后指示：“玄武湖的监视力量要加强，再也不能坐失良机。也要考虑到黄浚可能会有感觉，也许我们要在另外一个地方抓住他！”

“23号”

南京鼓楼叉路口，日本领事馆。

领事馆斜对面，是一家卖烟酒杂货的小商店，连个招牌都没有。店主是一个弯腰曲背的陈姓老头。

就这家不起眼的鸡毛店，店前一张方桌桌上，一把茶壶，原是陈老头自己生意清闲时享受一番的，久而久之却有了另一些常客，拉黄包车的、摆测字摊的、卖棒冰的，到这里买两支烟喝一碗茶，8月之后这样的人比往常多出几倍，陈老头桌上的一把小茶壶变成了两把大茶壶。

日本领事馆的小河也常来买烟闲聊几句，他对陈老头说：“中国的烟比日本的烟浓，中国的女人比日本女人嫩，中国人就是他妈的不会打仗！”

陈老头翻起两个白眼瞪着他，不作声。

小河看了一眼店门外坐了满满一桌正在喝茶的车夫们：“干什么的老盯着我们领事馆？”

“中国还没有亡是不是？这里是南京不是东京是不是？”陈老头一边翻白眼一边把小河顶出门去。

时常光顾陈老头店里，还有一个高挑个儿的中国人，姓陈名耆才，都姓陈，五百年前是自家，却差一点打了起来。

因为陈耆才是替须磨理发的。他大摇大摆地进出日本领事馆，会说一口日本话，这样的人不是汉奸是什么？

陈耆才第一次到店里来买烟。

“美丽牌的。”

“只有黑心牌。”

“拿来！”

陈老头拿出一把水果刀往他面前一拍：“你自己掏！”

陈耆才见状倒是笑了：“老哥，你知道剃头用什么？”

“剃头刀呗！”

“抗战杀敌，有的拿枪有的拿刀。”

陈老头却不为所动了：“唉！这个年头都是混口饭吃，只要别黑了良心就行。”

那陈耆才原是金陵城里挑剃头挑子的，人家的剃头挑子一头热他是两头热，一头的热水洗脸用，另一头的热水温着老酒，有生意剃头没生意喝酒，为人豪爽大方，四邻八舍的孤寡老人剃头一律不收钱。除了剃头他还会推拿、针灸，手到病除。其时的南京已有了不少时髦玩意儿，理发、吹风、小伙子们头上搽得崩儿光，他却大摇大摆地依旧穿街过巷，成了南京的“独一挑”。每天剃完头收摊时便自个儿喝一通，喝醉了便歪倒在剃头挑子旁，如是冬天会有人把他搀扶进屋里，如是夏天总有仨俩小顽童，轮番地替他扇扇子。

须磨是一个特别讲究理发的人，听说有此奇人便请来了，一试之下果然不同凡响：“大大的好，留下的干活！”

这时候，他便有了一个谷正伦亲自给他取的代号：23号。

23号报告：9月1日给须磨理发时，他刚走进房间便看见须磨将一张有皱折的巧克力纸扔进垃圾桶。

太古巧克力，上海太平洋食品厂出品。

10天以后，须磨的房间衣帽钩上多出一顶过去从未见过须磨自己也从未戴过的紫色礼帽。

丁队长他们跟踪黄浚的结果是：9月上旬，黄浚去丁家桥国民党中央党部开会一次，到黄埔路中央军校因公干面晤蒋介石一次。

一切如常。

黄浚再也没有在玄武湖的星光月色下出现过，黄浚的司机小王也从未再去过。

23号根据谷正伦的命令，务必盯住那一只礼帽！

盯住礼帽就得盯住人，这是谁戴的礼帽？

凭直觉，23号知道名义上是须磨秘书的小河次太郎不是个一般人物，他中等偏高个头，戴金丝边的近视眼镜，目光象冰凌带着尖刺，他并不满意23号可以在领事馆直进直出。

陈耆才恰恰和他在新街口相遇。

两个人打过招呼。

“陈先生，你的日本话说得真好！”

“小河君，你的中国话说得绝对一流！”

“我是专门学的，为了大东亚共荣圈，中国迟早都是日本的，我说中国话就是为了这一天。”

“我也是专门学的，你知道吗？你应该知道的，日本人的祖宗是中国人，日本人迟早要给中国人的祖宗牌位叩

头，我要教日本人叩头，给我的也是你的老祖宗叩头，我当然得会说日本话。”

小河一声冷笑，“别忘了，你是替须磨先生理发的。”

“呸！你可说对了。我替须磨先生理发，我站着挺胸，

他弯腰低头。我的手里是我祖上传下来的剃头刀，我的剃头刀经常搁在须磨先生的脖子上，这就是我们的交情，你说呢？”

“你很危险，我得报告须磨先生。”

是后湖酒家。

“我想我们还是做朋友的好！”小河说。

“当然，做朋友比做冤家好，做朋友什么都好说，做冤家就要打架，我们何不去喝一杯咖啡？”

小河稍一犹豫：“还是喝酒的好，我请客。”

后湖酒家的雅座。

葡萄美酒夜光杯。

小河偶尔望一眼窗外，心事重重：“陈先生，你很了不起，你是个出色的人才，你当然不会告诉我这些照片是怎



1938: 蒋介石身边的 日本间谍

“我想，你早已经报告过了，现在该轮到我要报告你一次了。”

陈善才说完把一只手伸进口袋，“小河君，你别怕，皇军的武运长久，你怕什么？今儿晚上月色真好，我请你看几张照片，我还想让须磨也开开眼界，那真是人生的一大乐事，花街柳巷男欢女爱，那男的好象是你，是你也没有关系，又怎么搂着须磨先生的情人？林小姐，金陵女子大学的校花，啧啧，你看那玉腿，小河君你身上的毛太多了一点，你听说过中国的一句古话吗？色胆包天！”

陈善才把一叠照片中的一张递到小河的眼前，路灯很亮，陈善才所言非假。

这两个人站在路边，就这么你一句我一句地来回过招，好象谁也没有看见马路左侧就是国际咖啡店，右侧便

么拍下来的？”

“也许你更关心是谁让我拍的？”

小河吐出一口烟圈：“也许吧。”

陈善才作神秘状：“我自己。你知道我不好女色，却喜欢钱，变着法子挣一点钱，因此偷偷地给你拍了几张照。”

小河接连吐了两口烟圈，从皮夹里掏出一叠美金捏在手中：“一手交货一手交钱。”

“哪里！哪里！我先交货，这是照片这是底片。”陈善才递过去，几乎是同时把那叠美金飞快地放进口袋。”

“干杯！”

“干杯！”

小河多少放心了一点，看来那陈善才油腔滑调可能有帮派的背景，而且是个敲竹杠的好手。

但，总是事出突然，至少陈晋才知道的太多了！

两个人走到门口，在马路上分手，好朋友一样握手说：“回头见。”

陈晋才拐过墙角，倚壁而立听着小河渐远的脚步声，一翻右掌按住墙沿轻轻地逾墙而过。

临街是个小院，靠墙爬满了扁豆藤，陈晋才从枝叶间望过去，小河走进了国际咖啡店。

小河戴着那顶紫色的礼帽。

刚才，陈晋才专心不二地敲小河的竹杠，似乎根本没有注意到头上的那顶礼帽。

国际咖啡店的招牌也是紫颜色，一根紫罗兰，随着霓虹灯的时明时暗，这紫罗兰也时隐时现……

百步之内

谷正伦和丁队长翻来覆去地谈论着那一顶紫色的礼帽。

在谷正伦房间的衣帽架上也挂着一只礼帽。

丁队长刚刚挂上去的，象小河一样走进国际咖啡店，9月的南京谁也不会戴着礼帽喝咖啡。

现在，他们两个人一个是南京的宪兵司令兼警备司令，一个是他手下的心腹干将，暂时地转换一下角色，一个是小河一个是黄浚手下的人——黄浚自己从不外出喝咖啡的。

这一顶礼帽意味着什么。

紫颜色呢？是某种象征还是某种信号？

假如紫色的礼帽是某种信号——又假如说是危险的信号——这信号本身对间谍工作来说并无重大的意义。因为，第一，间谍永远是危险的，当危险迫近他的时候，他要靠直觉去感知，而等着上司发危险信号的间谍一般来说是不会成功的，抓走枪决了就算了。第二，间谍——尤其是潜入敌方高层的间谍，以猎取准确的情报为最高目标，这一目标的延伸是安全地传递情报，通常情况下与此同时还要获得上司的指示和新的任务布置。

礼帽的夹层里放置情报，倒是一点也不显眼。

问题是，小河把礼帽挂在衣帽架上后，假设黄浚的人也等候在咖啡店，喝完咖啡付完帐出门之前把小河的礼帽戴走，且不说众目所睹之下他成了偷礼帽的小毛贼，更重要的是他怎么把情报交给小河？不妨这样解释，为了安全起见，黄浚和日本方面的情报交换是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甚至是不同的两个人之间进行的。这种做法在理论上说得通，而实际操作过程中却一下子增加了百分之五十被破获的可能！更何况目前中日之战的主战场淞沪前线的分分秒秒都是紧张、激烈的，与这场战争密切相关的情报战更不可能以此种单向合成的方式进行，因为时间就是生命或者死亡，也就是胜利或者失败！

再以江阴要塞封锁计划的破产，及蒋介石两次险遭暗算为例，潜伏在国民政府内部的间谍传递情报的速度、

时效，绝对是分秒必争的！

另一种可能是：国际咖啡店人来人往人员情况复杂，确实并不是交换情报最理想的地方，也容易为南京方面的特工发现，因而当紫色的礼帽出现，大家品味一杯法国咖啡之后，小河便戴上礼帽走出咖啡店，三五分钟后另一个人叼着香烟悠悠地也走到了马路上，他们俩人只是路人而已，但他们会在一处最僻静的地方渐渐靠拢，擦肩而过的瞬间便交换了情报，他们仍然是路人，各自消失在浓重的夜幕中……

这是一种可能的假设。

那紫色简直使人晕眩，谷正伦和丁队长的讨论暂时告一段落。

丁队长打开南京市地图，上边用红圈划出了197个监视点，谷正伦同意后连夜派出便衣，黄浚公馆、国际咖啡店每天24小时监视，陈晋才暴露得太多暂时隐蔽，由另一个特工李荣芳盯梢。

最关键、最困难的是，要在黄浚公馆里物色一个人成为内线，隐蔽地监视黄浚、其子黄晟及司机小王，并以最快的速度提供最新情报。

丁队长觉得很难，特警二队为黄公馆内一应人员排过队，绝大部分是黄浚的亲信，而且这些人几乎象一个模子里出来的一样，个个谨小慎微，黄浚贴身的人全是黄浚从福建老家带来的，或是近亲或是乡邻。黄浚父子在黄公馆内又都有独立的起居间，他们对下人并不刻薄，相反还显得和蔼可亲。

“有一个小丫头叫莲花，苏北盐城人，家境贫困，今年十九岁，每天负责到菜场买菜。莲花生得端庄、稳重，眉清目秀，可惜岁数太小怕难担重任。”丁队长说。

谷正伦一拍桌子站起来：“百步之内必有芳草，就是她，设法接近她，晓以民族大义，务必争取成功！”

第二天清晨，莲花出门买菜。

一个流里流气的小伙子迎面出来，走到莲花前面两只脚再也迈不开步了，盯着莲花，莲花的脸一下子变得绯红，连忙闪到路边，那小伙子又赶到路边，“嘿！小妮子，真漂亮，交个朋友怎么样？”

莲花定了定神：“请让开，借光了，我要去买菜。”

“就半小时，咱们聊几句怎么样？”边说边伸出手去要捏莲花的脸蛋。莲花举起竹篮子一挡，那小伙子竟变色道：“怎么打人那！”同时更放肆地扭住了莲花的手往自己胸前拉。

莲花怎么也推不开那一双手，哭着喊着，这时刚好一个过路的大学生模样的人走过，一把抓住那小伙子再一个扫腿只听“啪”的一声，那小伙子摔了个嘴啃泥，莲花终于挣脱出来，吓得把菜篮子往秦淮河里一扔扭头就跑。

那个大学生模样的青年人追上了莲花，把菜篮子交给她，“小妹妹，已经没有事情了，那个流氓保证以后不再侵犯你，警察教训了他一顿刚刚放走，你放心地办事去罢。”

莲花这才想起感谢那位陌生人，小伙子却说：“不用

谢的，小妹妹，我们中国人命够惨的，受日本鬼子的气，挨日本鬼子的打，我们怎么可以还要自己人欺负自己人呢？”

莲花听完这几句话，眼圈又红了，这是一个乡下少女，她的心灵从未被污染过。

自然而然地，他们一起走向菜市场，陌生人告诉莲花，他已经报名到淞沪前线去打仗，“活着做亡国奴，还不如做个抗日战士死了！”

这是莲花从没有听见过的话，震撼着她的心灵。

短短几天的接触，莲花对陌生人有了深切的信任甚至爱戴，陌生人告诉莲花，他是负有特殊使命接触她的，并向莲花介绍了黄浚可能犯有的罪行，莲花欣然应诺做黄公馆里的内应。

这一着“苦肉计”的确并不新鲜，但莲花提供的情报却使整个间谍案件有了豁然开朗之势。

陌生人叫周海涛，他向丁队长报告说，据莲花亲眼所见，黄浚的司机小王昨夜骑自行车外出，大约一个多小时后回到公馆，在黄浚书房的门口摘下头顶上的紫色礼帽，向黄浚晃了一晃，挂在衣帽架上，没有说一句话便回身走了。

又是一顶紫色的礼帽！

成双提对的紫色调。

丁队长还想不出究竟，只是心里一动。

李后主、王安石 孰知谁是醉醒客

在校长官邸内独坐的蒋介石不知道为什么忽然想起了两年前拜谒中山陵后下得山来，和几个亲信随从轻车就简，游了一番秦淮河的情景。

真是“偷得浮生半日闲！”

黄浚也随侍左右。

秦淮河边的万千掌故、南京城里的一木一石，黄浚几乎无所不知，那次游秦淮河，一路上，黄浚静静地讲，蒋介石静静地听。

昨夜，谷正伦单独求见，黄浚的嫌疑已不能排除，对黄浚的监控升格到各嫌疑人员中的首位，一应安全措施及突发事变的可能的应对手段，包括黄浚父子一旦有外逃的迹象时，实行紧急逮捕，对黄浚住处实行昼夜不间断的严密监视，等等，蒋介石表示同意，“要有最确凿的证据，在这之前不得轻举妄动，不可打草惊蛇！”蒋介石对黄浚一案作了明确的指示。

不知道究竟出于什么原因，今天，蒋介石很想单独和黄浚见一面。

也许这是最后一面了。

这是个追随他多年也得到了多年宠信的老部下。

他的面前总是有黄浚的影子晃动——一个埋头工作的人，一个目不斜视的，一个从未在思想上、行动上违抗

过自己的人。

“他是日本间谍？他要置我于死地？他为什么？”蒋介石不只一次地想过。

顺理成章的应该是汪精卫。

汪精卫的资历、声望，和日本军队及政府上层的渊源，一贯的亲日态度，动辄与蒋介石分庭抗礼乃至跑到广州组织另一个国民党中央的野心，值此中日正式开战，淞沪很有可能不保，南京在失去屏障之后也终将沦陷，时局将万分艰难的情况下，汪精卫除了投敌做汉奸以保高位外，别无它路。

黄浚的背后是不是有汪精卫？

据谷正伦说，“侦察至今，尚无证据。”

蒋介石告诉侍卫官，请黄浚来校长官邸。

蒋介石忽然想细细地看看这位老部下，谈谈金陵、李后主、小虹桥，还有王安石。多少人，多少不同的命运，这就是历史的悲喜剧。

他希望从黄浚的眼睛里，能看到一点端倪，他要最后一次面对面地判断一下黄浚这个学富五车的人，究竟包藏什么祸心？

而事实上这也是黄浚最后可以求得蒋介石从轻发落的一次机会——如果他能和盘托出幡然悔悟的话。

蒋介石下意识一挥挥手，想把这个念头一拂而去！如果查证属实，已有的罪恶已经造成的后果，便是十恶不赦！

黄浚在汽车上闭了五分钟眼睛。

他做好了最坏的准备——一进中央军校的大门，谷正伦，或者是戴笠的手枪手铐，便等待着他了。

即便不是如此，那也是一次不寻常的召见。黄浚深知蒋介石，他对自己的政敌是决不心慈手软的，他忽然感到记忆中的蒋介石的眼光，冷得象冰。

黄浚打了一个寒颤。

汽车刚好停在校长官邸前面。

侍卫官报告后，黄浚走进蒋介石的书房。

蒋介石微笑着点头示意黄浚坐下。

蒋介石的书桌上是一本翻开的《白下琐言》。

蒋介石面对面地审视了一会儿黄浚，感慨道：“兵荒马乱的，连书也很少看了。”

“军国重任如委员长系之一肩的，当今天下不作第二人想。”黄浚不慌不忙地说，如往常一样，他总能找到最恰当的字眼使蒋介石听了心里舒服。

“我在看《白下琐言》，南唐故宫遗址中有小虹桥一座，如今可在？”蒋介石问。

黄浚从容答道：“户部街西面的洪武路，也即是卢妃巷南面，有一条小河，河中已只有淤泥浊水，河上有一座桥，桥身的一半也已被埋浸，这座小石桥可能是当年小虹桥的遗蜕。”

“那小桥两侧便应是澄心堂、瑶光殿了。嘿！”蒋介石一声长叹：“历史之於现实，真是不可想象！”

“可惜李后主的一手好诗词！”蒋介石又加了一句。



“李后主被俘北上，挥泪对宫娥之际，想来也是在小虹桥上走过的。”

黄浚点头。

“李后主是被樊若水出卖的？”蒋介石问。

“是的，要说南唐气数因为李后主的醉生梦死不理朝政民不聊生也实在很难维持了。”

“雕栏玉砌今犹在，只是朱颜改。”蒋介石用浙江官话吟诵罢，“到了北地做了亡国之君才想起来，虽然晚了，后人倒可借鉴。”

“王安石的半山园恐怕已经不在了吧？”由李后主而王安石，蒋介石今天的谈兴很浓。

“四年前，按照《金陵古迹图考》，我去寻访过，它座在宋江宁府东门与钟山之间，恰好一半路程的地方。这里原是谢安的园池故址，留下了一个土堆子人称‘谢公墩’，位于半山园后面，两园均已荒废，留下来的倒是王安石咏谢公墩的两首绝句。”

黄浚侃侃而谈。

“嚶，读来听听。”

黄浚吟诵——

我名公字偶相同，
我屋公墩在眼中。
公去我来墩属我，
不应墩姓尚随公。

谢公陈迹自难追，

山月淮云只往时。

一去可怜终不返，

暮年无泪对桓伊。

蒋介石饶有兴趣地听罢，“那第二首就不是写谢公是写他自己了，罢相，离开高位，一去可怜终不返！”

“王安石两次罢相后都住在南京，第二次一住十年直到终老，作为一个勇于革新的政治家，他留下的三句话却是至今不朽。”

蒋介石紧接着信口念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一代名相何等气魄！”

“是极！是极！”黄浚动容。

意犹未尽，黄浚又补充道：“王安石在政治上志在革新百折不挠，可写诗却偏重于春色春情，语多缠绵，如‘春风又绿江南岸’，真是不朽佳句。”

“也有哀惋传神忠义千秋的，《读史》中‘精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总是诗言志罢。”

一番怀古纵谈后，是沉默。

沉默往往是最难堪的——对于宾主都一样。

沉默也是双方的某种期待，倘若此种期待被沉默证明是不可期待的，那就只能告别，让误会或者欺骗不再永远。

还是李商隐的联语写得妙。

有道是——

座中醉客延醒客，

江上晴云杂雨云。

紫罗兰之约

就在蒋介石和黄浚金陵怀古的那一天，夜9时，各种花草草因为夜幕的笼罩而纷纷黯淡失色的时候，国际咖啡店招牌霓虹灯中的那一根紫罗兰却多少带点神秘地闪烁闪烁。

这个夜晚，这个日本鬼子的战火已经逼近南京的夜晚，多少人多少男男女女，仍然走向新街口赴紫罗兰之约。

周海涛细心地擦着他的黑皮鞋，为了不让人感觉到这是个盯梢的探子，必须得带个女伴去咖啡店，他可以带他的女朋友，丁队长不允许，结果还是从特警二队选了一个最漂亮的内勤女特工汪敏做他的搭档，权且做一回临时恋人。

汪敏扶着周海涛的胳膊，两个人步履轻盈地走近国际咖啡店，紫罗兰一闪，窗户里从紫色的灯幔下流泻出来的光也是紫色调的，汪敏一声娇呼：“啊，真美。”

汪敏知道有任务，却不知就里，看周海涛神色从容，反而又多了一层迷雾。

“周，今儿干吗那么神秘？”

“你一心一意做好我这个晚上的恋人，切记目光不要旁顾，常常地看着我，要含情脉脉，真的，我不是吃你豆腐。另外，我们的座位不是面对面的，是坐在一个火车座上，咱们也时髦一下，你得挨着我一点儿，我还要轻轻地摸摸你的头发捏捏你的脸蛋，一切都会仅此而止的，我们要配合好。”

汪敏的脸上一阵绯红。

他们走进咖啡店，周海涛殷勤地替汪敏把外套挂在门口的衣帽架上。

客人还不多。

夜更深的时候，情人们的眼睛才会更亮。

汪敏选了一张靠窗里边的座位，左侧是窗，前面是大门。周海涛坐在窗户边上，汪敏一下子便进入了角色：“亲爱的，我要柯尼雅克。”

周海涛笑笑，告诉侍者：“两杯柯尼雅克加冰加柠檬。”

两个人笑盈盈地举杯、碰杯。

从咖啡店的角落里，不时会传来轻轻的仿佛是发自远山流泉之声一般的“叮叮”的碰杯声，流过紫色调的氛围，带着柠檬和美酒的芳香。

当天的“金陵晚报”——

坚守闸北四行仓库孤军四百余人弹尽粮绝全体牺牲，上海市民各界追悼哭声震天。

我军又放弃真如，撤退至苏州河南岸。沪西方面，中

日军队在中山路、北新泾一带，隔苏州河对峙、驳火。

日军在闸北纵火焚烧……

黄浚的司机小王出现了。

这是个外表木讷神情冷淡的年青人，二十七八岁，他径直走进咖啡店，但就在他迈进店内的一两步间，他的眼神已经在店堂里观照了一圈。

他戴着一顶紫色的礼帽。

他把礼帽随意地挂在衣帽钩上。

他要了一杯鲜桔汁，随随便便地找了一个座位，正好是周海涛、汪敏的邻座，前头一张桌子，背对着周海涛。

他看着窗外。窗外是朦胧的路灯黑色的树影。他是黄浚从小收养的一个孤儿，从福建带到南京，开小汽车，够神气的了。黄浚待他不薄，他也只知替黄浚做事，做得认真真死心塌地。

其实，他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紫色和紫色在相互吸引。

小河先生进来了。

小河今天的气色不错，刚刮的胡子，衬衣领子雪白、挺刮。

小河把自己的礼帽挂在衣帽架上，刚好就在小王那一顶礼帽的隔壁，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两顶紫色的礼帽。

周海涛喷出一口烟，烟雾缭绕中，他只一瞥。

小河要的是威士忌加苏打。

他很庆幸今天没有碰上陈晋才。这个敲竹杠的良心坏了坏了的混蛋自从敲走他一笔美金后，有很多天不见了，一定是天天喝醉最好醉得醒不过来。

林小姐是真有味道。小河却不敢再去了。

想起这件事，小河心里总不是味儿，这是个剃头匠，货真价实的剃头匠，谈吐却又不凡，手段也高明，还会说一口日语，总是被人家抓住了辫子，不知道哪一天他又会冒出来再敲一笔竹杠。

小王已经付完帐，他走了。

他走到衣帽架旁边，随随便便地把一顶紫色的礼帽往头顶上一戴。

十分钟后小河也走出了咖啡馆——日本人是很讲究仪表的，他在穿衣镜前细细地戴好礼帽，甚至还满意地欣赏一番那紫颜色，把领带扶正，披上灰色风衣，信步而去。

这个时候夜已深，风有点凉意，新街口的夜空并不辽阔，因为有高高的梧桐树，况且星月都很朦胧。

周海涛真是品酒专家。

他用右手的手心暖着大肚高脚玻璃杯里的柯尼雅克，轻轻地晃动着，他告诉汪敏就这一点晃动，就这一点热量，酒会更香品质更软，一点一点地喝要用舌头去感觉，芬芳在融化。

他还告诉汪敏，如果你真喜欢你杯中的酒，你还要以爱的眼光去注视去抚摸。你会看见一只酒杯是另一片海洋，啤酒的泡沫、鸡尾酒的颜色，我们不能光顾了嘴巴的享受而忘记眼睛的享受。

周海涛似乎并不关心那两顶紫色的礼帽，已经交换

过了。

当他发现礼帽暂时离开他们各自的主人，并排着挂在衣帽架上的时候，他已经明白了这是间谍战中还算高明的一着。

省略了接头暗号及间谍与间谍的直接接触。

认帽不认人。

两个人中如果有一个间谍发现正在被盯梢，或者周围的情况较之以往有异动，他还有可能挽狂澜之既倒——仍然戴上自己的那一顶礼帽，并将夹层中的情报及时毁掉。

仅仅是一只礼帽，就不会如此丰富多采了！

紫色调不仅是浪漫。

紫色与紫色的交换，能使人闻到血腥味——甘心充当汉奸敌特的良心的腐败，惨无人道的日本侵略者屠刀下的土地和冤魂。

在夜幕的簇拥下，周海涛急如星火地疾行而去，汪吃力地跟在后边。

这一对临时情侣，只好遗憾地分手了。

再见！紫罗兰之约。

“吴王剑行动”之始：剑出鞘

两千多年前，春秋战国，风云覆雨。

曾经占有过南京地区，凭借长江之险与越国、楚国争霸江南的吴国，以铸造宝剑、戈等青铜兵器而闻名。吴国的著名工匠干将曾为吴王铸造过两把挥之削铁如泥、能作龙吟虎啸之声的宝剑，一名干将一名莫邪，后人也有统称为吴王剑的，喻其锋利无比。到得吴王夫差时期，更是高筑冶城大炼兵器，这也是南京历史上最早的一座土城，位于如今的朝天宫后面。

周海涛、丁队长连夜商定并拟定细则形成文字的“吴王剑行动”计划，送到谷正伦手里时，是凌晨五点，谷正伦审定后指示：行动之始，务必选择一处僻静街道，严密封锁消息，走漏风声者就地枪决！

两天后的黄昏。

小河骑着自行车，离开了领事馆。

杂货店老板陈老头正在关门打烊。累了一天，松一口气，摸出一支老刀牌香烟。

你想象不出这个弯腰曲背的老头，翻身骑上自行车时的敏捷，他慢慢地骑着，一只手握车把一只手把烟送到嘴边。

陈老头骑在自行车上依然是弯腰曲背的，仿佛永远埋着头，这个世界除了他那一辆“嘎吱嘎吱”的破自行车外，一切都并不存在。

其实陈老头的眼睛是黑亮黑亮的。

他跟着小河穿进了一条破落的小巷，没有梧桐树没有云吞店，坑坑洼洼的碎石头铺成的街面，很多老房子的院墙已经倒塌，墙上的爬山藤是干枯的，有几只黑蜘蛛正

在悠闲地织网。

陈老头下车。

陈老头把没有熄灭的烟头随手往空中一抛，抛了个弧线。

烟头还没有落地的时候，陈老头的自行车已经走在回头路上。与此同时，从残缺的院墙里突然挤出十几辆自行车，一副贩夫走卒的模样，车的后衣架上有的挂着两个装西瓜的箩筐，有的把草帽、蒲扇堆得像山一样高，有一个虎头虎脑的年青人，车上装的是两桶猪下水，只见他脚下使劲一踩，自行车便加速驶出，别的人也紧紧跟上，当他接近小河的自行车时，再一次使劲儿踩车踏脚，拖着晃悠悠的两提桶猪下水，直往小河的自行车撞去，两个人两声惊叫，自行车倒地，小河迎面摔在碎石头街上，头上的礼帽飞出去十几丈，俩人的惊叫声刚停歇，后面十几辆自行车又紧紧跟上好像是刹车不及，全部车叠人叠人，猪下水西瓜皮草帽蒲扇滚了满地。

从另一条巷子里涌出来的几个交警，立即把摔得血流满面步履蹒跚的小河架走，小河一时摸不清头脑只说“礼帽！我的礼帽！”交警似乎都成了哑吧，一个大个儿一个大巴掌掩住了小河脸上的伤口也堵住了他的嘴巴，路边又刚好停着一辆急救车，四个穿白大褂戴白口罩的人把小河拖到车内，急救车似飞而去。

在急救车里，小河大喊抗议：“你们这是绑架！”

“不！先生，我们是在急救。”

“我是日本外交官！”

“先生，日本侵略军在淞沪烧杀抢掠中国人民的时候，我们却对你实行人道主义的帮助，你还喊什么呢？”这个穿白大褂的“医生”的声音特别冷静。

“我没有受伤，这是你们的诡计、阴谋。”

“你正在流血。”

“我的礼帽呢？”

“生命比礼帽重要，你说呢？”

小河被送进了一个院子中的一间临时布置的病房。

小河的礼帽早已戴在别人头上了。

这是“吴王剑行动”之前，从未露过面的特工二队侦察员刘华，他骑车到僻静处，眼观前方，把礼帽的夹层一摸便取出了一张叠成四叠的信纸，放进口袋；同时又取出事先准备好的仿照须磨笔迹、口气写的一份情报折成四叠，放进了礼帽的夹层。

刘华的自行车拐进街口。

刘华从容地走进国际咖啡店，把礼帽、风衣挂在衣帽架上，然后转身在靠近门口的一张咖啡桌旁坐下，要了一杯意大利咖啡。

另外那一顶紫色的礼帽早已在等待中。

还是两顶礼帽，还是紫色调。

意大利咖啡，真香，真浓！

选择尽量靠近咖啡店门口的座位，这是“吴王剑行动”中思虑缜密的一着——临近破获一个间谍案的时候，也是最敏感最可能出现异常因而也是最容易功亏一篑的

时候。

考虑到：

尽管认帽不认人，但毕竟物是人非，司机小王一定注意到了今晚的是陌生人而非小河。

这个陌生人假如是日本人就好了，他是中国人。

万一黄浚有所察觉有所交待，抢先一步，司机小王戴着自己的礼帽扬长而去，那么黄浚的直接罪证将拿不到手中，从此后间谍行动很可能沉寂，最终将无法破案。

为此，刘华坐镇大门以静待动——这个静也同样重要，静得无声无息让对方毫无察觉而走完最后束手被擒的一步——否则，即便取得罪证，在以后的二十四小时内，还可以生出别的变故来。

回到前面的假设，如果司机小王竟戴着自己的礼帽离去，刘华就必须及时跟进并将其立即制服，获得黄浚的直接罪证，迅即采取逮捕行动，由被控制中的司机小王叫门，拿获黄浚……

司机小王离开了座位。

他站在衣帽架前的时候，正好背对着刘华。

他戴在头顶上的，是刘华的那顶礼帽。

他走到门口，还把礼帽往下按了按。

天上有隐隐的雷声，梧桐树叶在晃动。

像九天之上剑风大作的一把剑，乌云被撕开了一条条裂缝，闪电颤动的时候，乌云会哭泣，雷声和雨点一扫南京城的暑热，玄武湖中的台城柳才有了青春的姿色。

谷正伦推开窗，好凉风！

他的手里紧握着刘华刚刚截获的黄浚送给须磨的情报——

蒋介石刚刚下发的绝密军令：调动六个精锐作战师，从苏州、无锡星夜开拔，划归张治中直接指挥，赶赴淞沪前线支援当地守军。

军事地图两份——

南京下关明堡、暗堡群落、岸炮火力设置图。

长江江防图。

雷雨中的黄公馆。

黄浚的书房，他细心地拉上第二层窗帘，风雨声顿时隔得很远很远。他习惯地从保险柜中取出白郎宁手枪，推上子弹打开保险，放在离他的右手半尺远的书桌上。

他已经坐到了太师椅上，准备看司机小王取回来的情报，每一次他都要拉窗帘、把手枪准备好，尽管他知道眼下黄公馆里一片梦乡。

每一次他接到须磨的情报、指示，眼睛都会充血，须磨对他的赞赏会使他热血沸腾，他像一个赌徒，他的人性最真实的卑鄙、残暴那一部分，此时才会使人看见一个真实的黄浚——他面部的肌肉微微地发抖，把眼镜摘下半闭着眼右手伸前半尺握着那一支白郎宁手枪，他会很快地使自己不再多想已经做过的令日本侵略军、土肥原、须磨欣喜若狂如获至宝而使中国人民、抗日将士付出多少生命、鲜血的事情，他要缜密地规划下一步。

须磨的“亲笔信”：

先生：中日亲善、君之努力，为普天之下功能最卓著者。奉上峰指示，明晚 11 时有关人员集中在你处，除颁发巨额奖金外，要事面商。

黄浚作欢呼状，但没有出声，几秒钟吧，他的脸上重新冷峻。

须磨亲自来公馆，显见事关重大，以往从未有过。蒋介石的几次绝密军机，使日本鬼子占尽风水之先，但戴笠、谷正伦不是吃干饭的。

间谍有成就的时候，便是有危险的时候。

间谍有大成就的时候，便是有大危险的时候。

前几天蒋介石屏退左右，两个人谈了一通金陵掌故，虽然未见杀机却是玄机密布……

黄浚用公馆内线电话，叫醒了他的儿子黄晟。睡意未消的黄晟，一看须磨的信，手有点儿发抖：

“爸爸，须磨亲自来，又是夜深人静时，南京城里到处都有戴笠、谷正伦的特务，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肯定有非常紧急重大的情况，可能是安排我们转移、隐蔽。黄浚声音很轻，像是自言自语。

黄晟毕竟年轻，二十出头，显然有点胆怯也相当的机敏：“我们已接近暴露，这是事情发展之必然，爸爸，要想想退路了！”

黄浚摇摇头：“眼下不可言退，见了须磨再说。”

“假如须磨是来杀人灭口的呢？”

黄浚的心里一震，“不作此想。你连夜收拾一下，伺机先去上海。”黄浚心里很清楚，上海沦陷在即。

黄晟又问：“妈妈呢？”

“不告诉她，也不走。她一概不知情也好，以防万一。”

言毕，黄浚若有所思：“当初，应该也不让你知情的。”他看了一眼他的儿子，这是他的独子，20 岁刚刚出头，福建候官黄家的一条独根。

“休息去吧。明天你通知曹、李、王几个人，晚上 10 时到我这里吃宵夜。”

风停、雨歇、夜沉沉……

谷正伦漏夜赶往“校长官邸”。

蒋介石看完黄浚给须磨的情报，那熟悉的字迹，蝇头小楷，“立即逮捕，军法审判！”

谷正伦并报告，黄浚及黄公馆已被 24 小时严密监视，围捕的网已经张开。为防止黄浚父子及别的案犯有所察觉而潜逃，将临机处置提前抓人。

“须磨那边呢？”蒋介石问。

“须磨一夜未睡，须磨的便衣还在城里活动打探消息，日本领事馆外围也已采取秘密警戒，领事馆及任何人都无法接触黄浚，按照南京战时状态有关规定，从明晨起鼓楼一带停电 24 小时，供电局将会通知日本人。领事馆通向黄公馆和黄浚办公室的两条电话线已经切断。”

“好！务必成功！”

“现被关押的小河怎么处置？请委座指示。”

“捉了黄浚之后，放他回去。”

鸡鸣寺的古城墙上，有一只公鸡正引吭高歌。

“吴王剑行动”之终：剑在手

这一天仍然是平平常常的一天。

这一天大家都很难熬，但大家都装作若无其事。

须磨在办公室里熬了一夜。

小河始终没有回来！

所有的密探都没有得到任何消息，昨夜金陵依旧，只是下了一场雨。

小河失踪。

小河好色，会不会中了戴笠的美人计？

如是，美人计的矛头所向是毫无疑问的了，国民政府连续被泄露最高军事机密、蒋介石险些丧生等一连串的事件再加上淞沪前线军情吃紧，南京的特工有所动作，是情理之中的，那么这也意味着：小河的失踪，将是日本在中国最高当局的一个间谍网的破灭……

侵华军最高特务头子土肥原的回电是：切勿声张，静观其变。

须磨也只能这样，南京其时还在中国人治下，他害怕中了引蛇出洞的计。

黄浚呢？

黄浚一如既往地按时上班。

这一天仿佛特别安静，没有军委会的重要会议，没有蒋介石的召见。

白崇禧——新任三军副总参谋长——给他打了个电话通知他：明天上午9时，军委会最高军事会议，由他做记录。

白崇禧是桂系军阀中的要人，又是新官上任，这位打仗的虎将，平时待人却总是客客气气的，放电话之前还不要忘记称兄道弟：“黄浚兄，明天见。”下班的人三三两两地离开行政院办公大楼，黄浚跨进汽车时，无意间回首望了一眼，西落的太阳下，每一扇玻璃窗都反射出五颜六色的光，火烧云平静地散落在西天，月亮也已经悄悄地挂上了树梢头。

成功就是一切。黄浚相信这句话。

黄浚也一样相信，日本人必将成为中国的主宰，而到了那个时候，他，黄浚将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福特车驶进了黄公馆。

小王刚停好车，黄浚轻声地说：“今夜10时以后告诉须磨房小心谨慎。”

晚9时。

谷正伦的办公室。

丁队长站在黄公馆沙盘模型前，详细了解公馆内的房屋、穿廊结构及公馆外的地形地物。执行此次“吴王剑行动”的共30名精干特工，一路从前大门进入先行突破。一路翻后墙而入，堵住后门后窗的退路。第三路从隔邻越墙后封锁楼面、控制制高点。

不直接参加逮捕行动的以战斗兵员组成的精锐分

队，一百人埋伏于公馆外所有通道口，以备事出突然，日本人强行介入时全力血战，保证公馆内的逮捕任务圆满成功。

钟高玉化装成送急件邮包的邮差，一身绿色制服，手中是四条香烟捆扎成的一个包裹。钟高玉叫门，他的身后隐藏着两个侦察员。

10时55分……

10时58分……

10时59分……

11时正，莲花如约在楼上卧室隔着玻璃窗，发出两次灯光信号。

钟高玉叫门，按铃。

侧门的一个小方孔里，露出两只惶惑的眼睛：“是谁？”

“邮局送包裹的！”

“哪儿寄来的？”

“上海！开门，拿章子来。”

门卫不开门，“从这儿塞进来。”

钟高玉举起包裹，在那个小小方孔前一晃，“塞不进！”

门卫这才不得不把侧门打开一条缝，钟高玉一侧身把门挤开反手掐住了门卫的脖子，后面的侦察员、丁队长、李荣芳、周海涛等持枪就往台阶上冲，就在这时，屋内传来一声枪响。

黄浚拒捕？

黄浚自杀？

丁队长的脑海里一闪，脚步更快，飞起一脚踢开楼下客厅紧闭的大门。

黄浚站在客厅的侧门旁，门开着通向走廊，黄浚的手里握着那支白郎宁手枪，神色木然。

丁队长大喝一声，“举起手来！”一边飞奔几步，黄浚的手枪“当”的一声掉在地板上，黄浚就捕。

十几步外，莲花的身体仆倒在血泊中……

客厅里准备接受须磨嘉奖的曹高参、李部员、王秘书、司机小王及黄浚的儿子黄晟一起落网。

李荣芳一个箭步奔到莲花身边，一探鼻息已经气绝，双目紧闭，长长的睫毛还有细碎的泪花，双手抱着一个牛皮纸口袋。

莲花死在最不应该死去的时候。

晚11时，她如约发出灯光信号后，按照丁队长、周海涛的指示，莲花本应留在楼上她的房间内——这是既考虑到省去不必要的暴露，又担心行动过程中，或许会动枪而发生意外。显然，莲花无法平静，甚至激动得忘记了个人的安危。她乘黄浚与曹高参等离开密谈的书房去客厅之际潜入，打开了抽屉，看见一个鼓鼓的牛皮纸口袋。抽出一张就凭她认得的不多的字便知道这是机密，这一包涉及国防、军队及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的各种绝密文件，恰恰正是黄浚准备今夜面交须磨邀功请赏的情报。莲花抱起牛皮纸口袋退出书房，她一定是想到万一今夜的行动生出突然变故，这一些情报在自己手里之后，就可以设

法交给周海涛。

总之，万万不能再落到日本人手中！

黄浚一行走进客厅落坐。

黄浚有些坐立不安。

墙上的自鸣钟摆来回地晃动。

就是这等待须磨来临的时刻，是黄浚一生中最漫长的时刻。

黄浚觉得燥热，电风扇的声音又很讨厌。

11时还差5分钟，

还差3分钟，

还差2分钟，

还差1分钟，

11时正，自鸣钟“当当当当”响了11下。

须磨应该到了，或许正在叫门。

他忽然想到书房的抽屉没有锁上，这是他自从担任日本高级间谍以来，从未有过的疏忽，他起身向书房走去。

莲花刚走出书房，向右拐向楼梯。

黄浚看见莲花的背影。

黄浚轻喝一声：“站住！”

莲花一惊之下加快了脚步。

黄浚开枪。

莲花倒地。

子弹从左右肩胛的中间穿过……

黄浚转身，同伙们都已从沙发上一惊而起。

子弹击中了莲花，枪声却也如丧钟一样，使黄浚这一伙间谍顿时失色。

用不着说话，莲花此举已足以说明一切：完了！

是的，该完了！

丁队长一脚破门，转瞬间枪口都已对准了他们的胸膛。

丁队长押着已戴上手铐的黄浚，把他拉到莲花的尸体跟前：“跪下！”

黄浚双膝下跪。

“叩三个头！”

黄浚叩头如仪。

一直紧盯住黄浚的周海涛，一步冲上揍了他两个巴掌。

一千人犯押出公馆大门。

一辆警车绝尘而去。

周海涛、李荣芳抬着一个简易担架，担架上安息着莲花。

月亮看着莲花。

星星看着莲花。

莲花的头发那么黑，莲花的脸那么白，莲花的眼睛闭上了嘴也闭上了，莲花穿着一身她第一次穿的印花蓝格子短袖、玉白布长裤。

这是她母亲纺线、浆纱，在一张老式的织布机上织的布。昨天托人从苏北乡下带来的。

周海涛和李荣芳抬着莲花。

月亮跟着莲花。

星星跟着莲花……

尾声之一

蒋介石闻报，长长地吐了口气。

他转身从书架上抽出黄浚写的《花随人圣庵摭忆》，翻读一页，“好文采！”

那一天聊金陵掌故，王安石的诗，黄浚自己吟的，其中有一句：一去可怜终不返！

谷正伦的报告摆在案头——

黄浚，字狄岳，福建候官人，早年留洋日本早稻田大学，是现任日本驻南京领事须磨的同班同学。

留学归国后，长期在北洋军阀中任职，与北洋要人、清朝遗老多有往来，书法、文章均为文坛称颂，著有笔记体著作《花随人圣庵摭忆》。北洋政府垮台，转到南京政府任职，以其巴结、拉拢权贵的手腕，冒升之核心高位。

须磨出任驻南京领事之后，以至今数月仍待查证的巨额美金拉拢黄浚，加之黄浚认为中日交战中国必亡日本必胜，遂由须磨正式发展为日本高级间谍。黄浚沦为汉奸、特务后，又将其子黄晟送往日本留洋，归国后仗着父亲黄浚的权势，任职外交部，同时亦成为黄浚间谍集团的重要骨干，是年22岁。

间谍集团其他成员为：参谋本部高参曹思成、军政部秘书王必贵、海军司令部部员李龙海及黄浚的司机小王。

查黄浚父子生活豪阔，苏州、上海父子俩人均各有公馆。黄浚的大量财产均已转移至上海……

“娘希匹，枪决！”蒋介石合上案卷骂了一声。

南京沦陷前夕，黄浚父子以卖国罪判处死刑，同时绑赴刑场，福建候官黄家，从此断子绝孙。

尾声之二

黄浚捕获，谷正伦指示丁队长把小河放走。

怎么放？

周海涛、李荣芳等都主张杀掉算了，丁队长说：

“委座说了，还是要放。”

这一夜天上乌黑不见月光，丁队长先把小河的双手捆在身后，黑布蒙眼，塞进了一辆吉普车中。过大街、穿小巷，不知绕了多少个弯，到得一处僻静街道，只见断墙依稀，不正是小河骑车被撞倒的地方吗？

吉普车减速行驶。

在车上给小河松绑，揭下蒙眼的黑布，周海涛打开车门，把小河推落街头，吉普车加速离去。

小河揉了揉眼。

小河大吼：八格牙鲁！

小河往前方有亮光处狂奔。

只见断墙里有一只手轻轻一挥，一柄三寸七分长的飞刀破风而去，小河应声倒地，那飞刀从左右肩胛的中间，穿胸而过。

跃出三个人影。

小河的尸体被装进了一只旧麻袋中。

巷子里停着一辆脚踏大板车。

板车上装着几麻袋杂货，现在又多了一只麻袋。

踏板车的细心地擦拭着马路上的血迹。

板车向着江边飞驰而去。

三个人影顿时消失在夜幕中……

尾声之三

黄浚被枪决的当天。

南京雨花台麓，莲花之墓。

吊唁者络绎不绝，默默地站在墓碑前，因为呼喊已经嘶哑因为血流得太多，淞沪抗战败北上海失守，日本侵略军兵分三路，在松井石根的指挥下直扑南京。日历刚刚翻到1937年12月，天那么冷，沉默象冰，流下的眼泪也是冰。

天上彤云堆聚，朔风呼啸。

花圈、挽联，覆盖了这个小小的墓穴。

吊唁者之中有了队长、周海涛、李荣芳等。

丁队长忽然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背影：陈晋才，还有杂货店的老板陈老头。在他们俩人身边是夫子庙前卖云吞

的刘仁山，以及一些江湖上的人物。

黄浚被捕，庆功之日，谁也找不到“23号”和陈老头。

他们无影无踪。

小河是谁杀的？丁队长心里明白。

他们另外还做了一件事，做得教人心惊胆颤。

南京殡仪馆里，为莲花隆重举丧、追悼的前一夜，莲花的遗体不翼而飞。凌晨，五更鼓罢，莲花之墓便屹立在雨花台麓。

墓地素朴、精巧，会使人想到一个少女的闺房或者梳妆台。

墓地四周一圈刚刚种下的杜鹃树，不知是红杜鹃呢还是白杜鹃……

丁队长挤动在吊唁的人群里。

他想握一下陈晋才的手。

“他妈的，真该喝一杯的！”南京市郊已经炮声隆隆，谁都知道国民政府已迁往重庆，谁都知道此刻才是真正的兵临城下，那么多的中国人，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却不想离开一个年青、美丽的灵魂，中华民族、五千年风风雨雨灿烂文化，日本侵略者难道是你们可以毁灭的吗？

丁队长还在挤来挤去的往前挤。

蓦然间，只听得伏地长拜的陈晋才、陈老头、刘仁山等一众七八人，同时发出一声清啸，这清啸声震金陵，俄顷，但见衣袂飘飘，他们下山而去了。

天上飘下了雪花。

雪，洁白的地，鹅毛大雪。

冰雪之人冰雪之树冰雪杜鹃……





○1964年9月,郭沫若在家中会见英国皇家学会理事、物理学家布莱克特教授(左六)、植物学家克拉彭教授(左四)一行时在屋前海棠树下合影。

解放后郭沫若锐气为何不 郭老晚年二、三

——朝柱、汉英对

求是篇

●王朝柱 郭汉英

在迎来郭沫若百年诞辰之际,朝柱怀着对郭老的崇敬,走访了汉英。朝柱希望通过对汉英的走访,对郭老、特别是晚年的郭老有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

听过朝柱的来意,汉英笑着说:“了解郭老,单从学术角度来看,就很简单;至于谈到晚年的郭老,必然牵涉到特殊的政治背景。我是搞自然科学的,学识和能力都很有限。对社会科学更是外行,恐怕很难满足你的要求。”

朝柱坚持说:“对于郭老的晚年,大家有不少疑问和不同看法。希望你能谈谈你所了解的郭老,特别是郭老的晚年,作为郭老和立群夫人的长子,大家对此是有所期望的。”

汉英难以推脱。他说:“好吧。可以谈谈我所接触到的一些事情,以供朋友们参考,至于种种疑问和不同看法是难免的,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其实,许多问题不宜

现在来作结论，不妨留给后人。”

朝柱和汉英的对话就这样开始了。

朝柱：郭老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光彩照人，才华横溢的人物。他的《女神》，他早年对中国古代史和古文字的研究，他的史剧《屈原》、《虎符》等都是划时代的，他的政论如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他的史论如《甲申三百年祭》都是震耳发聩的惊世之作，但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郭老的锐气却不及当年了。

汉英：新中国的成立，对郭老来说，应该是中华民族的新生。作为一个革命者，他自然要发自内心地讴歌人民革命的胜利，满腔热忱地赞颂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和成长。

朝柱：是的。浏览一下建国后的文艺作品，从茅盾的评论到柳青的小说，从老舍的戏剧到郭小川的诗歌，几乎都洋溢着对新中国的赞美。我相信他们和郭老一样是真诚的。

汉英：这种现象是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反映。不过，比起建国初期的文学创作，郭老的史学成就更为突出。50年代初，他出版了《奴隶制时代》，稍后，他又完成了《管子集校》这部巨著。

作为史学家，郭老十分清楚在新中国的躯体上，不可避免地会存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种种腐朽渣滓和痼疾。要清除渣滓，根治痼疾却是非常不容易。然而，新中国成立以后，他的政治地位变了，成了“国家领导人”之一。作

为一名身居高位的执政党的成员，他的言行不得不要受到制约。

朝柱：或许这就是中国传统上所谓的“官身不由己”吧。

汉英：对此，郭老是比较清醒的。他不止一次说过：“不要把那些应景或酬酢之作收入我的文集。”郭老十分欣赏战国时代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50年代初他就提出：“凡是自由讨论的风气旺盛的时代，学术的发展是蓬蓬勃勃的，反之便看不到学术的进步。”他期待着这样一个时代的再现。早在《甲申三百年祭》中，他就流露出对新中国的憧憬，他特别赞赏李自成“能纳人”，“采取民主式的合议制”。

那么，事实怎么样呢？我来讲两件事情。

那是50年代初，我还是初中生的时候。一次我参加天安门“五一”庆祝活动，无意中发觉《东方红》和《国际歌》的主题极不协调。《东方红》把毛泽东比喻为太阳，称毛泽东是人民的大救星；《国际歌》却有力地声称，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神仙和皇帝，全靠自己去救自己。回家以后，我直接到当地把我的“发现”告诉父亲。不料，父亲对我的“发现”似乎早有思考，回答说：“《东方红》是一首民歌，体现着亿万农民对领袖的朴素感情，《国际歌》是工人阶级的战歌，是巴黎公社的悲歌，代表着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要求，它的提法是科学的。”他停顿了一下，又接

及当年 事

语录

○1971年秋，郭沫若最后一次登临八达岭长城
时与于立群在烽火台留影。



着说：“不过，时代造就着时代的需要。现在的中国，九成是农民。农民唱出了《东方红》，农民也需要《东方红》。这是中国的现实。”

当时，我尚不能完全理解父亲讲法的含意。事后回想起来，父亲的讲话道出了他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些基本问题的思索和分析。

另一个故事是我在清华大学读书的时候。当时赶上了那个超英赶美的所谓大跃进的年月。我恰恰开始上专业基础课，又是足球校队队员。上午上“跃进”课，下午赛“跃进”球，晚上还得响应号召大炼“跃进”钢。一个周末的晚上，我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专门把小“炒炉”炒出来的一块“蜂窝钢”带回家请父亲看。父亲用手托着“钢”块看了一会，神态严肃地反问了一句“这也叫钢？”旋即感慨地摇摇头说：“狂热呀，狂热。凭这种狂热怎么能建成社会主义？”

在大兴这种狂热地“全民炼钢”热潮的同时，在周总理和陈毅、聂荣臻副总理等的支持下，成立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郭老出任校长。他语重心长地号召科技大学的全体师生要扎扎实实地学好基础课，努力攀登现代科学技术的高峰。今天，如果我们把反问“这也是钢”的郭老，把担任科大校长，鼓励师生勇攀科技高峰的郭老和曾经以夸张、浪漫的诗句歌颂“大跃进”的郭老联系起来，你会怎么看呢？

朝柱：这的确带有时代性的悲剧色彩。郭老一贯以敢于向权威挑战、敢于开拓新的科学领域而享誉中外。但是在他的晚年，却没有看到他公开撰文批驳某些悖逆科学的论调。不知郭老对这些论调是否表示过世人所不知的观点。

汉英：我还是再讲几个小故事。

大家知道，“文革”之前，哲学战线上发生过一场“合二为一”和“一分为二”的论战。

一次，我陪父亲在院子里散步，说起这场论战。父亲当然知道其政治背景和实质。他对此是有自己的见解的。父亲对我说：“对立统一的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说是对的。说到事物是一分为二，还是合二为一，却不能那样绝对，不能把这二者断然对立起来。主席的‘两点论’，不就是要看到事物的两个方面吗？如果一定说合二为一是错误的，那么如果没有精子和卵子的结合，怎么会有你毛泽东？”

父亲语重心长地嘱咐我：“这根本不是什么‘学术讨论’。你们年轻、单纯，经常把事情想得过于简单。你们会吃亏的。”

“文革”开始不久，一次同事们在研究室里议论说有个地方一位教师被打成了反革命，就因为他说了句“毛泽东思想也是一分为二的。”当时我曾表示这样做未免太过分。不料一位好事之徒后来竟把此事“汇报”了。一直闹到军管会在全体大会上宣布：这里公然有人为宣称对毛泽东思想也要一分为二的反革命言论辩解，对此我们要斗争到底！于是，我不得不做些准备。我写了一个提纲，要

点是，和世间一切事物一样，毛泽东思想是发展的，是对立的统一。我在一个周末把要点给父亲看了。父亲看后说：“学习毛泽东思想当然要分析，不分析怎么能学得好？分析就是一分为二。”他又说：“毛泽东思想是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集体智慧的结晶，由毛泽东这位领袖集其大成。中国革命和建设在发展，毛泽东思想也要发展，而发展的基本规律就是对立的统一嘛。”接着，他不无忧虑地说：“现在有人把毛泽东思想绝对化，把毛主席的每句话尊为圣旨，这其实是在反对毛泽东思想。”他再次叮嘱我，“这不是学术讨论，要当心那些无耻之徒，颠倒黑白，落井下石，卖友求荣之辈是大有人在的，世英就是吃了这类人的亏。”

后来随着“文革”的深入，他常常提醒我和弟妹们，现在鱼龙混杂，你们要学会分析，学会识别什么是“真正的毛泽东思想。”

另一个故事和周总理有关。“文革”期间，有一位湖南的老师写了一篇批判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文章。在“四人帮”的煽动下，竟有些全无科学常识的人跟着鼓噪，在“中央文革”的授意下，打算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公开批判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父亲对此十分重视。早在留学时期，父亲就接触到相对论，听过爱因斯坦在日本所做的相对论的演讲。他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是哲学意义上的相对主义。如果由《红旗》杂志发表这种文章，这和“无产阶级文化派”有什么两样？这样做会在世界上引起哗然，也会阻碍我们自己的科学技术的发展。”

我理解身处逆境的父亲的心情：公开反对批判相对论难以奏效；而默许这种愚蠢的批判，泛滥下去，后果将更为严重。几天以后，父亲告诉我，你们的好爸爸（指周总理）也知道了，他很关心这件事情。我告诉父亲，我已经和几位朋友设法打进那个“批判组”去，用孙悟空的办法，在内部斗。父亲笑了，他接着说：“不妨再设法搞个内部刊物，允许不同的意见发表，这样做或许更稳妥。”父亲告诉我，这也是好爸爸的意思。

父亲接着说：“老实讲，科学的批判，密切联系实际批判是会推动科学发展的，我们至今还缺乏这种批判精神。但是，打棍子、扣帽子，用哲学观点来判断科学的是非是荒唐的。自上而下地用权势来支持这类愚蠢的批判就更加荒唐。他嘱咐我，你们要参加这场辩论，并要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历史一再证明：淫威可以置人于死地，但却无力把科学打倒。相反，一切无知的批判科学的人，是一定要受到科学嘲弄的！”

显然，好爸爸和父亲的意思非常明确。不久，原来的“批判组”被一些搞自然科学的朋友打了进去，原来那场企图批判爱因斯坦相对论的闹剧变成了内部讨论。现在谈起这件往事，感到那样的滑稽可笑。可是，人们却不知道作为中国科学院院长的父亲，那时在顶着压力，遵照他的良知和周总理的意志在打太极推手呢？

朝柱：我看到过当时的内部刊物，但不知道还有这些

○1963年元旦后，郭沫若、于立群及子女在颐和园。（左起：世英、民英、于立群、汉英、郭沫若、庶英、建英、平英）



曲折的背景。

汉英：有关这件事的故事很多，说不定将来会有人写出一本“相对论批判演义”呢。

朝柱：我想再请你谈谈郭老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大家都知道，他们的关系是很密切的。他们之间不仅有书信往来，而且还有诗词唱和。也许是因为世人所不知的原因吧，一些学者对郭老和毛泽东的来往时有微词。

汉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必在意那些微词，还是那句话，历史自有公论。郭老一向认为人民抛弃了蒋介石，而选择了毛泽东，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同时也展示了毛泽东的伟大。郭老十分敬重毛泽东的胆略和学识，乃至诗词和书法。实事求是地说，父亲对毛泽东是由衷地敬仰的。

说到毛泽东对郭老的评价，也是世人皆知，凡读过毛泽东1944年11月21日致郭沫若函的人，都会相信毛泽东说的“武昌分手后，成天在工作堆里，没有读书钻研机会，故对于你的成就，觉得羡慕”是肺腑之言。至于毛泽东在信中对郭老的如下评价：“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也是至诚的。

诚如毛泽东对郭老有“不及柳宗元”，“十批不是好文章”的评价一样，郭老对毛泽东也不是盲目的崇拜。如前所说有关《东方红》与《国际歌》的问题。有关合二为一的争论、毛泽东思想对立统一的观点以及对批判爱因斯坦

的相对论的处理，都表明了这一点。即便是对毛主席的诗词和书法，他也是有分析的。

朝柱：是的。由于特定的政治的需要，郭老几乎没有——客观上也不允许他像当年重庆那样把这些思考尽遣笔端，告之世人。

汉英：谈一个有关毛泽东书法的小故事吧。

父亲是书法家，母亲则更是和书法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他们的潜移默化之下，久而久之，对书法的优劣，我们也略知一、二了。一次，同事们谈起毛主席的书法，大家要我评价一下贴在墙上的毛泽东的题辞——“向雷锋同志学习”。当时我把从父母亲那里体会来的判据：“跃然于纸上”告诉了同事们。于是大家你一言我一句地评论起来，结果发现题辞中有的字“跃”不起来，按照“判据”自然有败笔。不料，又有好事之徒打了小报告。

父亲知道了这件事，他说：主席的字才气横溢，但并不等于说，他的每一个字都是精品。我写字多年，也写过不少败笔。就说王羲之吧，他的书法也不都是件件同一水平嘛！用“跃然纸上”来作为判据，是对的。当你静观一幅书法的时候，如果看着看着感到字站了起来，活了起来，甚至离纸飞出，那一定是好字，否则，不是结构有问题就是有败笔。

父亲是很喜欢毛泽东的书法的。他办公室的墙上就挂着一幅主席《西江月·井冈山》的亲笔。我从父亲的这

番谈话中，再一次领略到他对主席书法的评价并非因人而异。

再回到《甲申三百年祭》。当时郭老对即将取得政权的共产党人——主要是毛泽东等领导人提出希望：要向李自成打天下的时候那样重用李岩这样的知识分子，为了谨防独断专行，遇有重大的决策，应当由一个有知识的智慧的班子集体讨论，共同裁夺，要“能纳人”，并采取他所憧憬的“民主式的合议制”。

然而 50 年代中期以来，他逐渐对一些作法产生怀疑。尤其当他看到文化界很多有学识而相知甚久的老朋友相继成为批判对象，而像林彪、“四人帮”这些政治小丑却扶摇直上，他内心的哀苦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他曾经公开地讲过，也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过：“我后悔当初没有把李岩和红娘子的故事写成戏。”郭老想写这幕历史剧的目的和当年写《屈原》、《甲申三百年祭》是一样的，即希望我们党的最高领导人能从中感悟到什么，这也是他遗憾的主要原因。

郭老坚信共产主义学说。但如何用共产主义学说指导建设新中国，他和其他的共产党人一样并不完全清楚。其实直到现在，什么是社会主义，不也在探索之中吗？记得世英就很尖锐地问道：三面红旗之下，竟有成百万人饿死，难道这是社会主义吗？当时父亲只能以沉默作答。作为史学家的郭老，他深知判断一个社会制度是否先进，说到底要看支撑整个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而判断经济基

础生命力的标志在于是否能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广阔的天地。用这些马克思主义的 ABC 来分析当时的中国社会，父亲的确难以正面回答世英所提出的尖锐问题。

的确，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深化，很多问题和矛盾暴露出来。不少共产党人——包括毛泽东同志的缺点，也因地位的改变而发展了。“文革”期间，他曾对我不止一次地感慨过：“很可惜，这是帝王思想，而且妒贤，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是呀，每句话都是“最高指示”，那里有郭老赞赏的“民主的合议制”的影子？

郭老对中国部分共产党人的思想倾向早有清醒的分析。他认为在中国，不少共产党员具有浓厚的农民意识，包括一些地位很高的领导人也如是。每当谈论到这些问题，我都不禁联想到《东方红》和《国际歌》主题的对立。其实，这是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必然面对的一个根本矛盾的反映。

朝柱：“文革”中郭老也是一位受害者，你能谈谈这方面的往事吗？

汉英：了解我们这个家受“四人帮”迫害的一些内情的朋友并不很多。我有两个弟弟民英和世英，先后受迫害死于“文革”初期，这对已经年逾古稀的父亲和体弱多病的母亲来说，是何等的痛苦啊！世英受迫害致死，有着强烈的政治背景。周总理曾经亲自安慰父母亲说：迫害世英，不仅针对你们，也是针对我的。

江青企图利用在国际上有声望的戏剧家郭沫若的影

1963 年夏，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举行首届毕业典礼。陈毅、聂荣臻副总理和郭沫若校长一起到会祝贺同学们即将奔赴工作岗位。



响,几次要郭老担任样板戏的顾问。父亲一直很不赞成大树八个样板戏的作法。他在庭院中散步的时候,经常不无幽默地说:

“现在不是百花齐放,而是八花齐放。何况是不是花还要看。”郭老十分清楚江青的用意。他断然拒绝了江青的这番“好意”。对此,江青恨之入骨。

江青不肯作罢。后来赶上珍宝岛事件,江青借口保护郭老的安全,请郭老搬进钓鱼台居住。理由冠冕堂皇:一是说国宾馆防空设施好;再是她可以随时听取郭老对样板戏的意见,并且把这两条理由通报给了有关的中央领导。

父亲完全清楚江青的用心,他以年老耳背为由再次婉拒迁住钓鱼台国宾馆。自然,充任样板戏顾问的事也就无从谈起了。江青无计可施,不得不给自己圆场。不久,“批林批孔批周公”的闹剧开始了。社会上传出“郭老从柳退”、“十批不是好文章”的“最高指示”。江青四出讲话,组织写作班子,批判《十批判书》,把暗箭射向周总理。“四人帮”迫害父亲的经过,母亲在悼念父亲的文章里作过叙述:

“还在1973年,江青就窜到北京大学,秘密组织班子,妄图公开批判郭老。1974年春,江青一伙又几次三番在大庭广众之中,当着周总理的面侮辱郭老,胡说郭老‘对待秦始皇、对待孔子那种态度,和林彪一样。’江青、张春桥甚至跑到家里来,当面逼迫他写文章,承认他在抗战期间为揭露蒋介石反共卖国独裁统治,冒着生命危险写下的剧作和论著,是王明路线的产物,是反对毛主席的;要他写文章,‘骂秦始皇的那个宰相。’

“江青一伙的狂妄无知、居心叵测,使郭老反感、愤怒到了极点。他当即驳斥张春桥:‘我当时是针对蒋介石的。’张春桥顿时无言以对。郭老蔑视这伙无耻之徒,他冷静地对我讲:‘历史自有公论’……”

当时我在家里,我亲眼看到了由于对国家,对人民,对党的前途深切的忧虑和无情的压力,使郭老的身体衰弱了。就在江青到家里来纠缠了整整三个小时的当天晚上,他的体温骤然升高,肺炎发作,病情一下子就到了十分危险的地步。

……

好了,我的学识和能力都很有限,只希望今天所谈的能对大家进一步的探讨有益。

时代造就了郭老,郭老也反映了这个时代。

朝柱:作为敬重郭老的人,我也有同感。我觉得不必把郭老的个人的功过看得那样重要。而应当把研究的重心放在这方面:一位借用《凤凰涅槃》,写出旧中国一定从死亡得到重生的诗人,一位运用辩证唯物论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学者,一位借爱国诗人屈原之口唱出《雷电颂》的戏剧大师,一位剖析了明末农民起义失败原因的思想家,为什么在晚年没有继续发挥他昔日的锐气。

我希望继续探讨这个大家关心的问题。

汉英:不过,这需要旺盛的自由讨论的风气。否则,正如郭老所说:“便看不到学术的进步。”

朝柱 1992年9月1日初稿于京城万寿寺。

汉英 9月16日改稿于南港,

10月22日再改于京城。

经济、政治、军事……诸多工作若排排队,文艺总应当排到后边去。前人说过,文艺搞多了要亡国的。是“警世通言”。但也不能没有文艺。前人又说过,连广义的文艺也没有要失败的。是“醒世恒言”。

这一位得不多不少,不前不后,不即不离,看起来也不大好伺候。难怪一个文艺与政治的问题,讨论了几十年还要讨论,车轱辘话说了多少?多少口水汗水滴答在磨道上。当领导的说话总不能只说一句,两句三句在所不免。好哩,左视盯着这一句,右视盯着那一句,三伏受用这一句,三九那一句受用。

那末怪不得领导,都是下边的偏头、歪嘴、斜眼了,哪能!常说左了右了的,那是路线大事,下边可没资格说三道四。好比把甲说作第一,把乙说成第二。闹下来就只有第一没有第二,只有甲没有乙,这是左了。那么倒过来,一闹下来也会只有第一没有第二,这回是只有乙没有甲,右了。再倒过来试,还得把第一闹成了唯一。怎么不考虑甲和乙,不是第一和第二的关系。文艺上的

借东风

●林斤澜

事儿“玄”一点,生产上实在。好比“安全”和“生产”,摆来摆去,工地上的标语只能“安全第一”或是“生产第一”,都不能标出谁是第二来。既标都不能标,这脑子为什么非得往第一第二上走?这排座次怎么就成了惯性思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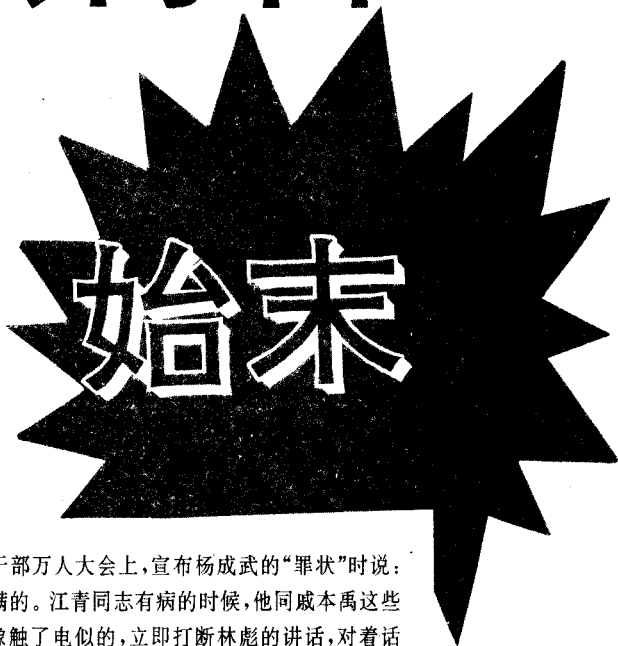
磨磨叨叨了几十年的问题有的是,怎么摆也摆不平。只有一样,“市场经济”没有摆弄过,过去也不叫摆弄。从文艺上说,“市场”还没摆起来,就撞起大包来了。

现在正好借此东风,吹拂“十方庄严跨世界”。其实文艺方面,要紧的不过投入“竞争”二字。为官为宦的,去竞争职位高低自便。写作的以文会友,为文争一个站脚地方,争一席之地,争一方水土。争出个文艺的兴旺局面来。

在“市场”上,文艺是“特殊商品”自不待言。此时翅膀也还没有长硬,过多担忧特殊这特殊那,好像就不担忧翅膀硬不起来,好像还不相信“竞争”是个“机制”,还没有认识市场有一般规律,也有特殊规律。

〔责任编辑:晓度〕

所谓整理 江青“黑材料”



1968年3月24日晚，林彪在人民大会堂驻京军队师以上干部万人大会上，宣布杨成武的“罪状”时说：“表面上他是拥护江青同志的，但是实际上，他是对江青同志不满的。江青同志有病的时候，他同戚本禹这些人就搞江青同志过去的……”林彪这句话才讲了一半，江青就像触了电似的，立即打断林彪的讲话，对着话筒大声说：“还要早呢，在去年春天就搞了！”

林彪顿时大吃一惊，思路被打乱，不知说什么好，于是顺着江青说的话，随意编造说：“噢，早在去年春天就搞江青同志的黑材料，实际上成立了专案，来迫害江青同志。”

林彪讲的所谓搞江青的“黑材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25年后的今天，历史仍然要恢复它本来的面目。

机密任务

“文化大革命”前，我在总参政治部组织部任副部长。那时，总参首长有一些临时任务，也常常交给我们去执行。

1967年4月12日深夜，忙碌了一整天，我正准备休息，床头柜上的电话铃突然响了。我拿起耳机，杨成武代总长办公室主任的声音传来：“陈虹同志吗？首长要你马上去京西宾馆东休息室开会。”

深夜的北京街道，沉静，车少人稀，我的专车一出复兴门大街便加速行驶，10多分钟就到了京西宾馆。

约半个小时，江青、叶群、戚本禹来了，杨成武随即也到了。江青进门时，手里拿着一个小纸条，她按照纸条上写着的名字，挨个地叫着：陈虹、王育民、王成恩、朱铁铮。叫到谁，谁就按军人的礼节回答“到”，并站起

●
陈虹



安排在巨鹿路空军招待所。

吃过早饭，我请翟处长先把何秀文找来。何秘书见到我给他的介绍信就说：“这信封是本禹同志亲自写的！”他看信时，我看到信的落款是陈伯达和江青的签名。何秀文看完信说：“这要把警备区的副政委李彬山请来，因为政法系统由他管。”何秘书和李副政委是很熟的，通个电话，李很快就来了。李彬山是位老红军，办事负责。听完我们介绍来上海的任务后，他说，上海市公安局的档案大部存在警备区的一个弹药仓库里，可立即陪我们去仓库与负责保管材料的同志联系。

一箱“通天”材料

弹药库远离市区，我们坐车走了1个多小时，来到一个四面有电网，警戒严密的军火库区。李彬山首先把我们向公安局负责管理的朱品涛作了介绍，然后我们说明了来意。朱品涛说：“这里存放有好几百箱材料，你们要的材料，需要逐个箱子查找。现在看守看管的就我一个人，其他的同志都不在。”然而他还是很负责地一个箱子一个箱子地打开，为我们查找所需要的材料。

第三天，我们正在查找材料的时候，老朱扶着一个箱子对我说，这是市局领导交我保管的材料，说是“通天”的，放在这里不安全，请你们带回北京去吧。我说，这件事现在决定不了，要请示领导。

16日中午，我到兴国路找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用他的保密机给杨成武打了电话，报告了上述情况。杨成武答复说，要报告江青，才能决定是否带回，并要我回北京前，再给他打一个电话。当晚，我又给杨成武打电话，报告任务已经完成，准备夜航返京。杨成武说：“关于那一箱‘通天’材料问题，下午已报告了周总理、江青同志，他们说，管它什么通天不通天的，把材料先拿回来再说。江青还特别交代，一个字也不能丢！”

17日早晨到北京后，材料原封未动地存在我们办公室，20日向江青写了请示如何处理的报告。

6月下旬，杨成武办公室的张忠庆秘书来电话说：“首长要你和王育民来一下。”

我和王育民按时来到翠微路五所南楼办公室。杨成武说：“找你们来谈一件事，那箱‘通天’材料，江青叫你们看一下，别人

来。当她点过名，确认该来的人都来了，就摆出一个领导的架势，威严地对我们说：“现在我宣布，由陈虹为组长，王育民任副组长，派你们去上海收集饶漱石、潘汉年、杨帆反革命集团的档案材料。”并说：“这个案子过去有人包庇，没有搞透。最近，我们中央文革收到一个名叫王徽民的写来的信，揭发有人通敌，给台湾发电报。这些电报底稿都在上海，种种迹象表明，底稿有被转移的危险。现在底稿放在什么地方，我们不知道，要靠你们去寻找。”

江青叫我们到上海找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帮助查找，并说已叫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派了一架专机。去上海取材料的介绍信，江青早已写好，由戚本禹拿着，并封上了口。戚本禹将信当面交给我们说：“你们拿上这个，上海会帮忙的。如果遇到王徽民就把他一起弄来。”这时江青又交给我一个便条，是张春桥写给他的秘书何秀文的。

任务布置完，江青对杨成武说：“杨代总长，具体的事，你负责抓一抓。”叶群马上插了一句：“从现在起，你们不要回家，也不要给家里打电话了。”我们说，出差连牙刷、牙膏，简单的洗漱用具都没有带。叶群命令似地说：“这些东西，你们到上海买新的吧！”说完，和江青起身走了。杨成武送她们到门口，回来又对我交代：“你们到上海后，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发现什么情况，随时用电话和我联系，不便时可以用保密机打。”

我们4人坐上汽车，直奔沙河机场。由空军三十四师著名女飞行员王云驾驶的伊尔14专机，已做好了起飞准备，我们一登机，飞机就起飞了，这时我看了下手表，已是13日凌晨两点。

飞机在空中经过3个半小时的飞行，安全降落在虹桥机场。前来接我们的是驻上海空军政治部组织处翟处长，他将我们

不得插手，不许扩散，看后提出一个报告。”

我们二人回到办公室，找了一间房子，关起门来，将箱子搬来，打开一看，原来是1954年一个人写的由上海寄往杭州交际处给江青的匿名信，经公安部立案，由上海市公安局负责侦察破案的材料。所谓一箱，并非像江青后来夸大说的“一大箱黑材料”，而是一个一尺四寸的小箱子，共计23个卷宗，有的卷宗比较厚，有的只有几页纸。这些卷宗，就其内容来说，大致可分为：

一、匿名信。信的原件有多少页不知道，因为没有存放在里边，但有信的第一页和信封两幅放大照片。从照片上看，信封左下印有“华东文委”字样，证明是华东文委机关的办公用品。信的第一页内容，主要是说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已经开过，要开始审查干部了，你江青的历史是堕落的，已写了材料送中央组织部等等，似有恐吓性质。至于如何堕落的，有什么事实，也许在其它页上，但第一页上没有写。

二、笔迹照片。为了破案，当时从文艺界、公安系统、党政部门收集了800多人的笔迹，其中包括一些知名人士和高级干部，经公安局技术部门逐个进行了鉴定。

三、侦情简报。案子自1954年发生立案侦查后，工作进展情况、发现的线索，均及时向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陈丕显和公安部长罗瑞卿及北京市公安局的负责同志报告。侦查工作中形成的文书材料有五六个卷宗。从侦情简报上看，案子从1954年至1962年，已侦查了8年，尚未有明确的结果。

四、侦查对象调查材料。对笔迹鉴定中发现与匿名信笔迹相似而又有作案条件的人，则列为侦查对象，进而重点侦查。这样的人有好几个，如江青过去的女佣人秦桂珍，她了解江青的历史，东海舰队司令陶勇的夫人朱岚，曾说过对江青不满的话。侦查时间最长，吃苦最多的，要数曾任上海市文化局长赖少奇的妻子曾菲同志。曾菲的笔迹经公安部门鉴定，认为与匿名信笔迹很相似。其次是侦破小组展开调查后，了解到曾菲对毛泽东的前妻贺子珍的生活处境，深表同情。那时贺子珍住在上海她哥哥处，曾菲有时去看望她，安慰她。特别对1952年毛泽东到上海后，没有与女儿李敏见面，曾也觉得不尽合适。而赖少奇又在上海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提了一个议案，建议对贺子珍的生活给予照顾等。侦破小组得知这些情况后，认定曾菲有作案的条件和思想基础。因而确定对她长期进行侦查，甚至把对敌侦查的那一套手段也用上了。后来赖少奇调安徽省委宣传部工作，曾菲也随之去合肥大学宣传部任职，但对她的侦查并没有放松，仍象在上海时一样，坚持进行着，由此而形成的曾菲的材料相当多，有五六个卷宗。

五、江青的卷宗。关于江青的卷宗仅有一个。侦破小组为了破案，曾搜集江青的必要的历史资料，卷宗上写着“若干历史材料”6个字。所谓历史材料，仅两种：一种是文字的，另一种是照片。文字共3篇。一篇是江青（即当年的蓝萍）30年代在上海写给她当时的丈夫唐纳的公开信。破案人员是从那时的报纸上抄下来的。一篇是江青到延安、进鲁迅艺术学院和毛泽东结婚，上海

一种小报发的一篇报道；还有篇是1945年毛泽东去重庆，江青带着孩子到重庆看病后的新闻报道及怀抱孩子的新闻图片。后两篇均为剪报。照片共两帧：一帧系江青在电影《王老五》里扮演王老五妻子的剧照，另一帧是结婚集体照，即唐纳、赵丹和顾而已三对，中间坐着主婚者——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沈钧儒。

江青变卦

我和王育民审阅了全部材料之后，对这个案子是否已破，详情搞不清楚。因为此事过去是公安系统管的，因此，我们写了一个建议由公安部组织专人负责处理的报告。

报告送上去，江青看后大为不满。她跑到林彪那里去闹，说保存这些材料就是整她。林彪听了对江青说，这事好办，让他们重新向中央写一个报告，将材料销毁。林彪的指示，随后传给杨成武去落实。

一个多星期后，杨成武找我和王育民到他的办公室，杨说：“报告送上去，江青看了。她说案子已破了，作案人林伯渠的妻子朱明也自杀身亡，材料保存没有必要了，要你们重新写一份建议中央指定专人集体销毁材料的报告。”说完还特意用征询的口气问道：“你们看怎样？”我们说：“既然案子已经破了，材料保存也没有用了，而且毛主席早就说过，党内不搞侦查，收集那么多党内同志的笔迹，传出去也不利团结，毁了也好。只是这个报告怎么写呢？”杨成武想了想说，报告的内容，就根据我传达江青的意见，你们作的记录，在文字上作些整理即可。

7月7日，林彪看过我和王育民写的报告后，批示：由谢富治、杨成武、汪东兴、关锋4人负责集体销毁。并将批件转给了周恩来。

周总理阅后，除了同意林彪的批示外，加批：连同北京图书馆保存的材料和吴、傅送来的一包材料一并销毁。毛主席看后，虽然没有在报告上面留下他的笔迹，但却说过：“烧它干什么，这是历史。”

报告和批示传下来后，正值谢富治去昆明调查云南省“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7月13日起，杨成武和汪东兴均随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8月关锋又被抓了起来。因此，销毁材料的事就被搁下来了。

9月23日，杨成武随毛主席由南方回到北京。谢富治告诉杨成武说：“江青几次大发脾气，说是杨成武整了她的黑材料，要放长线钓大鱼。”杨成武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将实情向周恩来总理报告并请示如何处理。周总理明确指示：由谢富治、杨成武、汪东兴三人监销。

王育民将材料送到中南海勤政殿汪东兴那里，先按目录对材料进行了核实，然后由谢富治动手点火，王育民负责向火里一卷卷扔。烧完后，3人都在报告上签了自己的名字。时间是1967年9月27日下午。

谁知，后来江青却无视事实反咬一口。

1967年9月5日，江青在安徽省来京代表会议上讲话时说：“有人过去整过我的材料，这一次才发现。”她说：“有一个专案组在上海，去拿材料时说，其中有一箱材料是我的。我说拿来嘛，拿来以后我也没有过问。”到1968年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江青这篇讲话时，她又说“你们看，一大箱黑材料，谁晓得是些什么东西”，绝口不提对这一箱所谓“通天”材料处理的前前后后，完全是根据她的指示办理的。

提审杨帆

1967年11月上旬的一天晚上，杨成武召集中央专案“二办”各专案组负责人在京西宾馆开会。散会时，交给我一个纸条，上写“江青叫你们去提审杨帆，搞清他1938年向中央发电报的事”。并说：“你们审后，把口供记录带回来给我看看”。当时，吴法宪也在场。杨帆1938年向中央发电报的事，是怎么回事？要弄清什么问题？我向杨成武提问，他说不知道，是江青给的任务。

接受任务后，第二天我和王育民、王成恩去秦城监狱，提审杨帆。由我和王育民问话，王成恩负责记录。

警卫战士将杨帆带进审讯室，审问开始。我说：“杨帆，你把向中央发电报的事交代一下。”

杨帆曾长期做情报联络工作，是上海解放后的第一任公安局局长，对审讯这一套，内行而有丰富的经验，思想敏锐，回答问题很注意分寸。他定了定神，回答说：“我根本没有向中央发过电报，也根本没有条件自己发电报。不知你们问的是哪一年的事。”

“不管哪一年，凡是发电报的事，你都可以交代。”王育民故意把问话的范围拉得大些。

“如果你们问的是1938年的事，那么我1954年被关起来后，公安部长罗瑞卿就来问过我了。”于是，我们要求他把1938年向中央发报的事交代清楚。杨帆说：“1938年我在皖南新四军军部文化队任指导员。有一天在路上遇到东南局书记、新四军政治委员项英。他跳下马来，问我有关江青在上海的历史情况。来皖南前我在上海电影评论协会任书记，江青的前夫唐纳在影协办的一个杂志任编辑，写些电影评论方面的文章。那时，江青叫蓝萍，在影协下边一个‘无名剧社’当演员，曾经被捕过，脱过党。我把知道的情况，如实地向项英作了回答。如果有电报的话，那一定是项英用我的名字发的。因我本人根本不具备直接向中央发电报的条件。”聪明的杨帆还承认他讲的那些话，是提供了攻击“中央负责同志”的“炮弹”。他没敢提江青的名字。

我们按杨帆的讲述作了记录，抄清后经杨帆看过，他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并加盖了指印。

大祸临头

江青看到杨帆的文字交代，很是得意。1968年1月19日晚上，在怀仁堂休息室听我们汇报时，她说：“你们送来杨帆的口供

记录，我看后很高兴，几十年没有解决的问题解决了。他过去向中央发过两次电报，都是署名殷扬（杨帆在上海时的笔名），反对我同毛主席结婚。你们再去提审。”

事后我们没有再去审杨帆。因为审来审去都是一样的内容，而且杨帆已经交代清楚了。

4月12日我离开专案组回到原来的工作单位。

1968年6月中旬的一天晚上，“二办”专案组给我打电话，说军委办事组副组长吴法宪通知我立即去京西宾馆。离开“二办”已两个多月了，走时移交手续办的清清楚楚，突然要我去干什么呢？一路上，我心里十分不安。

走进宾馆六楼会议室，邱会作、王育民和接替我在“二办”工作的北京军区炮兵师政委齐路安，已在那里坐着。大家谁也不说话，好像互不认识，气氛显得相当紧张。时间不长，吴法宪从另一个会议室走进来，坐下就是一通乱批：你们提审杨帆压根儿就不应该作文字记录。又指着我说：“现在你们把这个口供整理成材料，一旦被人看了，扩散出去，后果你要负责！”随后宣布立即烧毁这些材料。我们默默地看着邱会作点着火，将杨帆这份口供记录烧为灰烬。

专案组的所有材料，都有编号、登记，如今缺少一份，以后移交不好交代，因此我们留下了一个字据：饶案××号口供记录，经军委办事组决定销毁。监销人邱会作，执行人王育民、刘路安，见证人陈虹。年月日。我们依次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这份简单的字据，吴法宪是代表军委办事组来宣布决定的，不属于监督者，因此没有在上面签字。回家的路上我在心中暗想，事情是你们叫办的，为什么都成了我的错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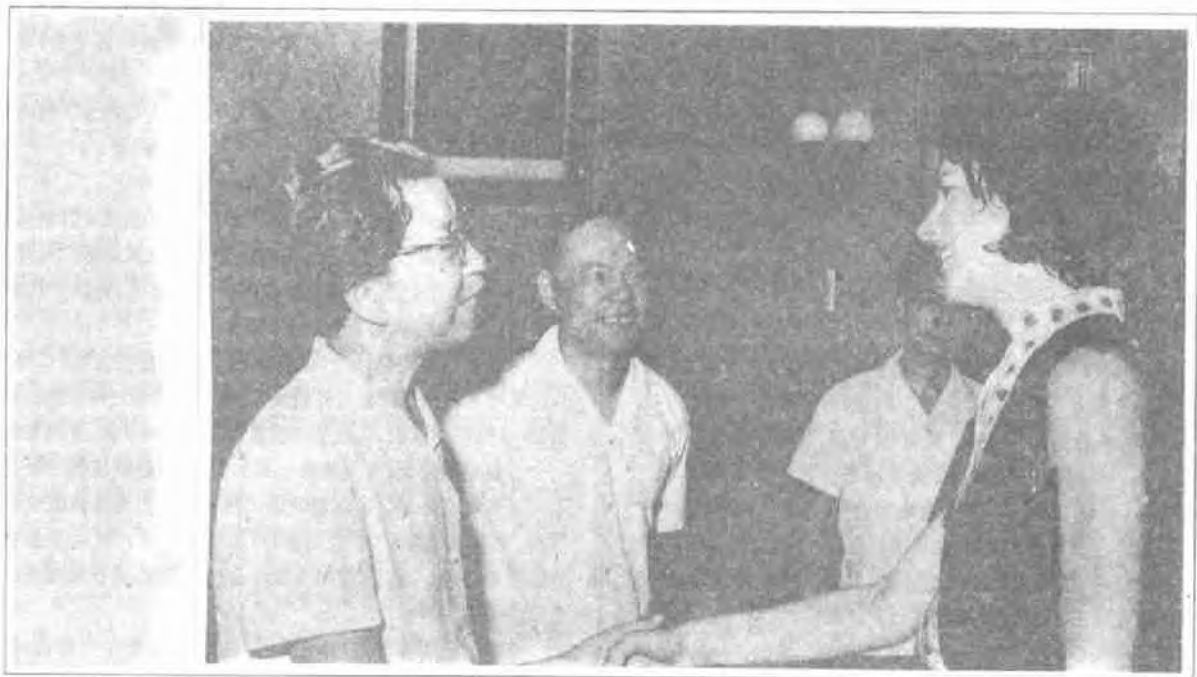
搞“通天”材料，审杨帆，这两件事都是江青要我们去办的。“杨、余、傅事件”发生时，江青却反咬一口首先发难，并且大做文章，在驻京军队师以上干部万人大会上，说我们搞了她的黑材料，立了她的“黑专案”，摆出一副决战到底的架势，让我们有口难辩。

1968年初，江青亲自出马，编造谎言，对我们进行诬陷。那时，潘汉年在狱中写了一份“认罪书”，我们报给江青，她看后签了字。2月潘汉年又写了“认罪书”之二。江青看后，在这份“认罪书”的标题旁写上：“为什么不将认罪书之一送给我看？”并多次叫嚷说饶案是她亲自抓的，但是现在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给我们扣上了对她“封锁”的罪名。

1968年4月20日，在中央专案“二办”全体人员大会上，江青又当众点我的名，并大声问：“陈虹来了没有？”下面有人说，他已经回原单位了。江青听后仍不罢休地说：“回去了也跑不了，我已叫人对他进行审查了！”不久，我被扣上“不是好人”的罪名，并冠以“对无产阶级司令部进行罪恶活动”的罪名被逮捕入狱一关就是6年零5个月。

害人终害己

“九·一三”事件之后，江青借机制造谣言，说黄永胜包庇了



“坏人”陈虹，并将这莫须有的罪名，编成材料，在总参散发供大家批判。然而，明眼人一看就清楚：批准抓我的，就是军委办事组的正副组长黄永胜和吴法宪，哪有这样的包庇呢！

江青在整我的过程中，同时整杨成武。1970年1月24日，她对负责审查杨成武的专案人员说：“我同杨成武斗了几次，杨成武与戚本禹勾结起来搞黑材料。杨成武假借搞饶漱石的专案，立了我的专案”。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江青不好再攻击杨成武“反对林副主席”了，腔调一变，又诬陷杨成武“整中央首长的黑材料”。1972年1月2日，中央碰头会议的成员，在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堂集体接见中央专案一、二、三办全体人员时，江青利用这一时机，当着周总理的面说：“二办饶漱石这个专案是我负责的，而杨成武却对我封锁，还给我立了一个专案。让陈虹、王育民、朱铁铮三个人整我的材料。能有什么材料？只不过是我去过去的一封信。杨成武这么干，我才下决心找我的这封公开信，还是春桥同志帮我找到的。这封公开信，很说明我的问题：第一，我是坚决抗日的；第二，我是抵制国民党特务的……他们还提审杨帆搞黑调查。”江青的表演真是令人作呕。

周总理听江青这么说，很生气，当即严厉地问道：“王育民来了没有？是怎么回事？”王育民站起来据实回答说：“审杨帆是在杨成武管‘二办’那个时期，是吴法宪参加布置的。”江青又问王育民：“杨成武是怎么布置你们整我黑材料的？”王育民在周总理面前，只能如实地将杨成武传达江青的指示，审问杨帆1938年向中央发电报的具体情况做了汇报。江青一听王育民揭她的底，立即矢口否认。以后，她狠整了一下王育民，撤销了他“二办”总支委员、支部书记和专案组副组长的职务，令他交代问题，回空

军劳动改造。还指示空军长期不给他分配工作，最后硬是让他转业。直到“四人帮”垮台后，王育民的冤案才得以平反，重新获得了工作的权利。

1974年，国内政治形势已发生很大变化，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已开过，领导班子重新作了调整，不少被审查的老同志都得到了解脱。这时，毛泽东对林彪过去所揭发的那些人的问题，已有新的看法。毛主席多次口头指示和文字批示：杨、余、傅案的性质应重新考虑，并说他“可能偏听偏信了”，明确表示“搞错了，要翻案，要平反”。

但江青对杨成武的问题仍然揪住不放。1974年2月7日，中央讨论专案组整理的《杨成武问题的报告》时，江青说：“报告的第2页对我个人意见不计较，但整中央首长的黑材料，写报告欺骗中央，不写不妥。”这实际上是借故将杨成武的事继续拖着。幸亏周恩来总理主持公道，说：“我认为杨成武同志没有历史问题，文化大革命中有路线错误，他自己可以写出材料。”不久，专案组将整理的杨成武的材料上报政治局讨论，决定予以平反。这样，江青的诡计终于没有得到实行，杨成武也于1974年5月23日恢复了自由。

历史是无情的，尽管江青他们能得逞于一时，但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四人帮”终于被人民推翻，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





毛泽东的“老朋友”，原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纪登奎下野以后

一个偶然的机遇

1988年1月12日晚。正是小寒接大寒，三九四九冰上走的季节。虽无积雪，寒风刺骨。

晚饭后，我写作太累了；独自出门散步，不觉走到灯市东口的一家私人小商店。我买了一袋胡大瓜籽，取货交款间，从店主人那里听到了亲切而又熟悉的乡音。我禁不住问这一对老夫妇：

“你们是山西人吗？”

“正是。”老两口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回答，同时脸上绽开了笑容。

“哪里的？”

“文水县。”

“咱们是近老乡，我是榆社人，还是一个地区呢。”

老乡遇老乡，聊起来挺热火。

闲话之中，这位六十余岁的老头突然冒出了一句：“北京咱们山西老乡不少，旁边这胡同内还有位呢。”

“哪里人，叫什么？”我急忙问。

“纪登奎，晋东南人。”

“什么？纪登奎？”

“没错，就是那个曾当过国务院副总理的纪登奎，有时他还常来这小店聊聊呢。”

“请你带我去找他，现在就去，好吗？”出于记者的敏感，我迫不及待地向这位刚结识的老乡请求。

他很痛快地答应了。我们一前一后出门，朝北走了没多远，拐进了东边一个胡同，走了几十米，便到了北京常见的那种可供小汽车出入，高级干部住的四合院大门前。我谢过这位老乡，敲响了那个灰色的大铁门。

半天没有人开门。看来，真不比当年了。

我看无人答应，下意识地推了一下大铁门上供单人出入的小门，太巧了，里面没插着，我便大大方方地推开门，闯进院子里。院子很大，但空无一人，我从东边找到西边，才在亮灯的锅炉房里，喊出一位手执煤铲的工人。他在前院大房子的后窗户上敲了敲，通报：“来客人啦！”只听里面有一位女同志应了一声，工人师傅便把我领到前后院的接门处。这时，正好出来一位年轻女子开门，把我领了进去。

我边走边想：这位曾在党和国家最高领导层工作了多年，被毛泽东称之为“老朋友”的人，我曾多次在电视屏幕上、电影银幕及报刊上看到的人，现在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当时，谁也没有料到，半年之后，纪登奎因心脏病突发，猝然去世，我就成了他下野之后去世之前采访过他的唯一的记者。

第一印象：普通而又热情的人

推开客厅大门，宽敞的房间里，彩电的映照下，一个十分熟悉的面孔出现在我面前。这就是久已闻名的纪登奎。

一个看上去十分普通的人，比电影银幕上的形象瘦小的多。头发依旧向后背着，只是更白更少了。眼镜依旧戴着。下身穿一条很肥的裤子，上身毛衣上套一件棉背心。他正抱着一个漂亮的小娃娃（看来是他的第三代）看电视呢。

见我进来，他急忙站起来，把孩子交给接我的那位年轻女子，就过来招呼我。他把我让进了客厅东面他办公的房间，让我坐在沙发上，嫌屋顶上吊的日光灯亮度不够，又伸手打开了办公桌上的台灯。

我自我介绍说：“纪老（我寻思半天，觉得这个称呼最合适），我是山西榆社人，跟你老家武乡县仅隔几公里，我们是近老乡。我来看看你，没有别的事。”

他拍着我的肩示意让我坐下说话，一边很热情地说：“谢谢！谢谢！”

我刚刚落坐，他又出去了。不一会儿，他跟接我的那位女子一起进来，将一盘切好的广柑放到了我面前。他则坐在了我对面的沙发上。一边用手朝我比划，一边说：“请吃点水果，还有塑料袋里的，那个好吃（是一种黑色的枣，好象是蜜枣）”。

我被这热情的接待感动了，对他笑着直点头，连声说：“谢谢，谢谢。”

“你还是我们的老政委呢。”我实际上是在做进一步的自我介绍。

“你当过兵？是北京军区的？”纪老热情地问。

“我是××师的，属北京军区装甲兵。”

“那好。现在转业了吗？”纪老看着我一身便装，又问。

“我68年入伍，86年转业，现在中国妇女报当记者，报社离你们家很近。”

“很好，当记者很好。”说着，纪老将我的单位、姓名、电话随手写在了台历上。我们开始了一次虽是初次见面，但相互间十分信任的谈话。

我是一个悲剧人物

说实话，我之所以要立即来看望纪登奎，确是出于我的职业敏感。我觉得他确实值得好好写一写。但是，当天

晚上并没有采访的打算，只是想看望、认识一下他，为今后交往开个好头。我觉得一切来日方长。

纪老是下野之人，我觉得应当安慰他一下。于是便对他讲：“过去的事情就让他过去吧。因为我们党犯了错误，何况一个人呢。不能用现在的眼光去看待过去的事。应当历史地认识问题。斯大林说过，一切以时间、条件、地点为转移。”

听了我一席话，纪登奎突然站起来，两手抱在腰间（就象列宁的一个习惯动作），兴冲冲走到我面前，激动地对我说：“小伙子，你来看我，我很高兴。但我不需要安慰。我不能原谅自己，完全不能。你们说，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那样做可以原谅，在你们看来，也许是对的。但我必须对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在同样的条件下，有些人就没有象我这样做呢？这个问题又该怎样解释呢？”

完全没有料到，我的安慰会使他这么激动。我一时无言以对。

纪老还没有坐下。他接着说：“当时，在我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跟毛泽东走，另一条是不听他的，只有这两条路，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可我选择了第一条，因为我太相信他了。跟他走难道还会有错？从来不敢这样想。也就是说，太迷信了。但有人就不这样。”

“谁呢？”我问。

“陈云，还有邓小平。”

“邓小平当时不听他的？”

“基本上不听，可以这么说。所以毛泽东要把他打倒。请出来一次，不听，打倒。再请出来一次，还不听，又打倒，几起几落啊！”

纪登奎说着，在地下转了一个圈，又回到了原来的沙发上坐下。接着说：“所以，我是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核心内，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悲剧人物。历史就是这样结论的。历史是最无情的，对任何人都是公正的。”

据跟随纪登奎到过全国各地搞过调查的几个同志介绍，纪老是经常在公开的场合解剖自己，做自我批评的。1987年4、5月间，纪老带几个人到广西玉林地区搞调查时，就对地区的领导谈起过农业学大寨问题。他说，大寨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是对的，搞劳动积累也是对的。但一窝蜂，大锅饭是错的。全国照搬，不顾自身条件也是错的。我当时在中央主管农业，是有责任的。同行的同志讲，因为他们下去是专门调查农业问题，所以，几乎每到一地，都谈这一段。

平安“降落”之后……

纪登奎同志到中央工作时，才45岁。那时，周恩来总理幽默地称他为“壮丁”。有许多事都交给他这个年富力强的“壮丁”干。他“九大”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十大”、“十一大”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中央这边，他分管过组织部、统战部。他还任国务院副总理，在政府这边，他分管过农业、林业、公安等。他还兼任北京军区第一政委。

他的工作十分繁忙。他离开中央之后，他的家人称之为平安“降落”。由原来的忙天忙地，到一下子无事可做，要完全适应，确实有个过程。下野之后，主要是这么几项“工作”。读书看报，吃饭睡觉，同孙子外孙打打闹闹，外加看电视，会朋友。生活上，他没有别的爱好，只知道工作，不爱玩，也不会玩。开始时，家人怕他闷，给他支起了乒乓球台，准备了羽毛球和拍子，他都不爱玩。后来，又给他买过一条跳绳，有时，他还真跳几下。看书、看报太累了，他就在院里散散步。院子脏了，他主动操起扫帚打扫一下。也经常帮家人收拾屋子。有时还自己动手烧锅炉洗澡，他说：“愿意学习一下”。

纪登奎曾对我讲，他每天常看的报纸有《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北京日报》、《文汇报》等。过去还爱看《解放军报》，说那上面有不少内部消息。因为原来他在军队兼职。这也是工作需要。后来，《解放军报》公开向国内外发行了，他说就没意思了，从此也不订了。

纪老还说，他家里有三份《红旗》杂志（现在改名叫《求是》），有送的，也有党组织用党费给订的，但他不爱看。

他最爱看的是《参考资料》（即“大参考”），每天必看。他还说，毛泽东主要看这个东西，通过这个窗口，了解世界大事。他也是如此。

“你看我们《中国妇女报》吗？”我问。

“没看过。”纪老如实回答。

“看不起我们报纸吧？”我同他半开玩笑地说。

“不是，主要是报纸太多，看不过来。”他立即解释。

“我们报是读者公认的首都大报中办得较好的几家之一。”我向他介绍道。

“都有哪几家？”

“《经济日报》、《中国青年报》，再就是我们《中国妇女报》了。”

“是吗？那以后我得看看。”纪老来了兴趣。

“我以后给你送点来。”

“谢谢你了。”

后来，我曾多次给纪老送去本报，请他阅读。我很想听听他对我们报纸的看法，可因为他忙，我也忙，一直没坐下来再详细聊聊。总觉得以后有的是机会。谁知，这竟成了永远也无法弥补的缺憾。

毛泽东为什么称纪登奎为“老朋友”

纪登奎一生最荣幸的是曾被毛泽东称为“老朋友”。毛泽东这样称呼一位他的下级，可以说绝无仅有。

毛泽东生于1893年，而纪登奎生于1923年。当毛泽东在上海参加缔造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纪登奎还没有来到人间。从年龄上比，毛泽东大纪登奎整整30岁，做他的父亲也绰绰有余。从职务和地位上讲，也极为悬殊，毛泽东身兼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而纪登奎同毛泽东认识时才是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

“老朋友”这样亲昵幽默的称呼从何而来？

“纪老，毛泽东为什么称你为老朋友？”我终于有机会端出了这个我最感兴趣的问题。

“说起来话长。”纪老缓缓地讲起了他与毛泽东交往的经历。

“那还是在50年代，那时我不到30岁，在河南许昌当地委书记。毛泽东主席到河南视察，同我谈过一次话。以后他每到河南，都要把我叫到专列上谈话。

“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前夕，毛主席指定让我在会上发言。并让与会者讨论，还指示让中宣部转发了我的经验——《许昌地区的宣传工作》。

“后来，他又让我去搞搞工厂。说搞搞工厂有好处。派我组建洛阳矿山机械厂，并让我到苏联去学习。在建厂过程中，他又一次来河南时，问我有什么困难，我说，缺少文化技术知识，对办工业也缺乏经验。他问我知道列宁十月革命后，关于党为何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段很有名的论述。我说了。他又问，记不记得我在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的一段话，我把关于我们要向一切内行的人们学习经济工作的话复述了一遍，他高兴地点点头。然后指示我在一段时间内，集中学点文化知识，同时还说，回北京后，建议中宣部发这样一个通知，让全党干部都补习文化。他回北京不久，这个通知就发下来了。我则从工厂请了个大学生，给我上课，学初、高中的课程，还有机械制图以及工厂有关的技术知识。那段时间，我可学了不少东西，对后来工作帮助很大。可惜大跃进开始了，中断了学习，要不，大学课程里的微积分都要学的。

“后来，我被调到了河南省委工作，这也是他老人家亲自安排的。

“‘文革’开始不久，我被造反派关了起来，完全没有自由。经常挨批斗。1967年，毛泽东主席巡视路过河南，跟当时的省军区负责人提出，要见我。说我那个老朋友哪里去了。省军区领导人匆匆赶来告诉我，说毛主席要找你谈话。我连忙收拾了一下，第二天，去见毛泽东。他一见我就说：纪登奎，老朋友了。问我挨了多少次斗，坐喷气式什么滋味？我说，挨斗不少，有几百次，坐喷气式没有什么了不起，就跟割麦子差不多，还可以锻炼身体呢。毛主席听了，哈哈大笑，他老人家也亲自学坐喷气式的样子，低头、弯腰、并把两手朝后高高举起，逗得大家哄堂大笑。毛主席走后，我被解放了。而他老人家巡视每到一地，都给有关负责同志讲我如何挨斗，坐喷气式，说跟割麦子差不多，夸我能正确对待群众运动。后来，周恩来总理也这样讲。这样一宣传，我的作用就不那么好了。老干部们在‘文革’中吃了不少苦，都有怨气，都让向我学习，他们吃苦更多了。

“后来，我被调到中央工作。包括‘九大’选我当中央委员、九届一中全会全选我当政治局候补委员，这都是毛泽东亲自提议的。所以，他老人家犯错误，我也跟着犯。”

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相比，纪登奎这个“三八”式干部资历不算老，但他同毛泽东的交往确实时间不短，

且真有交情。毛泽东亲切地称他为“老朋友”也就不难理解了。

关于“九评”

谈话自然而然地转到了毛泽东的才学上。纪老佩服地说：“毛泽东多才多艺，学识渊博，古今少有。请他审阅的文件，有时改得面目全非。有一次中央的一位同志给毛主席送去一个报告，等拿回来时，原文已看不到多少了。所以后来这位同志在毛主席去世后公开发表文章批评毛时，大家都不服气。你有什么，还不是被人家改得面目全非。”

“‘九评’是毛的得意之作”。

“‘九评’是主席亲自搞的？不是康生主持起草的吗？”我惊奇地问。

“康生组织一个写作班子，起草初稿，然后经邓小平等阅后呈送毛泽东。毛在上面逐字逐句地修改。毛生前对‘九评’是十分满意的。”

纪老接着说：“很可惜，‘九评’文字虽好，但经不住历史检验。现在九篇文章中，除了批评斯大林个人迷信部分等外，其他大部分都站不住了。如《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当时说不是，而后来我们先自己否定了自己，承认了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有批评苏联搞物质刺激、奖金挂帅等，我们现在比人家不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吗？”

“尽管我们现在还没有公开批评‘九评’，但这些东西终究会被公开否定的。”

“就是不公开否定，历史不是已经替我们做了结论吗？”我斗胆插了一句。

“是的，历史会对所有的事做出公正结论。”

纪老点了点头说。

毛泽东与基辛格

“你看过《基辛格回忆录》吗？”纪老问我。

“没有。”我如实回答。

“那里面写了基辛格与毛泽东多次见面的情况。毛主席批评基辛格批评得厉害，一见面就批。”

“基辛格可是公认的西方有远见的政治家呀！”

“但是，毛泽东还是批评他。”

“有一次，毛泽东一握住基辛格的手，就说：‘你还是黑格尔的学生呢，你根本不懂辩证法。你们放弃了一亿多人口的阿拉伯国家，只抓几千万人口的以色列，这不叫两点论，这叫一点论。’”

基辛格说，阿拉伯国家，特别是埃及，是国际上公认的苏联的势力范围，他不会放弃。我们无法挤进去。毛泽东说，你试试看嘛。结果，那次基辛格离开中国后即取道日本，回去后没几天，埃及的萨达特一夜之间，就将苏联的专家顾问驱逐出境。



“基辛格又一次来华访问，会见毛泽东时，一见面，老远就拱手说，你是我的真正的导师。我现在桌上没有黑格尔的书了，全部是你的书，军事著作、哲学著作都看。毛泽东笑了。”

看来，毛泽东真比基辛格、尼克松在某些方面高出一筹。我心里想。

“九·一三”事件中的毛泽东

“最近我看了一本书，《叶群野史》，香港出的，里面详细地谈了‘九·一三’事件。”我说。

“关于‘九·一三’事件，国内出的书刊也报道过不少，有一套书《历史在这里沉思》里面叙述的‘九·一三’事件基本上是真的。我看过。”纪老说。

“林彪的飞机真的不是打下来的吗？”

我向这位迄今不多在世上层人士提出多年不甚明白的重大问题。

“不是，这我知道。当林彪的飞机出境后，周恩来总理请示毛泽东，怎么办，打不打？还在射程之内。毛泽东说：不能打，天要下雨，娘要改嫁，由他去吧。打下来，怎么向全国人民交待？军内的人趁机作乱怎么办？就这样，眼看飞机出去了。毛泽东当时就坐在沙发上，头向后躺在靠背上。”纪老边说边在沙发上比划了一下。

“他眼睛闭着，说：有什么消息，速报告我。意思是等苏联方面发表什么声明。毛泽东处理这些问题是得心应手的，他随时都会作出最权威、最有力、最准确的回答。

“谁知，后来我们接到的是我国驻蒙古大使馆的报告。说我国有一架军用飞机侵犯了蒙古领空，在温都尔汗坠毁。人家向我们提出强烈抗议。

“当时，我们通知驻蒙大使馆，不要否认，到现场看看。大使到现场后，将失事飞机的机号、失事现场情况报告了中央，后来，又将尸体的照片也送来了。这一切可以断定：这就是林彪乘的那架256号三叉戟外逃飞机。毛泽东当时高兴地说，这是最理想的结果了。”

“那么，这飞机到底是怎么掉下来的呢？”我又问。

“分析过多种可能，但都是可能，准确的原因，谁也说不清了。”

“国内关于‘九·一三’事件的报道，关于上层的细节情况少，因为毛泽东、周恩来去世了。我是亲自参加处理这件事的最高层的领导人，有些人来找我采访，我没给他们谈。”

我点了点头。

纪老接着又给我讲起了“九·一三”事件的另外一些情况。

“那架直升飞机，是毛泽东亲自命令截回来的。那上面，有林彪反党集团的全部罪证。包括林彪搞政变的手令，大小舰队名单，还有其他一些材料，其中还有一个‘发射名单’。这对处理林彪反党集团事件提供了极大方便。

“这些罪证拿来后，送给毛泽东看，他指着舰队名单和发射名单问：‘究竟哪个是？’经过研究，才确定舰队名单是他们的骨干分子。而‘发射名单’上写着不少科学家的名字。这是林立果在空军做过一个报告，无法究称他‘发射了一颗卫星’，而‘发射名单’是指发林立果讲用报告材料的人。后经毛泽东亲自决定，将舰队名单上的93人全部抓起来。这个任务是我接受的，之后即派人执行，没几天，93人全部抓到，无一漏网。我体会到，我们的军队真好，真听话，没有一点乱子，没有人闹事。”

毛泽东的功劳和错误

谈到对毛泽东同志的总体评价，纪老说：

“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一位非常伟大的人物。他的主要功劳是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创造了一个真正独立统一的新中国。

“毛泽东同志博学多才，魄力过人，没有几个人能比得上。从遵义会议到1957年反右前，这二十多年是他老人家的辉煌时期。在这段时间内，他带领我们，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在维护祖国的独立和主权问题上，他是不含糊的。50年代末，赫鲁晓夫来中国，提出同我们共同搞长波电台、联合舰队。毛泽东一听就火了，拍了桌子对赫鲁晓夫说：‘你把整个中国都拿去算了’。跟赫鲁晓夫翻了脸。后来，才有苏联撤走专家以及中苏大论战。

“毛泽东有错误。他在国际问题上的错误主要是一边倒。即只要反对苏联的，同意我们观点的都是朋友。”

“毛泽东是否有同苏联领导人争国际共运领袖的意思呢？”我提出了在心中考虑多年的问题。

“这个后来有，但开始没有，开始主要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

“毛泽东不搞对外开放，是不是同他没有到国际上到处走走有关呢？”我又问。

“这当然，他是一把手，要是能出去多访问一些国家，长长见识就好了。”

我又接着说：“毛主席只去过苏联，要是能到欧洲、北美的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去看看就好了。别的去不了，到法国去还是可以的。1964年中法就建交了，毛泽东同当时法国总统戴高乐关系不错。世界变了，资本主义国家战后经济突飞猛进地发展。而我们还关起门来，总觉得中国是天下第一。”

纪老也说：“是这样的，我们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搞点对外开放就好了。”

“毛泽东在国内问题上的错误是一个又一个地搞政治运动，特别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历次政治运动，伤害了不少人。毛泽东文章写得不错，话也说得对，但他自己也往往出尔反尔，违背自己的思想，到了晚年，就几乎谁也不相信了。我们见他也不那么容易，让毛远新当联络员。另外，见他时，说话也不随便，生怕那句话错了，跟五六十年代见他不一样了，党内生活不正常，这是党的悲剧，也是他个人的悲剧！”

毛泽东晚年的一些事

纪老介绍了毛泽东晚年的一些情况。

他说：“毛泽东同志逝世前，身体已不行了。起不来床。也有点糊涂了。”

“逝世前四个月不是还接见外宾吗？”我问。

“这个情况你们知道，他接见的外宾都是友好国家的，人家出去也不说。外宾到来时，先要把技术最高的摄影师找来，做好一切准备。外宾到了之后，由人把他老人家搀扶起来，托着他的手，同外宾的手一握，由摄影师把这一瞬间摄了下来。实际上也谈不了什么东西了。”

周恩来是人民的好总理

“请纪老谈谈周总理的情况。”

听到我这个请求，纪老顿时变得感情丰富。他说：“我和周恩来朝夕相处共事，整整七年啊。他是一位十分无私伟大的人物。他对中国革命真可以说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周总理对毛主席可真是百分之百。听说，毛主席走的路他都要亲自先走一遍，检查有无不安全的因素；毛主席点的眼药，他也要先试一试，看有无不舒服的感觉？”我插话问。

“是的，确实是这样。”纪老边说边点头。

“周总理对毛主席忠诚太过了，有时顾一个人而不顾人民，这有点愚忠。”我说。

“不要叫愚忠，还是叫忠诚吧。”纪老纠正我。

“毛主席也真是对不住周总理。总理对他那么好，逝世时，他连句话都没说更不用说参加追悼会呢，”我有点忿忿不平。

“毛主席那时身体真不行了，自己也顾不了自己了。”

纪登奎

这些情况，老百姓不知道。”

“不，他5月份还接见外宾呢。总理是1月8日去世，身体不行，参加不了追悼会，写首诗或词，或者说几句话表示对半个多世纪的老战友的悼念之情总可以吧。很可惜，没有。”我越说越激动。

“毛泽东在周恩来有病期间，送给过他一个沙发。”

“这我们在历史博物馆里看到了。”我说。

“周总理可真是人民的好总理，是我们做人的楷模呀！”纪老长长叹了口气说。

“在杜润生手下干了”

在我拜访纪登奎时，发现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大摞文件，使这个摆着书柜的屋子更加协调。这一切告诉我，他又忙起来了。我曾问他：“纪老，你现在干什么工作？”

“我现在是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研究员。”纪老爽快地回答。

“是杜润生那里（杜也是山西人）？”

“对，我现在在杜润生手下干了。”他笑了笑，略带点幽默地说。

后来我才弄清，所谓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也称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纪登奎是1983年正式担任这个研究中心的顾问和部级研究员的。他在这里干得很认真，逢找必到，经常来参加会议，同大家交谈，工作热情很高。农研中心的同志们说，老纪没架子，健谈，好接近，同大家相处的很融洽。有什么说什么，心直口快，有时讲到激动处，能拍着桌子站起来。他读书很多，思想开阔，能接受新东西，他常常把青年同志的思想转带到老同志中间。他们还称赞他，有实际工作经验，有水平，处理问题干脆利落，工作作风也特别深入。

除此外，纪老也愿意承担一下社会工作，如帮有关部门，有关同志看报告，看文件，提出自己的意见。我们恳谈时，他就从大信封袋内抽出一份科研材料指给我看。他说：“这是一个科学工作者送来的，让我提意见。”我看了他写的意见，满满一页纸，后面署名：老纪。他说：“这也是我工作的组成部分。”

走遍全国搞调研

纪老到国务院农研中心确实是去踏踏实实地工作

下野以后

的，不是只挂个名。他亲口对我说：“过去在中央时，因为工作多，脱不开身，下去的不多。这几年有机会了，我走遍了除西藏以外的所有省、市、自治区，富的地方去，穷的地方也去，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地搞调查研究，收获真不小。”

我后来到来农研中心采访时，跟纪登奎一块儿下去过的同志也介绍了他不少情况。1987年4—5月，农研中心集中调查粮食问题。当时粮食产量徘徊不前，情况不明。调查回来后，准备起草个文件。全中心分了几个组分头出动。纪登奎带了一个组，一行四人到了广西、贵州两省。这次他没有带秘书，是参加小组调查。去时乘火车软卧包厢，回来乘民航飞机。调查时乘一辆面包车，日夜兼程，没有个8小时上下班的问题，也不问是星期天、节假日。日程安排得很满，随行的几个年轻人都有点受不了，可纪老却精力充沛，毫无倦怠。

调查研究搞得很细，纪老亲自问，亲自记，边调查边形成了20多个问题。如：生态平衡问题，变好了？还是变坏了？农田基本建设如何？水土流失怎样？农家肥有机肥用了多少？粮食单产是提高还是下降了？人口问题，娃娃是生多了还是减少了？农民生活是好了还是差了？粮食

和多种经营的关系怎样处理才好等等。每到一地，逐个问题都要问遍、问透。有时，还给地方的同志提建议，出主意。广西玉林地区产香蕉，粮蕉争地矛盾突出。当地领导原来的指导思想是粮食不能种少了，否则不够吃。纪老的思路是先多种香蕉，因为香蕉的经济效益好。种了香蕉取得了经济效益，不仅可以增加农业的投入，还可以办企业，搞其他非农产业，这是一条良性循环的道路。纪老就这个问题找玉林地区地委书记谈话，还给人家画了个香蕉、粮食、非农产业互相促进图。后来，当地的领导同志接受了纪老的这个意见。

这一次调查研究一个月走了广西、贵州 30 多个县。回到北京后，纪老亲自主持写了两个报告，即关于广西、贵州粮食问题的情况汇报。报告是由随行的工作人员起草的，经纪老亲自审阅定稿，后发表在农研中心的机关内部刊物《农村论坛》上。

乘公共汽车串门曾被骑车人撞伤

纪登奎下野之后，尽管组织上给他配了小汽车、司机、秘书、警卫员、厨师。尽管如此，还和他在中央工作时大有区别，首先是他工作没那么忙了，事没那么重要了，因此，到每天下班时，工作人员也就都走了。有一天，司机下班回家了，纪老想到宣武区的一家亲戚家去看看，他就乘公共汽车去了，刚下车走到亲戚家住宅的胡同口，迎面来了一个冒冒失失骑快车的小伙子，一下就把他撞倒了，当时急忙送进北京医院救治。骑车的小伙子听说自己撞了纪登奎，可吓坏了。还是纪老给这位闯祸的青年宽了心。医生给他做了认真的检查，发现左胳膊骨折。医生立即给他复位后打了石膏。过了没一个星期，纪老就急着到四川出差搞调研去了。走时，左胳膊上的石膏还在，他用一条绷带挎着。这次，他去了成都，又到了重庆，走了一个多月，回来后，胳膊也好了。

他也有高干的通病 生活自理能力差

纪登奎同志 1923 年生，1937 年 14 岁时就参加了革命。第二年 15 岁时就加入共产党。不久便任晋东青救总会委员兼和顺县青救会主席，鲁西区党委青救总会组织部长，冀鲁豫二地委抗联分会组织部长、副主任等职。从 17 岁开始，便有警卫员。以后又南下担任过县委副书记、书记，解放后担任许昌地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洛阳矿山机器厂厂长兼党委书记，洛阳地委第一书记。后又到省里担任领导工作。直到 1969 年调中央工作。他一直担任领导，是别人照顾的对象。在自己照顾自己方面没受到锻炼。据说，有时候下班因特殊情况，家中无现成饭，米面菜蛋肉都有，他都不知道怎么弄。

下野之后，开始很不适应。在国务院农研中心工作，下基层搞调查住招待所，不会开浴缸的开关，洗澡前，需别人帮他放水放好。内衣自己学着洗，外衣需同行的同

志帮他洗。那时，大家同他熟了，常常开这么个玩笑，“纪老，你走到东单后怎么找到你家（他家住东单往北两站地的灯市口东口附近）？”他会笑着说：“先到天安门，然后再判定方位，我家在天安门广场东北面，再朝这个方向慢慢找。”这是夸大了的一段玩笑话，但确实说明了一些实际。高级领导干部乘小汽车出入，到哪里说一声就不用管了，没有自己记路的习惯，下野之后，过上了半平民生活，在城市里找不到自己的家一点也不奇怪。末代皇帝溥仪成为平民后料理生活低能的笑话，在我们许多高干中也是有的，只是没有机会表现罢了。“文革”中不是留下了诸多笑谈吗？

纪登奎下野后，一切从头学起，进步很快，后来学会了煮稀饭，下面条，炒鸡蛋等，家中无人做饭时，他不会饿肚子了。

晚年的两个夙愿

纪登奎离开中央时才 55 岁，还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笔者去拜访并作长谈时，曾问他多大岁数？他还满有信心地让我猜。他说，你看呢？我答：60 多岁吧。他补充了一个准确年龄：“65 岁。”

我当时曾对他说：“我看您身体不错，还可以做许多事。”他点点头说：“是，是。”

“你打算干点什么事呢？”我问。纪老不加思索地说（看来他是深思熟虑了）：“写书，教书。”

他讲的写书是要将自己的经历和经验教训写出来，供人阅读，留给历史。他的经历确实很丰富，特别是在中央工作的 10 年，“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包括“九·一三”林彪叛逃这样关系到党和国家安全的重要事件，他都亲自参与处理。这确实是研究我党历史的宝贵资料，如果要真能按他的愿望留下来的话，可惜，没有来得及实现。

纪登奎的另一个夙望是想到大学里教书。他说：“我可以讲政治经济学，我可以结合实际，阐明基本理论。在理论联系实际方面，我有点发言权。”

纪登奎的这一愿望也没有实现。一是时间上没来得及，另一方面，在我们这个时空里，离开政治舞台的政治家选择余生职业，并不像有些国家那样随心所欲。

告别的话

我们聊的真带劲。

但我还是不由自主地抬起了左手，一看表，已经十点多了。

我赶忙起身：“纪老，不早了，您该休息了。”边说边站起来。伸手拿起放在茶几上的袖珍收音机。

“这是什么？录音机吧？”纪老惊恐地问。

“不是，不是，这是袖珍收音机，不信请看。我来看望你，你信任我，谈了这么多，我决不会偷着搞录音，请放

心。”我满轻松地回答。纪老笑了。

我要走了。纪老又说：“请把你的手机也留下。”我将电话号码写在留我姓名的台历上。

纪老把我送出了小院，又送出了套院，送到了大门口。握别时，他拍着我的肩头说：

“小伙子，欢迎你再来。但有一条，不要出去瞎说。”

“我一定常来看你，一定不出去乱说。”

灰色的铁门咔嚓一声关上了。

死神悄悄走近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正在纪登奎仍壮心不已地打算利用有生之年，为党和人民再多做点事的时候，死神悄悄向他走近了，但他毫无察觉。

纪登奎是1988年7月13日晚9时6分在北京医院去世的。6月份，他因患肺炎，也是在北京医院住院，临出院时，全面检查了一下身体，医生说他是60多岁的年龄，30多岁的身体，20多岁的精力。平时工作起来，连农研中心跟他一块儿下去调查的小伙子都觉吃不消，可他没事儿。散步走得很快，同赶路一样，一般人都追不上。

纪登奎没有心脏病史，但他确是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他发病那天是7月10日，正是周末。前一天，他去农研中心开了一上午会。中午还听念文件，下午去老战友冯克家聊了半天。发病那天晚上晚饭也正常。他爱吃毛豆粥和煮玉米，家里煮了一锅，他吃了一个玉米，喝了粥。晚饭后坐在客厅象平时一样看电视。看到11点多，三个台的节目都结束了。这时，他觉得肚子有点疼。当时纪老和家人都没在乎，以为是玉米没吃合适。他平时就有拉肚子的毛病，认为是老毛病又犯了。于是纪老就到院里散步，散了大约有一个小时，12点的时候，纪登奎喊他老伴快起来。说肚子疼的厉害，老伴一看，脸上有汗，一洗头，很凉。有点慌了，立即就要去找司机。这时纪老还追到大门口，说太晚了，不让他老伴去。后来，他们最小的姑娘纪方给国务院管理局打了电话。约10多分钟，车就来了。火速将纪老送到了北京医院。下了车，是他自己走到急诊室的。进门后，看见护士还跟人家笑着说：“我不行了，我要死了。”护士说：“不要开玩笑。”这时护士和家人扶着他慢慢地躺在病床上，开始试体温，口表放在嘴里仅仅4分钟，他就昏迷不醒了。医生护士立即进行抢救，该采取的措施、手段都用上了，到第二天下午血压的压差才拉开点。低压20，高压40。但纪老始终未睁开眼睛。13日晚9时6分，他的心脏完全停止了跳动。

在纪登奎同志病危住院期间，党和国家对他十分关心。中央许多领导同志都先后前往医院探望。

令人遗憾的是，纪登奎同志的小女婿是空军总医院心血管科副主任。医术很好，抢救心血管患者也很有经验，在他的努力下，曾有停止呼吸27分钟的病人起死回生。他本来每星期六都同妻子纪方回父母家里度周末的。

纪老发病那天晚上，他因在医院抢救病人未能回去。家里人都说，要是小女婿在，纪老是能抢救过来的。可惜，阴差阳错，只能抱憾终生了。

党这样评价他

纪登奎同志逝世后，党和国家为他举行了隆重的遗体告别仪式。中央领导人乔石、田纪云、秦基伟、李德生、习仲勋、倪志福等以及生前友好、机关干部代表400余人，向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仰卧在鲜花丛中的纪登奎同志进行最后诀别。

经中央审定的“纪登奎同志生平”这样评价他：

纪登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纪登奎同志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拥护改革开放的方针。他衷心拥护中央整党决定，积极参加整党，诚恳地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1983年他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以来，经常深入农村、深入基层、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对农村的改革和发展，提了不少积极的建议。

“纪登奎同志思想敏锐，办事果断，作风深入，艰苦朴素，廉洁奉公，平易近人，虚心好学，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他参加革命工作50多年，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贡献。”

在毛泽东同志去世12年之后，他的这位“老朋友”就这样匆匆地走了。

补写在纪老逝世之后

1988年8月3日，在外地开往北京的公共汽车上，我从收音机里听到一个不幸的消息：“党和国家领导人向纪登奎同志遗体告别。”当时我惊呆了，心咯噔一下子，耳朵几乎竖起来了。这怎么可能呢？前不久，我见他时还十分健康。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用新华社电讯反驳了我，这已是无可挽回的铁的事实了。也许是我跟他有过几次交往，他对我这个素昧平生的记者十分信任的缘故，心里十分难受。我很自然地想起了纪老同我那次坦诚的长谈。去看望他时，并没有写点什么的打算。谈过之后，觉得极珍贵，将来会有用的。因此，回去之后，及时追记了笔记留存，并没有想写成什么东西发表。纪老的突然长辞，促使我将笔记改写成文章，因这次意外的拜访所得已成为一篇珍贵的史料，我有责任将它公诸于世。

这篇东西写毕后，我曾送同纪登奎同志与毛泽东同志接触极密切的同志看过，他们一致觉得，“情况就是这样”。我更放心了。

我想，纪登奎在天之灵有知，也会感到欣慰的。他毕竟给这个世界留下了自己一些真实的心声。

一个“摘帽右派”在那个荒诞年代中，虽然没有大喜大悲，但是透过本文淡淡的描述，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溢于字里行间的那一缕难以言状的苦涩，一缕欲说不能的辛酸……

不再“逍遥”

我母亲的家，是个独门小院。

谁知母亲又会吓得怎样呢？更何况这正是个动荡混乱的年代，做为她的长子的我又是个摘帽“右派”，正在内蒙发配，我相信一定会比上次更让她害怕。

我接过电报一看，是我所在的工程队发给我的，只有四个字：“见电即归”。在连天空都“红彤彤”的年月里，象我这样的“黑五类”分子，接到“造反”派头头的电报，无异于封建时代罪臣接到圣旨，有天大的事都不能耽搁，我决定立即购票赶回呼和浩特。

动乱中的乱动

人海浪

●柳萌

每逢下雨的天气，由于院高屋低，雨水总往屋里灌，母亲不得不同雨水拼搏一番。这一天，天空阴云密布，雷声大作，眼看又要下雨了，母亲从屋里跑到院中，用破油毡盖住一件件怕淋的杂物，有的还用砖头压住，怕被水冲走。那股认真、细致的劲儿，那种着急、忙乱的样子，实在让我觉得有些过意不去，放下正在阅读的“造反”小报，我赶紧跑过去帮忙。

我们娘儿俩，好不容易把院子归弄好，走进屋子坐下歇息，这时，街上自远而近地传来嘟嘟的马达声，后来就在我家门口嘎然而止住，随后一个大嗓门的男人喊道：“一号——取电报。”

我家的门牌正是一号，听到这喊声，我立刻起身跑出来。我知道母亲最怕听拿电报的喊声，因为那年我结束了在北大荒的“右派”劳改生活，想让母亲高兴高兴，在临动身那天特意拍了份电报，听父亲说，母亲听到让拿电报的喊声，她立刻吓得像什么似的，脸刷白，腿发软，以为我在北大荒出了什么事儿。后来父亲把电报内容告诉她，她才逐渐恢复常态，眼里顿时漫出喜悦的泪花。知道这次的情况以后，后来无论有多急的事，我从来都不往家里拍电报。这会儿若不是我在家，听到这取电报的喊声，

特。可能是我当时的面部表情有些异样，母亲看出了我的心事，她略迟疑了一会儿，问我：“谁来的电报？说什么？”我如实地告诉她：“只是让我回去，没说什么事情。我得立即走。”“怎么这么急呵，怎么也得明天再说吧。”我对母亲的关切是很感激的，但却难以违抗那年月的冷酷。我说：“不行。必须今天走。”母亲见我如此坚决，也就不想再难为我。她说：“我这就做饭，吃了饭再走。”这时已经下起了雨，由小渐大，由慢渐急，在这样的年月，这样的天气，我匆忙地远走边疆，心中实在不是滋味，情不自禁地眼睛湿润起来。望着窗外不停飘落的雨，想着此去难测的凶险，我的心一片茫然，深感老天爷不公，竟如此戏弄我这草莽之人。

这时已是“文革”的中期，我所在的工程队的“造反”派的天下已成定局，这派掌权的头头，在“文革”前同我的私交不错，即使是有的人红得发紫的这会儿，这位老兄也没有真正的跟我掰了，还真够哥儿们。一来我是个明着的摘帽“右派”，属于“死老虎”，再打也还是如此，而且也不会显出他的“英雄本色”；二来他同我的关系，许多人知道，断然划清界线，反而会让人觉得不是味儿，所以他大权在握以后，曾很认真地告诫我：“这场革命，



同你没关系。我看这样吧，你先回天津探亲，什么时候叫你回来，我们拍电报。不过我得提醒你，见电报一定立刻动身，不能耽误，到时候我们查看车票日期。”他们能对我施以“仁政”，我自自然是高兴的，不管什么条件，我都会答应，更不会让这位升官的老友为难。

我母亲的家当时在天津西沽一带，距河北工学院很近，那时我无事就去工学院看大字报、听辩论，碰到卖各种小报的就顺便买几张回家看。就这样，逍逍遥遥，自在自在，我在天津住了个把月，真舒坦。这会儿突然来了电报，催我赶快回去，到底会是什么事呢？坐在开往呼和浩特的火车上我胡乱地猜想。但是我相信不会有好事等我，我这个人的命很不好，“反胡风”时就被狠狠地整了一顿，那时我才20岁，接着又被划为“右派”，自知好事同我无缘。再说，许多老干部、老专家都在遭罪，像我这样的无名“老右”，那里会有什么好果子等着我呢？想到这些，反而踏实了，在颠簸的火车上，斜着身子，我美美地睡了一觉，睁开眼睛已是次日早晨，呼和浩特站，到了。

走进工程队“造反”派组织的办公室，同我要好的那位头头，正趴在桌子上低头写什么，听到我的脚步声，他抬起头，见是我，便说：“赶回来了，挺好。坐下。”我顺从地坐在他指点的椅子上，在他收拾桌子上的东西时，我不安地察看他的表情，想尽快地捕捉一点儿信息，但是我失望了，他那双滴溜溜转的大眼睛，好似两眼井水，我没有办法见底。停了片刻，他划火柴点燃一根烟，连着抽了两口，却不说话，也许是在玩深沉，可我怎么受的了呢？他又足足地吸了两口，弹弹长长的烟灰，这时看了看我，才说：“上边有通知，让你进学习班，学习毛泽东思想。明天就走，你先回

去，做些准备。别的事情，走时再说。”

这是个变着法儿整人的年代，有些想靠整人升官儿的人，他们的聪明才智，在这时发挥的可谓淋漓尽致，五花八门的整人术，很难让善良人想象出来，所以我心中老是不踏实。听了他这么一说，怀揣的大石头算是落了地。我爱人在唐山，孩子在天津，就我一个人在内蒙，去哪里都一样，既然是个“班”，就不会是我一人，有伴儿就好。接着他的话茬，我又问了两句：“学习班在哪儿？去多长时间？”他见我反问，有些不耐烦地说：“三个月。去哪儿，到时候就知道了，又不是你一个人，你跟着走就是了。”

次日上午，按照通知的要求，进学习班的人，陆续地到了火车站。这时我才发现，原来去的并非都是我这样的人，还有“文革”前的当权人物，“文革”初期红极一时的派头头，“有历史问题”的人，被定成“现行反革命”的人，一看这阵势，我不禁心中窃笑起来：曾几何时，这个咬那个，那个揭这个，谁都怕被说成不是真革命，闹来闹去，如今都成了一路货，这很有点像内蒙人爱吃的那道菜的味道——大烩菜，全都放在一个锅里煮。我像点名似的，逐个儿看了看脸，有的过去标榜“革命”的人，这会儿像被霜打了的烂茄子，说不清是什么颜色，再没有了趾高气扬的精神劲儿，举止中明显地流露出不自在。像我这样的老牌“黑五类”，本来也不曾有过威风的时候，这会儿反倒觉得心平气和，这倒不是因为同几天前的“革命者”混在了一起，有被突然抬举的高兴，而是早已习惯了这种宠辱不惊的境遇。

有些开始有点自知之明的人，这会儿好像知道自己是几斤几两了，主动地走过来同我打招呼。就这样，我们这些曾被“文革”搞得人不人鬼不鬼的主儿，此刻一下子成了命运相同的唯

友,好像每个人都开始意识到,只有大家彼此关照,方能度过未来漫长的人生艰难。因此,临上火车的时候,谁都想主动帮助别人,这种同舟共济的情形,在刀光剑影的“文革”时期,似乎还很少见。人心实在古怪,只有都在苦难中才是平等的、善良的,一旦拉开距离或者同在幸运时就会你争我斗,所以我想,在苦难中比在平平时心灵会更轻松、更洁净。

上车以后,没过多久,列车就开了。这次的发配使我不禁想起1958年那次流放,所不同的是,车站上送行的人很少哭哭啼啼的,再有不管准不准还有个“三个月”(实际上是扯旦、是骗局,后来呆了五个“三个月”还多)的期限,人们在思想上压力会小些。可是人们的心里依然在打鼓,从火车前进的方向判断,这趟车是向东的,究竟让我们去哪里谁也不清楚。当知道列车朝东边开以后,我就暗暗地高兴起来,因为不管停在什么地方,都会距唐山、天津越来越远,从感情上我就有了寄托。但是,无论是我,还是他们,大家有个共同的疑惑:究竟要把我们带到哪里?等待我们的会是什么?我们这些经历过许多政治运动的人,特别是那些在“文革”初期表演过而结果并不妙的人,本性里的天真和轻信这会儿已经不复存在,凡是没有亲身体验过的事情再不会相信。“造反”派头头的种种说法,别看大家是听进耳朵里了,真正相信的人是不会有,在那个颠三倒四的年代,连“最高指示”还有真有假、真的也有自相矛盾的,一个小单位小头头的屁话,能值几文钱。

带队的是军管会的当兵的,三十左右岁,从四个口袋的军衣上判断,可能是个连排长一级的干部。他同我们一起上车后始终未开口。火车走了约十一二个小时后,这位带队的军代表,走到我们这节车厢的中间,操着一口标准的河南口音,说:“前边一站,叫×堡。我们学习班就在这儿。大家下车以后,在站台上等候,学习班有人来接。”几天来的疑惑和忧虑,这会儿才算消释,从每个人的面部表情看,都显得平静了些。人的情绪常常是这样,当着一件事情没有结果时,总是难以稳定下来,一旦有了结果——无论好坏——就会欣然接受。

我们背着扛着简便的行装,依次走出车厢,见站台上有二三十位军人,零零落落地守在火车前,看见我们下来,有的军人就喊:“学习班的人,在这里集合。”我们默默地、顺从地向他靠拢,放下肩上的行装,等待着他下一步的吩咐或命令。

火车停了几分钟,开走了。一位白脸微胖的军人,见我们都聚集在那里,他站在大家面前说道:“我是学习班二队指导员,叫茅志诚,矛盾的矛加草头,志是同志的志,诚是诚实的诚。你们就是二队的学员,以后我们要一起学习。”接着他指了指站在他旁边的几位军人,一一作了介绍:队长、副队长、副指导员……等等,叫什么名字,我们一时也难记住,总之,都是管我们这帮人的大小官儿。介绍完了,茅指导员又一本正经地说:“大家听着,我们学习班叫×军区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生活、学习、纪律全部按部队要求,班以上的干部全由部队指派,你们要无条件地服从。”听了这番讲话,我们这些即将“入伍”的“胡子兵”,似乎谁也没有

新兵的喜悦和新奇,这刚下火车的“下马威”,无形中又在我们心头罩上一层疑虑,不知这是学习,还是军管,但是谁也不敢说什么,只好不吭声,听他还要说些什么。

他清了清嗓子,接着又说:“遵照中央的指示,我现在宣布学习班的规定:一、不准请假回家;二、不准互相串连;三、不准通信;四、不准会客;五、不准鸣放。大家必须切实执行,违犯者要给予处理。”听了这“五不准”的规定,犹如五雷轰顶,每个人的表情都是那么沉重,心灵的绞丝扣才松开又拧得更紧了。站在开往学习班所在地军营的卡车上,一路上没有一个人说话,完全把自己交给了这神秘的命运之神,随它怎样摆布都已很无所谓了。

在学习班住下来,几天以后,同解放军战士熟了,有的悄悄告诉我们,办这个学习班和规定“五不准”,都是陈伯达的主意。这下我们全明白了,这个连完整话都说不上一句的老家伙,哪里是办什么学习班呵,明明是要把我们软禁起来。我们很气愤,就是不敢说。

我在“文革”中的还算“自在”的生活,就这样结束了,成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学员,从此不再逍遥。

偷传音信

此起彼伏的鼾声,终夜不断。这军营的兵舍,一张几十米长的木板床,从墙的这头到墙的那头,十几二十人挤在一起。由于鼾声的干扰,有时一夜辗转不眠,便用咳嗽、推搡、蔽床,想制止住这不停的鼾息,结果无济于事,总是以我的失败告终。

有天夜里,睡在我身边的人,躺下就开始打鼾,有时似沉沉的闷雷,有时似轻轻的哨音,从他那舒缓有致的鼾声中,我感到这位老兄是太困了。当然也很羡慕他的舒坦自在。我也很困,上下眼皮老打架,头也微微发涨,只是被鼾声震得睡不着,只好胡乱的想些事情。

在这些被软禁的人中,我是只“死老虎”,“文革”初期又是逍遥人,如果不再欲加新罪,谁也不会对我怎样。再说我存在又不会妨碍谁,有时还可以成为他们的挡箭牌,所以我来学习班以后,似乎比他们活的更踏实,起码不象他们中有的人那样,总是提心吊胆地暗暗自问:我到底有什么问题呢?其实,他们的所谓问题,只有鬼知道,这些人中的一些当权派,在过去的政治运动中,都曾整过人、给过别人“欲加之罪”,现在轮到他们自己担惊受怕了,象当年别人那样问自己有什么“问题”了,我想那滋味同样是苦涩的,道不明的。人哪,还是要活得正派些好。

我的问题,自己清楚,生活的也就坦然。不过我也有揪心的事。我爱人只身一人在唐山教书,我们的儿子在天津跟着奶奶,这样长的时间不通音信,彼此间都会很惦念。儿子还好说,年纪小,不懂事,又是跟着爷爷奶奶,总不致于受屈。我爱人的情况,我却不能不惦着,她生性过于轻信、诚实,在“文革”初期就被人陷害,在那些痛苦的日子里,只有我的信和电话给她以安慰,使她在艰难中得以生活。如今这“不准”通信的规定还未解除,我们

已有一个多月未通信息,说不定她会胡思乱想些什么事情哪。

想到这些,实在无法忍受,立刻气血冲顶,决心以冒险的行动,向这种毫无人味儿的环境挑战。我想,大不了给我加条新罪,再加我还是个“摘帽右派”,多少顶帽子多少条罪名,都同样是我一人承受,你总不能把我劈成几半儿。我就是要试试这种恶运能不能摆脱。

反正也睡不着,干脆写信,设法寄出去,让家里人知道我的下落。我轻轻地从被窝里爬起来,拿过挨墙根放着的手提包,取出几张信纸和两个信封,然后又从压在被上的衣服口袋里掏出钢笔,待这些东西一一送进被窝,我又钻进去,用被蒙住头,趴在那里,借着微弱的手电筒光,草草地写了两封短信,给我的父母和妻子,内容几乎都是一样。我告诉我的亲人们,我在××堡学习,家里不要惦记;学习班规定不准通信,以后就不再写信了。

次日正巧是个星期天,休息。这天我们可以整队上街,一是洗澡,二是购物,但是活动不能离开集体,就是买东西也得三人以上搭伴儿。我想这倒是个寄信的好机会。吃过早饭,趁还未集合的空隙时间,我匆匆地跑回宿舍,从手提包里取出两张八分邮票,用舌头润湿带胶的一面,工工正正地贴在了信封上,然后揣在衣服的下兜儿。我很为自己这个两地分居的准光棍庆幸。我相信只有我才会准备邮票,他们这些很少离家的人,绝对不会想到带邮票的,更何况来说三个月就回去。想到这里我越发踏实了。我想,只有我的两封信,绝不会引起官方注意,如果第一次平安的闯过,以后我就如法炮制,让家人每月见到我的信。

××堡镇是河北省××县县城。距我们学习班所在的军营有几里路,每次上街,我们都象军人那样排成整齐的队伍,唱着歌喊着一二三四走向这个小镇。这个塞上小镇,地方不大,紧靠铁路,节日假日还挺热闹。管我们的部队师机关,就在××堡镇里,我们在师部澡堂洗完澡,就结伴到商店买东西。每周如此。

带队上街的军人,每次换一位,他们轮换几回下来,都是什么样的秉性,我们也就摸的差不多了。管的最严的还是那位茅指导员,每逢轮到 he 带队上街,我们连大声出气都不敢,更不要说提些什么份外要求。我们最愿意跟的,就是那位陈副指导员,他为人随和,有时还开玩笑,只要是 he 带队,说说笑笑就走到镇上,谁也不觉得累。后来时间长了,听一些军人说,陈副指导员是位老资格的志愿兵,对于茅指导员那套花里胡哨的东西,他很看不惯,有时也不买茅指导员的帐,这无形中给了我们一点儿生存的空间。这次带我们上街的,就是这位陈副指导员。

队伍刚走进××堡镇,就有人喊:“报告,我去厕所。”陈副指导员看了看喊话的人,很干脆地说:“出列!”一位上了点年纪的男学员匆匆地走出队伍。接着又有一位女学员喊:“指导员,我也去厕所。”“去吧!”陈副指导员立刻批准。未曾想,有这两位带头,接着又是几位要去厕所,男的女的,几乎同时在喊“报告”。陈副指导员没有马上批准,稍停片刻,他操着四川口音,说:“娘的,真是乱弹琴,刚出来就憋不住了?干脆,解散。十点半准时在路口集合。”大家象一群出笼的鸟儿,仨一群俩一伙的走开,有的真的去

厕所,有的只是想抽根烟,有的朝商店走去。我和另外两个人一起走,我请他们陪我去趟杂货店,说是买把小泥壶。其实他们不知道,我的真正目的是在经过邮局时,把揣在口袋里的两封信,顺手扔进信筒里。就在他们不注意时,我的目的还真的达到了。

这一天,我高兴无比。我甚至于预感到,我的父母和妻子,当他们接到我的信,该是多么高兴,多日来的牵挂和思念,会因我的几个字有所消释。但是我又多少有些惊怕,万一要是被有的人看见,报告给学习班的领导,说不定会怎样处罚我。在那个捉弄人的残酷年代,无时无刻不在扭曲人们的心灵,诚实的人会变得狡猾,乖傻的人会变得灵慧,只有用同样的方法对付环境,你才会快活地生活。此刻,我的心理得到了某种平衡,接连几天都睡得很香,讨厌的鼾声竟成了悠扬的催眠曲。

学习班象部队一样,有晚点名制度。晚点名大都是在入寝之前,全体学员列队站在饭厅前,由队长、指导员点评当日的情况,好的表扬,坏的批评,实在没有话也得找话说,反正得走这个形式。有时有紧急事情或重要事情,在晚点名之后,还要回宿舍开班务会,让大家讨论。班务会开到半夜是常有的事。在学习班领导的眼里,班务会开的时间越长越好,说明这个班讨论认真。

这是又一次晚点名,时间是距我们上街几天之后。队长、指导员等站在队列前,表情显得非常严肃、冷漠,使人预感到,今天要有不寻常的事情发生。果然,那位军区毛著学习标兵茅指导员,用他那嵌在胖脸上的一双小眼,扫了扫队列,宽厚的嘴唇微微地颤动了一下,停顿一会儿,大声说:“我告诉你们,你们中有的人,简直胆大包天,竟敢违犯中央规定……”他一开腔,气就这么冲,火就这么大,大家立刻紧张起来,直着耳朵听,想知道是什么事情。他像要把戏的人卖关子似的,又停了一会儿,才说:“……偷着往外寄信。这是公开对抗中央的决定。”听了 he 完整的话,别的人的神经又松弛了,我的心中开始打起鼓来,这明明是在说我嘛!心想,这下可完了,加个“对抗中央决定”的罪名,就是“现行反革命”呵!

正在我愣怔的时候,只听 he 又说:“干这事的人,不止一两个,而是十几个人,我怀疑是合伙预谋。”说着 he 从衣袋里掏出一沓信来,举着让大家看,证明他们掌握有足够的罪证。在那个“阶级斗争”时时不忘的年月,像茅指导员这样的学习标兵,警惕性比任何人都高,而且极平常的事经 he 一说,立刻就会自然地地上纲上线,这不就上到“合伙预谋”的线上了吗?的确吓人。可是我反而心里有了底,再不那么惧怕了,因为,寄信的不止我一人,就是处理,总还有几张嘴一起争辩。

茅指导员的话,显然还未说完,大家都在等待。这时我们的队伍里有人喊:“报告!”茅指导员见是 he 表扬过多次的积极分子,便说:“你说。”那位积极分子有五十左右岁,花白头发,原来是位处长,像每次发言都讲在点子上一样,这次 he 又颇为自得的说:“我建议,把这些人的名字公布出来,让他们当众检查,然后再处理,免得我们大家受牵累。”

“我看那倒不必……”茅指导员这次未听献计,让那位积极

分子碰了个软钉子。“……念他们初犯，自己先认真的反省，如果以后再发生这种事，违犯‘五不’，那可就不客气了，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这起“合伙预谋”的“对抗中央决定”事件，就这样不了了之了，但在学员中产生的影响并未很快消除，有很长时间成为大家争论的话题。有的人出于“忍”“不吃眼前亏”的想法，觉得听从摆布算了；有更多的人却不同意这种做法，说：“在劳改队还让通信、探监哪，我们又未犯法，干嘛要软禁我们。”还有的人很热衷于了解，这些信是怎么被截的，至于寄信的人都是谁，他们倒没有兴趣猜测。后来经过多方打听，终于弄明白了，原来在我们未来之前，学习班就同邮电局商量好，只要是我们的信或可疑的信，统统由邮电局截住检查，绝对不准邮寄出去。你再聪明再机灵，你也逃不出这政治的“天罗地网”，这就是那个年代的生活。

这件事渐渐平息下来以后，有时想起来，我不禁暗自好笑：原来人的思想、智慧、计谋都差不多。在茅指导员未亮出那十几封信时，我还以为就我一个人写信哪，未曾想有那么多人同我想到了一起。真是人同此心、情同此理。

从那以后，我事事处处都格外小心，生怕再出差错，到时候新老帐一起算，那可就要吃不了兜着走了。但是我要给家人传递音信的想法并未打消，我想，只要不把我抓进监狱关起来，我总会有办法。

未过多久，这个机会真的来了。

有位学员的爱人病重，单位来电报给他请假，学习班不准；他请求写封信回去，学习班领导答应请示上级。在为此事请示上级的同时，学习班也将我们“合伙”“对抗”行为顺便做了汇报。大概是考虑学习班不能如期结束，也考虑怕再出什么事情，上级还真的发了慈悲，批准那位学员寄封信和食品回去，表示他对病中妻子的慰问，但是不准谈学习班的情况。至于别的人，上级同意由学习班跟学员原单位联系，再由原单位把情况转告学员家里，谁要是需要什么衣服、物品，写在一张纸上，由学习班派人负责去取。我家不在内蒙，衣物都在单位单身宿舍，把钥匙交给去的人，自然也会如数带来。然而，我的真实目的不在这里，还是想给家里人通个音信，就亲自跑到队部，讲明我的特殊情况，希望他们给予特殊照顾。

我提出给家里写信的请求以后，几天都无动静，估计是遇到了麻烦。有天黄昏，吃过晚饭，我同几个人在营盘里散步，看见两位解放军战士，坐在饭厅的台阶上看小人书，我凑过去扫了一眼。从文字说明和画面上看，好像是讲董存瑞的故事，我顺手翻了一下书皮，书名正是《董存瑞》。这时一个新的想法立刻出现，我要买几本小人书寄给儿子，我想他们就不至于为难了。

我在“军人服务部”买了《董存瑞》、《黄继光》、《红灯记》等好几本小人书，等熄灯号一吹，夜阑人静之时，我趴在被窝里，用手电筒照着，一页一页地翻着小书，并不是翻看内容，而是寻找合适的空白地儿，我要在上边写信。连着翻了两本，我终于发现有一页，说明文字不多，我在那里接着写几个字，估计不会被人发现。我写的是：“我挺好，勿念。学习班不准通信。全家保重。”字的大小，同小人书上的差不多。

这天夜里，我又失眠了，并非全是鼾声干扰。我想起这几十年的生活，风风雨雨，坎坎坷坷，情不自禁地淌出几滴清泪。现在又赶上这样的遭际，深感老天爷不睁眼，给了我这样不济的命运。

经学习班领导研究，同意我寄几本小人书，便找来一张牛皮纸、一根纸绳，连同书一起，我拿到队部。经值班人员检查，确定没有夹带信件，我就当面包好，写上收寄人地址、姓名，然后交给值班人员，说：“班长，要是队部有人去邮局，请帮我寄了。我留下一元钱。”值班人员没有任何刁难，我方才还悬着的心，顿时完全落了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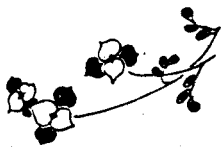
没过几天，队部的通讯员找我，把余钱和收据送来，这说明，这几本小人书，平安地去了天津。我相信，我的父母接到这几册书，翻看到我写的那几个字，同时会把情况告诉我爱人，他们就会放心了。那曾有过的担忧就会化为苦涩的欢欣。

书寄出去半月之后，有天下午，正在开班务会，派头头们“斗私批修”，发言的人都是“文革”中的红人，讲自己如何搞派性、搞夺权，并深挖自己当时的思想。开这类内容的会，历来跟我不搭边儿，这时我往往充当一个角色——给大伙打水。为了消磨掉这段时光，主要还是想不时透透风，我总是把铁壶打满水，这样可以多走动几次。今天下午也不例外，我见铁壶的水快倒光了，提起来就往外走，没走多远，就听有人喊我的名字，回头一看，是管我们的解放军班长。他一边跟我并排向水房走去，一边悄悄地告诉我：“你父亲来信了，是张明信片，说你寄的书收到了。还说家里人都好，让你不要惦念。”我一听，来了神儿，马上问他：“信在哪儿，快给我。”他笑了笑，说：“在队部哪，怕影响别人，指导员不同意交给你，让我把信的内容告诉你。”

尽管没有亲眼见到家里的信，我还是很高兴，一来是同家里互通了情况，二来是我的计谋未被发现，还有什么比这更开心的呢？

我思谋多时要传的音信，就这样传出去了。在没有知道还有谁这么干之前，我相信我是第一个冲破软禁的人。不过，这纯粹是那个扭曲的年代逼出来的。

〔责任编辑 晓度〕



神州景

继“世界第八大奇迹”秦兵马俑面世后，古都
西安又一文化奇观再次轰动世界——

价值千金的



○《宫女图》，永泰公主墓出土。

安克仁
摄

壁画 50 年代初既陆续在墓穴中发现,何以至今才示于世人?壁画直接绘制于墓穴中的砖墙或土墙上,怎样才能完好的揭取下来?壁画价值千金,但极易破损,怎样保护好这些国之瑰宝?

唐墓壁画

● 王兆麟

瑰宝初现 引起轰动

生活在今天 20 世纪 90 年代的人们,如果有幸能亲眼看到一千二百年前初唐、盛唐时代的绘画真迹,而且是高达二三米,长达数十米的长卷,那将会引起什么样的轰动效应呢!

这也许是难以想象的“神话”。可是从 1991 年 6 月 20 日起在西安建成开放的陕西历史博物馆里,人们竟可以看到多达 39 幅的唐墓壁画原作。这些稀世瑰宝原在西安附近的唐皇太子、公主和皇亲、贵族、大臣的墓中,如今为了庆祝这座国家级的博物馆的开馆而作首次短期展出。

这批千余年前的中国画真迹,从 50 年代初起陆续在唐墓中发现,揭取下来后深藏幽室,秘不示人达数十年之久,其部分摹本在海外展出时引起巨大反响,誉之为“东方古代文化史册中的闪光一页”,其原作有着“黄金般的价值”。

过去唐墓壁画从未公开展示过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它保存和展示困难很多,客观条件不具备。现在由于中国现代技术水平最高的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建成才得以实现。展出前先对展柜测出有害气体,予以清除。展厅内温、湿度调节到合适范围,并用温、湿度计进行监测,这是因为温、湿度高了会起霉,低了会干裂,色彩脱落,故采用抽湿机和空调送风,以防止温、湿度的波动。照明则采用菲力浦全显色性无紫外线荧光灯。对展室天井加百叶窗和厚窗帘及茶色玻璃,以减少外光进入。采取这些措施,都是为了保护千年古壁画不受损害。

“唐墓壁画真品展”开放以来每天有数以千计观众前来参观,最多达万人。这是文物大省陕西继 70 年代的“世界第八奇迹”秦兵马俑、80 年代唐法门寺地宫珍宝之后,90 年代唐墓壁画首展,成为同样在海内外引起轰动的文化盛事。

唐墓壁画 陕西最多

留存至今的中国古代壁画,大体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地面上现存的古建筑内的壁画,多保存在宫殿、寺庙、洞窟内,如甘肃敦煌莫高窟壁画;二是从地下考古发掘出来的历代墓葬、古建筑中的壁画,其中以墓葬内最多,古建筑中壁画很少。从数量上讲,目前以前者为多,象莫高窟壁画多达 4.5 万平方米。但从发展前景来看,墓葬出土的壁画的潜力要大得多,因为我国绝大部分重要墓葬(特别是帝王陵墓)没有发掘,很可能在这些墓葬中发现极为可观的壁画。这个推测,可从唐代皇帝陵园中许多陪葬墓发掘后,发现大批精美的壁画得到证实。

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墓葬壁画,是在陕西扶风县杨家堡一个西周墓中,发现墓壁上绘制了两方连续菱格纹图案。以后历代墓葬内壁画均有发现,其中不论是出土数量还是艺术价值,均以唐墓壁画居首。

唐墓壁画绝大部分发现于陕西,这也不奇怪,因为今陕西省会西安是唐时首都(当时叫长安),唐朝 20 座帝王陵墓,在陕西的就有 18 座。这些帝陵都没有发掘,但陵园内陪葬的太子、公主、皇亲、贵族、大臣及陵园外的其他唐墓则发掘了不少,大部分是配

合工业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进行随工清理时发现的。也有不少是根据科研、学术、旅游需要,有计划地主动发掘的。据不完全统计,从建国初的50年代起迄今,陕西陆续发现有壁画的唐墓60多座,其中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了25座唐墓中总计1000多平方米的壁画,其数量和质量均居全国各文博考古单位之首。

我国古代的地面壁画以敦煌莫高窟为代表,地下壁画以唐墓壁画为代表。

两者有何特点和不同?从题材方面讲,敦煌石窟壁画题材绝大部分与宗教有关,内容多为佛经故事,离现实生活较远,唐墓壁画题材摆脱了宗教的羁绊,从现实生活中广泛取材,直接反映当时的社会风貌和生活。从保存和展示的方式看,石窟壁画绝大部分在原处保存展示,由于壁画所在地往往比较僻远,前去观赏交通不甚方便。同时为了保护起见,大部分洞窟封闭,不公开开放;而唐墓壁画多揭取迁移到中心城市文博考古单位保存,具备了有效的保护条件后即可展示,其观赏的室内环境、照明、陈列和交通条件均较好,更能充分发挥社会效益。

唐墓壁画的揭取

唐墓壁画是在砖墙或土墙上抹上麦草泥再加素灰的墙皮上绘制的,墙皮厚仅1-1.5厘米,因此画面的基础稳固性很差。由于墓葬内部和地面的环境条件差别很大,历经千余年的真迹一经发掘,接触外界光天化日,极易风化、发霉,色彩剥落、褪色。加之壁画面积大、体量大,脆弱易断裂。因此较之其他金属、陶瓷、玉石质等文物,更为娇贵易损,成为当今世界上文物保护的一个重要科研课题。对此,陕西文博考古部门对有价值、保存较好的唐墓壁画,均设法完整地揭取下来,移到文物库房中精心保存。

新中国成立后,陕西省发现唐墓壁画最早的在1952年,西安市东郊在建墓中发现了唐魏国公苏思勳(?-745年)墓,墓室和甬道内共有壁画20多幅,全长13.7米。此后近40年间不断发现更多更好的壁画。如何完整无损地把它们揭取下来?50年代初,郑郁文、茹士安等考古工作者创造了用桃胶贴布,成功地揭取了壁画,然后对取下壁画用石膏衬底加固,这项技术于1955年发表论文向全国介绍。国家文物部门于1962年在西安召开壁画揭取技术现场观摩会,柴忠言、董文喜等人应用此技术,成功地揭取了唐乾陵永泰公主墓的100平方米壁画,这些技术在全国得到推广。1972年到1973年,柴忠言等人又对唐乾陵章怀太子、懿德太子墓中约400平方米的壁画成功地进行了揭取,然后改用聚醋酸乙稀乳液、环氧树脂等高聚物取代石膏进行壁画加固,使壁画强度增大了好几倍,重量却大大减轻,在全国文物界推广。这些独特的技术,引起外国专家的赞赏。

古墓壁画库建成 使国宝延年益寿

为了给这批价值胜过黄金的稀世瑰宝提供理想的长期保存

条件,国家“七五”期间在西安兴建国家级的、现代化水平最高的陕西历史博物馆时,决定在馆内建设一个中国第一、世界罕见的现代化古墓壁画藏品库,已于1991年夏基本建成。

这个壁画库位于陈列大厅的地下,总面积1200平方米。人们下到这个高大幽深的特殊文物库房,顿觉温润阴凉,原来这里保持着古墓中的温、湿度,夏季温度25度,冬季18度,湿度45-50%,库内采用无紫外线的特殊灯光照明,以免损害画面。

唐墓壁画从墓中揭取下来后,放在铺有棉花或泡沫塑料的木板上,移入特制的大木箱中运回博物馆,在卸落台卸下,由能起重1000公斤的行车吊运至壁画库上空入口处,降入地下面积为300平方米的壁画修复工作室,它是壁画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室内有特制的金属工作台,长4米、宽2米。为了便于工作,工作台下方设液压升降装置,设施颇为先进。

这个壁画藏品库与一般文物库房不同,它除具有收藏、保管功能外,还对专业科研人员、国宾及专家、学者开放。目前在展厅对广大观众开展出的39幅真品,只能作短期展出。为了确保文物安全,又要满足特殊的参观展示需要,壁画不是象画册、书本那样一件件地叠压存放,而是采用立式排列组合,也就是把修复加固后的壁画,镶嵌于长4米、高3米、宽0.7米的特制金属柜表面,每柜两边各可镶嵌一至二幅壁画,这几十个立式金属柜贮存于4米高的库室中。根据参观展示的需要,采用电脑控制,要检索的藏品名称、位置,可以很快地在屏幕上显示出来,当要观赏的壁画确定后,只要一按电钮,底部装着活轮的壁画柜,便从库中沿着4米长的铁轨,以每分钟6米的速度,自动徐徐驶出。由于采用减震装置,电力驱动时平稳无噪音,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对壁画的震动。当壁画柜驶出时,配套照明的灯光也在观赏范围内同步开启。

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唐墓壁画共450多幅,已经修复加固的百余幅,其中在陈列大厅短期展出的39幅,其余均将陆续修复加固,镶嵌入库保存。

唐墓壁画 题材丰富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在社会经济空前繁荣的基础上,唐代绘画艺术的发展也达到了封建社会时期的高峰。在《历代名画记》、《唐朝名画录》等古籍中所载的206位唐代画家,就有110人参加过壁画创作活动,如阎立本、吴道子、王维、李思训、周昉、韩干等名画家都从事过壁画创作。被称为“画圣”的吴道子,一生中创作壁画达300余堵,有“天衣飞扬,满壁风动”之誉。由于时代的变迁,殿宇、邸宅、寺观内的壁画,随着建筑的毁弃而荡然无存,保存在地下墓葬中的壁画,就显得特别珍贵。

唐代盛行厚葬,事死如生,墓主要把阳世的豪华丰足的物质、文化生活搬到阴间继续享用,这不仅在墓室建筑和随葬品中得到充分体现,在墓道、过洞、甬道、墓室墙上的壁画也得到反映,从各个不同方面展示了唐代的社会风貌。

根据已发掘的唐墓壁画,其题材可分为8个方面:

1. 四神:起着标志方位的作用,即青龙、白虎绘于墓道东、西两壁,朱雀、玄武绘于墓室的南、北两室,这“天之四灵”居于墓室四面,也有作墓主保护神之意。

二,星象:绘于安置棺椁的墓室穹顶,有金乌、蟾蜍、银河、星斗等图案。

三,宗教:它与石窟壁画的佛教经变故事的内容不同,往往是对佛寺、道观建筑的描绘,呈动态的僧侣、道士、善男、信女形象也刻划得栩栩如生。

四,建筑:既是墓主生前所居官府宅第的再现,又注意从建筑规模、结构等显示墓主享受的官品爵位,因此描绘精细而准



○《我国第一座古墓壁画库》内景一角。

确。

五、仪卫:包括出行仪仗、扈从侍卫和列戟等内容,均为墓主身分、地位、等级的佐证。画面上高车骏马、旌旗映日、人员前呼后拥,场面宏伟壮观。

六、狩猎:唐代皇室贵族喜爱狩猎,同时又可炫耀武功,因此壁画反映狩猎出行的内容较多,显示的规模也都很大。

七,生产:有反映宫廷生活的内侍、宫女图,有反映文化生活的打马球、音乐演奏、舞蹈等,有反映贵族家庭侍女伺候主人的场景,以及反映农业生产的耒耜、牛耕等内容。这部分壁画不仅面积大、内容丰富,而且构思情节、人物形象都不雷同,充满了生活气息。

八,友好往来:在体育、乐舞、器具、服饰等画面上反映了中外文化交流。一些礼宾、客使图上描绘了唐朝官员接待外宾的场面,具有较高的艺术、历史价值。

〔责任编辑:穆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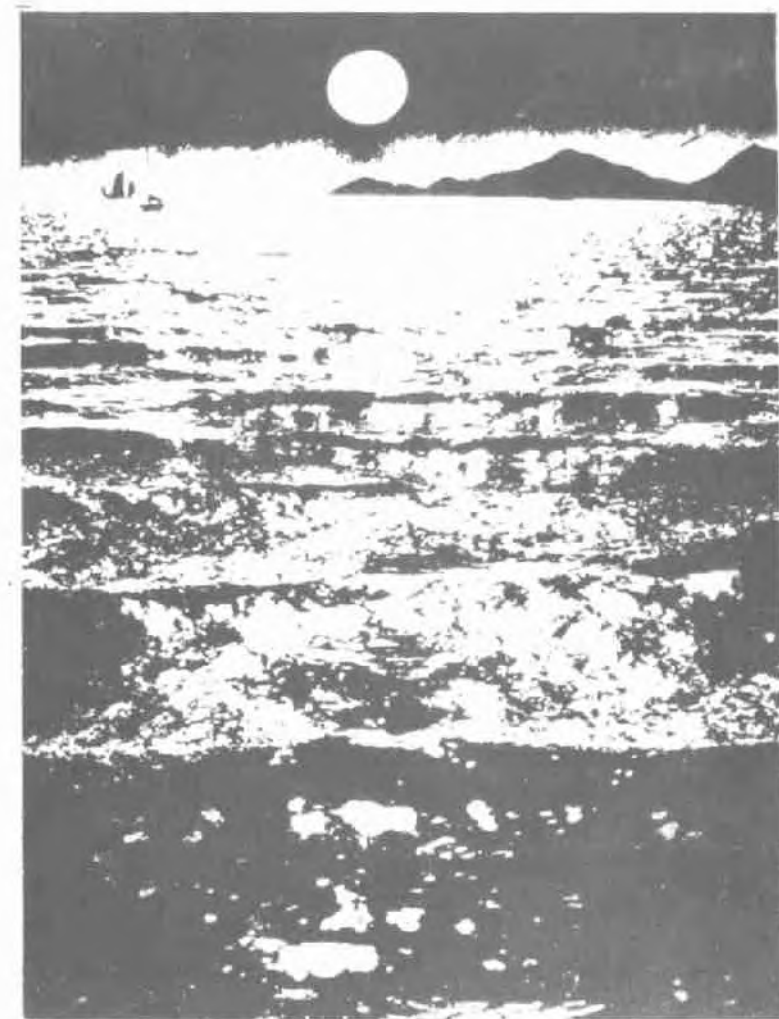
○《马图》(真品),唐,1971年乾陵陪葬墓章怀太子墓出土。



○《狩猎出行图》(之二),章怀太子李贤墓出土。

一代名医走向辉煌

——《国宝之光》之三



为了神圣的事业

505 神了！奇了！红了。从古城咸阳红到北京、上海，整个神州大地。从国内红到巴黎、纽约、曼谷、雅加达等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来辉武成功了，出名了，国内外的200多家电台、电视台、报刊宣传报道505，也报道了他。他和505同呼吸、共命运，有他才有505，两者不可分，不能分。他腰杆硬了，有钱了，1991年工厂年产值近半亿，1992年5月底已提前7个月进入1993年。

20多年执著追求，潜心研究，三秦汉子攀登上世界发明家的峰巅。老陕的505轰动了整个纽约城。离开纽

● 荏苒、晓寒、方美

约时,有人规劝他,有人挽留他,有人赤裸裸地高价收买他,要他留在美国,搞研究、办工厂。金钱、名誉、社会地位……应有尽有。只要他肯留下来,不用多久,就会成为举世瞩目的亿万富翁!他全都婉言谢绝了。他对金钱、名誉甚为淡漠,更不羡慕也不习惯国外的现代生活。他是炎黄子孙,三秦大地的儿子。祖国需要他。不久前,有的外商又聘请他到香港、到台湾办工厂,月薪5万美金。他说,中国的事需要我干一辈子呢。中国有我11亿同胞。请允许我先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再说,每月5万太少了嘛,我想盖新厂房,想搞药材基地,想建一所最好的抗衰老研究中心,每月5万元,啥时候才能办成这些事呢?

他从美国获奖回来时,江淮一带正闹水灾。他从电视屏幕上看到了群众的生命财产被洪水吞没的悲惨镜头,仿佛看到了当年爷爷奶奶一副担子,两个箩筐从神农架逃到渭水河畔的情景。他心里颤抖,坐卧不宁。号召全厂职工为灾区受难同胞奉献一份真诚。他带头捐出1000元。半天内,百多人的厂子捐了18万元。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省、市电台报道后,三秦大地救灾捐献的热潮更高了。

多年前,他做过从医的梦,就象爷爷、爸爸那样,从南山挖药,晾干后掺合起来,给乡亲们治病免灾,普救众生,积德行善。没有想过赚钱。他从祖国医学宝库中挖掘、研究、创造505时,更没有想着为自己发财、致富,只要能使患者减轻痛苦,他来辉武足矣。505经济效益显著,他有钱了。这钱是他的,也不是他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国家物价部门核定505售价82.5元,他降到38.5元。按规定505减免税收3年,他提前1年半向国家交税650万元。他用国外友人赠送的酬金设立了“505文学奖”、“西北大学505奖励基金”、“北大505文学基金”、“505医德奖”、“陕西省505教师奖励基金”等,为黄帝陵扩建以及社会公益事业、医疗卫生事业和教育事业及四川、江淮灾区捐款捐物等,累计近千万元。他向贫困户、中小學生、解放军战士免费赠送505数十万个,价值100多万元。最近又给505抗癌协会捐赠50万元,受到各界人士的高度赞扬。这却给他惹来了麻烦。有善意的劝说,叫他急流勇退。有好心人,叫他见好就收。有眼红的打他的主意。也有说他傻瓜的。甚至流言蜚语,冷嘲热讽,说啥的都有。人言可畏,他偏偏不畏人言。他说,我是属牛的,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这就是他的追求,他的生活目标和精神境界。

来辉武说:“患者是我的上帝。”他,就象青藏高原藏民朝拜喇嘛活佛,历尽艰辛,翻山越岭,一步一叩首那样,熬了20多个春秋,向他的上帝奉献出一份厚礼——505神功系列产品。

来辉武奉献给患者的是一片赤诚和深情,患者的回报却是热烈的渴望与期待:

“厂长阁下我实在无法了,求你救救我吧!跪等赐我元气袋为盼!”

“来叔叔,敬请你拉我这个挣扎在死亡线上的青年一把吧!”

……

他看到这些信时,真的被他的上帝感动了。刚强的汉子,在他攀登祖国医学高峰的险阻中,在他最艰难、最困苦的日子里,他咬着牙,狠着心,硬挺过来了,从未动过情、落过泪。这时,只有这时,他动情了,被他的上帝感动得落泪了。他说,“从这样的信中,我才真正体会到生活的价值,人生的意义!”他吩咐秘书,“马上寄505给他们,不要收款。”并说:“今后对贫困的人、中小學生、解放军战士、老弱病残者一律免费赠送505”。这就是来辉武捧给上帝的一颗滚烫的心啊!

他对患者的来信,每信必复,实在忙不过来,专设了10余人秘书班子,登记来信,给患者复信。

患者的信,上帝的经,50多万封天南地北、华夏内外的来信,象雪片一样,飞向来辉武,这是上帝带来的福音,是千千万万患者送来的喜报,他看着,笑着,笑得满足,笑得自得。他说自从有了505,生活变得神圣了。这种神圣来自他的上帝,来自千千万万患者。人世上还有比拯救生命、解除生命痛苦和延长生命的事业更神圣吗?

505 精神

来辉武发明了获金奖的505神功元气袋,他正在开创一个505的金奖企业。他担任中国老年报抗衰老研究所及陕西咸阳抗衰老研究所所长,形成了科研、生产、销售三位一体的一条龙机制。

来辉武说,他的产品和企业之所以成功,都是实事求是的结果。在他的企业不允许搞那些虚的、假的、骗人的东西,一切都得说实话,办实事,讲实效。有的记者把505说得包治百病,神乎其神。他说:“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那东西。我的元气袋只要能为60%~80%的有关病患者解除痛苦,就算为人民做了件善事。”后来,他发展成为“发扬人道主义,急患者之所急,想患者之所想,艰苦创业,积极进取,为人类的康复事业做贡献”的505精神,被奉为全厂职工的座右铭,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

来辉武搞科学研究时已是负债累累。建厂初期,一无资金,二无设备,三无厂房,处境极端困难,但他仍没有向国家伸手要一分钱,真是白手起家,艰苦创业。来辉武历尽了艰辛,吃尽了苦头,受尽了磨难,靠的是超乎常人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毅力。他每天工作十七八个小时。就是一年一度合家欢乐的大年三十也守在厂里。如今505红火了,厂房、办公用房一再扩大,由一层楼变为两层楼,由一个地方变为三个地方,他仍住在12平方米的办公、卧室兼科研三合一的小房子里。屋里依旧是一张办公桌、一个柜子、一把椅子、一张木板床、一个铺盖卷。床的一半还堆放着医药书刊。吃饭还是那样简单。一个馍,一碗稀饭,一碟辣子,就是一顿饭。他住在乡下的老妈妈和住在学校公房的妻子跟两个孩子,生活亦然如故。这在生活消费日益膨胀,相互攀比之风盛行,比阔气、讲排场的当今,这种廉洁俭朴的精神和作风,难道不令人肃然

起敬吗!

一个企业的兴衰和生命,在于消费者对产品的喜爱程度和对产品的信任程度,也就是信誉。信誉与质量,归根结底是质量。来辉武说,对于企业来说,质量就是生命,信誉就是效益,知名度就是市场。在伪劣假冒产品充斥市场,坑蒙拐骗的现象令人触目惊心的现实社会,质量更有特殊的道德、作风、心理与价值的内涵。来辉武是个诚实的发明家,也是个诚实的企业家,他为确保505的质量,从药材采集、收购、筛选、炮制到成品出厂,质检人员严格把关,生产厂长逐个检查,总厂定期抽查等都定有较完整的质检制度。他经常以身试药辨认真伪,把好质量关。有次购回一批何首乌,看后发现色泽不对,便泡了一点,亲自品尝,结果满嘴发青,浑身发冷,头晕目眩。他马上断定是假,立即退回。象这样的药品中毒,他已是习以为常。有的中药特别昂贵,但缺了它,505功效就难以保证,他从不马虎、凑合,宁肯重金四处收购。厂里明确规定,确系质量问题的保证退换,确属没有效益的保证退款。因而产品合格率一直稳定在99.5%以上,受到国内外千千万万患者的信赖和社会各界的普遍赞誉。

来辉武面对瞬息万变的市场行情,特别是由他带头而兴起的陕类保健治病的药袋子日益增多,他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居安思危。要“生产一批,试制一批,开发一批”,不断开拓奋进,积极进取,才能使505事业充满活力,立于不败之地。他亲自设计并实施的两个宏伟蓝图。一是90年代,随着人类对医疗保健事业需求向高层次发展的势态,方兴未艾的505在“八·五”期间的奋斗目标是,力争年产值过亿元,年利税达到2000万元,给咸阳市建设一所现代化的大学。二是搞药材基地。现在投资1500万元,面积8000平方米的科技大楼,已破土动工。成立抗衰老研究中心,将聘请世界最有威望的科学家参与研究。何等宽阔的胸怀,何等雄伟的抱负!这就是一个企业兴旺发达的根本动力。

来辉武在困境中敢于向干部制度的铁交椅、铁饭碗、铁工资提出挑战,这在深化改革的当今,具有深刻意义。他开创的505企业,从来没有“三铁”。职工的招聘和考核以才能和品德为准则,不拉圈子,不搞裙带关系,不论资排辈,不任人唯亲,而是任人唯贤、任人唯能。对职工的考查重在业绩,重在贡献,体现了按劳分配。实行了奖优淘劣,奖勤罚懒的工资制度。他说:“企业的活力在于奖勤罚懒。三勤加一懒,要懒懒不成。三懒加一勤,要勤勤不了。”使真正有才能、贡献大的职工拿到高报酬。职工有严重过失,厂长可随时撤免。同时,关心提高职工的素质,为职工排忧解难。因而才使一批大学生和有才干的年轻人应聘而来。厂管理干部中80%是大学生,平均年龄不到25岁。他们安心扎根,感到有干头,有奔头,工作中踏实负责,积极进取,生龙活虎,增进了企业内部的竞争力,增强了企业整体的凝聚力和开拓奋进的活力。505企业呈现一派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勃勃生机。这些,在开放改革深化的当今,在破“三铁”的实践中,是值得称赞的。

505事业发展神速,年轻队伍不断壮大。来辉武为把505厂办成具有现代化管理水平企业,他在1991年底,四处奔波,求贤如渴,数次登门求教管理学家丁耀华教授。丁教授是以标准法制为核心的“管理场”理论的创造者。该理论在企业管理中是行之有效的。丁教授率专家组来到505厂,为该厂发展速度之快,效益之高而惊叹。从提高干部素质入手,在厂里举办特训班。来辉武说,我们要走标准法制管理的道路。增加管理投资,以高起点、高质量、高速度创造管理奇迹。他说一不二,言传身教,上课从不迟到早退,多次从省城赶回听课。半年来,专家与干部合作已完成现代化管理标准40多个。在“答辩会”上,省技术监督局同志说,505的管理法制体系这一成就使我感到非常惊讶,这是我省企业罕见的奇迹。来辉武将用505现代化管理创出金奖。

来辉武从505投产以来,正在开创一个505的新型企业,创造出企业可敬可佩的505精神。这种精神,根植于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传统,又赋予了20世纪90年代的时代特征。

路,永远没有止境

半路出家能成仙。

505的魔力使来辉武神了。虔诚的患者感激他,敬重他,称他是华佗再现、扁鹊显圣、药王身后又一人等。神仙般的赞美歌。而实际上,他只是中学毕业,在工余念完了中医刊大、中药刊院。可贵的是他奋发图强,持之以恒,付出比常人成倍成倍的时间、精力和代价,以金石可镂、锲而不舍的精神,终于成为自学成才的世界发明家。接踵而来的是被戴上了研究员、名誉教授、兼职教授、讲学团教授、编审委员等头衔。这时有人眼红,有人不服气,有人说三道四。在当今传统的观念里,大学教授,必定是中学而大学、硕士生、博士生而后教授。来辉武有啥文凭?各种看法、议论是可以理解的。20世纪30年代初,华罗庚也没有文凭,刻苦钻研,写出了震动整个数学界的学术论文,而后才踏进堂堂高等学府清华大学。华佗、扁鹊、孙思邈、李时珍也没上过啥大学,在治病实践中成为一代医圣。在东方的国度里,往往是国外点“状元”,国内戴“皇冠”。来辉武是首次获得此类成果世界发明家奖的唯一中国人。议论是否有点对他太不公正、太不公平了。还是一位有名望的中医老教授说的好:“孙思邈称为一代药王,治过多少病人?来辉武拥有数百万个患者,比药王多得多,这在中国医学史上是没有的。505的实用性、普及性是中国医学史上了不起的事情。他的整体疗法、综合治本的思想可能引起医学界方法论的变革。”来辉武继承祖国中医药传统,挖掘中医药的优秀思想和方法,把内病外治发扬光大,是对人类生命开拓性的延伸。

人类文明史上,自从18世纪60年代始,相继爆发的第一、第二次技术革命,都是以人类创造物质财富的劳动工具手、脚的延伸为特征。20世纪40年代爆发的第三次

技术革命,则是以人类创造精神财富的劳动工具大脑的延伸为特征。505是减轻病痛、延年益寿的事业,是对人类生命的延伸,比技术革命更具有深远和深刻的意义。

来辉武成名了,但他并未成仙。他是个实实在在的人,身高1.7米,敦敦实实的个头,胖乎乎的圆脸盘,憨厚实诚,慈眉善目,笑着活象那尊丰满仁慈的弥勒佛。他是普普通通的三秦汉子,衣着朴素,实在没有格外出众的地方,迎面碰怀,谁也不会置信他就是世界发明家。几年的磨炼,他应酬、会谈、接待宾客,不卑不亢,因人而异,合时而来,洒脱自如,谈笑风生,有时也流露出在黄土疙瘩中滚打出来土生土长的本性。

来辉武被神州大地一股505旋风卷了进去。现代化的电子传播媒介、现代化的报纸、期刊为这股旋风推波助澜,一阵比一阵强劲。信件象雪片一般飞进秘书科,来人象潮水一般涌进接待室。上上、下下、方方、面面的邀请接二连三。名目繁多的会议频频不断,各种电报、电话、电传叠加而至。要钱、要物、要支持、要赞助的人推拥不动。还有工厂的远景规划、生产计划、大楼基建、药材基地以及科研、生产、销售等等,事无巨细,要安排、处理、过问、检查、决策,他事必躬亲。时而来辉武推着旋风转,他指挥若定,得心应手,潇洒自如。他踏实、惬意、满足、欢快,善良憨厚地笑。这是他20多年期盼追求的生活。时而旋风卷着他走,他晕头转向,眼花缭乱,有三头六臂也难以招架。他沉重、痛苦、无奈、焦虑、发脾气,甚至怒不可遏。裂变的时代裂变的人,年轻的企业年轻的队伍,新旧观念的撞击和某些人丧尽天良的行径,逼得他扭曲了自我。名人也有他的优长和劣短。他为了千千万万个人,也得罪了少数人。某些人为了达到他们险恶目的而造谣、演绎、添枝加叶,甚至真真假假、真假难辨,令人啼笑皆非。

辉煌的事业,辉煌的生活,仍处于重重的矛盾裂变之中。

来辉武是靠挖掘、研究祖国中医学起家的,他不满足企业家的生涯,时时刻刻要竭力回归到中医学研究上来,把多年的研究实践总结、概括、提高、升华到理性水平上。他撰著了《保健必读》一书,由陕西科技出版社出版。陈可冀教授在序中说:“本书科学实用,对于影响人们健康长寿的因素,诸如环境因素、生物因素、饮食营养因素、起居活动因素,乃至心理平衡等重要环节,均做了有中有西,有中国特色的、切合实际的阐述……是一本十分难得的指导保健的书籍。”他与冯孝义等人主编了《长寿与科学》一书,由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本书一、二章系统阐述了生物与人类寿命的一般规律,以及伴随老化进程机体各器官、各系统所出现的衰老变化,较全面的介绍了衰老起因的各种学说;第三章较全面地介绍了古今中外各种抗衰老的方法,其中包括505神功元气袋的机理和科学依据。他还撰写了“浅谈内病外治”等多篇论文。

来辉武著书立说,推出505系列产品,但他并不满意和舒心。科学研究和505企业的发展相比,进展太慢了。他千方百计要把被人分割的时空回归于己,然后合理地

分配科研与企业的时空比。目下他还是无能为力。科学研究是505事业的根基和核心。他要发展505科学事业,还得学习、提高、深造,完善自我。没有学习和科研,505事业就要停滞、衰退,失去发展的生命活力。这是来辉武经常告诫自己的。

来辉武成功了。他破除了重重观念的束缚,越过了种种世俗的险阻,跋涉了道道中医学的崇山峻岭,攀上了精神境界的高山奇峰,闯过了人生路上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在祖国医学书典、文献的大海里艰难地游着,忽儿沉入浪底,几乎被海浪吞没。忽儿飘上浪尖,向彼岸微笑。他终于绕过暗礁,爬上海滩,捧着五色缤纷的贝壳,灿烂夺目的珍珠,到达成功的彼岸。

时代呼唤英才,抚育人才。英才群出,推动时代,为时代增添奇霞异彩。来辉武和505的成功深深地印着我们时代进化的足迹。改革开放的宽松环境,为一切有志者提供了按照自我意愿、自我兴趣、自我爱好发挥才干的良好气候。事业成功者必然是那些敢于攀登、不畏艰难险阻、不辞劳苦的人。他自我拼搏、自学成才,成为世界名人。社会的进化,生活的改善,使富裕的人民有了预防疾病、延年益寿的迫切需求,而且这种需求越来越高。505的走红,有着这种社会需求的深厚土壤。来辉武应时而起,505应运而生。

来辉武的成功是挖掘我们祖国中医学和弘扬民族精神的灿烂成果。这两者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的两大国宝。他是千千万万挖掘国宝的佼佼者。他发现和综合创造的505使祖国医药学得以发扬光大,赋予了时代的精神和生命力,并发展到了一个新水平。中华民族的医药国宝必须用中华民族的精神国宝去挖掘,才能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成大医者必先有大德,有大德者方能成大医。德医一体,德医合流,两者不可分的关系就象有了来辉武才能有505一样。

他说,我已无所求,只求治病救人,有益于人类。因为我知道,我奉献于人类的东西,不是浮浅的、稍纵即逝的,更不是虚假的,而是真正的喜悦,是深刻到生命本身的、只要生命存在它就存在延续的喜悦。做一个给人以喜悦的人,足矣。

他就象一个终生跋涉的朝圣者,为着至高无上的目标宁肯舍弃一切,甚至生命,却不停止追求和创造,因为永远无止境的追求和永不疲倦的创新,才是他真正的生命。

来辉武成功之路是坎坷的,又是幸运的。通往他心中圣地的路途还将会遇到数不清的惊险和风浪。然而,象他这样一个从苦难中脱颖而出而又不忘记昔日艰难的人,一个给人类做出很大贡献但仍不失淳朴真实的人,一个在奋斗中功成名就而又充满献身精神的人,一个获得世界性荣誉而又深深扎根于三秦大地黄土之中的人,我们相信他必将一如既往,在与命运的不屈不挠的拼搏中展现出他生命的辉煌。

高岗曾建议

将东北划归苏联吗？

求是篇

中国和原苏联两党、两国和两国领导人的关系史，在原苏联和中国都曾有过许多误传，为了对历史负责，我才写了一些回忆录。但象伊·弗·柯瓦廖夫(有的译为科瓦廖夫，为同一人)那样任意编造，却是很令人吃惊的！更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国内把这些谎言刊登在内部刊物上，又由内部刊物到公开刊物，俨然以历史的面目出现，混淆视听。如若任其流传，又将是一笔糊涂史！因此，我同样为了对历史负责，不能对此保持沉默。

揭穿柯瓦廖夫的谎言

● 师哲口述 师秋朗执笔

柯瓦廖夫何许人？

《人物》1992年第6期的一段摘自《党史信息》160期的一段文字中提到的“斯大林私人代表”就是柯瓦廖夫。其实，他不是斯大林私人代表，也不可能是斯大林私人代表。

伊·弗·柯瓦廖夫是原苏联铁路上的技术干部。苏德战争以后，他在恢复乌克兰西南线(通往罗马尼亚)铁路运输是有成绩的，受到国家的重视。我国东北解放以后，为了尽快恢复中长铁路，苏联1948年把柯瓦廖夫调到那里。

柯瓦廖夫和高岗气味相投，一拍即合，他们互相吹捧，“专家组”这一头衔就是高岗给柯瓦廖夫安上的，后来毛泽东也这样称呼，有时还称他“顾问”。应该说明：苏方从来没有给柯瓦廖夫这种委任。

高岗怎样向毛泽东介绍柯瓦廖夫，我不知道。不过，毛泽东进北京以后，柯瓦廖夫也随即来到北京，先住在东交民巷，接着又让他住到了香山。在香山同毛泽东相隔两三道沟。

柯瓦廖夫住到香山没有几天，毛泽东就要去拜访他，当然事先给他打了招呼。柯瓦廖夫为了招待毛泽东，从东北铁路上调来四五位漂亮的苏联姑娘。毛泽东到达后，就由这些姑娘一会儿献茶，一会儿敬酒，有的卖弄风骚，有的烦恼异常。显然是迫于他的淫威。毛泽东是很厌恶的，刚从柯瓦廖夫寓所出来，毛泽东就说了一句：“这就是柯瓦廖夫！”

此后，毛泽东还找柯瓦廖夫谈过几次，那同在延安时给孙

平、阿洛夫等苏联同志谈的内容相近,毛泽东是想通过他们使苏联对中国革命有更多的了解,但柯瓦廖夫并没有起到这个作用。

1949年7月刘少奇秘密访苏,是带了柯瓦廖夫去的。柯瓦廖夫不知从哪里搞到几十公斤水银带回国去了。由于我们飞了7天才到莫斯科,斯大林对刘少奇的安全和健康十分关心,第一次会见时,刘少奇把柯瓦廖夫也带去了。柯瓦廖夫在斯大林面前像老鼠见了猫一样,座也不敢坐,头也不敢抬。斯大林向他询问了沿途情况和中长铁路一些情况,他回答完就离开了,前后不到半个小时。除此之外,他根本不可能见到斯大林,更谈不上什么“斯大林私人代表”。

1949年末,毛泽东访苏,柯瓦廖夫活动苏方允许,一同返苏。我在《陪同毛主席访苏》一文中写到毛泽东在莫斯科向柯瓦廖夫和费德林发了一顿脾气,我没在场,是费德林翻译的。毛泽东的意图是想让他们向斯大林反映他的不满情绪,但事实上他们根本不敢向斯大林反映。但柯瓦廖夫对这次挨骂怀恨在心,便给斯大林写了一封长信,告我们的状。斯大林在一次接见毛泽东和周恩来时,亲自把那封信交给了我们,并笑着说:“只看了一点,看不下去,交给你们自己去处理吧。”并说:“柯瓦廖夫是铁路上的一名技术人员,对于政治一窍不通。自己是个门外汉,还要削尖脑袋往政治里钻。他要是钻到政治里,就象老鼠钻进了风箱。”那封信很长,如译成中文约1万字。其内容,我已毫无印象,因为根本没有值得记忆的东西。

原苏联《远东问题》杂志1991年第6期所刊柯瓦廖夫的言论(中国某内部刊物转载)说:“1950年2月,他听说,斯大林把他写的这份报告和他批评中共中央的其他秘密电报以及装有高岗送给斯大林本人的情报的文件夹都交给了毛泽东。”这里除了柯瓦廖夫写的那封不值一文的长信以外,其余都是他添的油、加的醋。

自从斯大林见了那封信之后,柯瓦廖夫再也没有同我们见过面,也没再来过中国。毛主席访苏后期,在同斯大林谈给中国派专家顾问的问题时,毛泽东仍提出要柯瓦廖夫到中国来,意思是不究既往,我们能容人。但斯大林说:“不,柯瓦廖夫水平不够,我给你们派更合适的人。”那就是尤金(理论方面)和阿尔希波夫(经济方面)。

柯瓦廖夫谎言择要

《人物》引自《党史信息》的一段话是这样写的:

“1991年,斯大林私人代表伊·弗·柯瓦廖夫在答复苏联中国历史研究专家贡恰罗夫的提问时证实,1949年7月27日在联共(布)召开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列席会议的高岗建议把中国东北宣布为苏联的第17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高岗认为这样既可使东北免遭美国方面的袭击,又可使东北成为最后歼灭蒋介石军队的可靠根据地。……”

真的会有这样的事吗?

柯瓦廖夫不可能是斯大林的私人代表,前面已说明。至于高岗的这件事,简单地讲:根本没有其事!

试想:

第一,苏共政治局会议上的事,你柯瓦廖夫是怎么知道的?是不是为了说明消息的来源而把自己说成是“斯大林私人代表”?简直可笑之极,荒唐之极。研究历史的人,不仅应该搜集资料,还要把提供资料者的身份弄清楚,否则,你就可能被人愚弄,你的“史”就毫无价值,还会把人引入歧途。

第二,且不说高岗有没有此种想法,首先是他敢说这样的话吗?这是常识问题。

第三,“高岗认为”的两个理由根本不能成立。首先美国不敢或无意直接卷入中国内战,这在毛泽东在西柏坡同米高扬谈话中已分析得很清楚。同样在场的柯瓦廖夫,究竟听懂了什么?似此重大问题,高岗会分析么?分析过么?其次,1949年7月,解放战争已近尾声,不仅东北是巩固的后方,华北、西北以及华中、华东、西南的大部也已是巩固的后方,所谓为了“使东北成为最后歼灭蒋介石军队的可靠根据地”,岂不大大落后于时局?这只有“钻在风箱里”的柯瓦廖夫这样的“政治家”才想得出来!

在一份内部材料上还有这样一段话:

“柯瓦廖夫曾非常直截了当地对中共领导人说,中共不应该试图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斯大林于1949年4月拍给毛泽东的电报中重申了柯瓦廖夫的这条意见。斯大林在这封电报中指示中共只可以同美国发展经济关系而不可以发展政治关系。斯大林在1949年7月在同来访的刘少奇交谈时,用比这封电报更严厉的措辞向刘少奇提出了这个意见。”

事实是怎样的呢?

新中国成立后的外交方针,是毛泽东在全国解放以前就早已明确了的。他说:我们的屋子太脏了,要先打扫一遍,打扫干净了,然后才好请客人进来;与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决不着急,有的需要三五年,有的需要七八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这后者就是指的美国。相反,当年倒是斯大林不赞成我们在外交上“一边倒”,他认为应该同各国都建立外交关系,而只在政治上区别对待。斯大林也只是谈自己的看法,根本不存在什么“指示”啊、“严厉的措辞”啊等等。何况我们有自己独立的外交政策。毛泽东的主见谁也影响不了,斯大林也是知道的。

我所看到的所有柯瓦廖夫的言论中,只有一件事是符合事实的,那就是米高扬在西柏坡期间,没有建议我们不要过长江。除此之外,全都是胡说八道!

作为中国问题专家的原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中国研究室主任谢尔盖·贡恰罗夫把柯瓦廖夫这个小丑的言论当成“一段真实的历史”,如获至宝,不足为奇。这是因为原苏联缺乏民主,只要蒙过斯大林的耳目,什么事都可以干。这就为品质恶劣的人留下了可钻的空子。本文所及,只是可悲的现象之一而已。

1992年11月30日

周奇勋 和他

的“阶梯行动”

于源



英语仙是台语对英语教师的尊称，有博学与奋进的含义。本文主人公周奇勋先生曾做英语仙。现在不是了。不过，他所从事的“阶梯企业”又可称广义的英语仙。

—

那是个冬天。1989年12月，周奇勋下榻北京饭店。一天晚上，他闲步长安街头，行人渐少，路灯下寒意朦胧。也许就是那么一瞬间，他忽然感到被什么东西触动了。什么东西呢？不可名状。他只觉得长安街、天安门、紫禁城仿佛响起悠远的回声。这回声使他感到祖国的脉动是那样的清晰。

这是他第一次来大陆，还是一个偶然机会：去无锡买紫砂壶，没买到。最后他到了北京。

三年后的一个下午，周先生在北京外语学院电教厅，在关于“走遍美国”教学片的演示会上，而对十几所北京高校的外语专家们，也谈到了那个冬夜：“那天晚上，很冷，我做了很多思考，感到内心的一种脉动与民族的脉动

很合拍，想为整个民族尽一点力……”

那个冬夜，他心里总在响着一个声音：“应该尽一点力。”他想到外语——做为向世界沟通的语言，以及台湾阶梯公司，以引领普通人学习外语的特殊企业。

假如大陆也有一个“阶梯公司”呢？

回到台湾，周先生在阶梯公司董事会会上提出：我们应在大陆搞“分公司”，原因是……。与会者均无反应。又一次会上，周先生重讲在大陆办公司的事，还是没有反应……。

周奇勋家住美国。

那是新泽西州的一个小城镇，位于费城与纽约之间，是中产阶级的居住区。环境优雅、静谧，飘有花草的芳香。台湾阶梯公司美国分公司就设在这里。周先生供职于此，还兼办英语教学方面的刊物，与欧美出版商常有往来。

周先生的妻子在小城经营珠宝，回到家里便是贤妻良母。他们感情很好，总是相爱如初。周先生年轻时，有一位富家女子痴情于他。如结良缘，倒是可以改善周家之窘迫。周奇勋却放弃了。后来，他在街上遇见一位姑娘，气质

不凡,很动人。他就上前搭话:“明天请你跳舞好吗?”姑娘点头了,他们相识了,这就是他的妻子,一个普通人家的姑娘。

周先生的儿子和女儿都在罗格斯大学读书。儿子善拉提琴,女儿钢琴弹得好。周先生也颇通音律。每逢家人小聚,总有琴声与欢笑声在窗前回荡。

周先生的院子相当大,内有一块菜圃。闲来有限,他也带花弄菜,寄情田中趣。住家不远处,还有一个社区网球场。周先生常去那里挥拍,以享另一种韵味。

可是,从北京回到美国,回到小城镇时,网球打的少了,田中闲趣也少了,唯独多了些沉默。他的眼前总是晃动着长安街上那个朦胧之夜。他发现自己原来是这样的喜欢北京。是这样的渴望在那里做些什么,好像那里有许多重要的事情在等待着他。

二

周奇勋是台北县三芝乡人,祖籍福建。他本人1940年生于南京。他和他的父辈都是“原乡人”。

三芝乡是个海滨小山村。村民以农为主,渔民占少数,60年代以前日子都很艰难。文化教育自然很落后。孩子辍学是常事。有的根本上不起。周奇勋小学毕业,上了初中。那初中只有6个班,每班40余人。到这个年龄上学就更难。女孩子在家背弟妹,男孩子下地,哪有机会读书!入了学的一到农忙,也只好“缺席”。学生来源少,学校就来者不拒。不少外地的差等生,入另册者,跑到这里蹭混。

这所初中就成了这一带最差的学校。师资水平可想而知。专业老师也没有,英语课常由工艺老师或音乐老师兼授。

那时,周奇勋很好学,大部分时间用于读书。他尤其喜欢英语。还立志搞外文,最向往两种人:新闻记者和外交官。向往他们能接触和传播更多的现代文化。

但是,在这所学校外语形同虚设;他连26个字母也没学全。

实际上,周奇勋一家也很清苦。他父母亲曾因婚姻问题,双双远渡台湾海峡,来到大陆。在南京,他们生下周奇勋。回到台北后,做了几年生意,却一败涂地,又搬到乡下来,日子怎么会好过呢!周奇勋上完初中,家里就再也拿不出钱供他去外地读高中了。

“我不能不读书!”“可是,又怎么去读呢?”周奇勋别无出路,只有报考师范——不交费的高中。他考上了台北

师范学校。这是台湾最难考的学校:每年只收四百,考生高达万余人。毕业时,他成绩突出,全校排名第二。他本应留在台北教小学——多少人求之不得!他却回到了小山村,回到了母校:三芝乡国民小学。

“那时,父母不愿儿女远行,总希望我守在身边。”30多年过去,周奇勋对自己回到山乡的那些岁月至今不悔。“当然,还有更重要的原因,是想充实自己后,到大学读英语。那时,前10名毕业生,三年后可保送上大学。”还有,他喜欢当老师。“每逢星期六,我总是把孩子们叫到我那里,给他们补课。我还经常带他们上山,或去海边收集标本……”

第一年是普通老师,第二年他当上了研究主任。他干得很投入。那些年,除了教书,便是自学英语,他几乎没有放过每个早晨和夜晚。

到了第三个年头,他终于成了师范大学英语系学生——全台湾最好的英语系。在这里,他如鱼得水了。毕业后,他作为名副其实的“英语仙”,先后在台北中山女子高中和明志工业专科学校教英语。

其实,周奇勋最喜欢的还不是教书。他最喜欢的是孩子。他向往一种“超职业”的教学,似乎不是教学,是人类文明的传递和教育精神的奉献。不过,这种超越也可能相悖于某些教育制度。比如,当时专科学校的教官们就过于刻细,“男子的头发不许超过三公分”,“宿舍里不能摆放收音机”云云。不听,操行分就被打得很低,周奇勋常因此在教务会上替学生“理论”。

在他看来,“教师不是只教书的,还要有行为方面的

周奇勋和家人合影



辅导。”记得有一个学生,母亲守寡,“恋儿情结”很深,这学生很是烦恼,母亲就越发紧张。周奇勋就劝解学生:“多体谅母亲。”还建议他陪母亲多去寺庙做佛事,以求慰藉。并且介绍台大心理专家到学生家里做心理治疗。这位母亲才渐渐恢复。

至于英语教学,周奇勋自然是刻意求精了。而且他很反对死板枯燥乏味的教学。他说,英语教育不能“在升学主义的窄圈里原地打转,考试的压力,抹煞了学生的思考和创意,甚至浇熄了他们学习英语的热情之火,使许多原本活泼生动的英语课变得死气沉沉,老师与学生都觉得

兴趣索然。”他自己的英语课总是千方百计跳出旧框子、力图在教学技巧和教学设计上有所突破，以给学生更多的新鲜感与活力。他已经把英语教学和一代人的成长及整个民族对外的沟通与未来的贸易、咨询等方面的发展联系起来。正如他自己所说：“兹事体大，真是不能掉以轻心。”

三

周奇勋没有中止他的游说，尽管有人坚持己见：“外来公司怎么能在大陆生根？不可能吧？”

可能吗？周奇勋也想了很多次。

那是70年代中，周奇勋仍在明志工专任教。阶梯公司问世了。这种以代理最具权威的英语视听教材，设有语言学习服务网，引领所有学习者不断上台阶的特殊企业，建立之初就显示了旺盛的生命力。或者说，它顺应了台湾社会的发展。正如某学者所分析那样：60到70年代，台湾经济正值起飞阶段，“就业模式也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而不断发生变化。农民变成了工厂工人，处于衰落部门的生产者很快转移到更为兴旺的部门工作。这里体现了一系列的行为特征，包括学习新的知识的愿望以及适应变化的灵活性。”外语学习自然是“寻求自我提高”的重要方面。到了80年代，阶梯公司已发展为更为成熟的企业。它以创造21世纪的国际人为己任，其室内教学、户外教学、留学导航等系列，已颇得海内外专家学者的好评及英国、日本……等十二大出版公司的首肯。正是“阶梯”兴旺之际——这里云集着既懂外文又懂教学的各路精英，周奇勋也来此堪当重任，并以编写教材为主。他配合的非常好，“满发挥”，一展积蓄多年的才华与宏愿。那时，他仍兼职“明志工专”的英语课。不过他所面对的学生，已不仅是几十人的课堂了，而是成千上万英语自学者的广阔天地。

以他的英语功底，教学品质以及在阶梯的新视野和系统经验，难道还不具备在大陆创办阶梯事业的可能吗？况且，他所具备的条件还不仅仅是这些。

1985年，台湾《联合报》聘请了60个翻译，10个核稿人员，同步发行美国《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周刊的中文版——可称台湾新闻界与翻译界的一大创举。周奇勋即是10位核稿人员之一。每星期六中午12点上班，翻译当天稿件。晚12点全部翻完，审完。星期天上机，星期二出刊，节奏相当快。即便是局外人也足以想见那种紧迫感了。周奇勋一直很感谢那种磨练：使自己在重压下也能承受住。甚至在请纆去大陆办“阶梯”的日子，他也想到了那种“压力”。

1987年，他代表阶梯公司驻美工作，接任“美国分公司”副总裁。自然又跟欧美出版商往来频繁。跨文化交流方面的经验也就更为丰富。这不也是在大陆搞“阶梯”最需要的“资源”吗？

还有他的基本性格。用自己的话讲，即是：“我想做的事就一定做成，不管用什么方法，多少时间。”在他人生之

路，他的目标基本上都达到了。要做的事情都做到了，然而，在大陆搞事业的目标就不能达到了吗？其实，他的性格里还有一种素质：“我不能太安逸，我喜欢挑战。太空闲太悠闲的日子受不了！”实际上，他早就对自己在美国的清雅生活，有一种“不屈服”或“反自然”的潜意识了。

当然，还有一些说不清的“情结”，就像说不清为什么喜欢北京，为什么在1989年的冬夜有了那种“不可名状”。他并不否认自己也有“无根的漂泊感”。正如他从不拒绝台湾乡土作家钟理和的名言对他的感染：

“原乡人的血，必须流回原乡，才会停止沸腾！”

四

直到1991年底，台湾“阶梯”决策层才正式表态：先派人去看看吧。

又是冬天，周奇勋来到大陆作实地考察。回到台北，他在董事会上说：“我没有看错，问题是我们晚了。再不下决心，会更晚！”

事隔四个月，周奇勋再来大陆时，已经肩负北京阶梯公司总经理的使命，着手筹备有关事宜了。

然而，只身一人又如何闯得了京城？也无怪乎海外同仁的种种担忧了。“到大陆被人排斥怎么办？”“那种隔阂感你受得了？”“大陆办事之难，你想过吗？”

他当然想过了。可是他毕竟选择了“大陆”。选择了就不会后悔。

大陆有个叫龚亚夫的，在美国进修时，一次聚会上遇见周奇勋，由然而生敬意，最是佩服周先生的学养与人品。便问：先生何不去大陆开拓“阶梯事业”？大陆的外语热急待提高呢！周先生说：正有此意。龚亚夫说：先生果真这样，我愿鼎力相助！周奇勋打量着这位不足40岁的大陆来的英语教学专家，心里好生喜欢。“好，太好了！我们大陆见！”

还有一个叫彭剑峰的，攻读美国某大学的经济管理博士时，曾在周先生家里住过一些日子。有一天，彭剑峰对周先生说：“我想回去，我觉得国内更能发展自己。”周先生点头：“这点我太理解了！你学的是管理，在美国是没有前途的。你只有回大陆，才能施展才华。”彭剑峰喟叹：大陆的朋友劝他留在美国，周先生却劝他回去。周先生其人，果然不凡！

彭剑峰回国后，担任了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院长，成为最年轻的副教授。当然，也是周先生的得力顾问了。

还有助手吗？还有。也是一见如故。他叫张旗，人称“办事专家”。当他由龚亚夫带到周先生那里时，周先生连说：“好，就需要办事效率极佳的人！”张旗看周先生，却脱口而出：“您不像商人。”周先生笑道：“那我还有几分可爱之处啦？”

有道是：选择也是被选择，选择也是一种缘。周奇勋如此境界，在大陆又岂能孤立无援呢？

五

1992年8月,北京阶梯公司正式运转了。周奇勋终于拉开了自己人生舞台的新的一幕。

每天早上,他6点起床,晚上11点入睡。中间的十六七个小时,全部是工作。他精力过人,很难见他面带倦意。而且,时常飞来飞去,奔波于国内外。或洽谈、或研讨、或讲学、或与总公司切磋。总之,北京、上海、深圳、海南、香港、台湾、美国、英国。节奏快的像跳棋。即便在天上飞,或是机场上,也同样“运转”。

“这是一种奇怪的感受,每次坐在飞机上,总是想起许多没做完的事,没交代的话……。今天在香港机场有近三小时时间,但你们快下班了,我只先提几件事……”这是他回台北参加“英语学会理事会”,在途中给北京阶梯的电传。

事隔三日,他又在香港机场等待起飞,又挥笔“拉条子”。一份工作安排提前飞向北京:“今晨6点起床,8点05起飞,9点30抵香港,刚办完转机手续。请安排下星期一下午开内部会,时间两小时……”

他几乎在每一次起飞或降落时,都于机场电传北京,以使自己的思考和北京运转同步。

其实,在外地或国外开会与办事,也是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那次在海口参加研讨会,住在靠海的宾馆,每日只从窗口望见迷人的海天,却无暇走向海滩。他自己戏称是“望海的日子”。会议最后两三日,特安排三亚游览。与会者都兴致前往,他却把自己“软禁在房间里埋头苦干”。还电传北京,告之“如果我不在,只是去吃饭而已”。那些天他在审读“走遍美国”的加编部分。并通过电传及时与改编者交换意见。诸如“各位改编者之间的体例尚未能完全统一”。又如“给观众习练,应稍加一点变化”。

还有在英国的两天,不是开会、展示,就是谈判、交际,哪里有游览的考虑?只是在第二天饭后,才漫步街头,算是“我第一次伦敦之行的观光节目了”。

回到北京,更是一副“拼命三郎”的样子。常使助手与职员惊叹不已。

有一次,台湾阶梯来人与他交换意见。是夜,谈至午夜三点。8点40分,助手就开车接他去人民大学电脑室处理问题。11点返回公司驻地,来不及坐电梯,跑着上六层,喘着气写了三个电传,又跑下楼上车,直奔颐和园。到门口,仍是一溜小跑,以赶在11点35分与一家出版社边吃边谈。

有时台湾人来,周先生一边陪吃午餐,一边还修改文件。

但是,周先生忙而有序。而且很优雅。办公环境也是井井有条,整洁明亮。

起初大家觉得他太累,替他担心。渐渐地却发现他累得艺术,有节奏,有美感,又转为欣赏他的“艺术性”。当然更多的是感染和激励。已是副总经理的张旗就颇有感触的说:“跟着周先生工作,不忘我是不可能的。”主管财务小刘也有同感:“周先生创造了一种感觉,一种气氛,使你必须认真、不惜力。而且很舒心……”

六

现在该讲“走遍美国”的故事了。

大约八九年前,美国乔治城大学语言学院院长、国际英语教学组织会会长阿雷迪司先生写了一篇文章,试问:美国作为世界美语的代表,为什么不能出一套超水平的教学片与BBC那风行全球的“佛罗密”等抗衡呢!美国新闻总署署长威克看到了,就约见阿雷迪司。俩人深谈后,所见略同:应由美国新闻总署出面策划这件事为宜。新闻总署开始投标。麦克米伦出版公司得标,提出600万美元的预算计划。根据问卷调查,麦克米伦采取了戏剧表现形式的制作方案。1987年在世界各地试播这部片子时,又因故事不行,被否。后来重新搞,才有了以住在纽约的Stewart一家三代人的生活为轴心的、一系列各自独立的小故事的1991年版。它的中国译名——“走遍美国”。

这部耗资700万美元、历时8年、由获艾美奖的演员和动画设计公司通力合作的教学片,已在意大利、比利时、日本、墨西哥以及台湾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播出,反应极佳。

“走遍美国”为什么不走遍大陆呢?这便是周奇勋来大陆的重要目标之一。

现在,这个目标已经实现。截止1993年4月初,已有17个省市的电视台将要播出“走遍美国”。

当然,如此这般局面,谈何容易!只是,周奇勋及其助手们已经没有功夫回味其中的种种艰辛了。因为它毕竟是诸多目标中的一个。

周奇勋的阶梯行动是全方位的:开办自幼儿园到托福的多层次的外语培训中心。已在上海徐汇区试办,并且聘请了国际一流培训专家操作。正筹措举办海峡两岸中学生英语大赛。建立、并且已经开办了“阶梯书店”……。

据透露:周奇勋所代表的阶梯公司已在大陆投进资金逾百万元。有人开始为他忧虑:不知成败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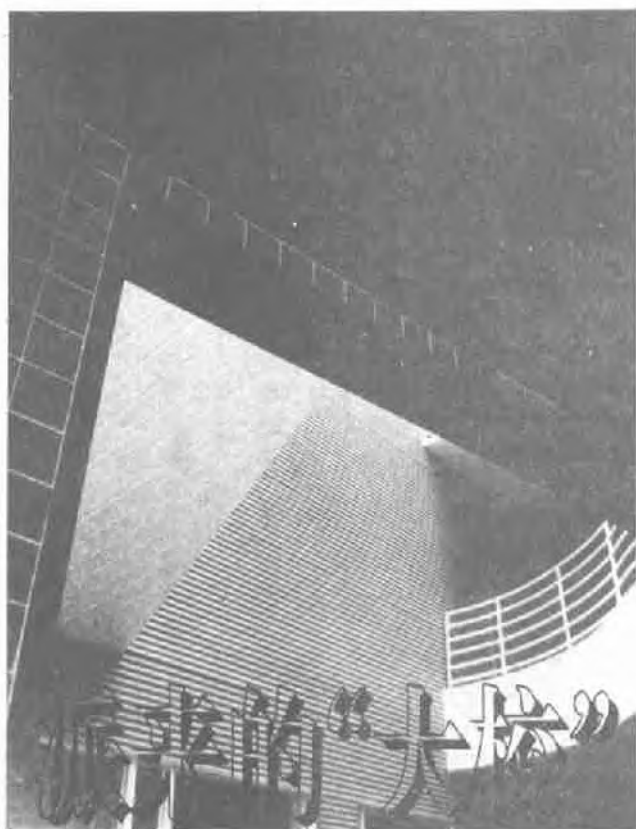
周奇勋却还有新的创意和蓝图有待铺开。

周奇勋儒雅之中仍透出胆识与魄力。

他是个不断实现梦想的人。正如他自己所说:“要有勇气做梦,做到不能做为止。”

愿周奇勋的“北京梦寻”变成灿烂辉煌的现实!

「总参谋部」



田浩

(一)

1986年10月。

居无定所的刘鸿福在奔驰的列车上随便浏览着一篇《当代骗术面面观》的纪实文学，禁不住哼了两声，都是“小儿科”的水平，难怪让人捉住曝光，当然，自己也可从中借鉴一下。

有人在他的对面坐下。

他警觉地抬起头，好气派，那人手腕上闪闪发光的雷达表，正宗的金利来领带，高档的皮尔卡丹西装。

这是条“鱼”。

“看得出来，这位老师，您在单位负的责任一定不小吧？”刘鸿福先发制人，投石问路了。

见着学者称老师，碰见地痞称大哥，女人的叫法就更因人而异，五花八门了。

谁不愿听恭维话呢？

“愧为人师，愧为人师，不过是在一家公司负点责任。”说完，那人递给他一张精美的资金名片。

“刘总经理，相见恨晚！”刘鸿福看了一眼名片后马上呈肃然起敬状，起身递烟，点火。

一阵喷云吐雾、海阔天空之后，刘鸿福得知，刘总经理属下有一规模宏大的合资公司，经营着国家的重要生产资料、生活资料，买卖遍布全国，涉及海外。并刚从海外考察回来，他想广招天下才子，将自己的买卖做得更多、更大。

这正中刘鸿福下怀。他开始毛遂自荐，向总经理推销起自己来。

他的如簧之舌，谄媚之能，君子之态，如大剂量的“蒙汗药”，将这位刘总经理放倒，总经理将一份由他签发的“委托证明书”从密码箱里拿出来，郑重其事的交到了这个萍水相逢，但却“可信赖的人面前”。

“鱼”终于被刘鸿福钓住了。

虽然刘总经理没有给他一文钱，但刘鸿福已欣喜若狂，纸虽薄，但却千斤重，实乃一纸千金。

他太知道这张纸在流通领域里的魔力了。

这张纸，象一部闹剧的脚本，戏，从这里拉开了帷幕。

(二)

青岛，如诗似画的城市。

这里有刘鸿福的旧友。

刘鸿福，曾在烟台市第二物资服务公司干过一段时间的业务员，他为公办的业务屈指可数，而他的“诈骗”业务却蒸蒸日上，以至最后将自己骗至大墙之内。

用他的话说，自己所以“栽了”，原因只有一条，就是那时候他做此“业务”的“经验”还不很多，太“嫩”了点。

今非昔比，经过这几年大墙内的“进修”，他自觉自己已明显的技高一筹。

他找到了一个往日和他“共过事”的兄弟。

择了一个吉日，刘鸿福昨日的难兄难弟们在青岛最豪华酒店里包了一个单间，为他们的龙头大哥洗尘压惊。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后，飘飘欲仙的刘鸿福开口了。

“弟兄们，大哥我给你们带来了一件价值连城的宝物，你们猜猜？”他故弄玄虚地说。

高墙之内，能有什么“宝物”？他们想不透。

“你们看。”刘鸿福从他随身携带的公文包里取出了那张“委托证明书”。

众人传看。

“这玩艺儿，能干什么？当手纸我都嫌脏。”

“不就这几个字吗？我也会写”。

“一张纸能值几个钱？”

“你们懂什么？现在没这个根本做不了大活，老子在里面天天看报，这叫‘授权委托书’，有这个东西，你的行为就是法人行为。跟你们讲多了你们也听不懂，好啦，你们就按我的吩咐办吧，到时候，有你们的票子分就是了。”

他此时很象一个自鸣得意的“导演”，开始向每一个演员“说戏”了。

他告诉他们，从现在起，他就是该公司“驻青岛办事处”的“主任”，公司现在的业务主要有，处理一大批国外废旧的轮胎，同时还要经销化肥、橡胶、各种建筑材料等等市场走俏的生产和生活资料。

刘鸿福告诉他们，公司的老板手眼通天，公司的货物可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各位尽可放心地去敛钱，越多越不嫌多。他知道“敛钱”是这帮人的强项。

他最后宣布，事成之后，他这位“主任”将代表公司向他们论功行赏。

(三)

一辆超豪华的“皇冠”卧车在青岛至黄县的公路上急驶。

刘鸿福的鼻梁上架上了一副14K金的平光眼镜，脸上也做了精心的修饰，身着新式港装，足登老板鞋，一派胸有成竹的样儿。

汽车停在了山东黄县一自行车配件厂门前。厂长姓李，对这位不期而至的“海外赤子”非常热情。没有不想吸引外资的厂长，大家都想“借鸡下蛋”。

刘鸿福又拿出了他的“镇山之宝”，那张大公司的“委托书”。

李厂长双手接过去，拿到窗前仔细看着，这可是一家赫赫有名的大公司呀。

李厂长笑了。

刘鸿福也微微的笑了。

“李厂长，本公司以扶植乡镇企业搞外向型经济为己任，我们知道中国农村有着一个潜在的巨大市场，我也是炎黄子孙嘛，当然希望祖国繁荣昌盛啦！”

他又逐一地向李厂长介绍了公司现在的经营范围和项目，特别强调公司近期从国外洽谈了一批轮胎业务……

什么鱼爱吃什么食，对这一点，他早已作了宏观和微观的分析和研究。目前，生产自行车配件的乡镇工厂最困难的事，就是无法搞到物美价廉的轮胎，他这个厂子自然不会例外。

“就是不知道贵公司的价格……”

李厂长早已被这个问题困扰多日， he 现在是烧香找不着庙，进门看不见佛，早就等不及了。

“对国内客户，有一个算一个，百分之百优惠价！”刘鸿福不失时机，再下一钩。

“好，既然给优惠，我们就先进一万支胎子！”

按照刘鸿福的要求，黄县自行车配件厂将12万元预付款汇入了刘在青岛市租借的帐号内。

望着自己手中那份盖着“公司公章”的书面合同，刘鸿福知道，第一个“节目”已经演完了。

他又开始了新的“创作”。

李厂长呢，从此就象是中了邪，开始四处寻找这位让他倒霉之极的“海外赤子”，寻找以他被撤职查办、心力衰竭住进医院而告一段落。

(四)

解放军某部驻青岛办事处在经商。

中国人民解放军——人民的子弟兵，雷锋的摇篮……，这块牌子太耀眼、夺目了。

刘鸿福的“钩”再度抛了出去。

他将第一次与解放军代表的会见安排在海滨之城中最豪华、气派、高档的大酒店——“汇泉王朝大酒店”，又选择了那个让人进去就会觉得“味道好极了”的大酒店咖啡厅。

军队代表被刘鸿福的“财大气粗”所迷惑，他们对刘鸿福寄予重托、委以重任，刘鸿福成了部队驻青岛办事处联营主任。

刘鸿福觉得自己还需要一块学者的牌子，他继续搜寻着目标。

“你真的有钱吗？”一天，一位不速之客来到了他包租的办公室问他。

“有钱怎么啦？”他看着来人，反问。

“有个事情我们可以联手搞一下。”来人立刻笑颜开地

了起来。

原来他们是“张仲景国医大学大连现代研究学院”的，现在他们也想“按经济规律办事”，下海挣钱，院里已同意他们研究院可以办一个“经济开发部”，但也仅限于“政策”和“精神”上的支持，他们必须去自筹资金方可使理想变为现实。

吃惯了官饭的人，给公家办事，从来没为缺钱发过愁，而这回让他们“自筹”，他们可真的发愁了。

怎么办？只能到社会上去搞“互惠互利”。

他们想到了刘鸿福和他那个“资金雄厚”的公司和“办事处”。

刘鸿福呢，也正需要他们这件“外衣”再抬抬身价，何况，钱多钱少反正都是骗来的，“联手”的目的对别人来说是想赚钱，对他则只是骗钱。他多“联手”一家，便多一个骗钱的渠道。经过一番商谈刘鸿福便成了“张仲景国医大学大连现代研究学院经济开发部”副主任、“集资委员会”主任。从此，“鱼”儿纷纷向他游来……

经理、军人、学者、海外华侨，刘鸿福使自己的形象越来越立体化，同时也更具有欺骗性了。

钱能通神，条能办事。以后，刘鸿福通过“滚雪球”滚出来的各种部队关系，从某部队站长郎某那里得到过若干套军官服和领章帽徽；从办事处得到了介绍信、合同书、军人通行证；从驻军某部得到了总参谋部印制的军容风纪纠察证；从驻军某医院的一位处长那里得到了手枪、子弹。

(五)

一天，刘鸿福的超豪华轿车又开进了威海市，停在了某部队服装加工厂的门前。

该厂目前经济效益在威海市的同行业中是令人咋舌的，这一点，刘鸿福早已“侦察”清楚，他同时还清楚该厂的业务负责人敢创、敢干、敢走“钢丝”且还从未“失过前蹄”。

办公室的大门没有关，刘鸿福礼貌地进门、递名片、握手，再递烟、点烟、寒暄，全部程序都过完之后，刘鸿福拿出一本报价单递到负责人丁某面前告诉他，单上，货全是现货，价格是本市最低的，欲购从速。

这么多紧俏商品，这么优惠的批发价格，丁某先是兴奋，后是吃惊，进而有点犹豫了。会不会是……这个不祥的念头刚出现，他就觉得自己亵渎了神灵。

是呀，他有什么理由怀疑眼前的这位军人呢？

“我想进一点进口尿素，你们的价格合适就是不知道供货时间……。”

“款到后三天货就会发到你们这里，晚一天我们付一天的罚金，你们只需先付二分之一的定金，待我们全部货发给你们后你们再付全款。放心，我是一名军人，我们部队的老传统是绝对不能丢的，做生意更要讲信誉，诚招天下客嘛。”

刘鸿福出色而又恰如其分的表演又征服了一颗善良而又有点幼嫩的心。

丁某和刘鸿福当即签订了一份购销进口尿素一万吨的合同。为表示自己诚意，丁某当着刘鸿福的面，让会计将70万元的人民币汇入刘鸿福提供的“公司”帐户内。

刘鸿福大喜过望，执意要请丁某共进午餐，崇倡廉洁的丁某婉言谢绝了宴请。

不必细说，丁某的70万元，“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了。最惨的是丁某和他的厂子，三个月后，他们破产倒闭了，若不是上级领导四处筹措，怕是连工人们的遣散费都发不出来了。

连连得手的刘鸿福又把触角伸到了甘肃。

这位是甘肃省农房建材公司的领导，在往来北往的火车上，他也“有幸”撞上了刘鸿福这个“大财神爷”，他激动万分，抱住不放。马上向刘鸿福发出他所负责的公司去洽谈生意的邀请。

刘鸿福此时早已悄悄的将自己“晋升”为部队办事处“主任”和张仲景医大的“主任”。合同顺利签订了，还是一万吨进口尿素，但据刘鸿福的介绍，这次是“特供”，那“尿素”的质量极好，所以不但价高，而且买方要预付全款。于是，一笔194万元的巨款又汇入了刘鸿福的“账号”。

广州白云宾馆。

商客云集，全国化工定货会议如期在这里举行。

刘鸿福在这里包了最昂贵的房间，打出了“中美联发国际贸易公司”和“驻青部队办事处”的金字招牌。

他带来的“演员”们四处活动，有意在大庭广众之下高声谈论“刘主任”的神通广大，货的物美价廉，供应如何快速便捷，发给购销人员的“购协奖”如何实惠等。

刘鸿福的房间门口竟然排起了队。

这次冲在最前面，率先受骗上当的是江苏省吴江县某物资贸易中心，依然是一纸进口尿素的合同。155万元的预付款再进刘鸿福的“帐下”。

他特地告诉“演员”们，为了“钓大鱼”，可以公开谢绝那一吨、两吨的小买卖，公开告诉他们：本公司只做千吨以上的“批发业务”。他决计要“大干快上”了。

(六)

每天都要听新闻，以便随时调整自己“经营方针”的刘鸿福听到了一个最新信息。

中央军委决定在部队授衔。

刘鸿福的脑门上渗出了汗珠，他这位“主任”在部队正式编制的档案里连一个标点符号都没有，何人会来给他“授衔”，而若是肩上没有那付金线缝制的硬牌牌，以后，他的很多“业务”都要受影响的。

不行。

刘鸿福赶在授衔前夕找到了他北京的一位朋友，应当说，这

也是一位被他欺骗的朋友。通过他的这座“桥”，刘鸿福认识了某高等军事领导机关的A秘书。

他带了很重的“敲门砖”，A秘书亲手为他打开家门，并引为上宾。

一阵听来能使常人肉麻的相互吹捧之后，刘鸿福起身告辞，走到门口，他像是又想起了什么转身对A秘书讲，因为他马上去吉林参加一个重要的交易会，肯定赶不上回去领衔，能不能先借他一副大校军衔戴着。

区区小事，何足挂齿，A秘书眼都没眨一下便送给他大校军衔一副。

这副大校军衔，刘鸿福自然“想不起”再去“还”，A秘书呢？更是“忙得顾不上要”了。

(七)

“大校”的肩章，使刘鸿福再次“晋升”为师级首长，他的自我感觉更好了，此后，他“业务”的成交额直线上升，他走到哪儿，身后便跟来一群像侍从似的“经理帮”。

他给追随者们留下了诸多“神秘感”。

刘鸿福告诉他们，他现在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某情报部门的“处长”，目前，他直接掌管和负责的是“国际军事技术的特种业务”……

他包租了位于繁华闹市区的北海宾馆中最高档的客房，同时调来了自己的“演员剧团”，闹剧又拉开一幕。

此时，北海宾馆楼下的大厅里，一脸愁容的山东惠民地区惠民田联营公司经理正在“走柳”，他等待刘鸿福的“召见”已经等了近四个小时了。

他不敢走，也不敢去催。

因为他已得到了关于这位“总参大校处长”的多条秘闻，其中一条引起了他的莫大兴趣，即“刘处长”能“搞到国家进出口物资的批文”。

他想跟“刘处长”签一份正式的经济合同，那才是真的。

“惠民的同志来了吗？”楼上的“首长”问他的“秘书”。

“来了，来了”。一直在底下候着的惠民来的经理闻声跑了上去。

“我们当然要签合同啦，这对咱们双方都是个约束，你怕我违约，我还怕你违法呢！”刘鸿福以守为攻，欲擒故纵，他的“业务”已经做到了异常娴熟的地步。

“我知道，你们惠民地区有特产青苧麻，我可以通过国务院和总参首长给你们搞到批文，让你们出口赚钱。”他看了一眼惠民田经理递给他的名片，微笑着接着说道：“你们需要起草一个报告给我，向中央有关部门介绍一下你们的情况，当然，你们要是着急，我现在就可以给国务院的有关领导打一个电话先给你们联系一下。”

“着急、着急，麻烦您先跟领导们打一个招呼。”经理的着急

显然是可以理解的，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其实，最着急的是刘鸿福，他不愿失掉每一个“机会”。

他不失时机的拿起了电话，随意拨了几位数，便开始了一次和国务院某领导秘书的“长谈”。他很“费劲”的跟“秘书”讲着，看着他那张表情千变万化的脸，经理很不好意思，他并不知道他自己刚才充其量是看了一个上乘的“小品”。

既然“小品”成功，刘鸿福干脆再抛给他一个“大绣球”。

“你们要是真的愿做这个买卖，我们可以联营，你们可以先出300万元至500万元，届时3个月除还本外我们还可以外加50万元利息分给你们，生意做成后，另按股份分成。”

真是碰上财神爷了，按刘鸿福刚才的说法，若是他们真做这笔买卖，除净赚盈利份额外，还可再挣50万，这还叫买卖吗？

到底是见过点世面的人，他想起了公证，对，去公证处。他敢给我50万，他自己至少应该赚100万，我们去公证，到时候谁瞧谁也别眼红。

公证员面对着这位“师级”的“大校首长”也有点眼晕，还查什么呢，那军服、肩章、手枪、身边形影不离的“便衣警察”，“师首长”对这位年轻的公证员很是热情，主动要求依法监督……

一顿美酒佳肴之后，公证机关的大印盖在了公证书上。

合同的实施细则谈判半天就进行完了，刘鸿福提供一切优惠，惠民方面很快签字划押，360万元“联营款”又进了刘鸿福的金库。

(八)

刘鸿福的“事业”“蒸蒸日上”之时，也正是他的末日即将来临之日。

引擎轰鸣，机翼闪光，中国民航的波音747客机滑进了青岛机场的跑道。

“大校”潇洒地走下弦梯，走进了候机楼。在大厅里，他突然怔住了，几名公安干警挡住了他的去路，他知道，这次无论怎样表演都走不过去了。

他还算识时务，自觉钻进了警车里，到拘留所食宿去了。

他开始交待自己执导的每一个“闹剧”。

据调查，2年多来，刘鸿福共诈骗巨款998万元，做了大大小小一百多笔“业务”，他在此期间共挥霍人民币218万元之多。

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最终以诈骗罪判处刘鸿福无期徒刑。

他的“业务”永远的做完了，他得到了一些有价的东西，但他却失去对人来说是无价的东西——自由。

刘鸿福罪有应得，将在铁窗内度过他的余生，然而，对于那些被骗者呢？请每一个人都记住吧——改革需要智慧、勇气，但这一切都必须是在法律的轨道中运作才有意义。否则，等待你的，也许是奔向牢狱之门、黄泉之路的警车。

[责任编辑 晓度]

画家苗地长我几岁,前几年已经办了离休手续。我也退休在即,非得找他要一张画不可了。

40年来风里雨里,我们在一个单位工作,几乎天天见面,原以为相处的日子还长着呢,索画的事何必着急。看来在阳世间要办的事,最好不要拖到阴间再去补办,到那时也许因地址不详,未必能找得到他。于是同他讲了,他马上拍胸脯:“那还用说?我一定给你一张我最得意的画。咱俩还有什么说的。”拍拍屁股,他骑着自行车就溜了。看那背影,当然没有30年前那么麻利,甚至连背也有点驼了。岁月不饶人哪!当年我们在青年团一起筹备个联欢会或舞会什么的,他可是个活跃分子,很多女孩子都乐意围着他转。一来他脾气好,有人缘,二来高高的个头,挺帅的。后来一打听,他不仅使君有妇,家中且养有两名公子,有心的便悄然离开,无心的逗他更厉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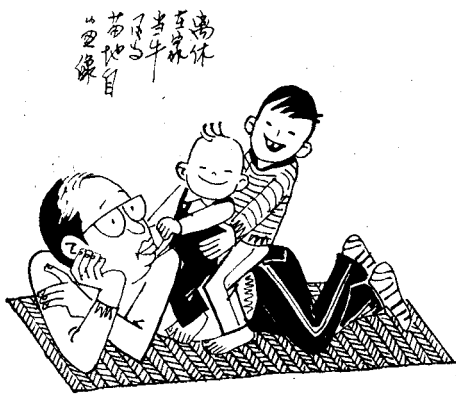
大概是解放的头一年,他同妻子以流亡学生的身份由太原来到北平。北平一解放,他进了华北大学,很快调到报社来工作。我是迟他一步分配来的。镇压反革命运动那年,他同赵志方兄一起到天津采访,回来后合作了一套连环画“姚大娘捉特务”,经华君武同志的手在报上发表,从此一举成名。他什么都画,这个版缺个插图找他,那个版要配个漫画找他,还有让他画题头装饰,或写美术字的,他都干。有时候他也发牢骚,说画画的未必会写美术字,可人家就是不信,一边嬉笑着打岔:“别客气了,大艺术家!”背后却奚落地说:“光想画有名

人海浪

向苗地兄

索画记趣

●姜德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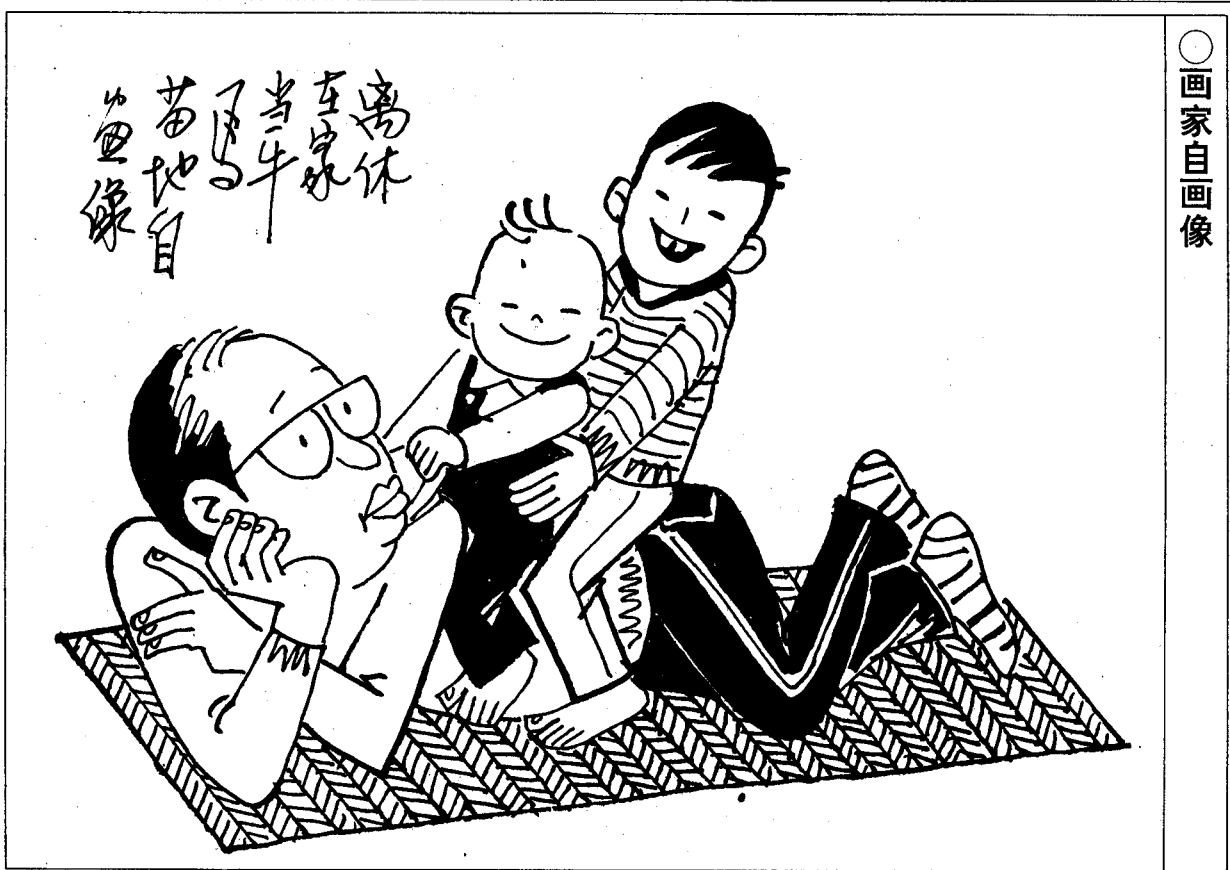


有利的,无名无利的不乐意干。”做人真难呀!

最拿手的该是画儿童了,苗地笔下的孩子都是在红旗下长大的。因此个个胖乎乎的俊美可爱,幸福天真。几十年来他画过多少孩子呢?没法儿统计了。我想这同他早生贵子,后来又得了一名掌上明珠有关系。他太爱孩子,也太熟悉孩子了。她的小女儿同我的小女儿在幼儿园是一班。那年赶上闹传染病,幼儿园不放假,我们都带着吃的去看女儿,我带的饼干和巧克力,苗地却带了一饭盒肥猪肉。女儿嘴里鼓鼓的还没咽下去,他又塞进去一大块,简直象是填鸭。事后他还向我介绍经验,就是让她们吃!你看我女儿多壮,从来不生大病,那么充满了生活情趣,正出自他的一片爱护子女之心,所以他的儿童画取得了成功。现在他已经有了第三代,也是两男一女,他自然对每一个都鞠躬尽瘁。我偶尔挖苦他,你究竟是爷爷呢,还是孙子!他苦笑不语,绝无异议。

他画漫画是从工作需要出发的,产量不小,因此社会上公认他是一位漫画家。我更喜欢他画的舞台人物速写,尤其是舞蹈速写,艺术上相当成熟,线条流利而准确,绝不显得柔弱和雕饰,我当面吹捧他:“叶浅予先生第一,你是老二。”他奉我为知音,有时感动得涕泪交流,真诚地表示:“我挑选几张满意的,给你重画一遍,然后装裱成一本册页送给你。”有时又兴致勃勃地说:“我给你画一张大的,彩墨的,并且为你装好镜框送给你。”可是说过了就随风而逝,幸亏我当时也没怎么当真,否则我会伤感的。

当然,我也当面骂过他,那



是他画什么外国旅游者畅游我国名胜等，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在一张画纸上象走迷魂阵似的一画多少天。画而满的没有一点空间，我感到繁琐腻味，了无意境，而他还得意地标榜是仿“清明上河图”的技法。我便给他泼冷水：“光画这个成不了大画家，你是在描小人呢，没出息！”苗兄待人忠厚，他听了从不生气，只是呆呆地望着我，可能心里在骂我的无礼而又无知。

在“文革”当中，我们一起去江南出差，在苏州车站，他换装照相机里的胶片，把印有外文字的说明书扔在一边，被车站纠察人员发现，当成机密情报。待我们一到无锡，当地公安人员便转告我们这事。我们一惊，也一笑了之。回到北京，我一转述，人们都戏称他：“特务”。

在上海，我们住在解放日报招待所，离外滩不远，每天晚饭后便到黄浦江边去散步。伏在江边的防护矮墙边，苗兄被落日的江景迷醉了，对身边早已挤满了一对一对情侣却一无所知，害得少男少女们也不敢热烈起来。最后还是一位泼辣的女郎硬是用屁股把苗兄给拱开了，还用上海话骂了他一句太不识相。

隔天我们又去城隍庙吃汤团、小圆子，苗兄看到一家饭馆的

匾额“上海老饭店”，他不加思索地大不以为然，认为上海人太不谦虚了，怎么能自称是“上海佬”呢！我回答他，既然有“北方佬”、“美国佬”，为什么不能有“上海佬”呢？总之，四十年相处，从青年到白头，类似这样的糊涂账也不知一共有多少。包括“文革”当中，我们各自参加的群众组织是对立面，可我们从未反目过，也没红过脸，这自然是由于苗兄一向为人海量，并有兄长的风度。

现在我可要揭开苗兄最怕别人知道的一个秘密了，其实也快要无法保密了。多年前我们还是小青年时代，有一次谈起儿童时的往事，他突然告诉我，年幼时他像当和尚似的受过戒，至今头皮上还留下老和尚用香火烧就的六个圆点秃斑。说着还低头扒开了茂密的黑发让我看。他说那是山西的迷信风俗，受过戒的孩子寿命长。现在，苗兄老矣，头发渐渐地稀疏，秃斑快要遮盖不住了。那天我威胁他，你说话不算数，到现在还没给我一张画，我可要公开你当过小和尚的秘密了！他没有正面回答，只是反唇相讥：“你小子现在变得又胖又老，也不像个样子了！”

我说话还是算数的，今天终于把苗兄的“隐私”公布于世，未知这样的索画方式能成功呢，还是不能成功。

正宗名药“四病克星”

高血压克星—— 资寿尼群地平片

首届全国“百病克星”大赛金奖
中国国货精品博览会银奖
河北省优秀新产品二等奖

尼群地平片属第二代钙拮抗剂，是目前治疗高血压病理想的首选药之一。在国外，1985年4月，联邦德国首次上市；在国内，同年9月，由本厂首家生产。本品的特点是：1. 高效。适用于各型高血压，尤其是老年人高血压及用其它降压药疗效不佳者，总有效率91.6%。舌下含服，抢救高血压急症，5分钟见效。2. 长效。一般每天服药一次即可。3. 安全。无明显副作用，偶见头痛、面红等不适反应，不需停药，可适当减量，继续服药后消失。未发现体位性低血者，对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及脑血管病也有防治作用。4. 不降低服药者生活质量，不影响性功能。这更是其它很多降压药所不能比拟的。

感冒克星—— 寿堂效灵感冒胶囊

中国国货精品博览会优秀奖
河北省优秀新产品三等奖
石家庄市优质产品奖

感冒发烧，发病率很高。八十年代海豚牌速效伤风胶囊，曾享誉省内外，至今仍畅销各地。实践证明，“速效”主要用于感冒初起而对病情较重的感冒往往不尽人意。为此，本厂从1983年起，便着力开发新一代抗感冒良药。1985年寿堂效灵感冒胶囊的问世，便是国内外众多的抗感冒药处方中，好中选优、博采众长的成功结晶。“效灵”，主含解热镇痛首选药阿司匹林、抗炎药牛磺酸和抗病毒药盐酸吗啉胍等成分，组方合理，相辅相成，疗效明显优于“速效”，用于各种感冒，总有效率为97.6%。过去人们认为：感冒不治也得一周。现在有了“效灵”，感冒三天可愈。

牙痛克星—— 寿堂牙痛安胶囊

河北省优秀新产品二等奖
河北省优质产品奖
振兴河北经济奖

俗话说：“牙痛不算病，痛起来真要命！”为何如此痛苦和难治呢？据文献报道：口腔感染尤其是牙周脓肿，几乎100%起因于厌氧菌感染；而被认为是抗感染药第三代里程碑的甲硝唑，则是抗厌氧菌的首选药。基于上述原理，本厂选用甲硝唑为主药在国内首创寿堂牙痛安胶囊，用于治疗急性智齿冠周炎、局部牙髓脓肿、牙龈炎和牙周炎，总有效率高达97.5%。有的患者反映牙病多年，口臭相伴，痛苦不堪言状，过去多方求医吃药效果都不好，结果只有拔牙了事；但吃了“寿堂牙痛安”，奇迹般地止住了牙痛，保住了牙齿，口臭也好了，惊叹不已，称赞本品是“真正的神药”。

痛经克星—— 寿堂妇科万应膏

首届全国“百病克星”大赛铜奖
中国妇女儿童用品
四十年博览会铜奖
河北省优秀新产品二等奖

妇女痛经、白带过多、经期紊乱、经量过多或闭经、小腹或腰部疼痛，都是妇科的常见疾患，多为各类盆腔炎症引起。特点是痛经，苦不堪言，病程长，可用西药少，而长年煎服中药，也很不便。本厂在老中医的指导和协助下，研制了主治痛经的新型含药橡皮膏——寿堂妇科万应膏。该药由十几味名贵的中药经提炼加工精制而成，外用穴位贴敷，治疗各类盆腔炎症，具有调经理血、消炎止痛和内病外治的卓越效果，使用携带方便，深受妇科病患者的欢迎和好评。

石 家 庄 市 新 华 制 药 厂

厂址：石家庄市中华南大街新华制药厂 厂长：牛守谦（高级工程师）

电话：331840（销售科）；331203（邮购部） 邮编：050091 电报：6687

请读者注意：海豚牌“四病克星”介绍及邮购方法向石家庄新华制药厂函索邮寄。

悼耀邦

——耀邦辞世四周年祭

杜卫东

多少回日月交替
——梦中身影依稀
走向青山 走向大地
多少次斗转星移
——话语犹在耳际
指点江山 指点春寒
啊！真诚的灵魂
是山 是海
山，有山的心扉
海，有海的魅力

胡耀邦

中国人民的儿子





高岗曾建议 将东北划归苏联吗？

所谓整理江青 “黑材料”始末

遭人嫉恨的林芳兵

扑朔迷离的“南山集”案

纪登奎下野之后

